

賴長楊 著

古代史學家傳

下

中外名文傳記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古代史学家传

(下)

赖长杨 主编

刘知几传

——《旧唐书》卷一〇二

【说明】刘知几（661—721），字子玄，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人。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。他的代表作是《史通》。《史通》全书共二十卷，分内篇、外篇二部分，内篇十卷三十九篇，外篇十卷十三篇，每一小篇均为专题论述的形式。其中内篇有三篇原文已经亡佚。

《史通》是对我国唐初以前史学状况的第一次全面总结。它在批评以往史学的基础上，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。包括：

史学目的论。《史通》认为，史学“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”（《史官建置》），治理国家绝不能缺少史学。史学的存在，是为了“申以劝诫，树之风声”（《直书》），史学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。

史家论。《史通》提出了衡量史家优劣的三个标准。首先，史家必须具备彰善瘅恶，不惧强御的“直笔”精神；其次，史家要具有编纂不朽史书的才华；第三，史家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。《史通》主张史家要撰述能成一家之言的史书，对唐高宗及武则天时期的史馆弊病作了尖锐的批评。

史书编纂论。《史通》论述了关于史书内容，史料选择、史书体裁、体例、文字表述，撰述原则在内的几个理论问题。指出“五志七科”是史书的主要内容，选择史料要博采而善择，纪传体、编年体是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，史书的文字表述要尚简，特别主张要“适时随俗”，要在史书中反映出时代风尚的变革。《史通》尤其强调，“书法不隐”，如实记事，是编纂实录史书的基本原则。

史学批评论。《史通》指出，进行史学批评，必须能够探赜索幽，不能妄测史家的本意。要根据时代的特点，评价史书价值。

总之，《史通》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史学理论著作。它的出现，把我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层面，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。

刘子玄，本名刘知几，是楚州刺史刘胤的同族孙子。刘知几少年时与其兄刘知柔都以擅长韵文之学而知名，二十岁时应举中进士，任命为获嘉县主簿。证圣年间，皇上下令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，各自说出时政得失。刘知几上表叙述了四件事情，言词非常确切率直。在这个时期，官爵僭滥而法规严厉周密，士人们竞相趋进，却有很多人陷于刑戮之中。刘知几于是著《思慎赋》以讽刺时局，并且以此表现自己的意愿。凤阁侍郎苏味道、李峤看到后赞叹道：“即使是陆机的《豪士赋》也不及此啊。”

刘知几于长安年间连续职任左史，兼修国史。后提升为凤阁舍人，但依然像过去一样参加修史工作。景龙初年，又

转任太子中允，依旧修国史。当时侍中韦巨源、纪处讷，中书令杨再思，兵部尚书宗楚客，中书侍郎萧至忠一起监修国史。刘知几认为监修过多，成为修国史工作最严重的弊端。萧至忠又曾经责备刘知几在著述上没有计划，刘知几于是请求免去修史的职务，写信给萧至忠陈述道：

我自从加入官吏的队伍，与众官站列在朝廷之上，进见奏报皇上，至今已三次被任命为史官，二次进入史馆，但最终却不能著成国史，并以此流传后代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我自己思考这件事，认为不能著成国史是由于五个原因。都是什么呢？古代的国史，都出自一家，如鲁国的左丘明，刘汉的司马迁，晋国的董狐，齐国的南史，他们都能著成不朽之作，藏于名山。从未听说过凭借众人的功力，才能撰成绝世佳作的。只有后汉在东观大集群儒，（撰写国史，）但在著述上没有主持人，也没有规定统一的体例。于是李伯度上表讥讽国史失实，仲长统认为应该焚毁。张衡、蔡邕二人在当时为修史发生纠纷，傅玄、范曄两家后来对这部书表示轻蔑。现在史馆选用的官员，是东汉修史人数的一倍，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荀悦、袁宏，各自夸誉自己是刘向、刘歆。每次要记载一件事，一句话，都搁笔相视，含着笔不能下一个结语。所以等头发白是可以期望的，但要等国史修成却没有日子。这是第一不可。

西汉时，郡县及诸侯国上报的载录地方人事、户口、赋税的簿书，先交给太史，再呈送丞相。后汉时，公卿

官员的奏书，先集中于公府，然后交给兰台。所以史官所修国史，记载的事情很广博。从近古开始，这种做法不再施行了。史官的編集记录，只有自己求询采集。但左史、右史的起居注有所缺漏，众多的门阀世族，如今也很少有人来通报他们的情况了。在州郡中搜访风俗民情，所见所闻都有不完备的方面；在官府藏书中寻讨历史沿革，却有许多原始材料书籍难以见到。即使让孔圣人出生在现在，也只能有管窥之见，况且我们限于中等才能，怎能达到广闻博识的目的？这是第二不可。

过去董狐以记事表明道义法则，并在朝廷上宣示；南史兄弟为了记载弑君一事，拿着竹简前往朝廷。而近代的修史机构，都设立在内城，幽居禁城之内，想要人们都看不见。思考这样做的用意，大约是以以此来谢绝情面，防止有人拉关系的缘故。然而如今史馆中的作者，士多如林，都喜言善辩，没有听说咬着舌头不说话的人。一旦有史书草成，一个字的嘉誉或贬毁，话还没有说完，朝野便都知道了；毛笔还没有插入笔套，官员们就都可以背诵了。孙盛的实录，被当权者嫉恨；王韶的直书，被贵族视为仇敌。这是人之常情啊，谁能不畏惧它呢！这是第三不可。

古时候刊定一史，纂成一家之言，体裁、规定都不一样，旨意目的也都不同。《尚书》的教导，是以通晓以往，预知未来为主；《春秋》的宗旨，是以惩恶劝善为首要目的。《史记》则黜退那些不愿做官的高洁之人而推荐奸雄；《汉书》则压抑忠臣而粉饰皇上的缺点。这些都是

过去的圣贤们有得有失的例子，是好史书应遵循的是非标准，过去写书的人说得已很详细了。近来史官注录记载，大多是承命于监修官，杨令公命令“必须直书”，宗尚书则说“应该把不好的事情多多地隐讳起来”。十头羊却有九个牧人，事情就很难做成；一个国家三个主人，听命、跟从谁呢？这是第四不可。

我个人认为史馆设置监修官，虽然古代没有模式，但追寻其名号渊源，还是可以说出一些的。所谓监，是总管统领的意思。如果是编年记事，则在时间上有起止断限；如果写作传体，叙述事迹，则记事有繁富有简洁。有的应该省略却不省略，有的应该记载而不记载，这些就违背了全书取舍的规则。连缀文词，排列史事，烦劳和安逸应该平均；挥洒铅粉，奋笔而书，勤快人和懒惰人的任务应相等。某卷某篇，交付给这个职务的人；某纪某传，归属于那个史官。这些就是选用人员安排事务的法则。这些都需要明确地定立规矩，详细确定职责范围，一旦每个人都自己思量着努力进取，那么史书就可立即写成。现在监修的官员既然不指派受理任务，撰写的官吏也没有可以遵守奉命的。这就使官员争着效法苟且之人，尽力互相推避任务，坐等季节的冷热变化，白白地延误岁月。这是第五不可。

凡是这些妨碍修撰国史的情况，类似的实在还有很多。我在这里用主要的几条概括这些，其它的举一反三便知道了。而如今众人的议论，怎么可以讥笑我在编撰史书上没有什么成就呢！近来我尊敬地看到大人您常

常心怀急切地勉励开导史官们，还时常提出要求，进行考察。您有时说著述典籍的事业很重大，要努力用心；有时说时间已经过去很多，国史何时才能完成？我个人认为，不确立制度条例，却徒劳地勤于督促、考察，即使以残酷的刑法进行威胁，以重金赏赐进行勉励，最终也是达不到目的的。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发挥自己的力量，承担责任，实在作不好就罢手。”我近来之所以向自己的知己敞开心扉、陈述想法，一个一个地触犯长官们，多次要辞去记载的官位，愿意罢免自己记言的职务，正是因为这句话的缘故。如今朝廷号称得到贤才，国家多有才学渊博之人，大明宫里，贤良正直者比比皆是，秘书省中，英奇之才一个挨着一个。我既然仿效圣贤没有成功，编撰的史书也没有最后完成，白白地用尽太官的饭食，凭空取得朝廷的俸禄。乞请还我以过去的职务，让我回到过去的住所，谢绝简书往来，避让朝廷纳贤之路。请求明达的长官您可怜我，答应我的请求。

萧至忠爱惜刘知几的才华，没有答应他辞去史官的请求。宗楚客嫉恨刘知几的正直，对其它史官说：“他写出这样的信，想把我等置于何地！”

当时刘知几又著《史通》二十卷，详细地议论史书的体例。太子右庶子徐坚非常重视这部书，曾说：“居于撰史职位上的人，应该将这部书置于座右。”刘知几自负史才，经常慨叹当时没有了解自己才能的人，于是将著国史的任务委托给著作郎吴兢，自己另外撰述《刘氏家史》十五卷、《谱考》三卷。推寻出汉氏是颍项后代陆终的子孙，并不是尧的后人。彭

成丛亭里的各支刘姓，都出自宣帝的儿子楚孝王刘嚣的曾孙司徒居巢侯刘恺之后，并不是承续楚元王刘交之后。所有这些，都考证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可以刊正前代的错误。虽然被世俗之人讥笑，但学者却敬佩他考据详实，学识渊博。起初，刘知几常说，如果能够得到皇帝授予的封号，就一定要以“居巢”为名，以继承从前司徒刘恺受封城邑的名号，后来刘知几因为撰修《则天实录》有功，果然被封为居巢县子。另外，刘知几的乡亲们因为刘氏兄弟六人都获进士及第，文章、学识名扬天下，就将乡里的名称改为高阳乡居巢里。

景云年间，刘知几连续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，兼崇文馆学士，并依旧修国史，加衔银青光禄大夫。当时玄宗是东宫太子，刘知几的名字在读音上与太子的名字相似，就改称子玄。景云二年，皇太子将亲自去国学祭奠先圣先师，（作为入学典礼）。有关部门起草了仪式的礼节章程，规定随从官员一律骑马、穿官服。子玄上奏建议道：

古时候自大夫以上，都乘车而马有四匹。魏、晋以后，直至隋代，京城的官员们都是乘坐牛车。历代经史，都记录有这些事情，不能在这里一一说明。至如李广北征匈奴，打完一仗即解下马鞍休息；马援南伐公孙述，依凭马鞍侦察敌情，这些都说明，设置鞍、马，是在军队中使用的；穿着戎服骑马，是图它方便骑射。南朝官员升为尚书郎的，常常随便骑马，于是被御史弹劾，颜延之罢官之后，喜欢骑马出入闾里，当时的人们都说他放诞不羁。这些都说明，如果乘坐专车，可以穿着朝衣；如果骑着御鞍的马匹，则应该穿着便服。举出近古的这些

例子，都是可以说明这个道理的明证。

自皇家应运而兴，就随着时代的需求，制定相关的制度。至于去陵庙扫墓祭祀，任命王公大臣，就穿着华丽的衣服鞋帽，乘坐豪华大车。一般的书生、百姓如果要穿着整洁的服装亲自迎接贵客，也是常常驾驭带有车箱的车子。（除此之外的）其它事情，则不再乘车，无论是贵族还是百姓外出，都只是骑马而已。臣子我近来看不到天子的车驾外出巡幸，皇车一出发上路，左右侍卫都身着朝服乘马。既然穿戴正规，就只能配上车出行。如今既然罢除了侍卫乘车的规矩，但服装却不更换，可谓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啊。为什么呢？宽衣大带，革履高冠，本来就不是马上能使用的，当然是坐车才能穿的衣服。如果一定要穿着袜子踩镫，不穿鞋子骑马，不但没有遵循传统习惯，也违背了当今习俗。想要求得折中，是不行的。而且衣袖宽广，飘飘扬扬，佩玉叮咚，丝带成行，节奏明快，神采飞扬，驰行于世俗的骚扰之内，出入于旌旗术戟之间，一旦马受惊飞奔，骑者颠坠于地，便会使成排车马的两旁，丢满大量的鞋子，皇车专用的路上，受阻的马匹一个连着一个。这当然就会使路边的行人嗤笑，因而有损皇家的威仪。

现在提出建议的人都说，秘阁之中有《梁武帝南郊图》，图上有许多戴着高冠骑马的人，这是近代出现的事情，不能说（盛服骑马的事在过去）没有记载。但我认为这幅图是后人所画，并不是当时的作品。而且现在有许多关于古今事情的图画，如张僧繇画有《群公祖二

疏》，图中兵士有的穿着草鞋；阎立本画《明君入匈奴》，图中妇女有的戴着周边缝有黑纱以防风沙的帽子。可是草鞋出于水乡，并非中原所有；防风沙的帽子创始于隋代，并非汉代宫廷的服饰。建议盛服骑马的人难道可以根据这二幅画，就认为中原果真有草鞋，西汉果真有防风沙的帽子吗？因此说，《梁氏南郊之图》（所画并非当时之事），道理就在于此。再说，解经的书宣扬要顺应习俗，《礼》经注重依据实际情况。殷商乘辂车，周代用冕，规模不一样；秦代男子讲究戴冠，汉代男子喜欢佩剑，用舍没有常规。何况我们国家在道义上超过任何一个帝王，功高万古，如果礼节、事情不便利的，当然有权力加以变通。身着朝服骑马这种形式，我个人认为应当废除。我怀有这一异议，已经很久了，由于没有机会，一直没来得及宣扬。现在恰逢殿下您要前往国学与众卿之子一起读书，凡有衣冠乘马的人都畏惧这次出行，所以我轻率地进此狂言，以申说我的鄙陋之见。

皇太子亲笔批示对外宣布施行，并编入制度中，作为常规。

开元初年，刘知几升任左散骑常侍，修史职务依然不变。开元九年，刘知几长子刘颙任职太乐令，由于触犯条律被发配流放。刘知几为此到执法部门申诉。皇上听到这件事后很愤怒，贬授刘知几为安州都督府别驾。刘子玄负责撰修国史，首尾共二十多年，有许多成就，甚为当时人们称赞。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子玄：“自古以来，文学人才多而史学人才少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刘子玄回答说：“做为史学人才，必须具备三

项才能，世上没有这种人，所以史才缺少。三项才能，是说才、学、识。只有学问而没有能力，就比如有百顷良田，黄金满筐，却使愚笨的人去经营，永远不能发财致富。只有能力而没有学问，就好像兼有雕刻石玉的才思，灵巧得像公输，但家中却没有雪、桡一类的木料，斧头一类的工具，最终不能完成宫室的建造。尤其须要坚持正义，端正刚直，善恶必书，使骄奢的皇上，祸国的臣子，也有他们惧怕的事情。这样就会如虎添翼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人才，天下也没有能够敌挡他的人。倘若不具备（以上这三种）才能，就不能忝居史官的位置。自远古以来，能够符合这几项要求的，实在是很少。”当时人们认为这些话是很有见解的。刘子玄到了安州之后，没有多长时间就去世了，享年六十一岁。他从小到老，撰述不倦，只要朝廷里有论著的任务，他就一定会任居其职。曾参予修撰了《三教珠英》、《文馆词林》、《氏族系录》，论断《孝经》并非郑玄所注，《老子》没有河上公的注，又修撰了《唐书实录》。这些著述都在当时流行，又有文集三十卷。刘知几去世数年之后，玄宗诏令河南府派人到他家抄写《史通》，进献给朝廷。玄宗读过之后，觉得很不错，于是追赠刘子玄汲郡太守；不久又追赠为工部尚书，谥号“文”。

（任宝菊 译）

【原文】

刘子玄，本名知几，楚州刺史胤之族孙也。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，弱冠举进士，授获嘉主簿。证圣年，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时政得失，知几上表陈四事，词甚切直。是时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，士类竟为趋进而多陷刑戮，知几乃

著《思慎赋》以刺时，且以见意。凤阁侍郎苏味道、李峤见而叹曰：“陆机《豪士》所不及也。”

知几长安中累迁左史，兼修国史。擢拜凤阁舍人，修史如故。景龙初，再转太子中允，依旧修国史。时侍中韦巨源、纪处讷、中书令杨再思、兵部尚书宗楚客、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，知几以监修者多，甚为国史之弊。萧至忠又尝责知几著述无课，知几于是求罢史任，奏记于至忠曰：

仆自策名士伍，待罪朝列，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，竟不能勒成国典，贻彼后来者，何哉？静言思之，其不可者五也。何者？古之国史，皆出自一家，如鲁、汉之丘明、子长，晋、齐之董狐、南史，咸能立言不朽，藏诸名山，未闻藉以众功，方玄绝笔。唯后汉东观，大集群儒，而著述无主，条章靡立。由是伯度讥其不实，公理以为可焚，张、蔡二子纠之于当代，傅、范两家嗤之于后叶。今史司取士，有倍东京，人自以为荀、袁，家自称为政、骏。每欲记一事，载一言，皆阁笔相视，含毫不断。故首白可期，而汗青无日。其不可一也。

前汉郡国计书，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；后汉公卿所撰，始集公府，乃上兰台。由是史官所修，载事为博。原自近古，此道不行，史臣编录，唯自询采。而左右二史，阙注起居；衣冠百家，罕通行状。求风俗于州郡，视听不该；讨沿革于台阁，簿籍难见。虽使尼父再出，犹且成其管窥，况限以中才，安能遂其博物。其不可二也。

昔董狐之书法也，以示于朝；南史之书弑也，执简以往。而近代史局，皆通籍禁门，幽居九重，欲人不见。

寻其义者，由杜彼颜面，防诸请谒故也。然今馆中作者，多士如林，皆原长喙，无闻齟舌。倘有五始初成，一字加贬，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，笔未栖毫而晋绅咸诵。夫孙盛实录，取嫉权门；王韶直书，见仇贵族。人之情也，能无畏乎！其不可三也。

古者刊定一史，纂成一家，体统各殊，指归咸别。夫《尚书》之教也，以疏通知远为主；《春秋》之义也，以惩恶劝善为先。《史记》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《汉书》则抑忠臣而饰主阙。斯并曩贤得失之例，良史是非之准，作者言之详矣。顷史官注记，多取稟监修，杨令公则云“必须直词”，宗尚书则云“宜多隐恶”。十羊九牧，其事难行；一国三公，适从焉在？其不可四也。

窃以史置监修，虽无古式，寻其名号，可得而言。夫言监者，盖总领之义耳。如创纪编年，则年有断限，草传叙事，则事有丰约。或可略而不略，或应书而不书，此失刊削之例也。属词比事，劳逸宜均；挥铅奋墨，勤惰须等。某帙某篇，付之此职；某纪某传，归之此官。此铨配之理也。斯并宜明立科条，审定区域，倘人思自勉，则书可立成。今监之者既不指授，修之者又无遵奉。用使争学苟且，务相推避，坐变炎凉，徒延岁月。其不可五也。

凡此不可，其流实多，一言以蔽，三隅自反。而时谈物议，焉得笑仆编次无闻者哉！比者伏见明公每汲汲于劝诱，勤勤于课责。或云坟籍事重，努力用心；或云岁序已淹，何时辍手？窃以纲维不举，而督课徒勤，虽

威以次骨之刑，勛以悬金之赏，终不可得也。语曰：“陈力就列，不能则止。”仆所以比者布怀知己，历抵群公，屡辞载笔之官，愿罢记言之职者，正为此耳。当今朝号得人，国称多士。蓬山之下，良直差肩；芸阁之中，英奇接武。仆既功亏刻鹄，笔未获麟徒殚太官之膳，虚索长安之米。乞以本职，还其旧居，多谢简书，请避贤路。惟明公足下哀而许之。

至忠惜其才，不许解史任。宗楚客嫉其正直，谓诸史官曰：“此人作书如是，欲置我何地！”

时知几又著《史通子》二十卷，备论史策之体。太子右庶子徐坚深重其书，尝云：“居史职者，宜置此书于座右。”知几自负史才，常慨时无知己，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，别撰《刘氏家史》十五卷、《谱考》三卷。推汉氏为陆终苗裔，非尧之后；彭城丛亭里诸刘，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嚣曾孙司徒居巢侯刘恺之后，不承楚元王交。皆按据明白，正前代所误，虽为流俗所讥，学者服其该博。初，知几每云若得受封，必以居巢为名，以绍司徒旧邑；后以修《则天实录》功，果封居巢县子。又乡人以知几兄弟六人进士及第，文学知名，改其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。

景云中，累迁太子左庶子，兼崇文馆学士，仍依旧修国史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时玄宗在东宫，知几以名音类上名，乃改子玄。二年，皇太子将亲释奠于国学，有司草仪注，令从臣皆乘马著衣冠。子玄进议曰：

古者自大夫以上，皆乘车而以马为骖服。魏、晋以降，迄乎隋代，朝士又驾牛车。历代经史，具有其事，不

可一二言也。至如李广北征，解鞍憩息；马援南伐，据鞍顾盼，斯则鞍马之设，行于军旅；戎服所乘，贵于便习者也。按江左官至尚书郎而辄轻乘马，则为御所弹。又颜延之罢官后，好骑马出入闾里，当代称其放诞。此则专车凭轼，可擢朝衣；单马御鞍，宜从褻服。求之近古，灼然之明验也。

自皇家抚运，沿革随时。至如陵庙巡謁，王公册命，则盛服冠履，乘彼辂车。其士庶有衣冠亲迎者，亦时以服箱充馭。在于他事，无复乘车，贵贱所行，通用鞍马而已。臣伏见比者，銮輿出幸，法驾首途，左右侍臣，皆以朝服乘马。夫冠履而出，只可配车而行，今乘车既停，而冠履不易，可谓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。何者？褻衣博带，革履高冠，本非马上所施，自是车中之服。必也鞮而升蹬，跣以乘鞍，非唯不师古道，亦自取惊今俗。求诸折中，进退无可。且长裾广袖，襜如翼如，鸣珮行组，锵锵奕奕，驰骤于风尘之内，出入于旌旗之间，倘马有惊逸，人从颠坠，遂使属车之右，遗履不收，清道之傍，绁骖相续，固以受嗤行路，有损威仪。

今议者皆云秘阁有《梁武帝南郊图》，多有危冠乘马者，此则近代故事，不得谓无其文。臣案此图是后人所为，非当时所撰。且现代间有古今图画者多矣，如张僧繇画《群公祖二疏》，而兵士有著芒屨者；阎立本画《明君入匈奴》，而妇人有著帷帽者。夫芒屨出于水乡，非京华所有；帷帽创于隋代，非汉宫所作。议者岂可征此二

画，以为故实者乎？由斯而言，则《梁氏南郊之图》，义同于此。又传称因俗，礼贵缘情。殷辂周冕，规模不一；秦冠汉佩，用舍无常。况我国家道轶百王，功高万古，事有不便，理资变通，其乘马衣冠，窃谓宜从省废。臣怀此异议，其来自久，日不暇给，未及摧扬。今属殿下亲从齿胄，将临国学，凡有衣冠乘马，皆惮此行，所以辄进狂言，用申鄙见。

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，仍编入令，以为常式。

开元初，迁左散骑常侍，修史如故。九年，长子贲为太乐令，犯事配流。子玄诣执政诉理，上闻而怒之，由是贬授安州都督府别驾。

子玄掌知国史，首尾二十余年，多所撰述，甚为当时所称。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：“自古已来，文士多而史才少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史才须有三长，世无其人，故史才少也。三长，谓才也、学也、识也。夫有学而无才，亦犹有良田百顷，黄金满盈，而使愚者营生，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。如有才而无学，亦犹思兼匠石，巧若公输，而家无榱桷斧斤，终不能果成其宫室者矣。犹须好是正直，善恶必书，使骄主贼臣，所以知惧，此则为虎傅翼，善无可加，所向无敌者矣。脱苟非其才，不可叨居史任。自夙古以来，能应斯目者，罕见其人。”时人以为知言。子玄至安州，无几而卒，年六十一。自幼及长，述作不倦，朝有论著，必居其职。预修《三教珠英》、《文馆词林》、《姓族系录》，论《孝经》非郑玄注，《老子》无河上公注，修《唐书实录》，皆行于代，有集三十卷。

后数年，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写《史通》以进，读而善之，追赠汲郡太守；寻又赠工部尚书，谥曰文。

李吉甫传

——《旧唐书》卷一四八

【说明】李吉甫（757-814年），字弘宪，赵郡（今河北境内）人。他的刻意之作是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。该志是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方总志。原有图和志共四十卷，目录二卷，图在北宋时就已亡佚，现存仅有三十四卷。此书虽冠以元和的年号，但不是元和时实际控制的疆域地志，它以贞观十三年规划的十道为纲领，配合当时的四十七镇，每镇一图一志，而实际上是以府或州为叙述单位，先列府、州的名称以及等级，户和乡的数目，次叙沿革形势，府、州四至八到的方里，开元、元和的贡赋，然后记叙属县的数目、名称，各县的沿革，主要山川、城邑、军事设施以及历代发生重大事迹等等。李吉甫“审户口之丰耗，辨州域之疆”，重视“兵饷山川，攻守利害”，体现他撰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仿李泰《括地志》体例，搜集汉、魏、六朝各家地记，兼采《水经注》及《括地志》，材料丰富，然而也有一些袭旧说而失考核的地方。

李吉甫，字弘宪，赵郡人。父亲李栖筠，在代宗朝为御

史大夫，在当时名望显重，国史有传。李吉甫年幼好学，能连词缀句写文章。二十七岁，为太常博士，知识广博多见闻，尤其精通本朝历史，对事件的沿革能取中正无所偏倚，时论大多称赞他。调任屯田员外郎，仍为博士，改任驾部员外郎。宰相李泌、窦参推重李吉甫的才能，对待他非常优厚。到陆贽为宰相，出京城为明州员外长史，很久以后才遇赦，起用为忠州刺史。这时陆贽已被贬谪到忠州，议论的人说李吉甫一定要对陆贽发泄久积的怨恨，加重他的罪行；到李吉甫抵达忠州，和陆贽相处非常欢悦，不曾把原来的嫌隙放在心上。李吉甫六年不调任，因病免官。不久，授官郴州刺史，迁往饶州。先前，饶州城因连续死了四位刺史，废置无人居住，又有物怪变异之事，郡中人士相信其灵验；李吉甫到饶州，打开饶州城的大锁，剪除荆棘荒草而住下，以后人们就也安居了。

宪宗即位，征辟李吉甫拜为考功郎中，知制诰，已到朝廷，不久又召入翰林为学士，转为中书舍人，赐紫袍。宪宗刚即位，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亲昵友善，盗用朝廷权力的情况严重，李吉甫请求罢免他们。刘辟造反，宪宗下令诛讨刘辟，计谋还未确定，李吉甫秘密帮助谋划，还请求广泛征调江淮的军队，由三峡路进入，以此分散蜀盗贼的兵力。这些建议都得到朝廷的允许和采纳，由此更被皇帝所亲信。元和二年春季，杜黄裳出京师兼河中尹、河中晋绛等州节度使，提升李吉甫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李吉甫生性聪敏，详审熟习各类事物，从员外郎起为官，滞留江淮十五年多，完全了解百姓的疾苦。到这时为宰相，忧患方镇贪婪

恣虐，于是奏言使属下州郡的刺史能自主地治理州事。李吉甫按顺序举进众人材，颇有好名声。

元和三年秋季，裴均为仆射、判度支，结交权臣、宠臣，想当宰相。以前，诏令策试直言极谏科，应试中有讥评朝政，触犯权臣宠臣的人，因此裴均的党羽就扬言这些人都是执政教唆指使的，企图以此动摇李吉甫的地位，幸亏依靠谏官李约、独孤郁、李正辞、萧俛上密疏陈述原委，宪宗的愠意才得以化解。李吉甫早年了解勉励羊士谔，提拔他为监察御史，还有，司封员外郎吕温有作词章的才能，李吉甫也爱重而接待他。窦群也和羊士谔、吕温友善，窦群开始拜为御史中丞，就上奏请求令羊士谔为侍御史，吕温为郎中、掌管杂事。李吉甫生气窦群不事先禀报，而所请又有超越官资顺序的，扣着公文几天也不实行，因而与窦群有了怨隙。窦群就伺机了解到从事占侯卜筮的陈克明经常出入李吉甫家，秘密地抓住他闻于朝廷，宪宗审问陈克明，没有奸猾行为。李吉甫认为裴均长期在翰林，又得宪宗亲信，一定担当大任，于是秘密推举他取代自己，因而自己谋求出京师为节度使。这年九月，李吉甫拜检校兵部尚书、兼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立任淮南节度使，宪宗在通化门楼为他饯行。在扬州，每当朝廷有得失，关系军国利害，李吉甫都以密疏论列。又在高邮筑堤为池塘，灌溉土地数千顷，百姓受到筑堤的好处。

元和五年冬季，裴均因病免官。第二年正月，授予李吉甫金紫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赵国公。到再入朝为宰相，请求减省官职数额和各种出身办事文吏等，以及裁定朝廷内外官俸钱，当时

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。京城众僧有因庄田水磨而免税的，李吉甫上奏说：“征收钱米。一向有定额，众僧有余力而宽免，却摊配给贫穷而无处求助的百姓，一定不能允许。”宪宗才停止免僧众的税，又请求让普润军回到泾原。

七年，京兆尹元义方奏说：“永昌公主按礼令建造祠堂，请定其法规。”当初，贞元年间，义阳、义章二公主都在墓所建造一百二十间祠堂，耗费钱币数万；到永昌公主用遵守的法规，宪宗命令义方按旧法规减半。李吉甫上奏说：“因永昌公主幼年夭折，举世同悲，何况陛下的圣情，当然极其眷念。然而，陛下如果减旧法规建造一半，表示出折衷的法规，昭显节俭以训诫他人，的确超越古今。臣以为祠堂的设置，礼典中无记载，德宗皇帝一时施恩，此事沿袭习俗，当时民间私下有议论。从前汉章帝的时候，想在光武帝原陵、明帝显节陵分别建造村舍，东平王刘苍上疏说这样做不行。东平王就是光武帝的爱子，明帝的爱弟。贤王的心意，难道吝惜用于父兄的费用吗！实在是因为这是人合于礼的事，人君所应当慎重的事。现在，按义阳公主例建起祠堂，臣以为恐怕不如按数设置墓户，以此充任守护奉祀。”第二天，宪宗对李吉甫说：“爱卿昨天所奏有关罢祠堂事，深切地符合朕意。朕开始担心起祠堂花费多，因为不知道过去规定，所以量情减少。看了爱卿所陈述的内容，才知道这样做没有根据。然而朕不想析出二十户百姓，应当挑官户托付他们为墓户。”李吉甫拜贺。宪宗说：“爱卿，这难道是难事。有关朕身的不利于时政的，假如听到就改，这难道足以能够受到赞扬吗！爱卿只勤于匡正时政，不要说朕不能施行。”

七年七月，宪宗亲临延英殿，看着李吉甫对他说：“朕近来全废止了游猎，只喜欢读书，昨天在《代宗实录》中，看到当时法度尚未振作，朝廷多事，也有所鉴诫。向后又看到爱卿先人的事迹，实在可以嘉奖称叹。”李吉甫降阶跪在地上奏说：“臣先父伏事代宗，尽心尽节，迫于不定的命运，未赶上圣时，臣出于内心深处的赤诚，经常有所追恨。陛下特别喜好文史，闻见天天更新，看到先父忠于前朝的事迹，记载在实录上，今天特别赐予褒奖宣扬，先父虽然在九泉之下，也如同看到了太阳。”因此俯伏在地泪流不止，宪宗安慰劝谕他。

八年十月，宪宗亲临延英殿，问时政记记什么事。当时李吉甫监修国史，先回答说：“时政记是宰相记录天子的事以此授于史官的实录。古代左史记言，现在是起居舍人之职；右史记事，现在是起居郎之职。永徽年间，宰相姚珣监修国史，忧虑亲近的话，有的不能听到，因此请求在场仪卫随时随地将奏对记下，以此授于史官，就是现在的时政记。”宪宗说：“有的时候不修时政记，为什么呢？”李吉甫说：“当面奉受德音，没来得及施行，都可谓是机密，所以不能记录送给史官；在这中间还有的谋议是臣下提出的，也不能自己写了以此交付史官；至于已经施行的，诏令已明示天下，天下都能闻见，史官就能记，不必等写好交付。况且臣看时政记的情况，姚珣修时政记在长寿年间，到姚珣免官修时政记也停了；贾耽、齐抗修时政记在贞元年间，到贾耽、齐抗罢官，修时政记的事就搁置一旁了。然则涉及时政的发展变化，不虚美、不隐恶，可称之为良史。”

这个月，回纥部落南过沙漠，夺取西城柳谷路征讨吐蕃，

西城防御使周怀义奏表到朝廷，朝廷非常惊恐，认为回纥声称讨伐吐蕃，其用意是进犯唐朝。李吉甫上奏说：“回纥进犯，抑或当是慢慢拒绝议和之事，不应立即就来进犯边境，朝廷只须防备，不必忧虑。”因此请求从夏州到天德，恢复已废弃的馆驿十一所，以此通报紧急情况，又请求调发夏州骑士五百人，驻扎在经略故城，响应援助驿使，兼有防党项的任务。

九年，李吉甫请求朝廷在经略故城设置宥州。六胡州因在灵盐界内，开元中废六州。李吉甫说：“国家以前设宥州，以宽宥为州名，统领众投降户。天宝末年，宥州寄治在经略军，大概因其地居中，可以总领蕃部，于北可以接应天德，于南可以支援夏州。现在经略军遥属灵武，又不设置军镇，不是旧的法规。”宪宗采纳李吉甫的奏议，又设宥州，下诏说：“天宝年间宥州寄治在经略军，宝应以来，因循之制于是废除。因此昆夷屡来骚扰，党项无依靠，对蕃部的人，抚慰怀化不及。朕正弘扬远略，想恢复旧的法规，应在经略军设宥州，仍为上州，在宥州城下设延恩县，为上县，隶属夏绥银观察使。”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，他的儿子吴元济请求承袭父亲的职位，李吉甫认为淮西在内地，不同于河朔，况且四境没有同伙支援，国家有几十万军队常驻淮西以为守御，应当按时将淮西取回。这非常符合宪宗的旨意，开始策划经营规划淮西的计谋。

元和九年冬季，李吉甫因得暴病去世，终年五十七。宪宗长久伤心哀悼他的去世，从宫廷派使者前往凭吊，除通常的赠与之外，宫廷出绢五百疋用以抚恤其家属，又赠司空。李吉甫开始作宰相，颇能协调时势民情，到从淮南再度征为宰

相，朝廷内外殷切地希望他再展风采。执政之后，视听经常有所闭塞，人心怀疑忌惮他。当时以公众愿望为己任的人顾虑被李吉甫猜忌，大多数人躲避、畏惧他。宪宗暗地里知道这事，不到一周年，就提升任用李绹，李吉甫和李绹非常不和；而且李绹性情刚直，揭发人的过失不徇情，在宪宗面前李绹与李吉甫互有争论，人们多以为李绹正直。然而，李吉甫性情胆小谨慎，虽然是他不高兴的人，也无所伤害。李吉甫穿衣吃饭，一定要极其珍美，然而不增置财产，除京城有一处宅第外，没有其他的宅第、别墅，公众舆论以此敬重他。有关部门给李吉甫谥号为“敬宪”，到会集议论时，度支郎中张仲方驳此谥号，认为过于优奖。宪宗发怒，贬斥张仲方，赐李吉甫谥号为“忠懿”。

李吉甫曾研讨《易象》异议，附在一行集注之下，以及连缀纪录东汉、魏、晋、周、隋故事，终成各朝成败损益的大事，名为《六代略》，共三十卷；分天下各镇，记录它的山川险要平易及沿革等，分别画地图列于每篇之首，是五十四卷，题为《元和郡国图》，又和史官等记录当时的户口赋税及兵籍，号为《国计簿》，共十卷；还纂《唐六典》诸官职为《百司举要》一卷。这些著作都奏上朝廷，流行于当代。李吉甫的儿子名叫李德脩、李德裕。（曾贻芬译）

【原文】

李吉甫，字弘宪，赵郡人。父棲筠，代宗朝为御史大夫，名重于时，国史有传。吉甫少好学，能属文。年二十七，为太常博士，该洽多闻，尤精国朝故实，沿革折衷，时多称之。迁屯田员外郎，博士如故，改驾部员外。宰臣李泌、窦参推

重其才，待遇颇厚。及陆贄为相，出为明州员外长史，久之遇赦，起为忠州刺史。时贄已谪在忠州，议者谓吉甫必逞憾于贄，重构其罪；及吉甫到部，与贄甚欢，未尝以宿嫌介意。六年不徙官，以疾罢免。寻授郴州刺史，迁饶州。先是，州城以频丧四牧，废而不居，物怪变异，郡人信谵；吉甫至，发城门管钥，剪荆榛而居之，后人乃安。

宪宗嗣位，征拜考功郎中、知制诰，既至阙下，旋召入翰林为学士，转中书舍人，赐紫。宪宗初即位，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暱善，颇窃朝权，吉甫请去之。刘辟反，帝命诛讨之，计未决，吉甫密赞其谋，兼请广征江淮之师，由三峡路入，以分蜀寇之力。事皆允从，由是甚见亲信。二年春，杜黄裳出镇，擢吉甫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吉甫性聪敏，详练物务，自员外郎出官，留滞江淮十余年，备详闾里疾苦。及是为相，患万镇贪恣，乃上言使属郡刺史得自为政。叙进群材，甚有美称。

三年秋，裴均为仆射、判度支，交结权倖，欲求宰相。先是，制策试直言极谏科，其中有讥刺时政，忤犯权倖者，因此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，冀以摇动吉甫，赖谏官李约、独孤郁、李正辞、萧俛密疏陈奏，帝意乃解。吉甫早岁知奖羊士谔，擢为监察御史；又司封员外郎吕温有词艺，吉甫亦眷接之。窦群亦与羊、吕善，群初拜御史中丞，奏请士谔为侍御史，温为郎中、知杂事。吉甫怒其不先关白，而所请又有超资者，持之数日不行，因而有隙。群遂伺得日者陈克明出入吉甫家，密捕以闻，宪宗诘之，无奸状。吉甫以裴垪久在翰林，宪宗亲信，必当大用，遂密荐垪代己，因自图出镇。其

年九月，拜检校兵部尚书，兼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充淮南节度使，上御通化门楼饯之。在扬州，每有朝廷得失，军国利害，皆密疏论列。又于高邮县筑堤为塘，溉田数千顷，人受其惠。

五年冬，裴垍病免。明年正月，授吉甫金紫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赵国公。及再入相，请减省职员并诸色出身胥吏等，及量定中外官俸料，时以为当。京城诸僧有以庄硿免税者，吉甫奏曰：“钱米所征，素有定额，宽缁徒有余之力，配贫下无告之民，必不可许。”宪宗乃止。又请归普润军于泾原。

七年，京兆尹元义方奏：“永昌公主准礼令起祠堂，请其制度。”初贞元中，义阳、义章二公主咸于墓所造祠堂一百二十间，费钱数万；及永昌之制，上令义方减旧制之半。吉甫奏曰：“伏以永昌公主，稚年夭枉，举代同悲，况于圣情，固所钟念。然陛下犹减制造之半，示折衷之规，昭俭训人，实越今古。臣以祠堂之设，礼典无文，德宗皇帝恩出一时，事因习俗，当时人间不无窃议。昔汉章帝时，欲为光武原陵、明帝显节陵各起邑屋，东平王苍上疏言其不可。东平王即光武之爱子，明帝之爱弟。贤王之心，岂惜费于父兄哉！诚以非礼之事，人君所当慎也。今者，依义阳公主起祠堂，臣恐不如量置墓户，以充守奉。”翌日，上谓吉甫曰：“卿昨所奏罢祠堂事，深惬朕心。朕初疑其冗费，缘未知故实，是以量减。览卿所陈，方知无据。然朕不欲破二十户百姓，当拣官户委之。”吉甫拜贺。上曰：“卿，此岂是难事。有关朕身，不便于时者，苟闻之则改，此岂足多耶！卿但勤匡正，无谓朕不

能行也。”

七年七月，上御延英，顾谓吉甫曰：“朕近日畋游悉废，唯喜读书。昨于《代宗实录》中，见其时纲纪未振，朝廷多事，亦有所鉴戒。向后见卿先人事迹，深可嘉叹。”吉甫降阶跪奏曰：“臣先父伏事代宗，尽心尽节，迫于流运，不待圣时，臣之血诚，常所追恨。陛下耽悦文史，听览日新，见臣先父忠于前朝，著在实录，今日特赐褒扬，先父虽在九泉，如睹白日。”因俯伏流涕，上慰谕之。

八年十月，上御延英殿，问时政记何事。时吉甫监修国史，先对曰：“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。古者左史记言，今起居舍人是；右史记事，今起居郎是。永徽中，宰相姚珣监修国史，虑造膝之言，或不可闻，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，以授于史官，今时政记是也。”上曰：“间或不修，何也？”曰：“面奉德音，未及施行，总谓机密，故不可书以送史官；其间有谋议出于臣下者，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；及已行者，制令昭然，天下皆得闻知，即史官之记，不待书以授也。且臣观时政记者，姚珣修之于长寿，及珣罢而事寝；贾耽、齐抗修之于贞元，及耽、抗罢而事废。然则关时政化者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谓之良史也。”

是月，回纥部落南过碛，取西城柳谷路讨吐蕃，西城防御使周怀义表至，朝廷大恐，以为回纥声言讨吐蕃，意是入寇。吉甫奏曰：“回纥入寇，且当渐绝和事，不应便来犯边，但须设备，不足为虑。”因请自夏州至天德，复置废馆一十一所，以通缓急。又请发夏州骑士五百人，营于经略故城，应援驿使，兼护党项。九年，请于经略故城置宥州。六胡州以

在灵盐界，开元中废六州。曰：“国家旧置宥州，以宽宥为名，领诸降户。天宝末，宥州寄理于经略军，盖以地居其中，可以总统蕃部，北以应接天德，南援夏州。今经略遥隶灵武，又不置军镇，非旧制也。”宪宗从其奏，复置宥州，诏曰：“天宝中宥州寄理于经略军，宝应已来，因循遂废。由是昆夷屡扰，党项靡依，蕃部之人，抚怀莫及。朕方弘远略，思复旧规，宜于经略军置宥州，仍为上州，于郭下置延恩县，为上县，属夏绥银观察使。”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，其子元济请袭父位。吉甫以为淮西内地，不同河朔，且四境无党援，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为守御，宜因时而取之。颇叶上旨，始为经度淮西之谋。

元和九年冬，暴病卒，年五十七。宪宗伤悼久之，遣中使临吊，常赠之外，内出绢五百匹以恤其家，再赠司空。吉甫初为相，颇洽时情，及淮南再征，中外延望风采。秉政之后，视听时有所蔽，人心疑惮之。时负公望者虑为吉甫所忌，多避畏。宪宗潜知其事，未周岁，遂擢用李絳，大与絳不协；而絳性刚讦，于上前互有争论，人多直絳。然性畏慎，虽其不悦者，亦无所伤。服物食味，必极珍美，而不殖财产，京师一宅之外，无他第墅，公论以此重之。有司谥曰“敬宪”，及会议，度支郎中张仲方驳之，以为太优。宪宗怒，贬仲方，赐吉甫谥曰“忠懿”。

吉甫尝讨论《易象》异义，附于一行集注之下；及缀录东汉、魏、晋、周、隋故事，论其成败损益大端，目为《六代略》，凡三十卷；分天下诸镇，纪其山川险易故事，各写其图于篇首，为五十四卷，号为《元和郡国图》；又与史官等录

当时户赋兵籍，号为《国计簿》，凡十卷；纂《六典》诸职为《百司举要》一卷。皆奏上之，行于代。子德修、德裕。

苏冕传

——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九下

【说明】苏冕，京兆武功（今陕西武功西）人，著有《古今国典》一百卷，《会要》四十卷。这部《会要》开创了典制断代史的前河，它记载了从唐高祖到唐代宗九朝的典章制度，而且流行于当时。苏冕这部《会要》的原书已不存在，但是在《会要》撰成的五十年后，即唐宣宗大中七年，由崔铉监修，杨绍复、崔琢、薛逢、郑言等撰成《续会要》四十卷，起唐德宗，续到唐宣宗大中六年，增加了七朝事迹。又过百年，宋代的王溥对苏冕、崔铉等人的《会要》重加整理，又增补了唐宣宗以后至唐末的史事，完成《新编唐会要》一百卷。《唐会要》基本保留下来，虽然不知王溥怎样整理的苏冕的《会要》，但苏冕对会要这种史书撰述体裁的创造之功则是显而易见的。

苏冕聚集国朝政事，撰述《会要》四十卷，流行于当时。其弟苏弁藏书达到二万卷，都是亲自刊校的，至今还说苏氏的书，仅次于集贤秘阁的藏书。贞元二十一年，在家去世。苏袞从赞善大夫贬为永州司户参军，朝廷敕命：“苏袞贬官，本

来缘于受其弟株连。哀怜他年已迟暮，加上患有疾病，应该命令永州强行将他送回，听任他回到自己家里。”苏衮年纪已过七十，两眼看不见已经一年了，因为苏弁的缘故，竟然没有停职。到被贬官，德宗听说他的事怜悯他，所以允许他回家。不久去世。当初，苏冕已因苏弁而获罪贬官，间或有人说苏冕有才学，德宗后悔早不知道此事，但已经被贬出京城，又恢复了苏衮原来的官职，难以再追还苏冕的官职，于是就作罢。

(曾贻芬 译)

【原文】

冕缙国朝政事，撰《会要》四十卷，行于时。弁聚书至二万卷，皆手自刊校，至今言苏氏书，次于集贤秘阁焉。贞元二十一年，卒于家。衮自赞善大夫贬永州司户参军，敕：“苏衮贬官，本缘弟连坐。矜其年暮，加以疾患，宜令所在勒回，任归私第。”衮年且七十，两目无见已逾年，以弁之故，竟未停官。及贬，上闻之哀悯，故许还家。寻卒。初，冕既坐弁贬官，或有人言冕才学，上悔不早知，业已贬出，又复还衮，难以再追冕，乃止。

杜佑传

——《新唐书》卷一六六

【说明】杜佑，（735—812年），字君卿，京兆万年（今陕西西安附近）人。他从十八岁起就先后担任过青苗使、江淮水陆转运使等职，并历任德宗、顺宗、宪宗三朝宰相。他穷三十六年之功撰修的《通典》二百卷，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专史，记载了从传说的黄帝到唐朝天宝年间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流变，开创了史学著述的新途径，对后世有极大影响。宋代郑樵仿其例作《通志》，元代马端临亦仿其例作《文献通考》，合《通典》，就是有名的“三通”。

《通典》分为食货、选举、职官、礼、乐、兵刑、州郡、边防八典，每典又分为若干子目。它把食货列在首位，在食货中又把田制列为第一，这不仅说明杜佑对社会经济机构有较为深刻的分析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强调政治措施要建立在物质经济基础之上，这种见解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“罕言利”的传统，是杜佑思想的精华所在。杜佑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，他反对“非今是古”，主张“随时立制，遇弊变通，不必因循，重难改作”。杜佑学识渊博，理财经验丰富，所以《通典》能博采经史，精选时论，保存了大量的宝贵史

料。《通典》还保存了不少今已亡佚的典籍的片断和文章，仅严可均编辑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中，就有近九百条是从《通典》中辑出的。当然，作为第一部典制专史的《通典》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，如兵典，只记兵法，则不记历代兵制沿革等等。

杜佑，字君卿，京兆府万年县人。杜佑的父亲杜希望，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，他接交的朋友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。他任安陵县令时，都督宋庆礼曾上表向朝廷上汇报，说杜希望为官从政有独到之处。杜希望后来因为一点小过失而被免了官。开元年间，交河公主下嫁突骑施，玄宗下诏派杜希望为和亲判官，送公主入突厥。信安郡王李漪也曾上表请准杜希望代理灵州别驾、关内道支度判官。杜希望从代州都督府被召回长安，应对边防之事，他的才能深得玄宗赏识。当吐蕃攻打勃律，勃律要求归附唐朝时，尚书右丞相李林甫刚领陇西节度使之衔，所以拜杜希望为鄯州都督，代行陇西节度使之职。于是，朝廷诏命一到甘肃，杜希望当即率军大破乌莽兵众，杀死一千多人，乘胜追击，进而攻占新城，军威大振，凯旋而归。杜希望因此晋升为鸿胪卿。于是在甘肃宁夏一带设置镇西军，杜希望带领部分军队驻扎在边关，吐蕃人很害怕，写信来求和。杜希望回复吐蕃：“接受和议，事关重大，不是我作为臣下所能决定得了的。”吐蕃又倾巢出动与唐朝争夺檀泉，杜希望率部下与之大小交战数十次，终于俘虏了吐蕃的酋长，直捣莫门，焚烧了吐蕃积蓄的物资，筑好城池，班师归来。从而得到两个儿子可以授官的褒奖。当时，由于频

繁地兴兵打仗，府库空虚，而自杜希望镇守边防以来，数年间粮草、钱帛都丰盛有余。宦官牛仙童来边防巡行，有人劝杜希望讨好他，杜希望回答说：“用钱巩固自己的地位，这种事我不能容忍。”因此，牛仙童还朝奏报，就诬陷杜希望不称职，结果，杜希望被降为恒州刺史，后又调任西河太守。然而，牛仙童接受诸将钱财的事终于败露，以死抵罪。那些送钱行贿的人也都受到惩罚。杜希望喜爱、重视文章、诗词，出自他门下的，象崔颢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士。

杜佑凭借先人勋业而步入仕途，开始做济南府的参军事，继而又任剡县县丞。杜佑曾去拜访润州刺史韦元甫，韦元甫把他当作老朋友儿子来接待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礼遇。一天韦元甫碰到一个疑案难以决断，就试着征询杜佑的意见，杜佑替他辨析有关此案的关键无一遗漏。韦元甫对他的才华颇感惊异，于是委派他任司法参军事。自此以后，不管任所在浙西，还是淮南，韦元甫都上表请求朝廷准许杜佑在他门下任职。大历六年，韦元甫死，杜佑入朝为工佐郎中，后又充任江淮青苗使，又调任容管经略使。大历十四年，杨炎辅佐朝政，杜佑应召入京，历任金部郎中、水陆转运使，后又改任度支兼和籴使。于是，每逢有战事，杜佑有权决定增减、调整漕运的数量、次数诸事宜。杜佑也曾以户部侍郎之职行度支之事。建中初年，河朔战乱纷起，弄得民不聊生，交不起租赋。杜佑认为解决时弊的良策莫过于节省开支，而节省开支就必须裁减官员，于是上奏本说：

汉光武帝在建武年间，合并、废除了四百个县，大抵每个官吏当中只留用一个；魏明帝太和年间，朝廷采取派遣

使者的方法，减少在编官员的数量；正始年间又合并郡县，以此减少了官吏；东晋太元年间，减省了七百名官吏；隋文帝开皇年间，废掉五百个郡；唐太宗贞观初年，精减禁中诸省官吏六百人。设置官吏的根本目的在于治理百姓，所以古人根据百姓的多少决定官吏的数量，不愿虚设多馀的官吏。从汉朝到唐朝，由于征战和时局艰难，从而减省官吏，这确实是拯救时弊的切实办法。

古代咎繇作士，掌管刑狱，现在由刑部尚书、大理卿分掌，就相当于两个咎繇。垂为共工，掌百工之事，现在由工部尚书、将作监分管，就相当于两个垂。契作司徒，掌管土地、民户，现在由司徒、户部尚书分掌，就相于两个契。伯夷为秩宗，分别长幼尊卑，掌礼仪，现在由礼部尚书、礼仪使分管，就相当于两个伯夷。伯益任虞，掌管山泽，现在由虞部郎中、都水使者分管，就相当于两个伯益。伯冏为太仆，掌管廐牧、车马，现在由太仆卿、驾部郎中、尚辇奉御、闲廐使分掌，就相当于四个伯冏。古代天子有六军，汉代有前、后、左、右将军四人，本朝有掌管宫禁宿卫的十二卫，还有神策八军，共有将军六十人。旧的官职没废，而新的官职却日益增加。汉代设别驾之官，跟随刺史巡察地方，犹如现在观察使的副职。参军这个官职，参与官府军事事务，不过是变动而已，难道真有什么事实根据吗？实在应该斟酌情况增减官员。想把天下治理好，必须先正名分，使其名实相符。神龙年间，官吏制度松弛，主管官吏的部门聚集着很多等候入选为官的人，官府已经没有空缺，就安排了二千名员外官，自此之后，这就变成了通例。正巧赶上开元、天宝时期，四

方太平无事，国家编户有九百余万，朝廷金库丰溢，虽有些浪费，不致引起人们的忧虑。而今，百姓几经丧乱，元气大伤，天下户数只有一百三十万，陛下命令使者查核户口，也只得到三百万户，这数字不过是天宝年间的三分之一，而其中还包括五分之二的浮寄户，交纳赋税的人锐减，而消耗赋税的人却依然如故，怎么可以不改革呢？

一些议论省官的人，顾虑目前天下还存在跋扈骄横不听命于朝廷的割据势力，一旦减省官吏，被罢免者就会投奔到割据势力那里去。这虽是合乎常情的说法，但大概并非深切中肯之论。况且有才能的人得到举荐录用，为什么还怕无能的人走掉，更何况那些还是眷顾亲友、家产的，投靠割据势力谈何容易！汉光武建武时，公孙述、隗嚣尚未翦灭，曹魏太和、正始以及东晋太元时，吴、蜀仍与魏鼎立，隋开皇年间陈叔宝依然割据东南，他们都能网罗杰出之士，当时尚且不忧虑人才外流而增强敌方的力量。何况现在的田悦之流，刑法繁苛，横征暴敛，只体恤军伍，而对待读书人则像奴仆，所以根本没有范雎效力于秦、贾季使狄强盛的忧患。如果因为官吏过多的状况沿袭太久，不能马上彻底改变，那也应该权且减少别驾、参军、司马这些在州县编制之内的官吏，要根据户数多少设置。应当减省下来的官员，有品行道义者，他们所在的官府可为其陈述，如果实际情况与推举者所言不符，推举者应当受到惩罚。不被人举荐的，听任他们参与正常的官吏调动。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比如北魏开始设柱国之职，由当时德高望重、功劳卓著的人荣任，其贵宠为举国第一。北周及隋，授予柱国之职的人已经很多了，于是，国家就以柱

国为勋级，而获得柱国称号的人，也不过只得到三十顷土地而已。还有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大夫。也都是官职，因授予过多，反过来成了官位的等级。根据时势建立制度，遇到弊病就改正，何必因循旧习而害怕改革呢？

这本奏折呈送朝廷，没有得到重视。

卢杞把持朝政，憎恶杜佑，把他贬出京师为苏州刺史。前苏州刺史因母亲去世而解任，杜佑的母亲健在，他提出不去苏州赴任，于是改任饶州刺史。不久，杜佑就被派往岭南为节度使。在岭南，杜佑为当地开辟大路，疏散民宅、店铺，以防止为灾。朱崖地区的黎民三代依靠天险，不服从唐王朝的统治，杜佑率兵讨平朱崖黎民。后来，朝廷召杜佑回京为尚书右丞，不久又命他离京出任淮南节度使，杜佑以母亲新丧为理由推辞，但朝廷下诏，没有批准他的请求。

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病逝，军中一片混乱，擅立张建封的儿子张愔为留后，上报朝廷，德宗不准，于是下诏以杜佑为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统率徐、泗兵马讨伐张愔，安定徐州。杜佑军中准备了刀形战舰，派遣部将孟淮渡过淮河攻打徐州，结果攻城失败，只好引兵而还。对于统兵打仗，应付瞬息万变的战事，不是杜佑的特长，因而杜佑固守城池不敢前进。朝廷不得已下诏授张愔徐州节度使之职，不过把原属徐州节度使管辖的濠、泗两州分出来，隶属于淮南节度使。当初，杜佑在淮南任上，引雷陂的水扩大灌溉面积，开拓海边的荒地为农田，于是淮南积存的米达五十万斛之多。杜佑所辖军队驻扎在三十个营区，个个兵强马壮，四邻无不敬畏。但是，杜佑对部下宽容，管理不严，所以南宫

傅、李亚、郑元均等竟至争夺权力，把官弄得乌烟瘴气，最后还是德宗出面，才替杜佑清除了这些人。

贞元十九年，杜佑官拜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贞元二十一年，德宗驾崩，诏杜佑代行冢宰之职，进而又任检校司徒并兼度支盐铁使。这时王叔文是度支盐铁副使，既然杜佑因身为宰相，不亲自处理度支盐铁事务，于是王叔文独揽大权。后来，王叔文因母亲去世，回家乡办理丧事，杜佑才有了处理事务的权力，而郎中陈谏却让他等王叔文回来再处理，杜佑气愤地说：“难道我这个度支盐铁正使还不能独立处理公事吗？”事后就将陈谏贬出京师，担任河中少尹。王叔文要废黜太子，希望杜佑帮助，杜佑不答应，于是王叔文等策划驱逐杜佑，然而这计划还未实施，顺宗驾崩，王叔文等人就被贬斥了。杜佑改荐李巽为自己的助手，任度支盐铁副使。宪宗居丧，杜佑又代行冢宰之职，并把度支盐铁大权全部交给李巽。当初，度支为节省用费，多让官吏暂且身兼数职，足涉各官府，因此职杂而又不得要领。杜佑对此做了改革，把营缮归将作监，木炭归司农寺，漶染归少府监，结果职务简化、整肃。第二年，杜佑拜司徒，封为岐国公。

党项暗地勾结吐蕃寻衅闹事，边防诸将求功心切，要求征讨吐蕃。杜佑认为没有好的治边之臣将，采取进击的作法反倒会招致少数民族的背叛，于是立即上疏说：

“古代周宣王中兴，玁狁侵害周朝，宣王率兵追击玁狁到太原，而一到边境即停兵不前，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不想消耗中原实力，也不想触怒远方的少数民族。秦王自恃兵力雄厚，在北方抵御匈奴，在西方驱逐诸羌，与边境异族结怨过多而

形成乱事，这实际上就是派大批罪徒戍守边疆的原因。一般说来，圣王治理天下，只想安抚百姓，如果西至沙漠，东濒大海，北方与南方，都只存在天子的声威教谕，难道还会出现为应付外来骚扰而削弱国力的事？从前，冯奉世假托圣旨杀了莎车王，把他的首级传往京师长安，此举威震西域。汉宣帝与朝臣议论，要褒奖冯奉世，封爵赐田，唯独萧望之力排众议，说冯奉世矫制违抗圣命，虽然有功，但不能以此为法，否则，恐怕以后奉命出使的人以他为榜样，在处理与夷狄的关系时给国家招来祸患。到突厥默啜侵害中原时，正值开元初年，入蕃使郝灵佺捕杀默啜，自称功大无比，希图得到厚奖，而宋璟担心边防诸臣效法郝灵佺而追求边功，玄宗采纳宋璟的意见，只授予郝灵佺右武卫郎将而已。从此一直到开元盛世，再没有边境争端，中原于是和平安定。这样的成败教训，与现在距离并不远啊。

党项是个不大的民族，与我朝边民杂居，由于有时边将对党项人侵害过甚，贪图他们的良马、子女，强征虏掠，迫使他们服劳役，从而逼得他们叛逃，与北狄、西戎相勾结攻我边防。有记载说：“远方的人不臣服，就修治文德，使他们来归顺。”管仲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国家不要委派勇猛的人戍守边疆。”这真是圣贤哲人洞察细末的明识灼见。目前，边疆众民族势力正强，而我边防军备还不充实，实在应该谨慎地选择良将，让他们与边境民族缔修友好，禁绝对他们的诛杀苛求，显示我们的信用和诚意，如果异族来犯边，就坚决抵制，予以严惩；打退进犯之后，就要谨防再次进犯。边将应该用安抚边境少数民族的做法，革除他们反叛、犯边的阴谋。何

必急急忙忙在动干戈，徒然自招劳费消耗呢！”

宪宗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
过了一年多，杜佑要求退休，朝廷不准，下诏允许他五天到中书省一次，处理政事。杜佑每次上朝进见，宪宗都非常尊敬他，称呼他的官职，而不称呼他的名字。又过了几年，杜佑坚持要退休，宪宗不得已就同意了，仍然拜他为光禄大夫、守太保致仕，让他每逢初一、十五入朝，宪宗吩咐宦官给杜佑丰厚、齐备的赏赐。元和七年，杜佑病逝，终年七十八岁。朝廷追赠杜佑为太傅，谥为“安简”。

杜佑嗜好学问，虽然身居高位，还每每读书到深夜。以前，刘秩兼采百家，按《周礼》的六官法撰成《政典》三十五卷，房琯称赞刘秩的才学胜过刘向。而杜佑却认为尚有不足，因此在《政典》的基础上，广泛地补其所缺，并且斟酌情况，增加了《开元新礼》的内容，完成一部二百卷的巨著，杜佑称它为《通典》。贞元十七年，杜佑把《通典》呈献给德宗，龙颜大悦，下诏大加褒奖，当时的读书人也被《通典》的简明详备所折服。

杜佑为人平易、谦逊、和顺，遇事能迁就别人，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，所以众人都爱戴、敬重他。杜佑为人处事很象汉代胡广，但是就熟练、通达和文采而论，则不如胡广。杜佑那位于朱坡之南的樊川别墅，修缮得亭阁错落，草木繁茂，加之凿山引泉，景致十分宜人，杜佑在此设酒宴客，甚是惬意。杜佑的子侄都在朝为官，杜氏家族的高贵兴盛，在当时无与伦比。杜佑生性擅长做官，从政比较宽厚，不甚细察，多次主管、筹划赋税收支，他能根据对百姓的利弊而权

衡变化。凡是评论杜佑的人，都认为他做官品行完美无缺。惟有晚年扶妾李氏为夫人，受到时人的非议。

(曾贻芬 译)

【原文】

杜佑字君卿，京兆万年人。父希望，重然诺，所交游皆一时俊桀。为安陵令，都督宋庆礼表其异政。坐小累去官。开元中，交河公主嫁突骑施，诏希望为和亲判官。信安郡王漪表署灵州别驾、关内道支度判官。自代州都督召还京师，对边事，玄宗才之。属吐蕃攻勃律，勃律乞归，右相李林甫方领陇西节度，故拜希望鄯州都督，知留后。驰传度陇，破乌莽众，斩千余级，进拔新城，振旅而还。擢鸿胪卿。于是置镇西军，希望引师部分塞下，吐蕃惧，遗书求和。希望报曰：“受和非臣下所得专。”虜悉众争檀泉，希望大小战数十，俘其大酋，至莫门，焚积蓄，卒城而还。授二子官。时军屡兴，府库虚寡，希望居数岁，刍粟金帛丰余。宦者牛仙童行边，或劝希望结其欢，答曰：“以货藩身，吾不忍。”仙童还奏希望不职，下迁恒州刺史，徙西河。而仙童受诸将金，事泄，抵死，畀金者皆得罪。希望爱重文学，门下所引如崔颢等，皆名重当时。

佑以荫补济南参军事、剡县丞。尝过润州刺史韦元甫，元甫以故人子待之，不加礼。它日，元甫有疑狱不能决，试讯佑，佑为辨处契要无不尽，元甫奇之，署司法参军。府徙浙西、淮南，皆表置幕府。入为工部郎中，充江淮青苗使，再迁容管经略使。杨炎辅政，历金部郎中，为水陆转运使，改度支兼和籴使。于是军兴餽漕，佑得刳决。以户部侍郎判度

支。建中初，河朔兵掣战，民困，赋无所出。佑以为救敝莫若省用，省用则省官，乃上议曰：

汉光武建武中废县四百，吏率十署一；魏太和时分遣使者，省吏员，正始时并郡县；晋太元省官七百；隋开皇废郡五百；贞观初省内官六百员。设官之本，以治众庶，故古者计人置吏，不肯虚设。自汉至唐，因征战艰难以省吏员，诚救弊之切也。

昔咎繇作士，今刑部尚书、大理卿，则二咎繇也。垂作共工，今工部尚书、将作监，则二垂也。契作司徒，今司徒、户部尚书，则二契也。伯夷为秩宗，今礼部尚书、礼仪使，则二伯夷也。伯益为虞，今虞部郎中、都水使者，则二伯益也。伯冏为太仆，今太仆卿、驾部郎中、尚辇奉御、闲廐使，则四伯冏也。古天子有六军，汉前后左右将军四人，今十二卫、神策八军，凡将军六十员。旧名不废，新资日加。且汉置别驾，随刺史巡察，犹今观察使之有副也。参军者，参其府军事，犹今节度判官也。官名职务，直迁易不同尔，讵有事实哉？诚宜斟酌繁省。欲致治者先正名。神龙中，官纪荡然，有司大集选者，既无阙员，则置员外官二千人，自是以为常。当开元、天宝中，四方无虞，编户九百余万，帑藏丰溢，虽有浮费，不足为忧。今黎苗凋瘵，天下户百三十万，陛下诏使者按比，才得三百万，比天宝三分之一，就中浮寄又五之二，出赋者已耗，而食之者如旧，安可不革？

议者以天下尚有跋邑不廷，一省官吏，被罢者皆往托焉。此常情之说，类非至论。且才者荐用，不才者何患其亡，又况顾姻戚家产哉！建武时公孙述、隗嚣未灭，太和、正始、太

元时吴、蜀鼎立，开皇时陈尚割据，皆罗取俊乂，犹不虑失人以资敌。今田悦辈繁刑暴赋，惟军是恤，遇士人如奴，固无范雎业秦、贾季强狄之患。若以习久不可以遽改，且应权省别驾、参军、司马，州县额内官，约户置尉。当罢者，有行义，在所以闻；不如状，举者当坐；不为人举者，任参常调。亦何患哉？如魏置柱国，当时宿德盛业者居之，贵宠第一，周、隋间授受已多，国家以为勋级，才得地三十顷耳。又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大夫，亦官名，以其太多，回作阶级。随时立制，遇弊则变，何必因循惮改作耶？

议入，不省。

卢杞当国，恶之，出为苏州刺史。前刺史母丧解，佑母在，辞不行，改饶州。俄迁岭南节度使。佑为开大衢，疏析廛闾，以息火灾。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，佑讨平之。召拜尚书右丞。俄出为淮南节度使，以母丧解，诏不许。

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，军乱，立其子愔，请于朝，帝不许，乃诏佑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节度徐泗讨定之。佑具舫舰，遣属将孟准度淮击徐，不克，引还。佑于出师应变非所长，因固境不敢进，乃诏授愔徐州节度使，析濠、泗二州隶淮南。初，佑决雷陂以广灌溉，斥海濒弃地为田，积米至五十万斛，列营三十区，士马整饬，四邻畏之；然宽假僚佐，故南宫僊、李亚、郑元均至争权乱政，帝为佑斥去之。

十九年，拜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德宗崩，诏摄冢宰。进检校司徒，兼度支盐铁使。于是王叔文为副，佑既以宰相不亲事，叔文遂专权。后叔文以母丧还第，佑有所

按决，郎中陈谏请须叔文，佑曰：“使不可专耶？”乃出谏为河中少尹。叔文欲摇东宫，冀佑为助，佑不应，乃谋逐之，未决而败。佑更荐李巽以自副。宪宗在谅闇，复摄冢宰，尽让度支盐铁于巽。始，度支啗用度，多署吏权摄百司，繁而不纲；佑以营缮还将作，木炭归司农，漵染还少府，职务简修。明年，拜司徒，封岐国公。

党项阴导吐蕃为乱，诸将邀功，请讨之，佑以为无良边臣，有为而叛，即上疏曰：

昔周宣中兴，狁狁为害，追之太原，及境而止，不欲弊中国，怒远夷也。秦恃兵力，北拒匈奴，西逐诸羌，结怨阶乱，实生谪戍。盖圣王之治天下，惟欲绥静生人，西至于流沙，东渐于海，在北与南，止存声教，岂疲内而事外耶？昔冯奉世矫诏斩莎车王，传首京师，威震西域，宣帝议加爵土，萧望之独谓矫制违命，虽有功不可为法，恐后奉使者为国家生事夷狄。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国，开元初，郝灵佺捕斩之，自谓功莫与二，宋璟虑边臣由此邀功，但授郎将而已，繇是讫开元之盛，不复议边，中国遂安。此成败鉴戒之不远也。

党项小蕃，与中国杂处，间者边将侵刻，利其善马子女，敛求徭役，遂致叛亡，与北狄西戎相诱盗边。《传》曰：“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”管仲有言：“国家无使勇猛者为边境。”此诚圣哲识微知著之略也。今戎丑方强，边备未实，诚宜慎择良将，使之完辑，禁绝诛求，示以信诚，来则惩御，去则谨备。彼当怀柔，革其奸谋。何必亟兴师役，坐取劳费哉？

帝嘉纳之。

岁余，乞致仕，不听，诏三五日一入中书，平章政事。佑每进见，天子尊礼之，官而不名。后数年，固乞骸骨，帝不得已，许之，仍拜光禄大夫、守太保致仕，俸朝朔望，遣中人锡予备厚。元和七年卒，年七十八，册赠太傅，谥曰安简。

佑资嗜学，虽贵犹夜分读书。先是，刘秩摭百家，侔周六官法，为《政典》三十五篇，房琯称才过刘向。佑以为未尽，因广其阙，参益新礼为二百篇，自号《通典》，奏之，优诏嘉美，儒者服其书约而详。

为人平易逊顺，与物不违忤，人皆爱重之，方汉胡广，然练达文采不及也。朱坡樊川，颇治亭观林葭，凿山股泉，与宾客置酒为乐。子弟皆奉朝请，贵盛为一时冠。天性精于吏职，为治不皁察，数斡计赋，相民利病而上下之，议者称佑治行无缺。惟晚年以妾为夫人，有所蔽云。

刘昫传

——《旧五代史》卷八九

【说明】刘昫（888—947），字耀远，涿州归义县（今河北雄县西北）人。后晋天福六年，高祖命张昭远、贾纬等人修撰唐史，由宰相赵莹监修。出帝开运二年，《唐书》撰成，因此时刘昫为监修宰相，所以此书由刘昫奏上，题为“刘昫等撰”。后来北宋欧阳修、宋祁撰《新唐书》，为与之区别，改名为《旧唐书》。

《旧唐书》二百卷，本纪二十卷，志三十卷，列传一百五十卷。记载了上起唐高祖武德元年（618），下迄哀帝天祐四年（907）唐代二百九十年的历史。宪宗以前主要依据唐代国史和实录。取舍较为得当，文字也简洁明了。而宪宗以后，则无本可据，皆由编者依搜集到的材料纂辑而成，内容较芜杂，也多有讹误。《旧唐书》的食货、礼仪、音乐、职官、刑法数志较好，这和唐一代注重典章制度的总结有关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旧唐书》对国内外少数民族的记载，超过以前各正史，而且史料可靠，对研究少数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正因为《旧唐书》有这些长处，故《新唐书》问世，也不能取代它，两《唐书》并存。

刘昫，字耀远，涿州归义县人。祖父刘乘，为幽陵都督府左司马；父亲刘因，任幽州巡官，刘昫神采优秀而出色，文学造诣深厚，和哥哥刘暉、弟弟刘晔，都在乡里有好名声，唐天祐年间，契丹攻陷了涿州，刘昫被俘虏到新州，逃出而获得自由。后来住在上国大宁山，和吕梦奇、张麟构筑草屋住在一起，以吟诵诗文自得其乐，

适逢定州连帅王处直以他的儿子王都为易州刺史，王都让刘昫代理军事衙推。到王都卸任，刘昫请假回乡，王都又招刘昫到中山。正好他哥哥刘暉从本郡到此，王都把刘暉举荐给他的父亲，不久代理节度衙推，不到一年，命他为观察推官。过两年，王都篡夺了父亲的位置。当时王都有个门客叫和少微，一向嫉妒刘暉，结怨而杀刘暉，刘暉逃出此地，寄居在浮阳节度使李存审征辟刘昫为从事。庄宗即位，授予太常博士，不久升为翰林学士，继而任膳部员外郎，赐绯红袍；任比部郎中，赐紫袍。遭母丧，服丧期满，授予库部郎中，依旧任职。明宗即位，拜为中书舍人，历任户部侍郎、端明殿学士。明宗看重刘昫的风度仪态，喜爱他的温和敦厚。长兴年间，拜为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、平章事。于是刘昫入朝谢恩，赶上最隆重的祭祀，明宗不御临中兴殿，阁门使告诉说：“按旧礼，宰相谢恩，须在正殿通报传唤，请等到明天。”枢密使赵延寿说：“任命宰相的制书，颁下已经好几天了，入朝谢恩不宜推后。”因此立即上奏明宗，于是在端明殿谢恩。刘昫从端明殿学士拜为宰相，而且又在本殿谢恩，士子以此为荣耀。

清泰初年，刘昫兼判三司，又加官吏部尚书、门下侍郎，

监修国史。当时与同班的李愚不睦，一有事就争吵，当时的议论非难刘昫。不久，刘昫、李愚都免知政事，刘昫守右仆射，让张延郎代判三司。当初，唐末帝从凤翔来，急迫地需要军费，此时王玫判三司，朝廷下诏问他钱谷状况，王玫把钱谷的数目都奏于朝廷，到命令他出钱谷犒赏军队，却严重地失于空虚。末帝发怒，用刘昫取代王玫，刘昫就搜索记财物收支的帐簿，命令判官高延赏仔细计款算查，连多年的残租，或者是市场的交易，都是虚附帐籍，刘昫将这些情况具条成章上奏，请求对可以征收的人抓紧督收，没有能力偿还官府的人就免除，对此吏与百姓相与唱歌欢庆，只有主管的人怨恨沮丧。到刘昫罢相的时候，众官吏相庆贺，刘昫还乡，没有一个跟从他的人，大概憎恨他太苛察的缘故。

晋天福初年，张从宾在洛阳作乱，害皇子重义，朝廷诏令刘昫为东都留守，判河南府事，不久以本官职判盐铁。没有多久，又奉命出使到契丹，回来任太子太保兼左仆射，封谯国公，不久改为太子太傅。开运初年，除授司空、平章事，监修国史，又判三司。契丹主太宗到洛阳，不改刘昫的官职，刘昫以眼病乞求退休，契丹太宗颁降伪命，授刘昫守太保。契丹太宗退回北方，刘昫留在东京。这年夏季，因病去世，终年六十。汉高祖登极，赠刘昫太保。

当初，刘昫在河朔避难，藏在北山的寺院里，有个叫贾少瑜的僧人，脱下自己的袈裟用来温暖刘昫。到刘昫官运通达，给与贾少瑜进士及第，拜监察御史，听说此事的人都认为刘昫仁义。

(曾贻芬 译)

【原文】

刘昫，字耀远，涿州归义人也。祖乘，幽府左司马；父因，幽州巡官。昫神彩秀拔，文学优赡，与兄暄、弟晞，俱有乡曲之誉。唐天祐中，契丹陷其郡，昫被俘至新州，逃而获免。后居上国大宁山，与吕梦奇、张麟结庵共处，以吟诵自娱。

会定州连帅王处直以其子都为易州刺史，署昫为军事衙推。及都去任，乞假还乡，都招昫至中山。会其兄暄自本郡至，都荐于其父，寻署为节度衙推，不逾岁，命为观察推官。历二年，都篡父位。时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暄，构而杀之，昫越境而去，寓居浮阳，节度使李存审辟为从事。庄宗即位，授太常博士，寻擢为翰林学士，继改膳部员外郎，赐绯；比部郎中，赐紫。丁母忧，服阕，授库部郎中，依旧充职。明宗即位，拜中书舍人，历户部侍郎、端明殿学士。明宗重其风仪，爱其温厚。长兴中，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、平章事。时昫入谢，遇大祠，明宗不御中兴殿，阁门白：“旧礼，宰相谢恩，须正殿通唤，请候来日。”枢密使赵延寿曰：“命相之制，下已数日，中谢无宜后时。”因即奏之，遂谢于端明殿。昫自端明殿学士拜相，而谢于本殿，士子荣之。

清泰初，兼判三司，加吏部尚书、门下侍郎，监修国史。时与同列李愚不协，动至忿争，时论非之。未几，俱罢知政事，昫守右仆射，以张延朗代判三司。初，唐末帝自凤翔至，切于军用，时王玫判三司，诏问钱谷，玫具奏其数，及命赏军，甚愆于素。末帝怒，用昫代玫，昫乃搜索簿书，命判官高延赏计穷诘勾，及积年残租，或场务贩负，皆虚系赈籍，条

奏其事，请可征者急督之，无以偿官者蠲除之。吏民相与歌咏，唯主典怨沮。及罢相之日，群吏相贺，晦归，无一人从之者，盖憎其太察故也。

天福初，张从宾作乱于洛阳，害皇子重义，诏为东都留守，判河南府事，寻以本官判盐铁。未几，奉使入契丹，还迁太子太保兼左仆射，封谯国公，俄改太子太傅。开运初，授司空、平章事，监修国史，复判三司。契丹主至，不改其职。晦以眼疾乞休致，契丹主降伪命授晦守太保。契丹主北去，留于东京。其年夏，以病卒，年六十。汉高祖登极，赠太保。

初，晦避难河朔，匿于北山兰若，有贾少瑜者为僧，辄衾袍以温燠之。及晦官达，致少瑜进士及第，拜监察御史，闻者义之。

王 溥 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二四九

【说明】王溥（919—981），字齐物，并州祁县（今山西祁县）人。他取唐苏冕《会要》（记唐高祖至德宗九朝事）四十卷，及崔铉监修的《续会要》（记德宗至宣宗大中六年事）四十卷，加以整理，而且搜集唐宣宗及唐末事迹，分类编辑，在宋太祖建隆二年撰成《唐会要》一百卷。这是一部断代典章制度专史，其内容包括帝系、礼、乐、学校、宗教、选举、职官、封建、历数、灾异、刑法、舆服、食货、外国等类，但书中不分大类，只分五百一十四目，如属职官类的目有秘书省、殿中省、大理寺等等，如食货类的目则有租税、杂税、团貌等等，对唐代有关的典章制度做了分门别类的记载，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。现在流传的《唐会要》已不是王溥的原本，此书在流传中有所残破。清乾隆年间，采摭诸书所载唐事，依原目编类，基本保存了王溥原书的面貌。另外，王溥还用会要体例，采后梁至后周诸朝事撰成《五代会要》三十卷，分细目二百七十九条，记载五代有关帝系、礼乐、刑、天文、官制、经济、外国等方面的典章制度，由于王溥历仕后汉后周等朝，对五代制度有感性的认识，加之多引当时的奏议、

诏令，因此本书的记载真实可靠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，是新旧《五代史》的重要补充。

王溥，字齐物，并州祁县人。父亲王祚，任郡中小吏，有心计，跟随晋高祖进洛阳，掌管有关盐铁的文书，因母亲年迈解职归故里。后汉高祖镇守并门，统领行营兵抵拒契丹，委派王祚经营规划粮草。汉高祖即位，提升王祚为三司副使。在后周任随州刺史。汉法禁止用牛皮制甲冑，用车把牛皮送往京城，遇到夏天雨多牛皮腐烂，王祚请求分发铠甲的式样到诸州，让各州裁制好再运输，百姓感到非常便利。改任商州刺史，用奉钱招募人力开大秦山岩梯路，行旅之人感激王祚的恩惠。显德初年，设华州节度，以王祚为刺史。不久，改为镇守颍州。王祚均衡所管范围的租税，补充核实流徙人的户口，将其从旧户籍中除去。州境内原有通商渠，距离淮河三百里，年久淤塞，王祚命人疏导通商渠，于是能通行船只，郡内也没有水患。还曾任郑州团练使。宋朝初年，宿州升为防御，以王祚为防御使。让百姓出钱凿井修缮防御设备，修筑城北堤坝用以防御水灾。因为请求辞官，来到朝廷，拜为左领军卫上将军，退休。

王溥，后汉乾佑年间中进士甲科，作秘书郎。当时李守贞占据河中，赵思绾在京兆反，王景崇在凤翔反，周太祖率兵讨伐他们，召王溥为从事。河中平定，得到叛贼手中的文书，这些文书多是朝廷权贵和藩镇相互交接的内容。周太祖登记这些人的名字，要审问这些人，王溥劝谏说：“魑魅的身形，等到黑夜才出来，一经日月照射，不祥的妖气就自动消

失。希望把这一切都烧掉，以此安定反复无常的局面。”周太祖听从了他的劝谏。军队回朝，王溥升为太常丞。跟从周太祖镇守邺。广顺初年，授左谏议大夫、枢密直学士。广顺二年，升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。三年，加户部侍郎，改任端明殿学士。周太祖病危，召学士草拟制书，以王溥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宣制书写完毕，周太祖说：“我没有忧虑了。”当天驾崩。

周世宗将亲征泽州、潞州，冯道极力劝谏制止，只有王溥赞成他这样做。军队凯旋，加王溥兼礼部尚书，监修国史。周世宗曾经从容地问王溥说：“汉相李崧把蜡书交给契丹，还有记得蜡书词语的人，真的有这样的事吗？”王溥说：“李崧作为大臣，假设有这样的阴谋，怎肯轻易告诉别人？大概是苏逢吉诬陷他。”周世宗开始醒悟，下诏赠李崧官。周世宗将征讨秦州、凤州，向王溥求问元帅的人选，王溥推荐向拱。平定凤、秦二州后，周世宗因此设宴斟酒赐给王溥说：“为我选择元帅建立边功的人，是爱卿。”跟从周世宗平定寿春，制加官阶爵位。显德四年，遭父丧。丧期未满起用他为官，王溥上四表章，乞求终丧期。周世宗大怒，宰相范质上奏劝解世宗，王溥入朝谢罪。六年夏季，命王溥参知枢密院事。

恭帝即位，加王溥为右仆射。这年冬天，上表请求修撰《世宗实录》，于是上奏史馆修撰、都官郎中、知制诰扈蒙，右司员外郎、知制诰张淡，右拾遗王格，直史馆、左拾遗董淳，一同参加修纂，朝廷同意他的奏议。

宋朝初年，进位居司空，罢参知枢院官。乾德二年，降为太子太保。旧制，一品官站班于台省之后，宋太祖因为见

到王溥，对左右人说：“王溥旧宰相，恩宠应当不同一般。”就命令分台省站班于东西两列，于是成为定制。五年，遭母丧，服丧期满，加太子太傅。开宝二年，任太子太师。入朝谢恩那天，太祖环顾左右说：“王溥十年为宰相，三次迁为一品，福禄之盛，近世未见可与其相比者。”太平兴国初年，封为祁国公。七年八月，去世，终年六十一。停止视朝两日，赠侍中，谥号文献。

王溥性情宽厚，风度优美，好吸引后进，他所举荐而后至显位的人很多。颇吝啬。王祚屡领州郡牧守之官，能增殖财货，所到之处都有田宅，家累万金。

王溥居相位，王祚以宿州防御使家居，每有公卿来，必然首先拜谒。王祚设酒祝寿，王溥穿着朝服小跑着侍奉左右，坐着的客人不敢安座，就站起来回避。王祚说：“这是猪犬小儿，不烦诸君起身。”王溥婉言劝说王祚请求退休，王祚估计朝廷不会准许他的请求，而请求已得获准，王祚大骂王溥：“我的筋力不衰，你想自己巩固名位，而幽禁我。”举起大棒要打王溥，在亲戚的劝说下才罢手。

王溥好学习，手不释卷，曾经编集苏冕《会要》和崔铉《续会要》，又增补两书的阙漏，撰成百卷，题名为《唐会要》。又采摭朱梁至后周事撰成三十卷，名为《五代会要》。还有文集二十卷。

王溥的儿子贻孙、贻正、贻庆、贻序。贻正官至国子博士。贻庆官为比部郎中。贻序，景德二年中进士，后改名贻矩，官至司封员外郎。贻正的儿子克明，娶太宗的女儿郑国长公主，改名贻永，让他与他的父亲同行辈。

贻孙字象贤，年轻时随周太祖掌管商、颍二州，代衙内都指挥使。显德年间，因父亲在中书省，改任朝散大夫、著作佐郎，宋朝初年，改任金部员外郎，赐三品以上官紫袍，累官至右司郎中。淳化年间，去世。宋太祖平定吴、蜀，把所缴获的文史副本分赐给大臣，王溥喜好藏书，多达万余卷，贻孙尽读此藏书，又多收藏书法名画。太祖曾经问赵普，拜礼时，为什么男子跪而女人不跪，赵普问礼官，回答不上来。贻孙说：“古诗说‘长跪问故夫’，这说明女人也是要跪的。唐武太后朝女人开始拜而不跪。”赵普问从何处得出这答案，回答说：“太和年间，有幽州从事张建章著的《渤海国记》，详细地记载此事。”赵普对王贻孙大为赞赏。端拱年间，右仆射李昉求访郡省百官集议旧仪，王贻孙都给以详尽的回答，事见《礼志》，当时的舆论承认王贻孙熟习礼法等等。

（曾贻芬 译）

【原文】

王溥字齐物，并州祁人。父祚，为郡小吏，有心计，从晋祖入洛，掌盐铁案，以母老解职归。汉祖镇并门，统行营兵拒契丹，委祚经度刍粟；即位，擢为三司副使。历周为随州刺史。汉法禁牛革，犂送京师，遇暑雨多腐坏，祚请班铠甲之式于诸州，令裁之以输，民甚便之。移刺商州，以奉钱募人开大秦山岩梯路，行旅感其惠。显德初，置华州节度，以祚为刺史。未几，改镇颍州。均部内租税，补实流徙以出旧籍。州境旧有通商渠，距淮三百里，岁久湮塞，祚疏导之，遂通舟楫，郡无水患。历郑州团练使。宋初，升宿州为防御，以祚为使。课民凿井修火备，筑城北堤以御水灾。因求致政，至

阙下，拜左领军卫上将军，致仕。

溥，汉乾佑中举进士甲科，为秘书郎。时李守贞据河中，赵思绾反京兆，王景崇反凤翔，周祖将兵讨之，辟溥为从事。河中平，得贼中文书，多朝贵及藩镇相交结语。周祖籍其名，将按之，溥谏曰：“魑魅之形，伺夜而出，日月既照，氛沴自消。愿一切焚之，以安反侧。”周祖从之。师还，迁太常丞。从周祖镇邺。广顺初，授左谏议大夫、枢密直学士。二年，迁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。三年，加户部侍郎，改端明殿学士。周祖疾革，召学士草制，以溥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宣制毕，周祖曰：“吾无忧矣。”即日崩。

世宗将亲征泽、潞，冯道力谏止，溥独赞成之。凯还，加兼礼部尚书，监修国史。世宗尝从容问溥曰：“汉相李崧以蜡书与契丹，犹有记其词者，信有之耶？”溥曰：“崧为大臣，设有此谋，肯轻示外人？盖苏逢吉诬之耳。”世宗始悟，诏赠其官。世宗将讨秦、凤，求帅于溥，溥荐向拱。事平，世宗因宴酌酒赐溥曰：“为吾择帅成边功者，卿也。”从平寿春，制加阶爵。显德四年，丁外艰。起复，表四上，乞终丧。世宗大怒，宰相范质奏解之，溥惧入谢。六年夏，命参知枢密院事。

恭帝嗣位，加右仆射。是冬，表请修《世宗实录》，遂奏史馆修撰、都官郎中、知制诰扈蒙，右司员外郎、知制诰张淡，左拾遗王格，直史馆、左拾遗董淳，同加修纂，从之。

宋初，进位司空，罢参知枢密院。乾德二年，罢为太子太保。旧制，一品班于台省之后，太祖因见溥，谓左右曰：“溥旧相，当宠异之。”即令分台省班于东西，遂为定制。五

年，丁内艰。服阙，加太子太傅。开宝二年，迁太子太师。中谢日，太祖顾左右曰：“溥十年作相，三迁一品，福履之盛，近世未见其比。”太平兴国初，封祁国公。七年八月，卒，年六十一。辍朝二日，赠侍中，谥文献。

溥性宽厚，美风度，好汲引后进，其所荐至显位者甚众。颇吝啬。祚频领牧守，能殖货，所至有田宅，家累万金。

溥在相位，祚以宿州防御使家居，每公卿至，必首谒。祚置酒上寿，溥朝服趋侍左右，坐客不安席，辄引避。祚曰：“此豚犬尔，勿烦诸君起。”溥讽祚求致政，祚意朝廷未之许也，既得请，祚大骂溥曰：“我筋力未衰，汝欲自固名位，而幽囚我。”举大槌将击之，亲戚劝谕乃止。

溥好学，手不释卷，尝集苏冕《会要》及崔铉《续会要》，补其阙漏，为百卷，曰《唐会要》。又采朱梁至周为三十卷，曰《五代会要》。有集二十卷。

子贻孙、贻正、贻庆、贻序。贻正至国子博士。贻庆比部郎中。贻序，景德二年进士，后改名贻矩，至司封员外郎。贻正子克明，尚太宗女郑国长公主，改名贻永，令与其父同行。

贻孙字象贤，少随周祖典商、颍二州，署衙内都指挥使。显德中，以父在中书，改朝散大夫，著作佐郎。宋初，迁金部员外郎，赐紫，累迁右司郎中。淳化中，卒。太祖平吴、蜀，所获文史副本分赐大臣。溥好聚书，至万余卷，贻孙遍览之，又多藏法书名画。太祖尝问赵普，拜礼何以男子跪而妇人否，普问礼官，不能对。贻孙曰：“古诗云‘长跪问故夫’，是妇人亦跪也。唐太后朝妇人始拜而不跪。”普问所出，对云：

“大和中，有幽州从事张建章著《渤海国记》，备言其事。”普大称赏之。端拱中，右仆射李昉求郡省百官集议旧仪，貽孙具以对，事见《礼志》，时论许其谙练云。

薛居正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二六四

【说明】薛居正（912—981年），字子平，开封府浚仪（今河南开封市）人。北宋开宝六年，太祖诏修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代史，命薛居正负责监修，参加编修的有卢多逊，扈蒙、张澹、李昉、刘兼、李穆、李九龄等人，都是当时颇有造诣的史家。此书历时十八个月撰修完成，共一百五十卷，目录二卷，记十四帝，为本纪六十一卷，志十二卷，列传七十七卷。此本原名《五代史》，也称《梁唐晋汉周书》，后为与欧阳修撰《五代史》区别，故在名前冠以“旧”字，称之为《旧五代史》，与《新五代史》并行于世。金章宗泰和七年诏学官只用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，于是《旧五代史》渐微。清代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《旧五代史》遗文，约得其十之八九，又采《册府元龟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通鉴考异》、《五代会要》诸书以补其缺，另外还参考《东都事略》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以及宋人文集，以资辅证，并注明引文出处，形成现行《旧五代史》，列入二十四史之中。《旧五代史》“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《五代通录》为稿本”，修《旧五代史》的人中还有私修过五代史的，所以《旧五代史》不仅

能够在短期完成，而且能保存大量的资料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，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》，涉及到五代史事，都参酌了《旧五代史》。

薛居正，字子平，开封府浚仪县人。父亲薛仁谦，在周朝为太子宾客。薛居正少年好学，有远大志向。后唐清泰初年，举进士而未考中，作《遣愁文》来自我解除愁闷，文章寓意卓越洒脱，读此文章的人认为薛居正有作三公辅相的能量。第二年，考中进士。

晋天福年间，华州节度使刘遂凝征召薛居正为从事。刘遂凝的哥哥刘遂清治理国家财政，奏明朝廷由薛居正代理盐铁巡官。开运初年，改任度支推官。宰相李崧掌管盐铁，又奏明朝廷由薛居正代理推官，又加大理司直，改右拾遗。桑维翰为开封府尹，奏明朝廷由薛居正代理判官。

汉乾佑初年，史弘肇统领侍卫亲军，他的威势权力令君主畏惧，残忍为所欲为，无人敢抵触他的意愿。史弘肇手下的官吏告百姓触犯盐禁，依法应当处死。狱案即将判决，薛居正怀疑此案有不真实处，召来审讯，原来是官吏和百姓有私仇，因而诬陷他，把官吏抓来审问，都依法处死。史弘肇虽然非常愤怒，也没有办法使薛居正屈服。

周广顺初年，调任比部员外郎，掌管三司推官，不久为知制诰。周太祖亲征兖州，诏令薛居正随行，因有劳而加都官郎中。显德三年，调任左谏议大夫，升为弘文馆学士，判馆事。六年，朝廷派薛居正到沧州制定百姓租税额。不久，因处事有才干而闻于朝廷，升为刑部侍郎，判吏部铨选。

宋朝初年，调为户部侍郎。太祖亲征李筠及李重进，薛居正并判留司与三司。不久出京城为许州知州。建隆三年，入朝廷为枢密直学士，代管贡举。开始平定湖湘，以薛居正为朗州知州，适逢逃亡的兵卒几千人聚集在山泽为盗贼，监军使怀疑城中一千多僧人都是他们的同伙，商议想把他们都抓来杀掉。薛居正用计谋拖延此事，因此率领军队翦灭众盗贼，擒获贼帅汪端，审问他，得知众僧都没有参预其事，众僧依靠薛居正得以活命。

乾德初年，薛居正加官兵部侍郎。太祖将要亲征太原，大规模征发百姓运输军饷。当时河南府有饥荒，四万家逃亡，太祖忧虑此事，命令薛居正乘驿站的车急去招集百姓，十日内百姓就都恢复旧业。以本官职参知政事。五年，加官吏部侍郎。开宝五年，兼淮南、湖南、岭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使事，又兼判门下侍郎事，监修国史；又监修《五代史》，第二年完成，朝廷赐以器物 and 财币。六年，拜薛居正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八年二月，太祖对薛居正等人说：“今年谷物丰登，众物繁盛，如果不是上天给予帮助，怎能达到这地步。所应做的是共同考虑帮助人，如果有了不善的政事，应当给与振兴，以此完成朕的志向。”薛居正等人进一步整治政事，以此符合太祖的意愿。

太平兴国初年，薛居正加左仆射、昭文馆大学士。跟随太宗平定晋阳归来，进位司空。因为服用丹砂中毒，正在朝廷奏事，觉得病要发作，赶快出去。走到殿门外，喝了一升多水，堂吏搀他回到中书省，已经不能说话，只指着廊庑里的储水器。左右的人取水来到他面前，但已不能喝水，倒卧

在阁中，吐气象火焰，乘车輿回到家中去世，时间是六年六月，终年七十。朝廷赐薛居正太尉、中书令，谥号为文惠。

薛居正气质容貌宏伟，饮酒饮数斗方寸也不乱。生性孝顺行为纯正，居家俭朴节约。做宰相讲信用，宽缓情实，不喜欢苛刻烦察，士人君子因此赞许他。薛居正从参与政事到做宰相，一共十八年，朝廷的恩遇始终不衰。

先前，太祖曾经对薛居正说：“自古以来为人君者很少有人能整饬自己，做人臣者大多数没有远略，虽然身居显赫的地位，不能留名后世，却身陷不义，子孙遭殃，大概是为君臣的事理还有所欠缺。我看唐太宗接受人臣的谏疏，直言诋毁他的过失而不以为耻。以朕之见，不如自己不做，使他人没有不同的说法。又观察古代的人臣大多数有始无终，能保全自己而且享受厚福的人，是由于忠诚正直。”开宝年间，薛居正与沈伦同时为宰相，卢多逊参知政事，九年冬季，卢多逊也为平章事。到薛居正去世，然而沈伦贬官，卢多逊放逐到南方，议论的人认为薛居正守为臣的事理所以享受福祿，果然符合太祖的话。

恭居正喜欢读书，做文章落笔往往不能自己，必然一气呵成。薛居正的儿子惟吉将他的文章编集成三十卷呈上朝廷，赐名为《文惠集》。咸平二年，朝廷下诏以薛居正附祭于太祖庙庭。

（曾贻芬 译）

【原文】

薛居正字子平，开封浚仪人。父仁谦，周太子宾客。居正少好学，有大志。清泰初，举进士不第，为《遣愁文》以

自解，寓意倜傥，识者以为有公辅之量。逾年，登第。

晋天福中，华帅刘遂凝辟为从事。遂凝兄遂清领邦计，奏署盐铁巡官。开运初，改度支推官。宰相李崧领盐铁，又奏署推官，加大理司直，迁右拾遗。桑维翰为开封府尹，奏署判官。

汉乾佑初，史弘肇领侍卫亲军，威权震主，残忍自恣，无敢忤其意者。其部下吏告民犯盐禁，法当死。狱将决，居正疑其不实，召诘之，乃吏与民有私憾，因诬之，逮吏鞠之，具伏抵法。弘肇虽怒甚，亦无以屈。

周广顺初，迁比部员外郎，领三司推官，旋知制诰。周祖征兖州，诏居正从行，以劳加都官郎中。显德三年，迁左谏议大夫，擢弘文馆学士，判馆事。六年，使沧州定民租。未几，以材干闻于朝，擢刑部侍郎，判吏部铨。

宋初，迁户部侍郎。太祖亲征李筠及李重进，并判留司三司，俄出知许州。建隆三年，入为枢密直学士，权知贡举。初平湖湘，以居正知朗州。会亡卒数千人聚山泽为盗，监军使疑城中僧千余人皆其党，议欲尽捕诛之。居正以计缓其事，因率众翦灭群寇，擒贼帅汪端，诘之，僧皆不预，赖以全活。

乾德初，加兵部侍郎。车驾将亲征太原，大发民餽运。时河南府饥，逃亡者四万家，上忧之，命居正驰传招集，浹旬间民尽复业。以本官参知政事。五年，加吏部侍郎。开宝五年，兼淮南、湖南、岭南等道郡提举三司水陆发运使事，又兼判门下侍郎事，监修国史；又监修《五代史》，逾年毕，锡以器币。六年，拜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八年二月，上谓居正等曰：“年谷方登，庶物丰盛，若非上天垂佑，何以及斯。所

宜共思济物，或有阙政，当与振举，以成朕志。”居正等益修政事，以副上意焉。

太平兴国初，加左仆射、昭文馆大学士。从平晋阳还，进位司空。因服丹砂遇毒，方奏事，觉疾作，遽出。至殿门外，饮水升余，堂吏掖归中书，已不能言，但指庖间储水器。左右取水至，不能饮，偃阁中，吐气如烟焰，輿归私第卒，六年六月也，年七十。赠太尉、中书令，谥文惠。

居正气貌瑰伟，饮酒至数斗不乱。性孝行纯，居家俭约。为相任宽简，不好苛察，士君子以此多之。自参政至为相，凡十八年，恩遇始终不替。

先是，太祖尝谓居正曰：“自古为君者鲜克正己，为臣者多无远略，虽居显位，不能垂名后代，而身陷不义，子孙罹殃，盖君臣之道有所未尽。吾观唐太宗受人谏疏，直诋其非而不耻。以朕所见，不若自不为之，使人无异词。又观古之人臣多不终始，能保全而享厚福者，由忠正也。”开宝中，居正与沈伦并为相，卢多逊参知政事，九年冬，多逊亦为平章事。及居正卒，而沈伦责授，多逊南流，论者以居正守道蒙福，果符太祖之言。

居正好读书，为文落笔不能自休。子惟吉集为三十卷上之，赐名《文惠集》。咸平二年，诏以居正配飨太宗庙庭。

宋 祁 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二八四

【说明】宋祁（998—1061年），字子京，安州安陆（今湖北安陆县）人。仁宗庆历五年五月降诏，开局修《唐书》，宋祁即是同刊修官，负责列传的撰写，后欧阳修入局主持纪、志、表的修撰刊定，约在嘉佑五年最后撰成《新唐书》，前后经过十七年，其中欧阳修、宋祁出力最多。《新唐书》二百二十五卷，包括本纪十卷、志五十卷、表十五卷、列传一百五十卷。记载了唐高祖武德元年（618）至哀帝天佑四年（907年）唐代二百八十九年的史事。与《旧唐书》相比较，《新唐书》删去本纪的十分之六七，使其内容显得简明；对于列传，则删去旧书的六十一传，另加三百余传，不仅使内容丰富，而且入选较得当；续撰《仪卫志》、《选举志》、《兵志》，这是以前正史中所没有的，增置《宰相表》、《方镇表》、《宗室世系表》、《宰相世系表》，以便查阅。总观《新唐书》在体例上有所创新，内容上有所增补，文字也比较严谨简明。由于当时追求“事增于前，文省于旧”，所以文辞刻意求简，以致记载中出现不少史实含混不清，年代不明的地方，有时竟凭个人

爱好随意改动奏议原文等等,这无疑有损原意及其史料价值。

宋祁,字子京,和其兄宋庠同时举为进士,礼部上奏宋祁为第一,宋庠为第三。章献太后不想让弟弟在哥哥之前,就升宋庠为第一,而将宋祁置于第十。人呼两兄弟为“二宋”,以大宋小宋区别他们。做官为复州军事推官。孙奭举荐宋祁,改任大理寺丞、国子监直讲。参加朝廷诏召考试,授直史馆,又改太常博士、同知礼仪院。有关部门说太常的旧乐几经损益,声音不和谐。朝廷诏令宋祁同按试。李照制定太常新乐,胡瑗铸造钟磬,都由宋祁掌管,此事的详细记载见《乐志》。参预修撰完成《广业记》,迁任尚书工部员外郎、同修起居注,权三司度支判官。正在陕西用兵,征发的费用日益急迫,宋祁上疏说:

军队以粮食为根本,粮食以钱币为辅助,食货是圣人一统天下应具备的。现在左藏库没有多年的钱币,太仓没三年的粮食,南方冶铜业匮乏而不能发展,治平相承如此,已经自行彫伤困顿,真的是因为取之已尽,用之无度。朝廷在大的方面有三冗,小的方面有三费,这三冗三费使天下财货困迫。财货穷拮据用项狭窄,而想兴兵远征,实在是没有办法。能除去三冗,节制三费,专门装备西北的屯兵,可以开朗地高枕无忧了。

什么是三冗?天下有固定的官职,却没有固定的人员限数,这是一冗;天下的厢军不参与战事,而消耗衣物粮食,这是二冗;僧道日益增多,而没有限定人数,这是三冗。三冗不除去,就不能治理国家。请求决断从现

在开始,和尚道士已经受戒手续完备的人姑且保持原状,其他的僧人道士都还俗为百姓,这样可以得到耕夫织妇五十多万人,一冗消除了。天下厢军不挑出矮小瘦弱的人而都刺字为兵,仅仅是谋求他们服役,这些人原本不懂军事,又还每月支取官府的储粮,每年耗费府库的钱币,而几口之家,不能自己庇护其家,大多数就离开厢军而为盗贼,虽然广泛招募他们,也无济于事,那些已经在兵籍的人就不必说了,其它的兵卒一律驱使他们归田务农,这样又得到尽力耕作的人几十万,二冗除去了。国家郡县,向来有固定的官职,譬如以十人为定额,通常以十二人增加这定额,就是遇到官吏调任代理、获罪贬谪,随时要官替补而有人可取。现在一官还未空缺,就群起而争逐这一官职,州县不比以前广阔,而官却是旧时的五倍,吏怎么会不苟且仕进,官怎么能不滥升迁。请朝廷诏令三班审官院内诸司、流内铨明确制定官吏限额,以此为固定的法规。那恩荫官、流外官以及贡举等科,都设实职选官的限额,稍微注意一下人员的选择,等有缺官时,计算缺员而补官,三冗也除去了。

什么是三费?一是佛道作道场设斋坛向神祈福,天天如此没有一天停止,而且由百官按需要的数量供给,到了不能计量的地步。他们都是以祝皇帝长寿,祀奉先烈、祈求民福等等为名,臣愚以为此事的主办人是用欺世盗名的计谋而已。陛下事奉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百神,所需牺牲玉帛,让主管人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奉上、按岁时定期献上,这足以条陈明德、佐助多福了,何必希冀繁

杂琐碎的回报呢？那么一费就节制了。二是京城的寺观，有的多设服劳役的人，还添置官府，所耗衣食大致是其他地方的三倍。居住大屋高廊，不服徭役，坐食侵吞百姓，寺观尤为严重。而且还自己募捐百姓的财物，营建祠庙，虽说不花费官府钱财，然而国家和百姓是一体，抛开国家而攫取百姓，那伤害都是一样的，请求罢除京师寺观，那么二费就节制了。三是派宰相为节度，而不检查边远要塞。节相的建立，或处边镇，或临军队，设置节相的公田，在于慰劳兵众，宴享宾客。现在大臣罢免，大都还叨占恩典，坐费国家资财，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。请求从现在开始，地处非边塞要冲，州中没有军队驻扎，不得建立节度；已带节度的，不得留在近处和京师，那么三费也节制了。

臣又听说，人不为表率就无人相从，身不先行就没有信用。陛下亲自实行节俭，以此风范标示四方，衣服起居，没有超越旧制法规，后宫锦绣珠玉，不得胡乱浪费，这样天下就会响应，百姓的生业日益繁丰，人心不动摇，战事可兴，风行电掣，瞬间，即可饮马西河。愚蠢的戎酋，即在我手掌中了。

宋祁调判盐铁句院，同修礼书。依进官顺次应当知制造，而宋庠刚参知政事，就以宋祁为天章阁待制，判太常礼院、国子监，又改判太常寺。宋庠罢官，宋祁也出京师为寿州知州，又调为陈州知州。还京为知制造、权同判流内铨，以龙图阁直学士为杭州知州，留任翰林学士。提举诸司库务，多次勘正弊病，增设勾当公事官，其部下有议论利害的人，都让先

上报度量可否，而后在三司议论，于是写成为法令。调知审官院兼侍读学士。宋庠又知政事，罢免宋祁的翰林学士，改任龙图阁学士、史馆修撰，修《唐书》。又迁任右谏议大夫，充任群牧使。宋庠为枢密使，宋祁又为翰林学士。

景佑年间，朝廷下诏求正直议论，宋祁奏说：“人主不决断是名分之乱。《春秋》写：‘落霜，不雕落豆苗。’上天的权威暂时停废，不能雕落小草，就如同人主不决断，不能制服臣下。”又说：“和贤能之人谋划而和不肖之人决断，慎重地遴选大臣而轻率地任用他，大事不谋划而小事急迫，这就是所说的三患。”宋祁言意的主旨在于加强君主权威，区别邪正，紧急解决当务之急，这些都切中时弊。

恰逢温成皇后进为贵妃。旧例，命妃都要发册，妃辞谢就停罢册礼。然而诰在主管部门，必须等到圣旨而后进内。还有，凡是制词，已经授于阁门使宣读，再交学士院书写，送到中书，以三省官衔做为了结，再送官告院盖印，就进呈宫内。宋祁正好该裁断此事，他不等候圣旨，写了诰书不送中书省，直接取官告院的印铃上，急忙封好进呈宫内。温成皇后正得仁宗宠幸，希望举行册礼，得到诰书大怒，把诰书扔到地上。宋祁因此得罪而出京城为许州知州。刚刚几个月，又召为侍读学士、史馆修撰。祭祀明堂，宋祁调任给事中兼龙图阁学士，因他的儿子随张彦方交游而获罪，出京城为亳州知州。又兼集贤殿修撰。

一年多以后，宋祁调任成德军使，迁为尚书礼部侍郎。请求开放河东、陕西马禁，又请求恢复唐代驮幕的法规。过了三个月，调到定州，又上奏说：

国家的根本在河北，而河北的根本在镇州、定州，以镇、定扼制贼人的交通要道，可做国家的门户。况且契丹卑屈讨好五十年，而是恶狼的样子，疯狗的心意，不可能没有动作。现在它垂涎定州、镇州，两军没有交战，就逼近深、赵、邢、洺诸州，直捣我边境之空虚，血盆大口贪婪急进，无所顾忌。臣私下考虑想军队强盛，不如增加粮食财货；想士兵训练精良，不如选择优秀的将帅；想人们乐于争斗，不如重赏严罚；想贼四顾不敢前进，不如使镇州成为重镇，使定州成为强镇。以怯弱为耻，崇尚勇敢，好论国事，乐得而忘死；河北的人，差不多天性即如此。陛下对河北人稍加激励，不愁他们不战。用想打仗的战士，而没有良将，虽然好斗还会失败，没有粮食与财货，城池虽固如金汤，它的势力一定遭轻视。

现在朝廷选择将帅训练兵卒，筹措财货积蓄粮食，却以陕西、河东为先，河北为后，这非良策。西部贼人兵虽精锐但数量少，不能深入我境，河东有天险，使贼人惧怕为盗。这河北则不然，从蓟州一直望去，势同高屋建瓴，贼众击鼓而前进，如同走在蒲席上。所以谋夺契丹的人应当先重河北，而谋划河北的人舍弃镇州、定州不论。臣希望先向镇、定二州运送粮食，镇、定粮食充足后，可以运入其他州郡。众将在陕西、河东有立功行状的人，能调到镇、定，那么镇、定二州就举足轻重了。天下长时间和平，马越来越少，臣请求多用步兵。说到云奔飚驰，抄后掠前，这是骑兵的长处，而强弩大棒，长

枪利刃，什伍相联缀，大呼着与敌人近战，这是步兵的长处。臣估计朝廷和敌人相攻，一定不准备深入敌境穷追，攻打他把他赶到边境就截止，这不必期待于骑兵而步兵就足够用了。臣请求减少骑兵增加步兵，因为马少则骑兵精良，步兵多则争夺强健，我朝能用步兵的长处，虽然契丹多骑兵，也无用武之地。

镇州、定州是一个整体，自从先帝以来，二州就同属一道，将帅是一个人而兵卒也不分开，所以定州击刺其胸，则镇州攻打其胁，这是自然形成的形势。现在将其判分为二，其明显是有害的，屯驻的山寨以及山川险要的地方都分属两州，平时的号令公文不能划一，贼人倘或攻打营垒则彼此不能相互谋划，还有谁肯担当此责任呢！请求合并镇州、定州为一路，以将相大臣统领此路，无战事时以镇州为治所，有战事就迁治所至定州，指明授予诸将，权力划一而责任有归属，这是策中之上策。陛下应当居安思危，缜密地谋划长远的事，一定要等到事情发生后再谋求解决，就危险了。

河东骑兵强盛，士卒熟习善于奔驰突击，与镇、定二州如同表里，然而东下井陘，不到百里即可进入镇州、定州了。贼人如果深入，以河东强健的骑兵协助镇州、定州的步兵，掩杀其衰败要逃回的人，这样做万出万全，这是一奇啊。臣听说切实于运用的事，不可以文饰后再陈述，臣所议论的事目繁杂琐碎，要待刀笔吏将原委曲折厘清才能明白，臣已按简便的方式说明此事，就另外上一篇择将畜财的封章，请求下达枢密院、三司，由他们

裁定此议。

宋祁又上《御戎论》七篇。加官端明殿学士，特别调任吏部侍郎、益州知州。不久除授三司使。右司谏吴及曾说宋祁在定州为政不平，纵容家人借用公使钱几千缗，在蜀地奢侈过度。这以后御史中丞包拯也说宋祁多游玩宴乐，况且他的哥哥刚执政，不可出任三司。就加官龙图阁学士、郑州知州。《唐书》撰成，调任左丞，进任工部尚书。因羸疾请求便于就医用药，入判尚书都省。过一个月，拜为翰林学士承旨，朝廷诏令宋祁当入朝值班时准许带一个儿子侍候汤药。又任群牧使，不久去世。宋祁留下遗奏说：“陛下享国四十年，东宫之位尚空虚，天下系于希望，人心不安。为社稷长远打算，不如选择宗室中的贤材，进爵为亲王，为宗庙之主。如果六宫有分娩之喜讯，圣嗣蕃衍，则宗子降封郡王，以此避嫡子，这是安定人心、防祸患的大计。”

宋祁又自作墓誌铭和《治戒》以此交给他的儿子：“三天入敛，三月安葬，小心不要被流俗阴阳所拘束畏忌。棺材用杂木打制，油漆棺木的四会，涂三道漆即可，使几十年足以晾干我的骸骨、朽坏我的衣巾而已。不要把金铜杂物埋在冢中。况且我的学识不能自成一家，文章又仅达中人水平，不足以留传后世。为官在良二千石之下，不要请求谥号，不要接受赠与、典礼。墓冢上种五棵柏树，坟修三尺高，墓前不得用石人、石兽。你们不可违背我的命令。你们兄弟十四人，只有两个小儿未仕进，把你们托给菖公。菖公在，你们就不孤独。”后来赠宋祁尚书。

宋祁兄弟都以文学显名于世，而宋祁尤其擅长做文章，善

于议论，然而文章的清新简约及庄重不如宋庠，议论者认为宋祁官未达三公辅相之高位也是因为这一点等等。宋祁修《唐书》十几年，自为亳州知州，出入朝廷内外曾以书稿随身携带，做列传一百五十卷。参预修《籍田记》、《集韵》。又撰《大乐图》二卷，文集一百卷。宋祁所到之处，治理政事明智严刻，喜欢订条文、教令。他的儿子遵循《治戒》的意愿不请求谥号，过了相当长的时间，学士承旨张方平说宋祁应该得到谥号，谥号为景文。

(曾贻芬 译)

【原文】

祁字子京，与兄庠同时举进士，礼部奏祁第一，庠第三。章献太后不欲以弟先兄，乃擢庠第一，而置祁第十。人呼曰“二宋”，以大小别之。释褐复州军事推官。孙奭荐之，改大理寺丞、国子监直讲。召试，授直史馆，再迁太常博士、同知礼仪院。有司言太常旧乐数增损，其声不和。诏祁同按试。李照定新乐，胡瑗铸钟磬，祁皆典之，事见《乐志》。预修《广业记》成，迁尚书工部员外郎、同修起居注、权三司度支判官。方陕西用兵，调费日蹙，上疏曰：

兵以食为本，食以货为资，圣人一天下之具也。今左藏无积年之镗，太仓无三岁之粟，南方冶铜匱而不发，承平如此，已自彫困，良田取之既殫，用之无度也。朝廷大有三冗，小有三费，以困天下之财。财穷用徧，而欲兴师远事，诚无谋矣。能去三冗、节三费，专备西北之屯，可旷然高枕矣。

何谓三冗？天下有定官无限员，一冗也；天下厢军

不任战而耗衣食，二冗也；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，三冗也。三冗不去，不可为国。请断自今，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旧，其他悉罢还为民，可得耕夫织妇五十余万人，一冗去矣。天下厢军不择孱小眇弱而悉刺之，才图供役，本不知兵，又且月支禀粮，岁费库帛，数口之家，不能自庇，多去而为盗贼，虽广募之，无益也。其已在籍者请勿论，其他悉驱之南亩，又得力耕者数十万，二冗去矣。国家郡县，素有定官，譬以十人为额，常以十二加之，即迁代、罪谴，随取之而有。今一官未阙，群起而逐之，州县不广于前，而官五倍于旧，吏何得苟进，官何得不滥除。请诏三班审官院内诸司、流内铨明立限员，以为定法。其门荫、流外、贡举等科，实置选限，稍务择人，俟有阙官，计员补吏，三冗去矣。

何谓三费？一曰道场斋醮，无有虚日，且百司供亿，至不可殫计。彼皆以祝帝寿，奉先烈、祈民福为名，臣愚以为此主者为欺盗之计尔。陛下事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百神，牺牲玉帛，使有司端委奉之、岁时荐之，足以竦明德、介多福矣，何必希屑屑之报哉？则一费节矣。二曰京师寺观，或多设徒卒，添置官府，衣粮率三倍他处。居大屋高庑，不徭不役，坐蠹齐民，其尤者也。而又自募民财，营建祠庙，虽曰不费官帑，然国与民一也，舍国取民，其伤一焉，请罢去之，则二费节矣。三曰使相节度，不隶藩要。夫节相之建，或当边镇，或临师屯，公用之设，劳众而飨宾也。今大臣罢黜，率叨恩除，坐靡邦用，莫此为甚。请自今地非边要、州无师屯者，不得

建节度；已带节度，不得留近藩及京师，则三费节矣。

臣又闻之，人不率则不从，身不先则不信。陛下能躬服至俭，风示四方，衣服起居，无逾旧规，后宫锦绣珠玉，不得妄费，则天下响应，民业日丰，人心不摇，师役可举，风行电照，饮马西河。蠢尔戎首，在吾掌中矣！

徙判盐铁句院，同修礼书。次当知制诰，而庠方参知政事，乃以为天章阁待制，判太常礼院、国子监，改判太常寺。庠罢，祁亦出知寿州，徙陈州。还知制诰、权同判流内铨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，留为翰林学士。提举诸司库务，数厘正弊事，增置勾当公事官，其属言利害者，皆使先稟度可否，而后议于三司，遂著为令。徙知审官院兼侍读学士。庠复知政事。罢祁翰林学士，改龙图学士、史官修撰，修《唐书》。累迁右谏议大夫，充群牧使。庠为枢密使，祁复为翰林学士。

景佑中，诏求直言，祁奏：“人主不断是名乱。《春秋》书：‘殒霜，不杀菽。’天威暂废，不能杀小草，犹人主不断，不能制臣下。”又谓：“与贤人谋而与不肖者断，重选大臣而轻任之，大事不图而小事急，是谓三患。”其意主于强君威，别邪正，急先务，皆切中时病。

会进温成皇后为贵妃。故事，命妃皆发册，妃辞则罢册礼。然告在有司，必俟旨而后进。又凡制词，既授阁门宣读，学士院受而书之，送中书，结三省衔，官告院用印，乃进内。祁适当制，不俟旨，写告不送中书，径取官告院印用之，亟封以进。后方爱幸，觐行册礼，得告大怒，掷于地。祁坐是出知许州。甫数月，复召为侍读学士、史馆修撰。祀明堂，迁给事中兼龙图阁学士。坐其子从张彦方游，出知亳州。兼集

贤殿修撰。

岁余，徙知成德军，迁尚书礼部侍郎。请弛河东、陕西马禁，又请复唐驮幕之制。居三月，徙定州，又上言：

天下根本在河北，河北根本在镇、定，以其扼贼冲，为国门户也。且契丹摇尾五十年，狼态獠心，不能无动。今垂涎定，镇，二军不战，则薄深、赵、邢、洺，直搏其虚，血吻焚进，无所顾藉。臣窃虑欲兵之强，莫如多谷与财；欲士训练，莫如善择将帅；欲人乐斗，莫如赏重罚严；欲贼顾望不敢前，莫如使镇重而定强。夫耻怯尚勇，好论事，甘得而忘死：河北之人，殆天性然。陛下少励之，不忧不战。以欲战之士，不得善将，虽斗犹负。无谷与财，虽金城汤池，其势必轻。

今朝廷择将练卒，制财积粮，乃以陕西、河东为先，河北为后，非策也。西贼兵锐士寡，不能深入，河东天险，彼憚为寇。若河北不然，自蓟直视，势同建瓴，贼鼓而前，如行堯枉。故谋契丹者当先问北，谋河北者舍镇、定无议矣。臣愿先入谷镇、定，镇、定既充，可入谷余州。列将在陕西、河东有功状者，得迁镇、定，则镇、定重。天下久平，马益少，臣请多用步兵。夫云奔飙驰，抄后掠前，马之长也；强弩巨槌，长枪利刀，什伍相联，大呼薄战，步之长也。臣料朝廷与敌相攻，必不深入穷追，殴而去之，及境则止，此不待马而步可用矣。臣请损马益步，故马少则骑精，步多则斗健，我能用步所长，虽契丹多马，无所用之。

夫镇、定一体也，自先帝以来为一道，帅专而兵不

分，故定搃其胸，则镇搏其胁，势自然耳。今判而为二，其显显有害者，屯砦山川要险之地裂而有之，平时号令文移不能一，贼脱叩营垒，则彼此不相谋，尚肯任此责邪！请合镇、定为一，以将相大臣领之，无事时以镇为治所，有事则迁治定，指授诸将，权一而责有归，策之上也。陛下当居安思危，熟计所长，必待事至而后图之，殆矣。

河东马强，士习善驰突，与镇、定若表里，然东下井陘，不百里入镇、定矣。贼若深入，以河东健马佐镇、定兵，掩其情若归者，万出万全，此一奇也。臣闻事切于用者，不可以文陈，臣所论件目繁碎，要待刀笔吏委曲可晓，臣已便俗言之，辄别上择将蓄财一封，乞下枢密院、三司裁制之。

又上《御戎论》七篇。加端明殿学士，特迁吏部侍郎、知益州。寻除三司使。右司谏吴及尝言祁在定州不治，纵家人贷公使钱数千缗，在蜀奢侈过度。既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游燕，且其兄方执政，不可任三司。乃加龙图阁学士、知郑州。《唐书》成，迁左丞，进工部尚书。以羸疾请便医药，入判尚书都省。逾月，拜翰林学士承旨，诏遇入直许一子主汤药。复为群牧使，寻卒。遗奏曰：“陛下享国四十年，东宫虚位，天下系望，人心未安。为社稷深计，莫若择宗室贤材，进爵亲王，为匕鬯之主。若六宫有就馆之庆，圣嗣蕃衍，则宗子降封郡王，以避正嫡，此定人心、防祸患之大计也。”

又自为诔铭及《治戒》以授其子：“三日敛，三月葬，慎无为流俗阴阳拘忌也。棺用杂木，漆其四会，三涂即止，使

数十年足以腊吾骸、朽衣巾而已。母以金铜杂物置冢中。且吾学不名家，文章仅及中人，不足垂后。为吏在良二千石下，勿请谥，勿受赠典。冢上植五株柏，坟高三尺，石翁仲他兽不得用。若等不可违命。若等兄弟十四人，惟二孺儿未仕，以此诿莒公。莒公在，若等不孤矣。”后赠尚书。

祁兄弟皆以文学显，而祁尤能文，善议论，然清约庄重不及庠，论者以祁不至公辅，亦以此云。修《唐书》十余年，自守亳州，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，为列传百五十卷。预修《籍田记》、《集韵》。又撰《大乐图》二卷，文集百卷。祁所至，治事明峻，好作条教。其子遵《治戒》不请谥，久之，学士承旨张方平言祁法应得谥，谥曰景文。

乐史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三〇六

【说明】乐史（930—1007年），字子正，抚州宜黄（今江西宜黄县）人，著作中以《太平寰宇记》最有价值。该书共二百卷，是北宋最早的全国性总地志，大概完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，记载的是太平兴国年间平定闽、越和北汉以后的中国地理情况。此书的纲领形式仍以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兰本，其中卷一至卷一百七十一记十一道的情况，卷一百七十二至卷二百记四夷的情况。书中所设门类除沿袭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外，又增加地方风俗、人物、姓氏、艺文等，无不备载，地志的内容范围，从此更为扩大，故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：“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而始详，体例亦自是而大变”。后来的方志所列类目范围多受《太平寰宇记》的影响。此书不仅收录材料繁富，而且考核精审，对研究宋代历史大有裨益。

乐黄目字公礼，抚州宜黄人。先世辅佐江南南唐李氏。父亲乐史，字子正。齐王李景达镇守临川，召乐史掌管大臣呈给皇帝的表奏，授秘书郎。入宋朝，为平原主簿。太平兴国五年，与颜明远、刘昌言、张观一起以现任官职举进士。太

宗惋惜他未能科举登第，只授诸道掌书记。乐史得以佐武成军，不久又赐他进士及第。乐史上书议论政事，升为著作佐郎，陵州知府。进献《金明池赋》，征召为三馆编修。

雍熙三年，乐史献上所著的《贡举事》二十卷、《登科记》三十卷、《题解》二十卷、《唐登科文选》五十卷，《孝弟录》二十卷，《续卓异记》三卷。太宗赞赏他的勤奋，迁任为著作郎、直史馆。调任太常博士、舒州知州，又调水部员外郎。淳化四年春季，和司封员外郎、直昭文馆李蕤一同派往两浙为巡抚，加都官、黄州知州。乐史又献上所著《广孝传》五十卷、《总仙记》一百四十一卷。朝廷诏令秘阁写本进献内廷。乐史喜好著述，然而广博而不得要领，认为五帝、三王，都是化仙而去，议论者讥笑他诡诈荒诞。

咸平初年，乐史调任兵部判职方事，又献上《广孝新书》五十卷，《上清文苑》四十卷。出京师任商州知州。乐史前后为州守治理百姓，颇有受贿之事闻于朝廷。不久以年老有病为由，听任他解除官职，分掌西京。咸平五年，郊祀礼完毕，乐史奉留守司表入朝祝贺，因此得以受召入对。真宗见他老而勇健，精神不衰，又知道他勤于学问，把他所著的书都取来藏在秘府，又授他以原职，和其子黄目同在文馆，人们以此为荣耀。出京城掌管西京磨勘司，黄目为京西转运使。乐史改任判留司御史台。真宗临幸洛阳，召乐史入对，赐他紫袍金鱼袋。乐史长期在洛阳，因为定居，所以有亭阁楼榭、竹树花草的胜景，能够悠闲自得。不久去世，终年七十八。乐史所撰著作还有《太平寰宇记》二百卷，《总记传》一百三十卷，《坐知天下记》四十卷，《商颜杂录》、《广卓异记》各二

十卷,《诸仙传》二十五卷,《宋齐丘文传》十三卷,《杏园集》、《李白别集》、《神仙宫殿窟宅记》各十卷,《掌上华夷图》一卷。又把自己所撰文章编成《仙洞集》一百卷。

(曾贻芬译)

【原文】

乐黄目字公礼,抚州宜黄人。世仕江左李氏。

父史,字子正。齐王景达镇临川,召掌笺奏,授秘书郎。入朝,为平原主簿。太平兴国五年,与颜明远、刘昌言、张观并以见任官举进士。太宗惜科第不与,但授诸道掌书记。史得佐武成军,既而复赐及第。上书言事,擢为著作佐郎、知陵州。献《金明池赋》,召为三馆编修。

雍熙三年,献所著《贡举事》二十卷,《登科记》三十卷,《题解》二十卷,《唐登科文选》五十卷,《孝弟录》二十卷,《续卓异记》三卷。太宗嘉其勤,迁著作郎、直史馆。转太常博士、知舒州,迁水部员外郎。淳化四年春,与司封员外郎、直昭文馆李蕤同使两浙巡抚,加都官、知黄州。又献《广孝传》五十卷,《总仙记》一百四十一卷。诏秘阁写本进内。史好著述,然博而寡要,以五帝、三王,皆云仙云,论者嗤其诡诞。

咸平初,迁职方,复献《广孝新书》五十卷,《上清文苑》四十卷。出知商州。史前后临民,颇以贿闻。俄以老疾为言,听解职,分司西京。五年,郊祀毕,奉留守司表入贺,因得召对。上见其矍铄不衰,又知笃学,尽取所著书藏秘府,复授旧职,与黄目同在文馆,人以为荣。出掌西京磨勘司,黄目为京西转运。改判留司御史台。车驾幸洛,召对,赐金紫。

史久在洛，因卜居，有亭榭竹树之胜，优游自得。未几卒，年七十八。所撰又有《太平寰宇记》二百卷，《总记传》百三十卷，《坐知天下记》四十卷，《商颜杂录》、《广卓异记》各二十卷，《诸仙传》二十五卷，《宋齐丘文传》十三卷，《杏园集》、《李白别集》、《神仙宫殿窟宅记》各十卷，《掌上华夷图》一卷。又编己所著为《仙洞集》百卷。

刘 攽 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三一九

【说明】刘攽（1023—1089），字贡父，临江新喻（今江西新喻县）人。他精于史学，参加修撰《资治通鉴》，专职汉史，是司马光的主要助手之一。刘攽平生著作有百卷，包括《彭城集》、《中山诗话》、《东汉刊误》等。其中《东汉刊误》四卷，无论在史学，还是在文献学方面都有一定影响。此书按《后汉书》（不包括志）卷第顺次排列，帝纪为第一卷，列传第一至三十卷为第二卷，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卷为第三卷，第六十一至第八十卷为第四卷。全书体例是先列校文，再加按语以辨证。刘攽对汉史有很深的研究，而且又能娴熟地运用多种校勘方法，对《后汉书》的记载错误和因流传而造成的错误或加以纠正，或提出质疑。由于《东汉刊误》使《后汉书》的错误、脱漏得以补正，令其更有史料价值。而刘攽提出的，书中有的字虽然错了，但因相沿太久，不能尽改，就相沿不改的原则，在今天的校勘实践中仍有价值。《东汉刊误》在宋代即被称道，但是以后流传却不广泛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即未著录，是清末罗振玉在日本得到此书的宋刻本，并

影写刊布，此书始得重见。

刘攽字贡父，和他的哥哥刘敞同年中进士，在州县为官二十年，才为国子监直讲。欧阳修、赵概推荐他试馆职，御史中丞王陶与刘攽有旧怨，领侍御史苏棻一起排挤他，刘攽官至员外郎，才得以任馆阁校勘。熙宁年间，判尚书考功、同知太常礼院。

朝廷诏令封太祖诸孙行辈中尊贵者为王，供奉太祖之后。刘攽说：“按礼法，诸侯不能祖奉天子，应当自奉这个国家的祖宗。应尊崇赵德昭、赵德芳之后，代代不降爵，宗庙祭祀，让他们在位，就能显著朝廷所以褒扬太祖的旨意。”后来二王继封，如刘攽的议论。

正在改学校贡举法，刘攽说：“本朝选举官吏的制度，施行了百年，历代的将相名卿，都由这制度选出，而认为这制度没有选拔出合适的人，不是诋诬吗！希望沿袭旧例，不要轻率地议论改法。士人在家中修养学习，足以学成德才兼备的人，又何必在学官用课程督促他们呢。”

王安石在经筵，请求让讲经的人坐着讲。刘攽说：“侍臣在前面讲论经书，不能安稳地坐着，离开座位站着讲，这是古今常礼。君主使讲者坐，以此表示君主尊德乐道之意；如果不命坐而请求坐，就不同了。”礼官都同意他的说法，至今还这样做。

考试开封举人，和同院王介争执谩骂，被监察御史弹劾而罢官。礼院廷试开始用策问，起初，考官吕惠卿列阿附时议的人为高等，揭露时弊不徇私的反居下等。刘攽覆核考察，

把吕惠卿列的名次都反过来了。刘攽又曾经给王安石写信，议论新法不妥。王安石发怒，搜取刘攽以前的过失，斥逐他为泰州通判，以集贤校理、判登闻检院、户部判官为曹州知州。曹州是盗贼出没的地区，重法也不能禁止盗贼。刘攽说：“百姓不怕死，怎么能用死使他们畏惧朝廷。”到曹州，于是治事以宽缓平和为上，盗贼也渐渐平息了。任开封府判官，又出任京东转运使。手下的官吏有疲沓软弱不能胜任的人，也一定都给于安置。迁为兖、亳二州知州。吴居厚代替刘攽任转运使，能奉行法令，达到所上财赋数额，于是追究刘攽废弛的罪过，降职监衡州盐仓。

哲宗初年，起用刘攽为襄州知州。入京师为秘书少监，因病请求离任，加直龙图阁、蔡州知州。于是给事中孙觉、胡宗愈和中书舍人苏轼、范百禄说：“刘攽博闻强记善做文章，处理政事如同古代循吏，一身兼有多种才能，恪守所主张的学说而不违背，应当给他优厚赐与的假期，使他留在京师。”刘攽到蔡州几个月，就召拜中书舍人。请求恢复旧制，在枢密院建紫微阁。终因病重再没有起来，享年六十七岁。

刘攽所著的书有百卷，尤其精深于史学。撰《东汉刊误》，被人们所称道。参予司马光修撰的《资治通鉴》，专记汉代史。为人粗疏而才华出众，不注意庄严的容貌举止，喜欢开玩笑逗趣，多次因此招来怨恨而后悔，然而到死也不能改变这做法。

(曾贻芬 译)

【原文】

攽字贡父，与敞同登科，仕州县二十年，始为国子监直讲。欧阳修、赵概荐试馆职，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，率侍御

史苏案共排之，攽官已员外郎，才得馆阁校勘。熙宁中，判尚书考功、同知太常礼院。

诏封太祖诸孙行尊者为王，奉太祖后。攽言：“礼，诸侯不得祖天子，当自奉其国之祖。宜崇德昭、德芳之后，世世勿降爵，宗庙祭祀，使之在位，则所以褒扬艺祖者著矣。”后二王绍封，如攽议。

方更学校贡举法，攽曰：“本朝选士之制，行之百年，累代将相名卿，皆由此出，而以为未尝得人，不亦诬哉。愿因旧贯，毋轻议改法。夫士修于家，足以成德，亦何待于学官程课督趣之哉。”

王安石在经筵，乞讲者坐。攽曰：“侍臣讲论于前，不可安坐，避席立语，乃古今常礼。君使之坐，所以示人主尊德乐道也；若不命而请，则异矣。”礼官皆同其议，至今仍之。

考试开封举人，与同院王介争誉，为监察御史所劾罢。礼院廷试始用策，初，考官吕惠卿列阿时者在高等，讦直者反居下。攽覆考，悉反之。又尝诒安石书，论新法不便。安石怒摭前过，斥通判泰州，以集贤校理、判登闻检院、户部判官知曹州。曹为盗区，重法不能止。攽曰：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”至，则治尚宽平，盗亦衰息。为开封府判官，复出为京东转运使。部吏罢软不逮者，务全安之。徙知兖、亳二州。吴居厚代为转运使，能奉行法令，致财赋，乃追坐攽废弛，黜监衡州盐仓。

哲宗初，起知襄州。入为秘书少监，以疾求去，加直龙图阁、知蔡州。于是给事中孙觉、胡宗愈，中书舍人苏轼范百禄言：“攽博记能文章，政事侔古循吏，身兼数器，守道不

回，宜优赐之告，使留京师。”至蔡数月，召拜中书舍人。请复旧制，建紫微阁于西省。竟以疾不起，年六十七。

攽所著书百卷，尤邃史学。作《东汉刊误》，为人所称。预司马光修《资治通鉴》，专职汉史。为人疏儻，不修威仪，喜谐谑，数用以招怨悔，终不能改。

欧阳修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三一九

【说明】欧阳修（1007—1072），北宋文学家、史学家，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号六一居士。吉州永丰（今属江西）人。曾任枢密副使，参知政事。早年支持范仲淹的改良运动；王安石实行新法时，曾上疏陈青苗法利弊。晚年辞官闲居，卒谥文忠。

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，他主张文章应“明道”、致用，对宋初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批判。其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，诸体兼备，大都内容充实，气势雄健，风格平易自然，流畅婉转，在当时极有影响。其诗学习韩愈“以文为诗”，语言自然晓畅；部分诗作融叙事、议论、抒情于一体，写得沉郁顿挫，风格接近杜甫。欧阳修还善于论诗，《六一诗话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。其词婉丽，有南唐遗风，多写恋情相思、酣饮醉歌、惜春、赏花等。欧阳修的赋也很出色，《秋声赋》变唐代以来的“律体”为“散体”，对赋的发展有开拓意义。

欧阳修于经学、史学，金石学也有很高的成就。他参加《新唐书》的修撰，自著《新五代史》，收集、整理周代至隋

唐的金石碑刻，辑为《集古录》。有《欧阳文忠集》。

欧阳修，字永叔，庐陵（今江西吉安）人。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，母亲郑氏，立誓守节，亲自教导儿子读书，家境贫困，以至用芦管当笔在地上描画着学习写字。欧阳修自幼就聪敏颖悟，超过常人，书读过就能熟记背诵。一到成年，就有了很高的声望。

宋代立国将近百年，但文章的体裁，还是依然沿袭着五代的风气。文人们刻镂雕琢的都是骈偶之文，文坛污浊，文风不振，读书人因循陋习，墨守成规，评论卑下，气调柔弱。苏舜元苏舜钦兄弟、柳开、穆修等人，都有意振作张扬正气，但力量不足。欧阳修游历随州（今属湖北），在废书簏中得到了唐朝韩愈的遗稿，读后万分欣慕。于是就苦心孤诣地探幽索隐，以至废寝忘食，他决心要同韩愈并驾齐驱、比肩齐名。

中进士，得南宫殿试第一，被选拔为甲科，调西京推官。开始和尹洙交游，和尹洙一起写作古文，议论当朝时政，互相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的教师和朋友，又同梅尧臣交往，相互作诗唱和，就这样，欧阳修凭着他的文章名满天下。不久，选进朝廷，为馆阁校勘。

范仲淹因为议论政事被贬了官，朝廷中很多官员都议论相救，只有司谏高若讷一个人认为当贬。欧阳修就写了封信责备他，指责他不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。高若讷把欧阳修写给他的信送给了皇上，欧阳修因此获罪，被贬为夷陵（今湖北宜昌）县令，不久又迁为乾德（今湖北光化）县令、武成（今河南滑县）节度判官。范仲淹出使陕西，征辟欧阳修执掌

书记。欧阳修笑着推辞说：“从前我所以那样做，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？还是同其退不同其进较好吧。”过了很久，朝廷又恢复了他的校勘职务，并被进举为集贤院校理。宋仁宗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主持谏院。

当时仁宗皇帝更换大臣，杜衍、富弼、韩琦、范仲淹都做了朝廷大臣，仁宗还决定增加谏官，起用天下名士，欧阳修第一个在被选之列。每次进见，仁宗都要征求每个大臣的意见，询问他们应该做些什么。因为朝中兴废的事多了，小人们的聚合趋附感到了很多的不便。欧阳修考虑到正直的好人必然不会得胜，多次向仁宗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。

当初，范仲淹被贬饶州（治所在今江西波阳），欧阳修和尹洙、余靖都因为替范仲淹辩白伸冤而被逐，且被看成是“党人”。从此，朋党的争论就开始了，欧阳修写了《朋党论》进呈仁宗。其大略的意思说：“君子和君子因为志同道合结成朋党，小人和小人因为私利相投结成朋党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但我说小人是没有朋党的，只有君子才有朋党。因为小人所喜好的是名利和厚禄，所贪图的是金钱和财物，当他们利害一致的时候，就暂时互相勾结拉拢成为朋党，这是虚伪的。等到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互相争先，或者无利可图的时候就反而相互残害，虽然是兄弟亲戚，也不能互相保护，所以说小人是没有朋党的。君子就不是这样，他们所恪守的是道义，所奉行的是忠信，所珍惜的是名节。用它们来修身，就不仅志同道合而且还互相裨益，用它们来效忠国家，就不仅同心协力而且同舟共济，始终如一，所以说：只有君子才有朋党。商纣有臣子亿万个，就有亿万颗心，可说是没有朋党

了吧，而商纣因此而亡国；周武王有臣子三千人，三千人只有一条心，可说是大的朋党了吧，而周王朝因此而兴。这是因为君子的朋党，虽然多也不会满足的缘故。所以做国君的人只该贬退小人的假朋党，起用君子的真朋党，那么天下就可大治了。”

欧阳修评议朝政严厉正直，小人们把他看成似仇人，而仁宗独夸奖他敢于说话，当面赐给他五品朝服，并且回看着侍臣们说：“像欧阳修这样的人，到哪里去找得来？”于是，提拔为同修起居注，又主管起草皇帝的诏令。按照先例，选拔主管起草皇帝诏令的官员一定要经过面试以后才能任命，因为仁宗了解欧阳修，下诏书特地任命欧阳修担任这个职务。

后来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。自从朝廷对西方用兵以来，议论时政的人就想废除麟州（今陕西神木）以便节省军队的供给。欧阳修说：“麟州是天然的险要之地，不要废除，废除了麟州，那末河内这些郡县的百姓就不能安居了。不如分出麟州的军队，让他们进驻河内的各个要塞，遇到危急也可以互相得到接应和救援，而平时又可以省去转辗运输之劳，对于谋略来说，这样做比较有利。”由于欧阳修的这个建议，麟州得到了保存。他又说：“忻州（治所在今山西忻县）、代州（治所在今山西代县）、岢岚（今属山西）多的是禁地和废田，希望下命令让老百姓去开垦和种植，不然，就将被敌人占有了。”朝廷把欧阳修的提议交给有关部门讨论，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实行，结果是朝廷每年得到了几百万斛的粮食。凡是河东土地赋税过重，人民无法忍受的摊派，欧阳修上奏朝廷请求免除了十几项。

欧阳修出使回来，正值保州（今河北保定）屯兵作乱，欧阳修被授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他在向天子辞别的时候，仁宗对他说：“你不要做长久留在外面的打算，有什么想说的，说吧。”欧阳修回答说：“我在谏官任上就该评论朝政，现在我已经不做谏官了，再评议朝政就是越职了，这是有罪的。”仁宗说：“只管说，没关系，不要因为京官和外官而生出间隔来。”乱贼平定了，大将李昭亮、通判冯博文私藏妇女，欧阳修逮捕了冯博文把他囚禁在监狱里，李昭亮害怕了，马上放出了所有私藏的妇女。保州屯兵开始作乱的时候，官府曾经用投降不杀的诺言进行招安，等到叛乱平定后却统统把他们杀死了，另外尚有胁从的二千人，本来已经把他们分别编制、隶属到各个州郡里去了，当时富弼是宣抚使，担心这些被编的人以后会再生变故，所以又决定将他们在同一天里全部杀死。碰巧富弼和欧阳修在内黄（今属河南）这个地方相遇了，半夜里，富弼屏退左右，悄悄地把自己的这个打算告诉了欧阳修。欧阳修说：“灾祸没有比杀死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，何况又是胁从的人呢？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，如果有哪个州郡不服从你的这个命令，变故起来可不是小事呀！”富弼恍然大悟，因此中止了这个计划。

当时，杜衍等大臣因为党议一个接一个被罢了官，欧阳修愤慨地向朝廷上奏疏说：“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，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是可以被举用的贤才，而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应该被免职的罪过。自古以来小人谗害忠贤，他们的说法其实也并不复杂。想大批地陷害忠良，不过就是指责他们是朋党，想动摇大臣的地位，就必须用专权来诬陷他们，这是

什么原因呢？因为除去一个好人，其它很多的好人还在，这对小人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利益；想把好人一网打尽，但好人却又很少有过失，很难一一找到他们的缺点，只有指责他们结为朋党，那么就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内全部贬逐他们。至于自古以来那种已经被皇上了解、而且深得皇上信任的大臣，那么就难以用其它的事由来动摇他们了，只有专权是皇上最忌讳和憎恶的，所以，一定要用这种说法，方才可以打倒他们。正直的人士在朝廷，邪恶的小人就会有所避忌，谋臣不被举用，正是敌国的福气。现在这四个正直的大臣一旦罢免，一定会使邪恶的小人相互庆贺于内，四周的敌人相互庆贺于外，我替朝廷可惜呀！”于是邪党更加憎恨欧阳修，就借他妹妹的孤女张氏的案子罗致他的罪名，把他降为知制造，出为滁州（今安徽滁县）知州。欧阳修在滁州住了二年，徙扬州（今属江苏）、颍州（今安徽阜阳）。不久，恢复了他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衔，留守南京，因为母亲去世而去职。服丧期满，朝廷任命他为流内铨。当时，欧阳修在外已十一年了，仁宗看到他的头发都已发白，问候慰劳很是周到。小人们害怕欧阳修再次被重用，就有人假造欧阳修的奏章请求仁宗清洗内侍中挟持恩宠，为非作歹，用非法手段获取私利的奸徒。这样就激起了宦官们对欧阳修的深切怨怒，纷纷诬陷他，要把他外放同州（今陕西大荔），仁宗皇帝采纳了吴充的意见才得以中止。迁翰林学士，让他修纂《唐书》。欧阳修奉命出使契丹，契丹君主命令四个贵臣掌管宴会，并且对欧阳修说：“这种规格的接待并不是常规制度，只是因为你的名声大，所以才这样做的。”

嘉佑二年(1057)，欧阳修主持贡举。当时应考的读书人喜欢写作险怪奇涩的文章，号为“太学体”，欧阳修极力排斥，贬抑这种文体，凡是写作这种文章的人一概黜落。这件事结束后，从前那些轻狂浅薄的人侦候得欧阳修出门，聚集在一起气势汹汹地拦住欧阳修的马头高声责骂，街上的巡逻队无法制止；然而科举考试的风气，却从此得到了改变。

欧阳修被封龙图阁学士，知开封府。他继承包拯威严治政之后，用简明便易、遵循法制的原则治政，不求显赫的名声，京师也治理得很好。十个月以后，改充群牧使。《唐书》修撰完毕，欧阳修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。欧阳修在翰林院八年，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。当时黄河在商胡决口，北京（今河北大名）留守贾昌朝想掘开横垅故道，回折河水使它向东流。有个叫李仲昌的人，却主张把河水引入六塔河。议论的人不知听谁的好。欧阳修认为：“黄河水流多泥沙，按理说来没有不淤塞的，下流既然已经淤塞了，上流就一定会决口。用近来发生的事情去考察，黄河的决口并不是不能努力塞住，故道也不是不能努力恢复，但是这种做法都不是治本之道，因而势必不能保持久长。开掘横垅故道工程很大，但难以成功，即使成功了，最终还是要再次决口。而六塔河河床狭窄，令黄河水悉数倾注，滨、棣、德、博各州一定会遭到它的灾害。不如依循河水的走向，增高河堤，疏通它的下游，让黄河之水无所阻拦地流入大海，这才是几十年的长久利益呀。”当时的宰相陈执中主张贾昌朝的意见，文彦博主张李仲昌的意见，终于造成了河北的大灾难。

谏院论述陈执中的过失，但陈执中仍然拖延着企图稳住

自己的官位。欧阳修上书皇帝，认为“皇上拒绝采纳忠告，庇护愚顽的宰相，给皇上带来了连累。”过了不久，陈执中被免去了宰相职位。狄青做了枢密使，很有威望，仁宗不高兴，谣言纷起，欧阳修请求出任外官，以保全自己得以善终。于是就免去了他的朝官而改任陈州（今河南淮阳）知州。欧阳修曾经因为水灾向仁宗上奏疏说：“皇上君临天下已经三纪了，但至今东宫太子之位未定。从前汉文帝刚即位，因为臣子们的建议，马上立了太子，因此享国很久长，为汉太宗。唐明宗讨厌臣下议论接班人的事，不肯早早立定太子，因此造成秦王之乱，宗庙社稷由此倾覆。皇上为何犹豫而久久不选定太子呢？”此后的建立英宗，推究其源，就在于欧阳修的这次上书。

嘉佑五年（1060），欧阳修升任为枢密副使。嘉佑六年（1061），为参知政事。欧阳修在兵府时，曾经和曾公亮考核全国的军队数和三路驻守兵员的多少，地理的远近，重新制造了地图和簿籍。凡是边防长久以来没有派兵驻守的，一定进行检阅和补充。他在任执政大臣时，和韩琦同心辅助仁宗。凡是兵民、官吏、财利等中书省应当知晓的重要大事，编集成一个总目，碰到事情就不必临时匆忙地向有关部门了解。当时东宫太子的人选还没有决定，欧阳修就和韩琦等人对这样一件大事协商出了一个意见，宋英宗因为得了病，无法亲自处理朝政。皇太后垂帘听政，左右的人互相猜忌，制造矛盾，皇帝和皇太后几乎因此成为怨仇。在韩琦奏事的时候，太后哭着向韩琦说了英宗和自己的种种矛盾。韩琦用英宗有病来进行劝解，太后听了不高兴，欧阳修就进一步劝说道：“太后

侍奉仁宗皇帝已经几十年了，您的仁德昭示于天下。以前温成专宠，太后您处置得从容自如；现在母子之间，反而不能宽容吗？”太后的情绪稍稍和缓了些，欧阳修又劝说道：“仁宗皇帝在位的时间很久，他德政的恩泽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，所以一旦驾崩，天下奉戴太子，没有一个人敢不赞成的。现在太后您只是一个妇人，而我们也只是五、六个书生罢了，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遗意，天下谁人肯听从呢？”太后不作声，过了很久，母子之间的矛盾才逐渐平息了。

欧阳修平素和人相处总是坦率地说出自己要说的话，从不掩饰和隐瞒。等到他执政以后，士大夫们对他有所请求，他总是当面说明可以还是不可以的理由，就是谏院的官员议论政事，他也一定用是非作为标准来责问他们，因此怨恨他、说他坏话的人就更多了。英宗将追封尊崇濮王，下命令让有关部门讨论，都说应当称皇伯，改封一个大国。欧阳修引述《礼记·丧服记》，认为：“身为人子的人，应该替他的父母实行“报祭”，降服丧三年为服丧一年，而不隐没父母的名字，可是丧服可以降等，但名字是决不可隐没的。如果出嗣的儿子把亲生的父亲改称为皇伯，这种例子就是遍考前代，都是没有根据的。进封为大国的王，但礼制规定又没有加爵的道理。所以中书省的意见，和大家的意见不同。”最后太后写出了手书，允许英宗称濮王为亲，推尊濮王为皇考，三夫人为后。英宗不敢承当。于是御史吕诲等人毁谤说欧阳修主张这种意见，争论不休，后来吕诲等人都被贬逐出了御史台。只有蒋之奇的意见附和欧阳修的主张，所以欧阳修推荐他为监察御史，但是被御史台的很多人看成是奸佞邪恶的小人，蒋

之奇为此十分害怕，就想使自己摆脱这种窘境。正好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和欧阳修有仇恨，他捏造了欧阳修家庭生活淫乱的谣言来诋毁欧阳修，这个谣言转辗相传，一直传到了御史中丞彭思永的耳中，彭思永又把这个谣言告诉了蒋子奇，蒋子奇就上奏章弹劾欧阳修。当时，神宗皇帝初即位，心里希望重重地谴责一下欧阳修，就去征求过去的宫臣孙思恭的意见，孙思恭替欧阳修辩白解释，欧阳修杜门不出，要求神宗对制造谣言的人治罪。神宗派人诘问彭思永、蒋之奇，追问谣言的出处，彭思永、蒋之奇回答不出来，结果都遭到了贬逐。欧阳修也坚决要离开朝廷，结果罢为观文殿学士、刑部尚书、亳州（今安徽亳县）知州。第二年，迁兵部尚书、青州（今山东益都）知州，后来又改为宣徽南院使、兼任太原（今属山西）知府。欧阳修辞不受命，后又改徙蔡州（今河南汝南）。

欧阳修总是以风骨气节自我制约，但却屡屡遭到诬蔑，且年纪已六十了，就一再上表要求辞去官职，神宗帝总是宽慰他，没答应他的辞官。及至出守青州，又因为请求停止散发青苗钱，被王安石所诋毁，因此要求放归的愿望益发急切。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。熙宁五年（1072）死，赠太子太师，谥号“文忠”。

欧阳修始在滁州时，自号为“醉翁”，晚年改号“六一居士”。他天资刚劲，见义勇为，虽然机关陷阱就在前面，但也能置触发之险于不顾。虽然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被放逐流放，却仍旧是志气自若。当他被贬夷陵时，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，就取出积年的陈旧案牍反复观看，看到其中冤屈谬误的地方

不可胜数，于是仰天长叹道：“一个荒远的山城，尚且如此，天下冤屈谬误事之多就可想而知了。”自此以后，碰到狱讼之类的事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疏忽。学者求见，和他们谈话，从来不论及文章，只谈官事，他认为文章只能润及自身，而政事却可以推及它物。他前后历任数郡的长官，不炫耀政绩，不追求声誉，为政宽缓简要而不扰民，所以，凡是他所到的州郡，人民都感到安适。有人问他：“您老治政宽缓简要，而政事却并没有弛废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欧阳修说：“如果以放纵为宽，以怠慢为简，那么政事就一定会弛废，而人民也一定会受其弊害。我这里所说的宽，是指政令不苛刻急迫，我所说的简，是指政令不繁杂琐碎。”欧阳修从小失去了父亲，母亲曾经对他说：“你父亲做官的时候，常常秉烛夜读公文，屡屡停卷而叹。我问他，他就说：‘这是个死狱啊，我想设法让他能活，不能啊！’我说：‘生可求吗？’你父亲就说：‘做官的人想方设法寻求使死狱者获生的办法而不得，那未死的人和我就都无恨了。而做官的人虽然常常存有使死狱者变活的愿望，尚且会不小心使他死了，何况世上不少做官的常常希望的是治民以死呢！’他平时教育他的子弟，也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说，我耳朵都听得熟了。”欧阳修听后终身遵循父亲的这个教导。

欧阳修写的文章，自然天成，或丰满或简约，都符合标准。他的文辞简要，旨意明朗，立论有据，内容通博，旁征博引，引类例举，分析事理至深至透，因此很能折服人心。他超然脱俗，独自奔驰，众人不能相及，所以天下的人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尊称他为师。欧阳修鼓励提携后进，犹恐不及，凡

是被他赏识的人，大多成了有名望的人。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洵的儿子苏轼、苏辙，当他们还是平民的时候，屏处乡里，不为人知，欧阳修就为他们游说，赞美他们的声誉，说他们一定会显名闻达于世。他对待朋友非常笃实，朋友在世的时候举拔扶持他们；朋友去世以后就調理保护他们的家族。

欧阳修喜好古文，爱好读书，凡是周、汉以来的金石遗文，断编残简，都要采集收拾起来，研究考核它们的异同，把自己的观点写在左边，明白、昭著可为表证，称之为《集古录》。奉诏修撰《唐书》纪、志、表，自撰《五代史记》，章法严谨，用词精约，多取《春秋》遗旨。苏轼论述欧阳修的文章时说：“论大道时像韩愈，议政事时像陆贽，记史事像司马迁，作诗赋像李白。”有识之人以为这是真正了解欧阳修的话。

.....

评论说：自从夏、商、周三代以来，一直到秦、汉，文章虽然跟着时代而有所盛衰，但它们的语言却都繁富滋润，它们的光泽都灿烂照人，它们的音节都清晰明亮，这是因为还都保留有先王遗留下来的功绩。经过晋、魏，文章就衰弊了，到唐代的韩愈手里，文章重新振兴起来。唐代的文章，经过五代又衰弊了，到宋代欧阳修手里，又再次振兴起来。挽回百川之颓波，平息千古的邪说，使这种文章的正气，可以辅佐大道，可以扶持人心，这都是韩愈、欧阳修两人所作的努力啊！韩愈在政治上没有得到重用，欧阳修得到了重用，但最终还是不能有所作为，这件事真应该被世道惋惜的啊！

（姚汉荣 译）

【原文】

欧阳修字永叔，庐陵人。四岁而孤，母郑守节自誓，亲诲之学，家贫，至以荻画地学书。幼敏悟过人，读书辄成诵。及冠，嶷然有声。宋兴且百年，而文章体裁，犹仍五季余习。鏤刻骈偶，澶涘弗振，士因陋守旧，论卑气弱。苏舜元舜钦、柳开、穆修辈，咸有意作而张之，而力不足。修游随，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，读而心慕焉。苦志探赜，至忘寝食，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。

举进士，试南宫第一，擢甲科，调西京推官。始从尹洙游，为古文，议论当世事，迭相师友，与梅尧臣游，为歌诗相倡和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。入朝，为馆阁校勘。

范仲淹以言事贬，在廷多论救，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。修贻书责之，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。若讷上其书，坐贬夷陵令，稍徙乾德令、武成节度判官。仲淹使陕西，辟掌书记。修笑而辞曰：“昔者之举，岂以为己利哉？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。”久之，复校勘，进集贤校理。庆历三年，知谏院。

时仁宗更用大臣，杜衍、富弼、韩琦、范仲淹皆在位，增谏官员，用天下名士，修首在选中。每进见，帝延问执政，咨所宜行。既多所张弛，小人翕翕不便。修虑善人必不胜，数为帝分别言之。

初，范仲淹之贬饶州也，修与尹洙、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，目之曰“党人”。自是，朋党之论起，修乃为《朋党论》以进。其略曰：“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以同利为朋，此自然之理也。臣谓小人无朋，惟君子则有之。小人所归者利禄，所贪者财货，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。及其

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反相贼害，虽兄弟亲戚，不能相保，故曰小人无朋。君子则不然，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。以之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，以之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，终始如一，故曰：惟君子则有朋。纣有臣亿万，惟亿万心，可谓无朋矣，而纣用以亡。武王有臣三千，惟一心，可谓大朋矣，而周用以兴。盖君子之朋，虽多而不厌故也。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”

修论事切直，人视之如仇，帝独奖其敢言，面赐五品服。顾侍臣曰：“如欧阳修者，何处得来？”同修起居注，遂知制诰。故事，必试而后命，帝知修，诏特除之。

奉使河东。自西方用兵，议者欲废麟州以省馈饷。修曰：“麟州天险不可废，废之，则河内郡县，民皆不安居矣。不若分其兵，驻并河内诸堡，缓急得以应援，而平时可省转输，於策为便。”由是州得存。又言：“忻、代、岢岚多禁地废田，愿令民得耕之，不然，将为敌有。”朝廷下其议，久乃行，岁得粟数百万斛。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者，奏罢十数事。

使还，会保州兵乱。以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陛辞，帝曰：“勿为久留计，有所欲言，言之。”对曰：“臣在谏职得论事，今越职而言，罪也。”帝曰：“第言之，毋以中外为间。”贼平，大将李昭亮、通判冯博文私纳妇女，修捕博文系狱，昭亮惧，立出所纳妇。兵之始乱也，招以不死，既而皆杀之，胁从二千人，分禁诸郡。富弼为宣抚使，恐后生变，将使同日诛之，与修遇于内黄，夜半，屏人告之故。修曰：“祸莫大于杀已降，况胁从乎？既非朝命，脱一郡不从，为变不细。”弼悟而止。

方是时，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，修慨然上疏曰：“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，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，而不闻其有可罢之罪。自古小人谗害忠贤，其说不远。欲广陷良善，不过指为朋党，欲动摇大臣，必须诬以颺权，其故何也？去一善人，而众善人尚在，则未为小人之利；欲尽去之，则善人少过，难为——求瑕，唯指以为党，则可一时尽逐。至如自古大臣，已被主知而蒙信任，则难以他事动摇，唯有颺权是上之所恶，必须此说，方可倾之。正士在朝，群邪所忌，谋臣不用，敌国之福也。今此四人一旦罢去，而使群邪相贺于内，四夷相贺于外，臣为朝廷惜之。”于是邪党益忌修，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，左行知制诰、知滁州。居二年，徙扬州、颍州。复学士，留守南京，以母忧去。服除，召判流内铨，时在外十一年矣。帝见其发白，问劳甚至。小人畏修复用，有诈为修奏，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。其群皆怨怒，谮之，出知同州，帝纳吴充言而止。迁翰林学士，俾修《唐书》。奉使契丹，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，曰：“此非常制，以卿名重故尔。”知嘉佑二年贡举。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，号“太学体”，修痛排抑之，凡如是者辄黜。毕事，向之器薄者伺修出，聚噪于马首，街逻不能制；然场屋之习，从是遂变。

加龙图阁学士、知开封府，承包拯威严之后，简易循理，不求赫赫名，京师亦治。旬月，改群牧使。《唐书》成，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。修在翰林八年，知无不言。河决商胡，北京留守贾昌朝欲开横垆故道，回河使东流。有李仲昌者，欲导入六塔河，议者莫知所从。修以为：“河水重浊，理无不淤，下流既淤，上流必决。以近事验之，决河非不能力

塞，故道非不能力复，但势不能久耳。横垆功大难成，虽成将复决。六塔狭小，而以全河注之，滨、棣、德、博必被其害。不若因水所趋，增堤峻防，疏其下流，纵使入海，此数十年之利也。”宰相陈执中主昌朝，文彦博主仲昌，竟为河北患。台谏论执中过恶，而执中犹迁延固位。修上疏，以为“陛下拒忠言，庇愚相，为圣德之累”。未几，执中罢。狄青为枢密使，有威名，帝不豫，讹言籍籍，修请出之于外，以保其终，遂罢知陈州。修尝因水灾上疏曰：“陛下临御三纪，而储宫未建。昔汉文帝初即位，以群臣之言，即立太子，而享国长久，为汉太宗。唐明宗恶人言储嗣事，不肯早定，致秦王之乱，宗社遂覆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？”其后建立英宗，盖原于此。

五年，拜枢密副使。六年，参知政事。修在兵府，与曾公亮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、地理远近，更为图籍。凡边防久缺屯戍者，必加搜补。其在政府，与韩琦同心辅政。凡兵民、官吏、财利之要，中书所当知者，集为总目，遇事不复求之有司。时东宫犹未定，与韩琦等协定大议。英宗以疾未亲政，皇太后垂帘，左右交构，几成嫌隙。韩琦奏事，太后泣语之故。琦以帝疾为解，太后意不释，修进曰：“太后事仁宗数十年，仁德著于天下。昔温成之宠，太后处之裕如；今母子之间，反不能容邪？”太后意稍和，修复曰：“仁宗在位久，德泽在人。故一日晏驾，天下奉戴嗣君，无一人敢异同者。今太后至一妇人，臣等五六书生耳，非仁宗遗意，天下谁肯听从。”太后默然，久之而罢。

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。及执政，士大夫有所干请，辄

面谕可否，虽台谏官论事，亦必以是非诘之，以是怨诽益众。帝将追崇濮王，命有司议，皆谓当称皇伯，改封大国。修引《丧服记》，以为：“‘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报。’降三年为期，而不没父母之名，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。若本生之亲，改称皇伯，历考前世，皆无典据。进封大国，则又礼无加爵之道。故中书之议，不与众同。”太后出手书，许帝称亲，尊王为皇，三夫人为后。帝不敢当。于是御史吕诲等诋修主此议，争论不已，皆被逐。惟蒋之奇之说合修意，修荐为御史，众目为奸邪。之奇患之，则思所以自解。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，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，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，思永以告之奇，之奇即上章劾修。神宗初即位，欲深谴修。访故官臣孙思恭，思恭为辨释，修杜门请推治。帝使诘思永、之奇，问所从来，辞穷，皆坐黜。修亦力求退，罢为观文殿学士、刑部尚书、知亳州。明年，迁兵部尚书、知青州，改宣徽南院使、判太原府。辞不拜，徙蔡州。

修以风节自持，既数被汙蔑，年六十，即连乞谢事，帝辄优诏弗许。及守青州，又以请止散青苗钱，为安石所诋，故求归愈切。熙宁四年，以太子少师致仕。五年，卒，赠太子太师，谥曰文忠。

修始在滁州，号醉翁，晚更号六一居士。天资刚劲，见义勇为，虽机阱在前，触发之不顾。放逐流离，至于再三，志气自若也。方贬夷陵时，无以自遣，因取旧案反复观之，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，于是仰天叹曰：“以荒远小邑，且如此，天下固可知。”自尔，遇事不敢忽也。学者求见，所与言，未尝及文章，惟谈吏事，谓文章止于润身，政事可以及物。凡

历数郡，不见治迹，不求声誉，宽简而不扰，故所至民便之。或问：“为政宽简，而事不弛废，何也？”曰：“以纵为宽，以略为简，则政事弛废，而民受其弊。吾所谓宽者，不为苛意；简者，不为繁碎耳。”修幼失父，母常谓曰：“汝父为吏，常夜烛治官书，屡废而叹。吾问之，则曰：‘死狱也，我求其生，不得尔。’吾曰：‘生可求乎？’曰：‘求其生而不得，则死者与我皆无恨。夫常求其生，犹失之死，而世常求其死也。’其平居教他子弟，常用此语，吾耳熟焉。”修闻而服之终身。

为文天才自然，丰约中度。其言简而明，信而通，引物连类，折之于至理，以服人心。超然独惊，众莫能及，故一下翕然师尊之。奖引后进，如恐不及，赏识之下，率为闻人。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洵子轼辙，布衣屏处，未为人知，修即游其声誉，谓必显于世。笃于朋友，生则振掖之，死则调护其家。

好古嗜学，凡周、汉以降金石遗文、断编残简，一切掇拾，研稽异同，立说于左，的的可表证，谓之《集古录》。奉诏修《唐书》纪、志、表，自撰《五代史记》，法严词约，多取《春秋》遗旨。苏轼叙其文曰：“论大道似韩愈，论事似陆贽，记事似司马迁，诗赋似李白。”识者以为知言。

……

论曰：三代而降，薄乎秦、汉，文章虽与时盛衰，而蔼如其言，晔如其光，皦如其音，盖均有先王之遗烈。涉晋、魏而弊，至唐韩愈氏振起之。唐之文，涉五季而弊，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。挽百川之颓波，息千古之邪说，使斯文之正气，

可以羽翼大道，扶持人心，此两人之力也。愈不获用，修用矣，亦弗克究其所为，可为世道惜也哉！

司马光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三三六

【说明】司马光（1019—1086），字君实，陕州夏县（今山西夏县）人，宋代杰出史学家。平生著作颇丰，仅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的就有三十七种，流传至今，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的有十六种，其中《资治通鉴》是一部最有影响的史学名著。与《资治通鉴》有关的还有《资治通鉴目录》三十卷，《资治通鉴考异》三十卷。

《资治通鉴》二百九十四卷，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403），下迄后周显德六年（959），一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，按朝代纪，分十六纪，即《周纪》五卷、《秦纪》三卷、《汉纪》六十卷、《魏纪》十卷、《晋纪》四十卷、《宋纪》十六卷、《齐纪》十卷、《梁纪》二十二卷、《陈纪》十卷、《隋纪》八卷、《唐纪》八十一卷、《后梁纪》六卷、《后唐纪》八卷、《后晋纪》六卷、《后汉纪》四卷、《后周纪》五卷。《资治通鉴》自太平兴国三年设局修撰，直到元丰七年全书完成，前后经过了十九年。此书修撰除参酌正史外，还参阅各种典籍多达三百余种。《资治通鉴》创编年体通史规模，以时

间先后叙次史事，使史事的发展变化、前因后果有个系统、明晰的交代，对重要的史事，根据各种的史料，采取追叙或附叙的手法，使事件完整地表达出来，避免或减少因以时间为序造成的史实分散割裂的弊病，被后人誉为“叙之井井，不漏不烦”。除叙述史事外，还有分析、评语，或引他人语，或题“臣光曰”，不论是叙事，还是评论、皆无一语无所本，繁简适宜、文浅事明。《资治通鉴目录》以年表的形式编成，实际是《资治通鉴》的概要。《资治通鉴考异》是对史料的考辨情况的记录，而《考异》的撰成，使考异从此成为一种史书撰述体例。《稽古录》、《涑水纪闻》也是司马光的重要著作，受到后世史家的普遍重视。

司马光，字君实，陕州夏县人。父亲司马池，为天章阁待制。司马光长到七岁，就严肃得象个成年人，听人讲《左氏春秋》，喜欢这部书，回到家给家人讲《左氏春秋》，就了解了这部书的要旨。从此以后就手不离书，到了不知饥渴寒暑的地步。很多孩童在庭院戏耍，一个孩子登到瓦缸上，脚一滑掉入水中，别的孩子都丢下这孩子跑掉了，而司马光拿石头把瓦缸敲破，水流了出来，那个孩子得救了。这以后京城、洛阳之间把此事画成图。仁宗宝元初年，得中进士甲科。刚刚成年，生性不喜欢华丽奢侈，在闻喜宴上只有他不戴花，同科进士对他说：“君主赐予不可违违。”就戴一枝花。

授为奉礼郎，当时司马池在杭州，司马光请求签判苏州判官事以便侍奉父亲，朝廷允许他的请求。父母去世，司马光守丧多年，哀伤得形容枯槁符合丧礼。服丧期满，签书武

成军判官事，又改大理评事，补国子直讲。经枢密副使庞籍举荐任馆阁校勘，同知礼仪院。

宦官麦允言死，给仪仗队。司马光说：“用繁纓装饰马匹以朝见，孔子尚还以为不可。麦允言是亲幸之臣，没有大的勋劳，却赠三公官，给一品官的仪仗队，以此看繁纓，不又太大了。”赐夏竦谥号为文正，司马光说：“这谥给最有美德的人，夏竦什么人，可以配得这谥号？”改为文庄。司马光加官集贤校理。

司马光由于随庞籍的征辟，通判并州。麟州屈野河西良田很多，西夏人一点点地蚕食这些土地，成为河东的祸患。庞籍命令司马光按察此事，司马光建议：“修筑两座城堡用来制约夏人，招募百姓来耕种这些土地，耕种的多了收买粮食就价钱低，也可以逐渐缓解河东高价买粮长途运输的忧虑。”庞籍听从司马光的计策；然而麟州将官郭恩勇敢并且狂傲，率兵夜里渡过屈野河，不提防，军队陷没于西夏，庞籍由此获罪而离任。司马光三次上书罪责归于自己，得不到答复。庞籍去世，司马光升堂拜揖他的妻子如同母亲，抚育他的儿子如同兄弟，当时的人认为司马光贤明。

改任直秘阁、开封府推官。交趾国贡献异兽，说这是麟，司马光说：“此麟的真伪不可知，即使它是真的，不是自己来的不足以表示祥瑞，希望归还交趾所献的麟。”又奏上赋以讽此事。修起居注，判礼部。有关部门上奏太阳当有食，按旧例日食不满食，或京师看不到日食，都要祝贺。司马光说：“四方见日食，京师不见，这是人君被阴邪所遮蔽；天下都知道而唯独朝廷不知道，这样为灾难才更厉害，不应当祝贺。”

朝廷听从他的意见。

同知谏院。苏辙应对制策中肯鲠直，考官胡宿要黜退苏辙，司马光说：“苏辙有爱君主忧国家的心意，不应当黜退。”朝廷下诏苏辙安置在末级。

仁宗开始有病，皇嗣还未确立，天下人担心但谁也不敢说此事。谏官范镇首先发出立嗣的议论，司马光在并州听说后继而言立嗣事，并且写信给范镇劝他拼命力争此事。至此，又当面说：“臣以前通判并州，所呈上的三份奏章，希望陛下果断地施行。”仁宗沉思了很久时间，说：“能不想选宗室为后嗣的吗？此是忠臣的话，但是常人不敢触及此事啊。”司马光说：“臣言及此事，自知必死，没想到陛下开始采纳。”仁宗说：“这有什么害处，古今都有这样的事。”司马光退朝没有听到诏命，又上疏说：“臣以前进言，意思是说立即施行，现在寂然无声，什么也没有听到，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年富力强，为什么急于做不吉祥的事。小人没有远虑，不过想在仓猝之际，推立他们交厚亲善的人啊。‘定策国老’、‘门生天子’的祸患，能说得尽吗？”仁宗大为感动，说：“送到中书省。”司马光见韩琦等人说：“诸公不于现在作出定义，日后禁中在夜半之时递出片纸，上写以某人为皇嗣，那么天下没有谁敢违抗。”韩琦等人拱手说：“哪敢不尽力。”不久，朝廷诏令英宗判宗正，英宗推辞不就任，于是立为皇子，又借口有病不入宫。司马光说：“皇子推辞不能计量的财富，已至一个月，他的贤德远远超过一般人了。然而父亲召唤不应诺，君有命征召而不侍驾，希望用臣子的大义要求皇子，应当必定入宫。”于是英宗接受诏命。

兖国公主嫁给李玮，不相谐和，朝廷诏令李玮出任卫州，他的母亲杨氏归他的哥哥李璋奉养，公主入禁中居住。司马光说：“陛下追念章懿太后，所以让李玮尚娶公主。现在却令母子分离，家道流落，难道没有恩泽的感情吗？李玮已被贬黜，公主怎能没有罪过？”仁宗顿悟，降公主为沂国公主，待李氏的恩泽不减。

升司马光知制诰，坚决推辞，改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、知谏院。当时朝政特别随便宽容，办具体事务的小官吏吵闹就能驱逐御史中丞，引御辇的官悖逆怠慢能黜退宰相，卫士凶恶违逆而不能将其全部治罪，军卒辱骂三司使而认为不触犯尊卑等级。司马光说这都是衰落的加剧，不可以不纠正。

充媛董氏死，赠为淑妃，停止视朝都穿上应穿的丧服，百官都表慰问，定下谥号，举行册封礼，安葬给仪仗队。司马光说：“董氏的品秩原本低微，病重才拜充媛。古代妇人没有谥，近代典制只有皇后有谥号。仪仗队本来是用来奖赏军功的，未曾给过妇人。唐平阳公主有兴兵辅佐高祖定天下的功劳，才得到给仪仗队的奖赏。到韦庶人时开始让妃子公主在安葬之日都给鼓吹，这不是好的法制，不足以效法。”当时有关部门制定后宫封赠法，皇后和妃子都赠三代，司马光议论说：“妃子不应当与皇后相同，袁盎撤掉慎夫人的坐席，正是为了这个。天圣陛下亲自举行郊祀，太妃只赠两代，而何况妃子呢？”

英宗即位，有病，慈圣光献后和他一起听政。司马光上疏说：“以前章献明肃皇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，不过因为亲用外戚，就在海内受到毁谤。目前摄政之际，大臣忠厚的像王

曾，清纯的像张知白，刚正的像鲁宗道，正直的像薛奎，应当信用他们；卑鄙的像马季良，谗谄的像罗崇勋，应当疏远他们，这样天下宾服。”

英宗病愈，司马光估计一定有追崇亲生父母的事，就上奏说：“汉宣帝为孝昭帝之后嗣，最终不追尊卫太子、史皇孙；光武帝上继承汉元帝，也不追尊钜鹿都尉、南顿令，这是万世之法。”后朝廷诏令内外两制合起来商议濮王的典法礼仪，学士王珪等人相互对视，没有谁敢先发表意见，司马光独自奋笔写道：“为人后即为人之子，不能顾恋自己的亲生父母。王应当按照服一年丧的亲属中的长辈的旧例，称为皇伯，授高官封大国，给最高的尊荣。”拟议完成，王珪就命令吏以司马光的手稿为文书。此奏议已呈上与大臣的意见不同，御史六人力争此议，都被斥贬。司马光请求留下他们，不同意，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。

当初，西夏派遣使者来祭仁宗，延州指使高宜引导陪伴，对西夏使者傲慢，侮辱西夏国主，使者将这些诉于朝廷。司马光和吕诲请求给高宜加罪，朝廷不同意。第二年，西夏人进犯边境，杀掠官吏士民。赵滋为雄州守，只以勇猛强悍治理边地，司马光论证这样做不行。至此，契丹的百姓在界河捕鱼，在白沟以南伐柳条，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佑是没才干的人，想取代他。司马光说：“国家在戎夷依附归顺的时候，喜欢与他计较枝节小事，到他们桀骜不驯时，又从而姑息他们。最近西边的祸患发生于高宜，北方的祸患起源于赵滋。当时正以此二人为贤能，所以边防之臣都以制造事端为能事，这样的发展趋势不能让它再滋长了。应当敕令边地官吏，因疆

界小事就用刀箭相加的人，判罪。”

仁宗死后的赐予价值百余万，司马光率领同僚三上表章，说：“国家有大忧患，内外窘迫匮乏，不能只用乾兴旧例，如果遗赐不能辞谢，应当允许侍从向上进献金钱佐助先帝陵墓。”朝廷不准。司马光就把所得到的珠作为谏院的公使钱，把金送给舅舅，因义不把珠金收藏于家中。慈圣光献太后还政于英宗，有关部门建立规格，凡是太后有所取用，应当详审情况，重新上奏，才予以供给。司马光说：“应当移置所属使立即供给之后，就全数报告给太后，以防造假不实。”

曹佾没有功劳升迁为相，枢密院、中书门下二府都升官。司马光说：“陛下想以此抚慰母亲的心意，然而升迁没有理由，这样宿卫将帅、内侍小臣，都有觊觎之心。”接着升都知任守忠等人的官职，司马光又争此事，因此事论说：“任守忠是大恶人，陛下成为皇子，不是任守忠的意思，他阻止破坏大事，离间多端，幸亏先帝不听；到陛下即位，他又反复虚构事实，制造矛盾，是国家的大贼，请求将他斩杀于市井，以报谢天下。”贬降任守忠为节度副使，在蕲州安置，天下人大快此事。

朝廷下诏招陕西义勇二十万人刺上印记，百姓情绪惊恐，而此军纪律松弛不能用。司马光高声说这样做不对，拿着奏章告诉韩琦。韩琦说：“兵即贵在先声夺人，李谅祚正桀骜不驯，让他突然听到我们增兵二十万，难道不震惊恐惧？”司马光说：“兵的贵在先声夺人，因为没有事实，只可欺骗敌方于一天之间啊。现在我们虽然增兵，实际上不能用，不过十天，对方将了解其中的详情，还有什么恐惧的？”韩琦说：“你只看到庆历年间发兵刺字为保捷军，忧虑现在又一次这样做，朝

廷已下勅榜和百姓相约，永远不充军戍边。”司马光说：“朝廷曾经失信，百姓不敢以此为是，即便光也不能不疑。”韩琦说：“我在此，你不必忧虑。”司马光说：“公长在此地，可以；日后别人当权，因有公现成的军队，用他们运粮戍边，不过是反掌之间的事。”韩琦默然，而竟然不阻止。不出十年，情况都象司马光所顾虑的那样。

王广渊升任直集贤院，司马光论说此人奸邪不能亲近：“从前汉景帝重用卫绾，周世宗鄙视张美。王广渊在仁宗之朝，私自与陛下结好，难道是忠臣吗？应当贬黜他用以激励天下。”升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。

神宗即位，提升为翰林学士，司马光极力推辞。神宗说：“古代的君子，有的有学识而不善文辞，有的善文辞而没有学识，惟有董仲舒、扬雄二者兼能。爱卿有文采、学问，为什么推辞呢？”司马光回答说：“臣不能作四六句的骈体文。”神宗说：“像两汉的诏令就可以；况且爱卿考进士能取得高第，而说不能作四六文，为什么呢？”竟然不能推辞。

御史中丞王陶因论宰相不押班而被罢免，司马光代替他，司马光说：“王陶因论宰相而罢免，那么中丞不能再做。臣希望等到已经押班然后就职。”朝廷准许。于是上疏论述修养心性的三要点：曰仁爱，曰圣明，曰勇武；治国的三要点：曰授人官职，曰有功者必赏，曰有罪者必罚。他的论说非常完备。而且说：“臣能事奉三朝，用这六言进献，平生尽力学习所得，都在这里了。”御药院的内臣，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官，升至内殿崇班就出内宫；近年暗地里计算官资，不是祖宗本意。因此论说高居简奸邪，请求把他流放到远方。奏章五次

呈上，神宗因为黜出高居简，将寄资的官全部罢免。不久又留二人，司马光又力争罢黜此二人。张方平参知政事，司马光议论他不符合众望，神宗不听从这议论。还司马光翰林学士兼待读学士。

司马光时常忧虑历代史书繁复，人主不能全部阅览，于是撰《通志》八卷献上。英宗喜欢这部书，命令在秘阁设史局，续撰此书。至此，神宗为此书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亲自作《序》授与司马光，使他每日进书阅读。

朝廷下诏录用颖邸直省四人为合门祗候，司马光说：“国初草创，时运还很艰难，所以登位之初，必用左右旧人为心腹耳目，称之为随龙，这不是平时之法。合门祗候在文臣中为馆职，怎么能让厮役充任此职。”

西戎的部将嵬名山想率横山兵众，夺取李谅祚来降宋。朝廷诏令边臣招纳嵬名山的军队，司马光上疏透彻地论说，以为：“嵬名山的军队，未必能制服李谅祚。幸而战胜李谅祚，也是消灭一个李谅祚，又生出一个李谅祚，对我朝有什么好处？如果他不能取胜，一定会带兵众归附我朝，不知怎么对待他，臣恐怕朝廷不只失信于李谅祚，还将失信于嵬名山。假若嵬名山保留的兵众还多，返回北方不行，进入南方又不受，途穷无归宿，一定会冲击占据边城以此解救兵众的性命。陛下没见到侯景的故事吗？”神宗不听，派将官种谔发兵迎接嵬名山，夺取绥州，消耗军费六十万，在西方用兵，大概自此开始。

百官上尊号，正当司马光回答诏问，他说：“先帝亲自举行郊祀，不接受尊号。晚年有进献议论的人，说国家和契丹

往来通信，他有尊号而我们没有，于是才以特别时期奉册。从前匈奴冒顿自称‘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’，没听说汉文帝也选大名加在自己身上。希望追述先帝的本意，不要接受此名。”神宗特别高兴，手诏褒奖司马光，让他缮写答辞，颁示朝廷内外。

执政因河朔旱灾，国家支用不足，请求举行南郊礼不要赐金帛。朝廷诏令学士议论，司马光和王珪、王安石同见神宗，司马光说：“救灾节用，应当从有权势的人做起，可以按执政的意见办。”王安石说：“常袞不用政事堂的公膳，当时人认为常袞既自知无能，就应当辞官位不应当辞奉禄。况且国用不足，不是现实紧急的事务，所以不足，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。”司马光说：“善理财的人，不过是最会苛敛民财而已。”王安石说：“不然，善理财的人，不增加赋税而国用充足。”司马光说：“天下那有这样的道理？天地所生产的财货众物，不在百姓手中，就在官府的库中，他另想办法掠夺百姓，那危害就比加赋更严重。这大概就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，太史公记载此事用以说明他的不明智。”两人争议不已。神宗说：“朕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同，然而姑且以不允许答复执政。”正巧王安石草拟诏书，以常袞的事指责两府，两府不敢再说什么。

王安石掌朝政，推行新法，司马光上书条陈新法的利害。在迺英殿进读，读到曹参代萧何为相的事，神宗说：“汉代常守萧何之法不变，行吗？”司马光回答说：“岂只汉朝，让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君主常守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法，虽然时至今日还可以沿袭存在。汉武帝把汉高祖法制拿来乱改，天下一半

是盗贼；汉元帝改汉宣帝的政治，汉朝大业就衰败。由此说来，祖宗之法不能变。”吕惠卿说：“先王的法规，有一年一变的，‘正月开始和煦，在宫阙公布法规’就是这种；有五年一变的，天子巡守考察就是这种；有三十年一变的，‘刑罚三十年轻三十年重’就是这种。司马光的话不对，他的意思在于讽谕朝廷。”神宗问司马光，司马光说：“在宫阙公布法规，是颁布旧法。诸侯中变易礼乐的人，待天子巡守时就被诛杀，不能自行改变。治理新建国家用轻法，动乱的国家用重法，这是所说的三十年轻三十年重，不是法变。况且治理天下譬如居室，敝坏就修理它，不破得厉害不重新建造。公卿侍从都在这里，希望陛下问问他们。三司使掌管天下财政，因没有才能而黜免是可以的，不能让执政侵扰他们的事务。现在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为什么？宰相以儒道辅佐人主，为什么要用例？假若用例，则是办具体事宜的小吏的事。现在设看详中书条例司，为什么？”吕惠卿不能回答，就用其他的话诋毁司马光。神宗说：“互相议论是非，何必到此地步。”司马光说：“平民把钱借出生利息，还能蚕食贫户，何况官府督责的威势呢？”吕惠卿说：“青苗法，愿意要的则给他，不愿意要的也不勉强。”司马光说：“愚钝的百姓只知借债的好处，不知还债的害处，不只官府不勉强，富户也不勉强。从前太宗平定河东，建立和籴法，当时一斗米十钱，百姓乐于与官府交易。以后物价贵了，然而和籴法不解除，于是成了河东世世代代的忧患。臣恐怕日后的青苗法，也象这种情况。”神宗问：“用坐仓形式买米入官怎么样？”坐着的人都起来了，司马光说：“不合适。”吕惠卿说：“买米百万斛，就省去东南的

漕运，东南用钱供给京师。”司马光说：“东南钱少而粒米狼藉，现在不采东南的米而要东南的漕运钱，这是舍东南的有余，取东南的缺无，农业商业都困苦。”侍讲吴申站起来说：“司马光的话，是最深刻的言论。”

过了几天，留下来应对，神宗说：“目前天下动荡不安的情况，是孙叔敖所说的朝廷中有人认为对的，却是众人所憎恶的。”司马光说：“是的。陛下应当论证它的是非。现在条例司所做之事，只有王安石、韩绛、吕惠卿认为是对的，陛下怎么能只和这三人共同治理天下呢？”神宗想任用司马光，询问王安石，王安石说：“司马光外借直言谏上的名声，内隐曲意附下的实情。所说的话都有害政事，所交往的人都是有害政事的人，还想将他安排在左右，让他参与国事的议定，这是力量消长的关键。司马光的才能哪能破坏政事，但身在高位，则持异论的人就倚重他。韩信树汉赤旗，灭了赵兵的士气，现在任用司马光，就是给持异论的人树赤旗。”

王安石因韩琦上疏，躺在家中要求引退。神宗就拜司马光为枢密副使，司马光推辞这个职务说：“陛下所以用臣，大概看到臣疏狂直率，或许对国家有补益。如果只以富贵高位使其荣耀，却不采用他的意见，这是以天官偏授与不当的人。臣只以富贵和高位自以荣，而不能解救百姓的忧患，这是盗窃名器以求自身的私利。陛下真的能罢制置条例司，朝廷追回授与的提举官，不施行青苗、助役等法，虽然不任用臣，臣也感到受恩赐很多了。现在说青苗法危害的人，不过说使者骚扰地方州县，是眼前的祸患。而臣所忧患的，则在十年以后，不是现在。百姓的贫富，是因勤懒而不同，懒惰的人常

常生活困乏，所以一定依赖于他人，现在官府出钱借给百姓而收利息，富人不愿意借钱，使者以多借出钱为有功，就一切强行摊派。恐怕百姓拖欠税款，一定命令富人穷人互相担保，穷人无钱可还，就逃散到四方；富人不能走，一定督使他们代还数家的欠款。春季予算，秋季结帐，展转时日，欠债一天天多起来，穷人已被刮尽，富人也变穷。十年以后，百姓没有再能生存的了。又把常平的钱谷都用来推行青苗法，以后如果想恢复常平，将如何取得钱谷？富人已经穷了，常平也废弛了，加上战争，遇到灾害的百姓中的弱者必定死填沟壑，而壮者一定聚众做盗贼，这种情况是一定要出现的。”直言上疏达七八次，神宗派人对他说：“枢密是掌兵事的，官各有各的职守，不应该上疏议论本职以外的事。”司马光回答说：“臣还未接受任命，就还是侍从，对于政事没有不能议论的。”王安石开始治理朝事，司马光辞枢密副使的请求就被准许，于是请求离开。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。宣抚使下令分义勇兵戍边，选拔诸军的骁勇兵士，招募市井无赖青年做奇兵；调集百姓制做乾粮，都去修筑城池和了望高台，关辅一带人心骚动。司马光极力上言说：“官府和百姓都困穷，不能举大事，而且京兆一路都是内地郡，修治并不紧急。宣抚使的命令，都不敢听从，如果因此影响军事行动，臣应当负责任。”于是只有京兆一路得免。改为许州知州，催促他入京朝觐，没有前往。请求判西京御台回到洛阳，从此绝口不议论政事。而朝廷的求言诏颁下，司马光读了感动得落泪，想沉默而又不忍心，就又陈述六事呈上，还写信责备宰相吴充。

蔡天申为察访使，胡作威福，河南尹、转运使像对待上

级官员那样恭敬地事奉他。蔡天申曾去朝谒应天院神御殿，河南府专为他设一班，表示不敢与他抗衡。司马光环顾场内，对台吏说：“带蔡寺丞归回本班。”台吏就带蔡天申立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。蔡天申困窘沮丧，当天就走了。

元丰五年，司马光突然得了语涩的病，怀疑不久将死去，预先作好遗表放在卧室内，一旦有了情况，应当将此交与所信任的人呈给皇帝。元丰官制施行，神宗指御史大夫说：“这非司马光不可。”又要让他做东宫师傅。蔡确说：“国事刚刚安定，希望稍为晚些施行。”《资治通鉴》没完成，神宗尤其重视这部书，认为胜于荀悦的《汉纪》，多次催促使他们完稿，把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赐给他们。到《资治通鉴》撰成，司马光加资政殿学士。在洛阳一共居住十五年，天下人认为他是真的宰相，村夫野老都号称他司马相公，妇人小孩也都知道他是君实。

神宗驾崩，司马光前往朝廷临丧，卫士远远看见他，都把手放在额头上说：“这是司马相公。”所过之处，百姓拦路聚众观看，马到了不能前进，说：“公不要回洛阳，留下来辅佐天子，使百姓得活。”哲宗年幼，太皇太后临朝政，派人问司马光首先应该考虑的事，司马光说：“开言路。”朝廷诏令榜示朝堂。而大臣有不高兴这种做法的人，又设六句话，说：“如果暗地里有所打算，触犯了职分的界限，或动摇机要大事的重要地位；或迎合已推行的法令；对上想侥幸晋升，对下蛊惑民俗。如果属于上述情况，定罚不赦。”太皇太后又命人将此拿给司马光看，司马光说：“这不是求谏，是拒谏。人臣除非不说，说就属这六事。”于是详尽地论述这情况，改诏令

施行，于是上奏章的人数以千计。

起用司马光为陈州知府，过朝廷，留下他做门下侍郎。苏轼从登州被召回，沿道上人们相聚呼叫说：“代谢司马相公，不要离开朝廷，多多保重好使我们得活。”这时天下的百姓，伸着脖子擦亮眼睛注视着朝廷的新政，而议论的人还说“三年不改更于父之道”，只粗举小事，稍稍搪塞人们的议论。司马光说：“先帝的法规，那些好的虽然已过百世也不能变。象王安石、吕惠卿所建立的法规，是天下的祸害，改变它应当救像大火拯溺水。何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道，不是子改父道。”众人的议论开始平定。于是罢免保甲团教，不再设置保马，废除市易法，所储蓄的物资都予出卖，不收利息，减除百姓所欠钱款；京东铁钱和茶盐的有关法规，都恢复旧法。有人对司马光说：“熙宁、元丰间的旧臣，多是谄媚弄巧的人，以后有人用父子情义离间皇上，就会生成大祸。”司马光严肃地说：“上天如果赐福于宗庙社稷，一定不会有这种事。”于是天下人的顾虑解除了，说：“这是先帝的本意。”

元佑元年，司马光又得病，朝廷诏令司马光上朝面君，只须两拜，不必舞蹈。当时青苗、免役、将官等法还存在，而且有关西戎的议论尚未决断。司马光感叹说：“四方忧患没有消除，我死不瞑目啊。”写便简给吕公著说：“我把身体托付给医生，把家事交给儿子，只有国事没有可托之人，现在把国事嘱托于你。”于是论述免役法的五种害处，请求直接颁降敕令罢免役法。各将兵都隶属于州县，军事委托给太守、县令通盘考虑决断。废除提举常平司，把这官署的事归到转运、提点刑狱。边防计事以和戎为宗旨便通。说监司新进很多年

轻人，他们热衷于苛责、急峻，让近臣在郡守中选举，而在通判中选举转运判官。又设十科荐士法。朝廷都采纳了。

拜司马光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不必朝觐，允许乘轿子，三天到一次省。司马光不敢当，说：“不面见君王，不能治理政事。”朝廷诏令他的儿子司马康搀扶着他入朝策对，并且说：“不要拜。”于是停青苗钱，恢复常平糴法。两宫虚心地听取司马光的建议。辽、西夏使者来，一定问候司马光的起居安好，敕令他们的边境官吏说：“中国以司马光为宰相，不要轻率地惹事，开始边界纠纷。”司马光看到朝廷对自己言听计从，想以身殉国家，亲自处理各种政务，不分昼夜。宾客见他身体瘦弱，就拿诸葛亮因少进食多劳累而死的事劝戒他，司马光说：“死与生都是命运。”为此更加尽力。病重，不再能自制，有气无力地像在说梦话，然而说的都是朝廷天下事。

这一年九月司马光去世，享年六十八岁。太皇太后听到凶信极其悲痛，和哲宗前往哭临其丧，明堂礼举行，但不祝贺，赠太师、温国公，赠给一品礼服，银绢七千以助丧事。朝廷诏令户部侍郎赵瞻、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司马光的灵柩，回到陕州安葬。谥号为文正，赐碑为《忠清粹德》。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吊唁，为了祭奠卖衣服，灵车经过整个街巷都在哭。到安葬的时候，哭的人像哭自己的亲人。岭南封州的父老，也相继供置祭奠，城中和四野都画了司马光的像用以祭祀，吃饭前必先祝祭他。

司马光孝友忠信，恭俭正直，居处有规矩，行动有礼仪。在洛阳的时候，每次到夏县省视先人坟墓，一定去探望他的哥哥司马旦，司马旦年近八十，司马光侍奉他像严父，照顾

他如婴儿。司马光从小到老，说话从乱言，自己说：“我没有超人的地方，只是平生所做的事，还没有不能对别人说的事。”诚实的心出于自然，天下恭敬信任，陕、洛之间都用司马光的道德施行教化，遇有不好的人和事，就说：“君实能不知道这事吗？”

司马光对于财物很淡薄，没有什么爱好，对于学问则是无所不通，只是不喜好佛、道，他说：“佛、道的微言大旨不能出现在我的书里，因它怪诞我不相信。”司马光在洛中有三顷田，妻子去世，卖了田安葬妻子，穿粗衣吃薄食一直到去世。

绍圣初年，御史周秩首先议论司马光诬谤先帝，将其法规全部废除。章惇、蔡卞请求掘墓辟棺，哲宗不准许，就下令除掉封赠和谥号，放倒为司马光立的碑。然而章惇还不断上奏言司马光的罪行，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节度副使，又贬崖州司户参军。徽宗即位，恢复司马光为太子太保。蔡京专擅朝权，又降司马光为正议大夫，蔡京撰《奸党碑》，下令各郡国把《奸党碑》刻在石碑上。长安石工安民应当去刻碑，他推辞说：“民是笨人，本来不知道立碑的意义。但象司马相公这样的人，全国都称赞他正直，现在说他奸邪，民不忍心刻这样的碑。”府官发怒，想给他加上罪名，他哭着说：“该我服役不敢推辞，请求免去在石碑末刻安民二字。我恐怕得罪于后代。”听的人感到惭愧。

靖康元年，恢复司马光的封赠和谥号。建炎年间，附祭于哲宗庙庭。

司马康字公休，自幼正直恭谨，不随便说笑，对父母非

常孝顺。敏学过人，博通群书，以明经考第一等。司马光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奏明朝廷由司马康检阅文字。遭母丧，三日不进一勺饮食，毁瘠几乎失去生机。司马光住到洛阳，从学的士人退而与司马康谈学问，没有人没有收获。路途上的人见到他的容貌举止，虽然不认识他，都知道他是司马氏的儿子。因为韩绛的荐举，为秘书官，由正字迁为校书郎。司马光去世，办丧事都用《礼经》的家法，不按世俗的办法做。把得到朝廷给予的司马光遗恩，都送与族人。服丧期满，被召为著作佐郎兼侍讲。

司马康上疏说：“近年来，干旱成灾，百姓多缺粮。如果再有一年欠收，那么公私都困乏，盗贼就有可乘之机。自古以来的圣贤君主，不是没有水旱灾害，只是以有储备应付它，就不能成为严重的灾害。希望到今年秋季收获的时候，命令州县广泛收购谷物，除百姓食用之外的粮食，都归储于官府。今冬明春，允许流民外出就食，等到家乡丰收，就归还本土。作为一个国家，一丝一毫都应当爱惜，只在赈济百姓方面不应当吝惜。真的能捐出数十万金帛，做为天下防患的大本钱，那是天下最大的幸运。”朝廷拜司马康为右正言，为避亲嫌没有就职。

司马康给哲宗讲前代治世少而乱世多，讲祖宗创业的艰难，以及积累的辛劳，劝哲宗及时认真学习，守住江山社稷，并且劝太皇太后在禁中经常教诲开导哲宗，司马康的这些话说得非常中肯。在迺英殿进讲，司马康又说：“《孟子》在书籍中是最精纯正直的，陈述王道更是明白，宜于阅读。”哲宗说：“正在读这本。”不久，朝廷诏令侍讲官节录《孟子》以进

呈给哲宗。

司马康自从服父丧，住草屋食粗饭，睡在地上，于是得了腹疾，因此不能上朝谒君。朝廷在司马康告假期间赐予恩泽。病更危险了，司马康还把应该说的事都写在奏折上准备好，说：“能够一见天子极力陈言死而无恨。”朝廷派人召在兖州的医生李积，李积年纪大了，乡民听说李积不去，就到他家告诉他说：“百姓受司马公的恩德深，现在他的儿子有病，希望迅速前往。”来劝行的人日夜不断，李积于是动身前往。到了京师，司马康的病就已经不能治了，年仅四十一岁就去世了。公卿在朝廷感叹悲痛，士大夫相继到家中吊丧，街市百业之人没有不哀悼他的。朝廷下诏赠右谏议大夫。

司马康为人廉洁，从不谈钱财事。当初，司马光立神道碑，哲宗派使者赐白银二千两，司马康因治丧的费用都是朝廷给的，就辞谢不受。朝廷不准辞谢。司马康派家吏进京师接受这赐予，这件事才算结束。（曾贻芬译）

【原文】

司马光字君实，陕州夏县人也。父池，天章阁待制。光生七岁，凜然如成人，闻讲《左氏春秋》，爱之，退为家人讲，即了其大指。自是手不释书，至不知饥渴寒暑。群儿戏于庭，一儿登瓮，足跌没水中，众皆弃去，光持石击瓮破之，水迸，儿得活。其后京、洛间画以为图。仁宗宝元初，中进士甲科。年甫冠，性不喜华靡，闻喜宴独不戴花，同列语之曰：“君赐不可违。”乃簪一枝。

除奉礼郎，时池在杭，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，许之。丁内外艰，执丧累年，毁瘠如礼。服除，签书武成军判官事，改

大理评事，补国子直讲。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，同知礼院。

中官麦允言死，给鹵簿。光言：“繁纓以朝，孔子且犹不可。允言近习之臣，非有元勋大劳，而赠以三公官，给一品鹵簿，其视繁纓，不亦大乎。”夏竦赐谥文正，光言：“此谥之至美者，竦何人，可以当之？”改文庄。加集贤校理。

从庞籍辟，通判并州。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，夏人蚕食其地，为河东患。籍命光按视，光建：“筑二堡以制夏人，募民耕之，耕者众则余贱，亦可渐纾河东贵余远轮之忧。”籍从其策；而麟将郭恩勇且狂，引兵夜渡河，不设备，没于敌，籍得罪去。光三上书自引咎，不报。籍没，光升堂拜其妻如母，抚其子如昆弟，时人贤之。

改直秘阁，开封府推官。交趾贡异兽，谓之麟，光言：“真伪不可知，使其真，非自至不足为瑞，愿还其献。”又奏赋以风。修起居注，判礼部。有司奏日当食，故事食不满分，或京师不见，皆表贺。光言：“四方见、京师不见，此人君为阴邪所蔽；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，其为灾当益甚，不当贺。”从之。

同知谏院。苏辙答制策切直，考官胡宿将黜之，光言：“辙有爱君忧国之心，不宜黜。”诏寘末级。

仁宗始不豫，国嗣未立，天下寒心而莫敢言。谏官范镇首发其议，光在并州闻而继之，且贻书劝镇以死争。至是，复面言：“臣昔通判并州，所上三章，愿陛下果断力行。”帝沉思久之，曰：“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？此忠臣之言，但人不敢及耳。”光曰：“臣言此，自谓必死，不意陛下开纳。”帝

曰：“此何害，古今皆有之。”光退未闻命，复上疏曰：“臣向者进说，意谓即行，今寂无所闻，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，何遽为不祥之事。小人无远虑，特欲仓卒之际，援立其所厚善者耳。‘定策国老’，‘门生天子’之祸，可胜言哉？”帝大感动曰：“送中书。”光见韩琦等曰：“诸公不及今定议，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，以某人为嗣，则天下莫敢违。”琦等拱手曰：“敢不尽力。”未几，诏英宗判宗正，辞不就，遂立为皇子，又称疾不入。光言：“皇子辞不赀之富，至于旬月，其贤于人远矣。然父召无诺，君命召不俟驾，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，宜必入。”英宗遂受命。

兖国公主嫁李玮，不相能，诏出玮卫州，母杨归其兄璋，主入居禁中。光言：“陛下追念章懿太后，故使玮尚主。今乃母子离析，家事流落，独无雨露之感乎？玮即黜，主安得无罪？”帝悟，降主沂国，待李氏恩不衰。

进知制诏，固辞，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、知谏院。时朝政颇姑息，胥史喧哗则逐中执法，犴官悖慢则退宰相，卫士凶逆而狱不穷治，军卒詈三司使而以为非犯阶级。光言皆陵迟之渐，不可以不正。

充媛董氏薨，赠淑妃，辍朝成服，百官奉慰，定谥，行册礼，葬给卤簿。光言：“董氏秩本微，病革方拜充媛。古者妇人无谥，近制惟皇后有之。卤簿本以赏军功，未尝施于妇人。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，乃得给。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，非令典，不足法。”时有司定后宫封赠法，后与妃俱赠三代，光论：“妃不当与后同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，正为此耳。天圣亲郊，太妃止赠二代，而况妃乎？”

英宗立，遇疾，慈圣光献后同听政。光上疏曰：“昔章献明肃有保佑先帝之功，特以亲用外戚小人，负谤海内。今摄政之际，大臣忠厚如王曾，清纯如张知白，刚正如鲁宗道，颀直如薛奎者，当信用之；猥鄙如马季良，谄谀如罗崇勋者，当疏远之，则天下服。”

帝疾愈，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，即奏言：“汉宣帝为孝昭后，终不追尊卫太子、史皇孙；光武上继元帝，亦不追尊巨鹿、南顿君，此万世法也。”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，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，光独奋笔书曰：“为人后者为之子，不得顾私亲。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，称为皇伯，高官大国，极其尊荣。”议成，珪即命吏以其手稿为按。既上与大臣意殊，御史六人争之力，皆斥去。光乞留之，不可，遂请与俱贬。

初，西夏遣使致祭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，傲其使者，侮其国主，使者诉于朝。光与吕诲乞加宜罪，不从。明年，夏人犯边，杀略吏士。赵滋为雄州，专以强悍治边，光论其不可。至是，契丹之民捕鱼界河，伐柳白沟之南，朝廷以知雄州李中佑为不材，将代之。光谓：“国家当戎夷附顺时，好与之计较末节，及其桀骜，又从而姑息之。近者西祸生于高宜，北祸起于赵滋；时方贤此二人，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，渐不可长。宜敕边吏，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，罪之。”

仁宗遗赐直百余万，光率同列三上章，谓：“国有大忧，中外窘乏，不可专用乾兴故事。若遗赐不可辞，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。”不许。光乃以得珠为谏院公使钱，金以遗舅氏，义不藏于家。后还政，有司立式，凡后有所取用，当覆奏乃供。光云：“当移所属使立供已，乃具数白后，以防矫伪。”

曹佺无功除使相，两府皆迁官。光言：“陛下欲以慰母心，而迁除无名，则宿卫将帅、内侍小臣，必有觊望。”已而迁都知任守忠等官，光复争之，因论：“守忠大奸，陛下为皇子，非守忠意，沮坏大策，离间百端，赖先帝不听；及陛下嗣位，反覆交构，国之大贼。乞斩于都市，以谢天下。”责守忠为节度副使，蕲州安置，天下快之。

诏刺陕西义勇二十万，民情惊挠，而纪律疏略不可用。光抗言其非，持白韩琦。琦曰：“兵贵无声，谅祚方桀骜，使骤闻益兵二十万，岂不震懾？”光曰：“兵之贵先声，为无其实也，独可期之于一日之间耳。今吾虽益兵，实不可用，不过十日，彼将知其详，尚何惧？”琦曰：“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，忧今复然，已降敕榜与民约，永不充军戍边矣。”光曰：“朝廷尝失信，民未敢以为然，虽光亦不能不疑也。”琦曰：“吾在此，君不忧。”光曰：“公长在此地，可也；异日他人当位，因公见兵，用之运粮戍边，反掌间事耳。”琦嘿然，而讫不为止。不十年，皆如光虑。

王广渊除直集贤院。光论其奸邪不可近：“昔汉景帝重卫绾，周世宗薄张美。广渊当仁宗之世，私自结于陛下，岂忠臣哉？宜黜之以厉天下。”进龙图阁直学士。

神宗即位，擢为翰林学士，光力辞。帝曰：“古之君子，或学而不文，或文而不学。惟董仲舒、扬雄兼之。卿有文学，何辞为？”对曰：“臣不能为四六。”帝曰：“如两汉制诏可也；且卿能进士取高第，而云不能四六，何邪？”竟不获辞。

御史中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，光代之，光言：“陶由论宰相罢，则中丞不可复为。臣愿俟既押班，然后就职。”许

之。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：曰仁，曰明，曰武；治国之要三：曰官人，曰信赏，曰必罚。其说甚备。且曰：“臣获事三朝，皆以此六言献，平生力学所得，尽在是矣。”御药院内臣，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，至内殿崇班则出；近岁暗理官资，非祖宗本意。因论高居简奸邪，乞加远窜。章五上，帝为出居简，尽罢寄资者。既而复留二人，光又力争之。张方平参知政事，光论其不叶物望，帝不从。还光翰林兼侍读学士。

光常患历代史繁，人主不能遍览，遂为《通志》八卷以献。英宗悦之，命置局秘阁，续其书。至是，神宗名之曰《资治通鉴》，自制《序》授之，俾日进读。

诏录颖邸直省官四人为阁门祗候，光曰：“国初草创，天步尚艰，故御极之初，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，谓之随龙，非平日法也。阁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，岂可使厮役为之。”

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，取谅祚以降。诏边臣招纳其众，光上书疏极论，以为：“名山之众，未必能制谅祚。幸而胜之，灭一谅祚，生一谅祚，何利之有；若其不胜，必引众归我，不知何以待之。臣恐朝廷不独失信谅祚，又将失信于名山矣。若名山余众尚多，还北不可，入南不受，穷无所归，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。陛下不见侯景之事乎？”上不听，遣将种谔发兵迎之，取绥州，费六十万，西方用兵，盖自此始矣。

百官上尊号，光当答诏，言：“先帝亲郊，不受尊号。末年有献议者，谓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，彼有尊号我独元，于是复以非时奉册。昔匈奴冒顿自称‘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’，不闻汉文帝复为大明以加之也。愿追述先帝本意，

不受此名。”帝大悦，手诏奖光，使善为答辞，以示中外。

执政以河朔旱伤，国用不足，乞南郊勿赐金帛。诏学士议，光与王珪、王安石同见，光曰：“救灾节用，宜自贵近始，可听也。”安石曰：“常充辞堂馔，时以为充自知不能，当辞位不当辞禄。且国用不足，非当世急务，所以不足者，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。”光曰：“善理财者，不过头会箕敛尔。”安石曰：“不然，善理财者，不加赋而国用足。”光曰：“天下安有此理？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不在民，则在官，彼设法夺民，其害乃甚于加赋。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，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。”争议不已。帝曰：“朕意与光同，然姑以不允答之。”会安石草诏，引常充事责两府，两府不敢复辞。

安石得政，行新法，光逆疏其利害。迺英进读，至曹参代萧何事，帝曰：“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宁独汉也，使三代之君常守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法，虽至今存可也。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，盗贼半天下；元帝改孝宣之政，汉业遂衰。由此言之，祖宗之法不可变也。”吕惠卿言：“先王之法，有一年一变者，‘正月始和，布法象魏’是也；有五年一变者，巡守考制度是也；有三十年一变者，‘刑罚世轻世重’是也。光言非是，其意以风朝廷耳。”帝问光，光曰：“布法象魏，布旧法也。诸侯变礼易乐者，王巡守则诛之，不自变也。刑新国用轻典，乱国用重典，是为世轻世重，非变也。且治天下譬如居室，敝则修之，非大坏不更造也。公卿侍从皆在此，愿陛下问之。三司使掌天下财，不才而黜可也，不可使执政侵其事。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何也？宰相以道佐人主，安用例？苟用例，则胥吏矣。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，

何也？”惠卿不能对，则以他语诋光。帝曰：“相与论是非耳，何至是。”光曰：“平民举钱出息，尚能蚕食下户，况县官督责之威乎！”惠卿曰：“青苗法，愿取则与之，不愿不强也。”光曰：“愚民知取债之利，不知还债之害，非独县官不强，富民亦不强也。昔太宗平河东，立籴法，时斗米十钱，民乐与官为市。其后特贵而和籴不解，遂为河东世世患。臣恐异日之青苗，亦犹是也。”帝曰：“坐仓籴米何如？”坐者皆起，光曰：“不便。”惠卿曰：“籴米百万斛，则省东南之漕，以其钱供京师。”光曰：“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，今不籴米而漕钱，弃其有余，取其所无，农末皆病矣！”侍讲吴申起曰：“光言，至论也。”

它日留对，帝曰：“今天下汹汹者，孙叔敖所谓‘国之有是，众之所恶’也。”光曰：“然。陛下当论其是非。今条例司所为，独安石、韩絳、惠卿以为是耳，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？”帝欲用光，访之安石。安石曰：“光外托廊上之名，内怀附下之实。所言尽害政之事，所与尽害政之人。而欲寘之左右，使与国论，此消长之大机也。光才岂能害政，但在高位，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。韩信立汉赤帟，赵卒气夺，今用光，是与异论者赤帟也。”

安石以韩琦上疏，卧家求退。帝乃拜光枢密副使，光辞之曰：“陛下所以用臣，尽察其狂直，庶有补于国家。若徒以禄位荣之，而不取其言，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。臣徒以禄位自荣，而不能救生民之患，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。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，追还提举官，不行青苗、助役等法，虽不用臣，臣受赐多矣。今言青苗之害者，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，

为今日之患耳。而臣之所忧，乃在十年之外，非今日也。夫民之贫富，由勤惰不同，惰者常乏，故必资于人。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，富者不愿取，使者以多散多功，一切抑配。恐其逋负，必令贫富相保，贫者无可偿，则散而之四方；富者不能去，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。春算秋计，展转日滋，贫者既尽，富者亦贫。十年之外，百姓无复存者矣。又尽散常平钱谷，专行青苗，它日若思复之，将何所取？富室既尽，常平已废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，壮者必聚而为盗贼，此事之必至者也。”抗章至七八，帝使谓曰：“枢密，兵事也，官各有职，不当以他事为辞。”对曰：“臣未受命，则犹侍从也，于事无不可言者。”安石起视事，光乃得请，遂求去。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。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边，选诸军骁勇士，募市井恶少年为奇兵；调民造干糒，悉修城池楼橹，关辅骚然。光极言：“公私困敝，不可举事，而京兆一路皆内郡，缮治非急。宣抚之令，皆未敢从，若乏军兴，臣当任其责。”于是一路独得免。徙知许州，趣入覲，不赴；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，自是绝口不论事。而求言诏下，光读之感泣，欲嘿不忍，乃复陈六事，又移书责宰相吴充。事见《充传》。

蔡天申为察访，妄作威福，河南尹、转运使敬事之如上官；尝朝谒应天院神御殿，府独为设一班，示不敢与抗。光顾谓台吏曰：“引蔡寺丞归本班。”吏即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。天申窘沮，即日行。

元丰五年，忽得语涩疾，疑且死，豫作遗表置卧内，即有缓急，当以畀所善者上之。官制行，帝指御史大夫曰：“非

司马光不可。”又将以为东宫师傅。蔡曰：“国是方定，愿少迟之。”《资治通鉴》，未就，帝尤重之，以为贤于荀悦《汉纪》，数促使终篇，赐以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。及书成，加资政殿学士。凡居洛阳十五年，天下以为真宰相，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，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。

帝崩，赴阙临，卫士望见，皆以手加额曰：“此司马相公也。”所至，民遮道聚观，马至不得行，曰：“公无归洛，留相天子，活百姓。”哲宗幼冲，太皇太后临政，遣使问所当先，光谓：“开言路。”诏榜朝堂。而大臣有不悦者，设六语云：“若阴有所怀；犯非其分；或扇摇机事之重；或迎合已行之令；上以徼倖希进；下以眩惑流俗。若此者，罚无赦。”后复命示光，光曰：“此非求谏，乃拒谏也。人臣惟不言，言则入六事矣。”乃具论其情，改诏行之，于是上封者以千数。

起光知陈州，过阙，留为门下侍郎。苏轼自登州召还，缘道人相聚号呼曰：“寄谢司马相公，毋去朝廷，厚自爱以活我。”是时天下之民，引领拭目以观新政，而议者犹谓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，但毛举细事，稍塞人言。光曰：“先帝之法，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。若安石、惠卿所建，为天下害者，改之当如救焚拯溺。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，非子改父。”众议甫定。遂罢保甲团教，不复置保马；废市易法，所储物皆鬻之，不取息，除民所欠钱；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，皆复其旧。或谓光曰：“熙、丰旧臣，多俭巧小人，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，则祸作矣。”光正色曰：“天若祚宗社，必无此事。”于是天下释然，曰：“此先帝本意也。”

元佑元年复得疾，诏朝会再拜，勿舞蹈。时青苗、免役、

将官之法犹在，而西戎之议未决。光叹曰：“四患未除，吾死不瞑目矣。”折简与吕公著云：“光以身付医，以家事付愚子，惟国事未有所托，今以属公。”乃论免役五害，乞直降敕罢之。诸将兵皆隶州县，军政委守令通决。废提举常平司，以其事归之转运、提点刑狱。边计以和戎为便。谓监司多新进少年，务为刻急，令近臣于郡守中选举，而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。又立十科荐士法。皆从之。

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免朝觐，许乘肩舆，三日一入省。光不敢当，曰：“不见君，不可以视事。”诏令子康扶入对，且曰：“毋拜。”遂罢青苗钱，复常平糴籴法。两宫虚己以听。辽、夏使至，必问光起居，敕其边吏曰：“中国相司马矣，毋轻生事，开边隙。”光自见言行计从，欲以身徇社稷，躬亲庶务，不舍昼夜。宾客见其体羸，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。光曰：“死生，命也。”为之益力。病革，不复自觉，谆谆如梦中语，然皆朝廷天下事也。

是年九月薨，年六十八。太皇太后闻之恸，与帝即临其丧，明堂礼成，不贺，赠太师、温国公，襚以一品礼服，赙银绢七千。诏户部侍郎赵瞻、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，归葬陕州。谥曰文正，赐碑曰《忠清粹德》。京师人罢市往吊，鬻衣以致奠，巷哭以过车。及葬，哭者如哭其私亲。岭南封州父老，亦相率具祭，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，饮食必祝。

光孝友忠信，恭俭正直，居处有法，动作有礼。在洛时，每往夏县展墓，必过其兄旦，旦年将八十，奉之如严父，保之如婴儿。自少至老，语未尝妄，自言：“吾无过人者，但平生所为，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。”诚心自然，天下敬信，陕、

洛间皆化其德，有不善，曰：“君实所无知之乎？”

光于物澹然无所好，于学无所不通，惟不喜释、老，曰：“其微言不能出吾书，其诞吾不信也。”洛中有田三顷，丧妻，卖田以葬，恶衣菲食以终其身。

绍圣初，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，尽废其法。章惇、蔡卞请发冢斫棺，帝不许，乃令夺赠谥，仆所立碑。而惇言不已，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，又贬崖州司户参军。徽宗立，复太子太保。蔡京擅政，复降正议大夫，京撰《奸党碑》，令郡国皆刻石。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，辞曰：“民愚人，固不知立碑之意。但如司马相公者，海内称其正直，今谓之奸邪，民不忍刻也。”府官怒，欲加罪，泣曰：“被役不敢辞，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，恐得罪于后世。”闻者愧之。

靖康元年，还赠谥。建炎中，配享哲宗庙庭。

康字公休，幼端谨，不妄言笑，事父母至孝。敏学过人，博通群书，以明经上第。光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奏检阅文字。丁母忧，勺饮不入口三日，毁几灭性。光居洛，士之从学者退与康语，未尝不有得。途之人见其容止，虽不识，皆知其为司马氏子也。以韩絳荐，为秘书，由正字迁校书郎。光薨，治丧皆用《礼经》家法，不为世俗事。得遗恩，悉以与族人。服除，召为著作佐郎兼侍讲。

上疏言：“比年以来，旱暵为虐，民多艰食。若复一不稔，则公私困竭，盗贼可乘。自古圣贤之君，非无水旱，惟有以待之，则不为甚害。愿及今秋熟，令州县广采，民食所余，悉归于官。今冬来春，令流民就食，候乡里丰穰，乃还本土。凡为国者，一丝一毫皆当爱惜，惟于济民则不宜吝。诚能捐数

十万金帛，以为天下大本，则天下幸甚。”拜右正言，以亲嫌未就职。

为哲宗言前世治少乱多，祖宗创业之艰难，积累之勤劳，劝帝及时向学，守天下大器，且劝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训迪，其言切至。迺英进讲，又言：“《孟子》于书最醇正，陈王道尤明白，所宜观览。”帝曰：“方读其书。”寻诏讲官节以进。

康自居父丧，居庐疏食，寝于地，遂得腹疾，至是不能朝谒。赐优告。疾且殆，犹具疏所当言者以待，曰：“得一见天子极言而死无恨。”使召医李积于菴。积老矣，乡民闻之，往告曰：“百姓受司马公恩深，今其子病，愿速往也。”来者日夜不绝，积遂行；至，则不可为矣。年四十一而卒。公卿嗟痛于朝，士大夫相吊于家，市井之人，无不哀之。诏赠右谏议大夫。

康为人廉洁，口不言财。初，光立神道碑，帝遣使赐白金二千两，康以费皆官给，辞不受。不听。遣家吏如京师纳之，乃止。

范祖禹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三三七

【说明】范祖禹（1041—1098），字淳甫，成都华阳（今四川成都）人。年轻时跟随司马光修撰《资治通鉴》达十五年之久，分管唐史部分。积多年所得，他撰成《唐鉴》二十四卷，“上自高祖，下迄昭、宣，撮其大纲，系以论断”，是宋代有代表性的史论专著。《资治通鉴》是反对区分正统篡逆的，而范祖禹在《唐鉴》则坚持正统观念，如记武则天称帝时期中宗的事，则以《春秋》笔法，不用武周的年号，还用已被废黜的中宗的年号，表示对武则天篡逆的贬斥和对李氏正统地位的尊崇。范祖禹非常推崇《孟子》，常以《孟子》为其评论史事的标准，得出与以往史家不同的结论，反映出宋代理学对史学的影响。《唐鉴》问世即受到当时人的重视，据载高宗曾与讲官说，读《资治通鉴》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，读《唐鉴》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。朱熹对《唐鉴》则有不同看法，他说此书议论弱，又有不相应处。宋代对《唐鉴》的不同看法，都对后人正确认识《唐鉴》有益。

范祖禹，字淳甫，还有一字为梦得。他出生时，他母亲

梦见一个魁梧的男子披挂着金甲进入卧室，说：“我是汉将军邓禹。”已经醒了，还看到他，于是以“禹”为名。年幼丧父，叔祖父范镇抚育他象自己的孩子。范祖禹自己因为已失去父亲，每到年节亲友宾朋庆祝聚会，就忧伤地象不被这些人容纳的局外人，关起门来读书，不去参予人事交往。到了京师，和他交游的人，都是一时的知名人士，范镇很器重他，说：“这孩子，是天下士。”

范祖禹举进士甲科。跟随司马光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在洛阳居住十五年，不谋求仕进。《资治通鉴》撰成，司马光举荐他为秘书省正字。当时王安石当朝掌权，特别爱重范祖禹。王安国和范祖禹关系友善，曾经告诉他王安石的意思，范祖禹竟然不前往谒见。富弼退休后居住在洛阳，素来坚强严格，闭门很少与人接触，唯独对范祖禹优厚，病重，把范祖禹叫来交给他密疏，疏大概意思是论说王安石贻误国家以及新法的危害，言论极其愤懑急切。富弼去世，人们都认为密疏不能上奏，范祖禹最终还是上奏了。

神宗驾崩，范祖禹上书议论丧服的制度，说：“先王制定礼法，为君服丧同于为父服丧，都是服丧三年，大概是恐怕作为人臣不能以父事奉他的君王。自从汉代以来，不只人臣不为君服丧，人君也不服三年之丧。本朝从祖宗以来，外廷虽然采用以月代年的丧服制度，但宫中仍实行三年丧服制度。君王丧服制度如同古代礼法，而臣下还依汉代制度，所以十二日为小祥，宫中一年为小祥，处廷二十四日为大祥，宫中两年为大祥。已经以日计算，又以月计算，这样的礼法是没有根据的。古代两周年为大祥，二十七月而禫，禫是祭祀的

名称，不是丧服类别。现在就服丧服三天然后举行禫祭，这礼法不近情理。丧服已除去，到安葬时又着丧服，祔庙之后就着吉服，才八个月就匆忙地改纯粹的吉服，什么装饰都佩戴，这又是礼法没有逐渐变化的过程。初一、十五，群臣穿着朝服到停灵柩的殡宫，这是着吉服临丧；君主着丧在上，这是把先帝的丧服当成君主个人的丧服，这二者于礼法都是不妥当的。”

哲宗即位，提升为右正言。吕公著为执政，范祖禹因避翁婿之嫌推辞，改授祠部员外郎，又推辞。任著作佐郎、修《神宗实录》检讨，改任著作郎兼侍讲。

神宗驾崩已过大祥，范祖禹上疏宣仁后说：“现在除去丧服刚开始，服御一新，奢侈、节俭二者，都从这时开始兴起。凡是可以荡惑人心取悦耳目的事，不宜比旧有的有所增加。皇帝的圣性还未定型，目睹节俭就节俭，目睹奢侈就奢侈，所以训导成有道德的人，其训导应当有成法。现在听说奉宸库取珠宝，户部用金帛，其数量都很多，恐怕以后会无节制的增加，希望制止在还未形成这种情况之前。崇尚节俭敦朴，辅导培养皇帝的圣性，使他目不视华美的色彩，耳不听放荡的声音，不合礼法的话不说，不合礼法的事不做，那么学问一天天增加，圣德一天天隆盛，这是宗庙社稷无限的福气。”旧例，丧服除去应当开始娱乐摆设宴席，范祖禹以为因除丧服而开始娱乐设宴，则好象除丧服而庆贺，不是君子不得已而除去丧服的意思，不能这样做。

夏季酷暑暂且停止进讲，范祖禹说：“陛下现在的学习与不学习，关系着以后天下的治乱。如果好学，那么天下的君

子欣羨敬慕，愿意立班于朝廷，用正直的道理事奉陛下，辅佐有德行的事业，而使天下太平；如果不学，那么小人就蒙动坏心，以邪僻谄媚为事，借以窃取富贵。况且一般的人使学习有进益，也都在年青时期，现在陛下年龄一天天大起来，几年之后，恐怕就不能像现在这样专心了，私下里为陛下惋惜。”为起居郎，又召为试中书舍人，都没有拜受。吕公著去世了，召拜范祖禹为右谏议大夫。首先上疏议论君主端正修养身心的要诀，请求太皇太后每日用天下的辛劳、万民的疾苦、群臣的邪正、政事的得失，开导皇帝的思想，明白地存在心中，使以后纷纭的众说不能迷惑，邪僻的小人不能亲近。

蔡确已经获罪，范祖禹说：“自从乾兴以来，不远放逐大臣已经有六十余年，一旦这样做了，流传到四方，无不震动。蔡确离开相位已经很久，朝廷内大多不是他的党羽，偶尔有偏见异论的人，如果一律都认为是蔡确党羽而除掉，恐怕刑罚失当，而人心不安定。”蔡京镇抚蜀地，范祖禹说：“蔡京小有才学，不是端正善良的人。如果让他守成都，他回来，应当让他为执政，不宜推崇助长。”当时大臣想在新旧法之间有所作为，范祖禹以为朝廷已察明王安石之法是不对的，只应该恢复祖宗的旧法，假若出于新旧两法之间，两法兼存并用，纪纲就破坏了。范祖禹任给事中。

吴中发大水，朝廷下诏拿出米百万斛、缗钱二十万振救灾民。谏官说报告灾情的人妄说，请求检验考核。范祖禹封还谏官的奏章，说：“国家根本，仰仗东南供给。现在一方百姓，呼唤上天告诉，开口仰赖生存，以此摆脱一时的急难。上奏灾情虽小有过失，正应忽略而不问。假若稍行惩罚谴责，恐

怕以后不再有敢说话的人了。”

范祖禹兼国史院修撰，任礼部侍郎。议论选择监司守令说：“祖宗把天下分为十八路，设置转运使、提点刑狱，收乡长、镇将的权力都归于县，收县的权力归于州，州的权力归于监司，监司的权力归于朝廷。上下相维系，轻重相制约，作为建置的宗旨，最为符合时宜。一路交付监司，一州交付守臣，一县交付令宰，这都是和天子分治地方，这些人能不认真挑选吗？祖宗曾有考核官吏的法规，专门考察诸路监司，中书省存放着记录官状的文簿，以便考核官吏的主要情况。现在应当委托吏部尚书，把可以任州守的人，将他们的成绩分别列出送到三省，三省把这样的人召来考察，假如这人可以委任，就按顺序表奏任用他。做了州守，就让监司考察他的政绩，一年之后，可以比较政绩优劣而决定贬黜提升。这样就一定能得到很多人材，监司、郡守得到适当的人选，县令没有才能，也就不是什么忧患了。”

听说宫禁内寻觅乳母，范祖禹因哲宗已经十四岁，不是接近女色的时候，就上疏劝谏皇帝增进德行爱惜自身，又请求宣仁后保护皇帝，言语恳切中肯。不久宣仁后告谕范祖禹，外面的议论都是谣传，范祖禹又上书说：“臣言皇帝进益德行爱惜自身，应常引以为戒。太皇太后保护皇帝，也希望因而不要忘记。现在外面的议论虽然是无中生有，也足以成为先事的警告。臣以经侍奉左右，在道路上有所闻，实在是怀有个人的忧虑，所以不敢躲避妄言的罪过。凡事讲在未发生之前，就真的算是过分；到事情已发生，则又来不及解决了，说它还有什么益处？陛下宁可听受尚未发生的话，不要让臣等

有来不及做的悔恨。”拜范祖禹翰林学士，因为他的叔叔范百禄在中书省，改任侍讲学士。范百禄离开中书省，范祖禹又为翰林学士。范氏从范镇至范祖禹，连续三世官居禁中，士人议论范氏荣耀令人羡慕。

宣仁后驾崩，朝廷内外议论纷纷，人们心怀不安而观望，在位者畏惧，都不敢说话。范祖禹顾虑小人乘机危害朝政，就上奏说：“陛下才独揽朝廷诸政务，接见群臣，这是国家兴衰的根本，社稷安危的关键，百姓休戚的根源，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际遇，天命人心去就离合的时刻，能不畏惧吗？先后对宗庙社稷有大功，对百姓有大德，九年之间，始终如一。然而众小人对她的怨恨，也是不少，他们将用改变先帝的政治，驱逐先帝的臣僚为理由，从而作离间的事，不能不明察。先后顺天下人心，把变的新法更为旧法。既然已改变新法，那么制作新法的人有罪当然应离去，也是顺众人言论而逐退的。这些人都是上负先帝，下负万民，天下所仇恨而要除去的人，难道有个人憎恶在这中间吗？只有辨别分析是非，严厉拒绝邪说，给用奸言惑乱视听的人，以刑法处置，严惩一人，用以警告群恶，就会安定无事了。此等人已贻误先帝，又想贻误陛下，天下的事，怎能经得起这些小人再破坏呢？”当初，苏轼约同僚一起上奏章论列政事，谏章的草稿已完具，看到范祖禹的上疏，于是附上姓名与范祖禹同奏，说：“公的奏文，是治理世事的文章。”竟然不再出示自己的奏章稿。

范祖禹又说：“陛下继承六世遗下的功业，应当想天下是祖宗的天下，人民是祖宗的人民，百官是祖宗的百官，府库是祖宗的府库。一言一行，都好象祖宗亲临在上，评定在傍，

这样就可以长期享受天下的事奉。先后以大公至正的意愿，停罢王安石、吕惠卿所造的新法，而施行祖宗旧政。所以社稷由危急而恢复平安，人心由离散而恢复聚合。就连辽主也告诫他的臣下不要生事说：‘南朝专意施行仁宗之政了。’外夷的人情如此，中国的人心就可想可知了。先后苦心劳力，为陛下建立了太平的基础。希望陛下以静守天下，约束自己用以亲临天下，虚心用以治理天下，这样群臣的邪正，万事的是非，都明白地存在陛下心中了。小人的心情专意为私，所以不利于公；专意为邪，所以不利于正；专意好动，所以不利于静。愿陛下痛心疾首，以此为刻骨之戒。”奏章多次呈上，没有答复。

忽然有旨召见十余名内臣，范祖禹说：“陛下亲政以来，四海侧耳而听，没听说亲访一个贤臣，然而所召见的人却先是内侍，一定说陛下偏私亲幸的人，希望立即恩赐追改。”因而请求对策，说：“熙宁初年，王安石、吕惠卿造立新法，完全改变祖宗之法，多引用小人以至误国，屏弃勋旧之臣而不用，忠诚正直的人相继远去。又用武力开边，与外夷结仇，天下愁苦，百姓流离。依赖先帝觉悟，罢免驱逐这两个人，然而他们引用的众小人，已经布满朝廷内外，不能再离去，蔡确接连兴起大狱，王韶创取熙河，章惇开五溪，沈起扰交管，沈括、徐禧、俞充、种谔兴造西方边事，兵民死伤都不下二十万。先帝临朝悼念追悔，因此说朝廷不能不承担其过失。以至于吴居厚在京东推行铁冶之法，王子京在福建施行茶法，蹇周辅在江西推行盐法，李稷、陆师闵在西川施行茶法、市易法，刘定在河北教保甲，百姓都愁苦怨叹，家家思乱。依赖

陛下与先后起来挽救这局面，天下的百姓，如同解除了倒悬之苦。只有这些以前被斥逐的人，窥伺事变，妄想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正确，如果他们能到陛下左右，必定进奸邪的言论。万一误听而再任用他们，臣恐国家从此衰落，不能再振兴了。”又议论说：“汉、唐的灭亡，都是因为宦官。自熙宁、元丰年间，李宪、王中正、宋用臣之流执政统领军队，权势威严显赫。王中正兼管四路，口敕招募军队，州郡不敢违抗，士兵冻饿，死得最多；李宪陈述再次兴兵的对策，致使永乐被摧毁陷落；宋用臣大兴土木之事，没有停歇的时候，网罗市井的微利，为国家收敛来怨恨。这三个人，虽然加以诛伐杀戮，但不足以平百姓之愤。李宪虽然已死，而王中正、宋用臣还健在，现在召见内臣十人，而李宪、王中正的儿子都在其中。这两个人已入宫禁，那么王中正、宋用臣必定将再被任用，希望陛下注意此事。”

当时绍述的议论已兴起，有以章惇为宰相的意思。范祖禹极力说章惇不能用，不被采纳，于是请求放外官。哲宗还想重用范祖禹，然而朝廷内外作梗的人颇多，就以龙图阁学士为陕州知州。上奏言的人议论范祖禹修《神宗实录》有所诋诬，又搜集他谏禁中雇乳母的事，接连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、昭州别驾，在永州、贺州安置，后又徙至宾州、化州而去世，终年五十八岁。

范祖禹平时居处恭顺，不讲他人的过失。到遇见事情，则分辨论述其是非，少有借喻隐讳。在迺英殿进讲，遵守经典正确的宗旨，供皇帝采纳的进言尤其多。曾经讲到《尚书》“内为女色乱，外为鸟兽迷”数语时，拱手再一次诵读，退一

步站着说：“希望陛下记住。”哲宗再三首肯，范祖禹才退下。每当进讲前夕，一定整肃衣冠，犹如真的在皇帝身旁，让子弟侍奉，先按进讲的内容，开列古代义理，参酌现实时事，言辞简捷得当，没有一句冗长的话，义理明白，赫然成文章。苏轼称他为侍讲官第一。

范祖禹曾经进呈《唐鉴》十二卷，《帝学》八卷，《仁皇政典》六卷。而《唐鉴》深刻地反映了唐代三百年的治乱，学者尊崇他，视他为“唐鉴公”云云。建炎三年，追复范祖禹为龙图阁学士。儿子范冲，绍兴年间官至翰林侍读学士，《儒林》有传。

(曾贻芬译)

【原文】

祖禹字淳甫，一字梦得。其生也，母梦一伟丈夫被金甲入寝室，曰：“吾汉将军邓禹。”既寤，犹见之，遂以为名。幼孤，叔祖镇抚育如己子。祖禹自以既孤，每岁时亲宾庆集，惨怛若无所容，闭门读书，未尝预人事。既至京师，所与交游，皆一时闻人。镇器之曰：“此儿，天下士也。”

进士甲科。从司马光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在洛十五年，不事进取。书成，光荐为秘书省正字。时王安石当国，尤爱重之。王安国与祖禹友善，尝谕安石意，竟不往谒。富弼致仕居洛，素严毅，杜门罕与人接，待祖禹独厚，疾笃，召授以密疏，大抵论安石误国及新法之害，言极愤切。弼薨，人皆以为不可奏，祖禹卒上之。

神宗崩，祖禹上疏论丧服之制曰：“先王制礼，君服同于父，皆斩衰三年，盖恐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。自汉以来，不惟人臣无服，人君遂不为三年之丧。国朝自祖宗以来，外廷

虽用易月之制，宫中实行三年服。君服如古典，而臣下犹依汉制，故十二日而小祥，期而又小祥，二十四日而大祥，再期而又大祥。既以日为之，又以月为之，此礼之无据者也。古者再期而大祥，中月而禫。禫，祭之名，非服之色。今乃为之惨服三日然后禫，此礼之不经者也。服既除，至葬又服之，祔庙后即吉，才八月而遽纯吉，无所不佩，此又礼之无渐者也。朔望，群臣朝服以造殡宫，是以吉服临丧；人主衰服在上，是以先帝之服为人主之私丧，此二者皆礼之所不安也。”

哲宗立，擢右正言。吕公著执政，祖禹以婿嫌辞，改祠部员外郎，又辞。除著作佐郎、修《神宗宝录》检讨，迁著作郎兼侍讲。

神宗既祥，祖禹上疏宣仁后曰：“今即吉方始，服御一新，奢俭之端，皆由此起。凡可以荡心悦目者，不宜有加于旧。皇帝圣性未定，睹俭则俭，睹奢则奢，所以训导成德者，动宜有法。今闻奉宸库取珠，户部用金，其数至多，恐增加无已，愿止于未然。崇俭敦朴，辅养圣性，使目不视靡曼之色，耳不听淫哇之声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则学问日益，圣德日隆。此宗社无疆之福。”故事，服除当开乐置宴，祖禹以为因除服而开乐设宴，则似除服而庆贺，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，不可。

夏暑权罢讲，祖禹言：“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，系他日治乱。如好学，则天下君子欣慕，愿立于朝，以直道事陛下，辅佐德业，而致太平；不学，则小人皆动其心，务为邪谄，以窃富贵。且凡人之进学，莫不于少时，今圣质日长，数年之后，恐不得如今日之专，窃为陛下惜也。”迁起居郎，又召试

中书舍人，皆不拜。吕公著薨，召拜右谏议大夫。首上疏论人主正心修身之要，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劳、万民之疾苦、群臣之邪正、政事之得失，开导上心，晓然存之于中，使异日众说不能惑，小人不能进。

蔡确既得罪，祖禹言：“自乾兴以来，不窜逐大臣六十余年，一旦行之，流传四方，无不震耸。确去相已久，朝廷多非其党，间有偏见异论者，若一切以为党确去之，惧刑罚失中，而人情不安也。”蔡京镇蜀，祖禹言：“京小有才，非端良之士。如使守成都，其还，当使执政，不宜崇长。”时大臣欲于新旧法中有所创立。祖禹以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为非，但当复祖宗之旧，若出于新旧之间，两用而兼存之，纪纲坏矣。迁给事中。

吴中大水，诏出米百万斛、缗钱二十万振救。谏官谓诉灾者为妄，乞加验考。祖禹封还其章，云：“国家根本，仰给东南。今一方赤子，呼天赴愬，开口仰哺，以脱朝夕之急。奏灾虽小过实，正当略而不问。若稍施惩罚，恐后无复敢言者矣。”

兼国史院修撰，为礼部侍郎。论择监司守令曰：“祖宗分天下为十八路，置转运使、提点刑狱，收乡长、镇将之权悉归于县，收县之权归于州，州之权归于监司，监司之权归于朝廷。上下相维，轻重相制，建置之道，最为合宜。监司付以一路，守臣付以一州，令宰付以一县，皆与天子分土而治，其可不择乎？祖宗尝有考课之法，考察诸路监司，置簿于中书，以稽其要。今宜委吏部尚书，取当为州者，条别功状以上三省，三省召而察之，苟其人可任，则以次表用之。至官，

则令监司考其课绩，终岁之后，可以校优劣而施黜陟焉。如此则得人必多，监司、郡守得人，县令不才，非所患也。”

闻禁中觅乳媪，祖禹以帝年十四，非近女色之时，上疏劝进德爱身，又乞宣仁后保护上躬，言甚切至。既而宣仁谕祖禹，以外议皆虚传，祖禹复上疏曰：“臣言皇帝进德爱身，宜常以为戒。太皇太后保护上躬，亦愿因而勿忘。今外议虽虚，亦足为先事之戒。臣侍经左右，有闻于道路，实怀私忧，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。凡事言于未然，则诚为过；及其已然，则又无所及，言之何益？陛下宁受未然之言，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。”拜翰林学士，以叔百禄在中书，改侍讲学士。百禄去，复为之。范氏自镇至祖禹，比三世居禁林，士论荣慕。

宣仁太后崩，中外议论汹汹，人怀顾望，在位者畏惧，莫敢发言。祖禹虑小人乘间害政，乃奏曰：“陛下方揽庶政，延见群臣，此国家隆替之本，社稷安危之机，生民休戚之端，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，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，可不畏哉？先后有大功于宗社，有大德于生灵，九年之间，始终如一。然群小怨恨，亦为不少，必将以改先帝之政、逐先帝之臣为言，以事离间，不可不察也。先后因天下人心，变而更化。既改其法，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退，亦顺众言而逐之。是皆上负先帝，下负万民，天下之所仇疾而欲去之者也，岂有憎恶于其间哉？惟辨析是非，深拒邪说，有以奸言惑听者，付之典刑，痛惩一人，以警群慝，则帖然无事矣。此等既误先帝，又欲误陛下，天下之事，岂堪小人再破坏邪？”初，苏轼约俱上章论列，谏草已具，见祖禹疏，遂附名同奏，曰：“公之文，经世之文也。”竟不复出其稿。

祖禹又言：“陛下承六世之遗烈，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，人民者祖宗之人民，百官者祖宗之百官，府库者祖宗之府库。一言一动，如临之在上，质之在傍，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。先后以大公至正为心，罢安石、惠卿所造新法，而行祖宗旧政。故社稷危而复安，人心离而复合，乃至辽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：‘南朝专行仁宗之政矣。’外夷之情如此，中国之人心可知。先后日夜苦心劳力，为陛下立太平之基。愿守之以静，恭己以临之，虚心以处之，则群臣邪正，万事是非，皆了然于圣心矣。小人之情专为私，故不便于公；专为邪，故不便于正；专好动，故不便于静。惟陛下痛心疾首，以为刻骨之戒。”章累上，不报。

忽有旨召内臣十余人，祖禹言：“陛下亲政以来，四海倾耳，未闻访一贤臣，而所召者乃先内侍，必谓陛下私于近习，望即赐追改。”因请对，曰：“熙宁之初，王安石、吕惠卿造立新法，悉变祖宗之政，多引小人以误国，勋旧之臣屏弃不用，忠正之士相继远引。又用兵开边，结怨外夷，天下愁苦，百姓流徙。赖先帝觉悟，罢逐两人，而所引群小，已布满中外，不可复去。蔡确连起大狱，王韶创取熙河，章惇开五溪，沈起扰交管，沈括、徐禧、俞充、种谔兴造西事，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。先帝临朝悼悔，以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。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，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，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，李稷、陆师闵行茶法、市易于西川，刘定教保甲于河北，民皆愁痛嗟怨，比屋思乱。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，天下之民，如解倒悬。惟是向来所斥逐之人，窥伺事变，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，如得至左右，必进奸言。万

一过听而复用之，臣恐国家自此陵迟，不复振矣。”又论：“汉、唐之亡，皆由宦官。自熙宁、元丰间，李宪、王中正、宋用臣辈用事总兵，权势震灼。中正兼干四路，口敕募兵，州郡不敢违，师徒冻馁，死亡最多；宪陈再举之策，致永乐摧陷；用臣兴土木之工，无时休息，罔市井之微利，为国敛怨。此三人者，虽加诛戮，未足以谢百姓。宪虽已亡，而中正、用臣尚在，今召内臣十人，而宪、中正之子皆在其中。二人既入，则中正、用臣必将复用，愿陛下念之。”

时绍述之论已兴，有相章惇意。祖禹力言惇不可用，不见从，遂请外。上且欲大用，而内外梗之者甚众，乃以龙图阁学士知陕州。言者论祖禹修《实录》诋诬，又摭其谏禁中雇乳媪事，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、昭州别驾，安置永州、贺州，又徙宾、化而卒，年五十八。

祖禹平居恂恂，口不言人过。至遇事，则别白是非，不少借隐。在迓英守经据正，献纳尤多。尝讲《尚书》至“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”六语，拱手再诵，却立云：“愿陛下留听。”帝首肯再三，乃退。每当讲前夕，必正衣冠，俨如在上侧，命子弟侍，先按讲其说，开列古义，参之时事，言简而当，无一长语，义理明白，粲然成文。苏轼称为讲官第一。

祖禹尝进《唐鉴》十二卷，《帝学》八卷，《仁皇政典》六卷。而《唐鉴》深明唐三百年治乱，学者尊之，目为“唐鉴公”云。建炎二年，追复龙图阁学士。子冲，绍兴中仕至翰林侍读学士，《儒林》有传。

李 焘 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三八八

【说明】李焘（1115—1184），字仁甫，眉州丹棱（今四川丹棱县）人。早年就致力于史学，以撰史为己任，博览群书，搜罗百家之言，尤其下全力研究本朝的典故，效法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的体例，取太祖建隆至钦宗靖康间史事，撰成编年体史书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原为九百八十卷。现存的《长编》是清代修《四库全书》时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重加厘定的，共五百二十卷。李焘师承司马光表现在很多方面。首先，强调“宁失于繁，无失于略”，这本是司马光在给范祖禹的信中说的，李焘在《进书表》中特别提到而且忠实履行；其次他还采用《通鉴考异》的做法，在注文中对各种资料的出处、取舍、异同和真伪，以及一时难以考订清楚的史料等情况，都尽可能加以说明。李焘撰史主张“年近则事详，远则略”，在《长编》的修撰中即年代愈近，记载愈详。作为《长编》，李焘不仅以实录、国史为主要依据，还参考日历、时政记、会要等官方文书，并尽可能地利用野史、文集、笔记、行状等私家著述，而且注意兼收并蓄不同派别的材料，所以，《长编》保存了大量的丰富资料，这是它在史学上的最大贡献。

李焘字仁甫，眉州丹棱人，唐朝宗室曹王的后裔。父亲李中应试考中，执掌仙井监。李焘成年，愤懑金人之仇未报，著《反正议》十四篇，都讲的是救国的大事。绍兴八年，擢拔为进士，调华阳为主簿，又调雅州为推官。改官品，为双流县知县。官宦之家张氏的儿子在居丧期间争夺家产，李焘说：“你们忍心丧失先人的教诲吗？何不回去想一想。”三天后张氏子再来，竟后悔全不诉讼。又有不告诉母亲就出卖产业的人，李焘立案处理，豪强收敛恶迹。于是李焘有余暇致力于学问。

李焘不屑于阅读王氏之书，自己博览所有的典籍，搜罗百家之言，激昂地以撰史为自任，对于本朝的典故尤其下全力研究考核。效法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的体例，断取自建隆至靖康间史事，撰编年体一书，名为《长编》，卷帙浩大还未撰完，又按司马光《资治通鉴目录》的体例修《百官公卿表》。史官以此闻于朝廷，朝廷下诏给笔纸抄书呈上。制置王刚中征辟李焘干办公事。

李焘为荣州知州。荣州以小溪为护城壕，夏秋二季都苦于溪水泛滥，李焘筑堤防捍卫城池。升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，进入所辖境内，弹劾四个不称职的守令。县内多聚敛，李焘总括一路的财赋数额，在路内通有无，又参酌三年财赋的平均数，定为赋税的约数，上报于朝廷，然后颁示到州县。

乾道三年，奉命来对策，首先举太祖治身、治家、治官、治吏的典故，以此为恢复的法规，请求增置谏官，允许六察言事，请练兵，不要增兵，杜绝诸将私下向朝廷献财物，核实军队的空额。

李焘任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。正值庆节祝寿，在郊礼的散斋期内，议论权且奏乐，李焘说：“汉代、唐代祭祀天地，散斋四天，致斋三天，建隆初年郊祀也如此。自从崇宁、大观年间效法《周礼》祭天地，所以前十天受警戒，现在已经合祭，应当恢复汉、唐以及建隆的旧制，也许可以两得。”朝廷下诏唐垂拱年间祝寿不奏乐。正殿给北方来使暂且使用。正式任命李焘为礼部郎中，他说中兴祭祀还不完备，请命太常寺以《开宝通礼》、《嘉佑因革礼》、《政和新仪》相互参考比较同异，修成祭法。

乾道四年，呈上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从建隆到治平，共一百零八卷。当时《乾道新历》修成，李焘说：“历法没有误差不改，不经核验不用。没有误差不能知道它的过失，没有核验不能知道它的正确。旧历法误差多，不能不改，而新历法也没有做大规模的核验，请求告诫历官还须讨论。”五年，李焘任秘书少监权起居舍人，不久兼实录院检讨官。

李焘子李厚应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。李焘向来认为三百年来不愧为这科的人只有刘去华，心中倾慕他，曾以所撰《通论》五十篇去见蜀帅张焘，想响应朝廷的诏令，没有遇到张焘而作罢。他的朋友晁公遯写信勉励他，李焘以应当进修这门学问，一定不参与此举的意思回答晁公遯。既然不能亲自应试，于是就命令两个儿子李厚、李塾学习此学。至此，吏部尚书汪应辰推荐李厚的言行可以应朝廷之诏，所以有这个命令。

左相陈俊卿出为福州知州，右相虞允文担任收复北方故土的事，重新张扬旧法。宰相因李焘多次议事，不高兴，李

焘于是请求离任。改任直显谟阁、湖北转运副使，辞别孝宗，以想速成、变旧法为戒。

李焘又上奏：“《禹贡》九州，荆州田土列为第八，贡赋却列在第三，已经人功修整，于是超过五等。现在土地多数荒芜，赋税方欠十分之八。”朝廷命令李焘条具规划。已到朝廷，又上奏：“京湖的百姓，结茅为草庐，筑土为防，雇牛以耕田，买种以殖谷，而谷苗还未长出来，就已有很多人窥伺着它的收获，有横加摊派赋税的人。现在应该放宽侵冒的禁令，按乾德年间的诏令只交旧税，扩大收募的办法，象咸平、元丰年间的旧例，对劝勉交赋有功劳的人给以恩泽。”诏令同意他的建议。总饷吕游问入朝奏事由李焘代他理政事。这一年有饥荒，开鄂州大军仓振济灾民，所属官吏与李焘争执以为不行，李焘说：“我自己负责任，不因此连累诸位。”不久如数偿还大军仓。吕游问回来，果然弹劾李焘专断，朝廷只让陈述分析，并不加罪于李焘。

乾道八年，李焘直宝文阁，帅潼川兼泸州知州，首先修葺石门堡用以防犯夷人，上奏请求敬告茶马司买卖叙州联络马不要超额，警告官府、百姓不要在夷、汉禁山中伐木造船，奏把锁水的军队移到开边的旧池，朝廷回答都可行。

淳熙改年号，李焘被召，恰巧城中起火，上表章自责。提刑何熙志上奏说李焘所言火烧的数量不真实，而且说《长编》记魏王吃肥肉，其言语涉嫌诬谤，孝宗说：“御史审查上奏火烧数失实，是尽本职，为什么干预国史？”命令成都提刑李夔究查起火的事，诏令何熙志贬二品官秩免官，李焘只贬一品官秩。

李焘到京城，请求为祠官，授江西转运副使，而且准许当时派遣。有人用刚刚蒙受谗毁不要涉及时事来劝他。李焘说：“圣主如此大器量，我要竭尽忠诚以为报答。”于是上奏：“日食地震都是阴盛所致，以敌国小人为主，不能不忧虑。”并且重申“不变古法，不求速成”两句话，又上《快箴》，援引太祖罢朝追悔乘快决断大事的例子，以此劝谏孝宗，孝宗说：“朕应当把它高举在座右。”进李焘为秘阁修撰、权同修国史、权实录院同修撰。

李焘作左史的时候，曾经请求恢复举行明堂礼，说：“南郊、明堂开始不分尊卑，对于圜坛是一样的，特免去出郊的虚浮费用。”此时申述此事，朝廷下诏召集议论，皇帝宠幸的人阻止此事。这以后周必大做礼部尚书，申明这说法，开始能推行。李焘权礼部侍郎。

七月壬戌（初七），雷击太祖庙的立柱，震坏鸱尾，主管部门马上加以修缮。李焘上奏说这不是畏惧上天变化的作法，应当做与其相应的实事。孝宗晓谕大臣：“李焘爱护朕，屡次进正直的言论。”赐紫袍及金鱼袋。曾经请求正太祖东向的位置。

淳熙四年，孝宗临幸太学，因李焘授经书特别升一秩官。李焘议论国学、太学的释奠，从祀孔子，应登升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轼，黜降王安石父子；从祀武成王，应当降黜李勣，众人议论不统一，只降黜王雱一人而已。正式拜授侍郎，仍然兼任工部之职。

为撰《徽宗实录》设实录院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朝廷催促上奏《徽宗实录》成篇，李焘推荐吕祖谦，称他学识高明，召

为秘书书兼检讨官。夜里当班宣引，李焘上奏说：“近来蒙气遮蔽太阳，其占卜说是不肖者为官，应当对身边的重臣、近臣谨慎任用。”孝宗赐坐。李焘要起身，孝宗又留他赐酒、赐茶。不久诏令监视太史测验天文。

九月丁酉（二十二日），太阳当夜有食，李焘为社坛祭告官，伐鼓礼已废，此特别举行伐鼓礼。李厚已中制举，任秘书省正字，不久迁为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编修检讨官。父子一同主管修史之事，缙绅以此为荣耀。

李焘感激孝宗的知遇之恩，议论朝事更加尽心，每逢召集众议，众臣都不敢发言，只有他一人条具陈述政事是非与否无所避讳。近臣又推举李焘的次子李塾应制举，因阁试未达标准而免。李厚辅助考核上舍试卷，发对策制举，被御史所弹劾，内容株连到李焘，李厚免官，李焘亦遭贬为常德府知府。

当初，政和末年，澧、辰、沅、靖四州设营田刀弩手，招募人开拓边疆，范世雄等人附合扰民，建炎时废罢此事。乾道年间，有人建议请朝廷恢复营田刀弩手的设置，李焘为转运使，曾经上奏不应当恢复，不久提刑尹机强迫郡县推行此事，田地不能供给。李焘到这时又申述这件事，请求度量土地而定营田刀弩手的人数，而且相约帅臣张栻同列上奏，朝廷下诏从他们的奏议。境内有很多茶园，以前禁令逼迫商人，竟到了交兵的地步，李焘说：“官府捉捕茶贼，岂能禁止茶商。”听茶商自行交易，竟然没有危急的情况可报告。

李焘多次上表请求休闲，于是提举兴国宫。秋季，明堂大礼告成，因李焘首先提议，又授敷文阁待制，不久，李厚、

李塾相继去世，孝宗想以公事舒缓李焘的忧伤，举他为遂宁府知府。

淳熙七年，《长编》全书完成，进呈朝廷，下诏藏于秘阁。李焘自己说这部书宁可失之于繁，而不可失之略，所以一祖八宗的事迹共九百七十八卷，卷第总目有五卷。按照宁修《三经》的体例，损益修撰更换四千四百多事，孝宗说这部书无愧于司马迁。李焘曾经举汉代石渠阁、白虎观故事，请求孝宗行使皇权亲临决断，又请求孝宗在书前作序，孝宗答应了这一请求，竟然未能完成。

李焘又上奏：“陛下即位二十多年，立志于国家富强，然而军队羸弱财货匮乏，与‘教百姓七年可以攻战’不同。”一天，命李焘入朝对策延和殿，讲臣正在谈《陆贽奏议》，李焘因而说：“陆贽虽然辅佐德宗，其实并无知遇。现在知遇于陛下，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之一时啊。”于是举出陆贽所说切合于现在可举行的事有数十项，劝孝宗极力办理。孝宗有功业不足的感叹，李焘说：“功业体现于变通，人事已经做好，天应就会到来。”进仕敷文阁直学士，提举佑神观兼侍讲、同修国史。推举尤袤、刘清之等十人为史官。

淳熙十年七月，长久干旱，李焘进祖宗离开宫殿减少膳食以求上言的故事，孝宗马上施行。丁丑（十五日）下雨。一天宣李焘入对，李焘说：“外边议论陛下经常服药，很少临殿，宫嫔进见没有定时，多余的费用很多。”孝宗说：“爱卿对朕可以说是忠心、爱护，顾念朕老了，怎么能有此名声。最近只为安葬李婕妤用了三万缗，没有其它的花费。”于是因此转对，请求用祖宗旧例召宰执前往经筵。

太史说十一月初一，太阳行至心宿而食之八分。李焘又条列呈自上古至今日食在十一月的三十四例，因而奏此事说：“心宿，是天王正位，他的分野是宋。十一月在卦中为复填，正是阳气潜伏的时候，阴气乘此而盛，所以此时日食比其他日食更为严重，不是小人危害朝政，就是敌人窥伺中国。”第二天对策延和殿，又谈及晋代何曾讥讽晋武帝没有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。

十一年春季，乞求退休，朝廷特别下诏不准退休。孝宗多次询问李焘病情的好坏，给事中宇文价传达孝宗的旨意，李焘说：“臣子留恋朝廷，要不是年老有病，也不愿辞官。”因此询问宇文价当时朝事，并以向朝廷进献忠心来勉励他。又听说四川请求减少酒课数额，还手书札子告皇帝推行此事。

李焘病重，除授敷文阁学士，退休。诏命下达，李焘高兴地说：“事情了了。”口述遗表说：“臣年已七十，死也不算早亡，所遗恨的是未竟报国之志。希望陛下在治国谋略方面以太祖为师，用人方面以仁宗为准则。”说话辞气平缓舒畅，就这样去世，终年七十。

孝宗闻听李焘的死讯悲叹痛悼，赠他光禄大夫。有一天，孝宗对宇文价说：“朕曾经答应李焘写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七个大字，而且用神宗赐司马光的旧例，作序冠于篇首，不是就止此而已。”

李焘性格刚大，有独立见解而且不随波逐流。早年就开始著书，当时秦桧还掌权当道，秦桧死后李焘才开始闻名于朝廷。及在朝官的行列，经常表情严肃地评议有关国事的论议。张栻曾经说过：“李仁甫有如霜松雪柏。”没有什么嗜好，

没有姬妾侍女，不置办产业。平生以文字为生命，《长编》一书倾其四十年的功力，叶适认为《春秋》之后仅有此书。

李焘著有《易学》五卷，《春秋学》十卷，《五经传授》、《尚书百篇图》、《大传杂说》、《七十二子名籍》各一卷，《文集》五十卷，《奏议》三十卷，《四朝史稿》五十卷，《通论》十卷，《南北攻守录》三十卷，《七十二候图》、《陶潜新传》并《诗谱》各三卷，《历代宰相年表》、《唐宰相谱》、《江左方镇年表》、《晋司马氏本支》、《齐梁本支》、《王谢世表》、《五代将帅年表》合为四十一卷。

李焘谥号为文简，累赠太师、温国公。（曾贻芬译）

【原文】

李焘字仁甫，眉州丹棱人，唐宗室曹王之后也。父中登第，知仙井监。焘甫冠，愤金讎未报，著《反正议》十四篇，皆救时大务。绍兴八年，擢进士第。调华阳簿，再调雅州推官。改秩，知双流县。仕族张氏子居丧而争产，焘曰：“若忍坠先训乎？盍归思之。”三日复来，迄悔艾无讼。又有不自其母而鬻产者，焘置之理，豪强敛迹。于是以余暇力学。

焘耻读王氏书，独博极载籍，搜罗百氏，慨然以史自任，本朝典故尤悉力研核。仿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例，断自建隆，迄于靖康，为编年一书，名曰《长编》，浩大未毕，仍效光体为《百官公卿表》。史官以闻，诏给札来上。制置王刚中辟干办公事。

知荣州。荣因溪为隍，夏秋率苦水潦，焘筑防捍之。除潼川府路转运判官，入境，劾守令不职者四人。县多聚敛，焘括一路财赋额，通有无，酌三年中数，定为科约，上之朝，颁

之州县。

乾道三年，召对，首举艺祖治身、治家、治官、治吏典故，以为恢复之法，乞增置谏官，许六察言事，请练兵，毋增兵，杜诸将私献，核军中虚籍。

除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。会庆节上寿，在郊礼散斋内，议权作乐，焘言：“汉、唐祀天地，散斋四日，致斋三日，建隆初郊亦然。自崇宁、大观法《周礼》祭天地，故前十日受誓戒。今既合祭，宜复汉、唐及建隆旧制，庶几两得。”诏垂拱上寿止乐，正殿为北使权用。正除礼部郎中，言中兴祭礼未备，请以《开宝通礼》、《嘉佑因革礼》、《政和新仪》令太常寺参校同异，修成祭法。

四年，上《续通鉴长编》，自建隆至治平，凡一百八卷。时《乾道新历》成，焘言：“历不差不改，不验不用。未差无以知其失，未验无以知其是。旧历多差，不容不改，而新历亦未有大验，乞申饬历官讨论。”五年，迁秘书少监兼权起居舍人，寻兼实录院检讨官。

子厚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。焘素谓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刘去华，心慕之，尝以所著《通论》五十篇见蜀帅张焘，欲应诏，不偶而止。其友晁公遡以书勉之，焘答以当修此学，必不从此举。既不克躬试，于是命二子厚、塾习焉。至是，吏部尚书汪应辰荐厚文行可应诏，故有是命。

左相陈俊卿出知福州，右相虞允文任恢复事，更张旧典。宰相以焘数言事，不乐，焘遂请去。除直显谟阁、湖北转运副使，陛辞，以欲速变古为戒。

又奏：“《禹贡》九州，荆田第八，赋乃在三，人功既修，

遂超五等。今田多荒芜，赋亏十八。”上命之条画。既至，奏：“京湖之民结茅而庐，筑土而坊，佣牛而犁，杂种而殖，谷苗未立，睥睨已多，有横加科敛者。今宜宽侵冒之禁，依乾德诏书止输旧税，广收募之术，如咸平、元丰故事，劝课有劳者推恩。”诏从之。总饷吕游问入奏熹摄其事。岁饥，发鄂州大军仓振之，僚属争执不可，熹曰：“吾自任，不以累诸君。”寻如数偿之。游问返，果劾熹专，上止令具析，不之罪也。

八年，直宝文阁，帅潼川兼知泸州，首葺石门堡以扼夷人，奏乞戒茶马司市叙州羁縻马毋溢额，戒官民毋于夷、汉禁山伐木造舟，奏移锁水于开边旧池，皆报可。

淳熙改元，被召，适城中火，上章自劾。提刑何熙志奏焚数不实，且言《长编》记魏王食肥彘，语涉诬谤，上曰：“宪臣按奏火数失实，职也，何预国史？”命成都提刑李夔究火事，诏熙志贬二秩罢，熹止贬一秩。

熹及都门，乞祠，除江西运副，且许临遣。或劝以方被讦，无及时事，熹曰：“圣主全度如此，竭忠所以为报。”遂奏：“日食、地震皆阴盛，主敌国小人，不可不虑。”且申“无变古、无欲速”两言，又上《快箴》，引太祖罢朝悔乘快决事以谏，上曰：“朕当揭之座右。”进秘阁修撰、权同修国史、权实录院同修撰。

熹为左史时，尝乞复行明堂礼，谓“南郊、明堂初无隆杀，合视圜坛，特免出郊浮费。”至是申言之，诏集议，嬖幸沮止。其后周必大为礼部尚书，申其说，始克行。权礼部侍郎。

七月壬戌，雷震太祖庙柱，坏鸱尾，有司旋加修缮。熹

奏非所以畏天变，当应以实。上谕大臣：“焘爱朕，屡进说言。”赐金紫。尝请正太祖东向之位。

四年，驾幸太学，以执经特转一官。焘论两学释奠：从祀孔子、当升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苏轼，黜王安石父子；从祀武成王，当黜李勣。众议不叶，止黜王雱而已。真拜侍郎，仍兼工部。

《徽宗实录》置院已久，趣上奏篇，焘荐吕祖谦学识之明，召为秘书郎兼检讨官。夜直宣引，奏：“近者蒙气蔽日，厥占不肖者禄，股肱耳目宜谨厥与。”赐坐。欲起，又留赐饮、赐茶。寻诏监视太史测验天文。

九月丁酉，日当夜食，焘为社坛祭告官，伐鼓礼废，特举行。厚既中制科，为秘书省正字，寻迁著作郎兼国史实录院编修检讨官。父子同主史事，缙绅荣之。

焘感上知遇，论事益切，每集议，众莫敢发言，独条陈可否无所避。近臣复举其次子塾应制科，以阁试不中程黜。厚偶考上舍试卷，发策问制科，为御史所劾，语连及焘，厚罢，焘亦知常德府。

初，政和末，沔、辰、沅、靖四州置营田刀弩手，募人开边，范世雄等附会扰民，建炎罢之。乾道间，有建请复置者，焘为转运使，尝奏不当复，已而提刑尹机迫郡县行之，田不能给。焘至是又申言之，请度田立额，且约帅臣张栻列奏，诏从之。境多茶园，异时禁切商贾，率至交兵，焘曰：“官捕茶贼，岂禁茶商？”听其自如，讫无警。

累表乞闲，提举兴国宫。秋，明堂大礼成，以其首议，复除敷文阁待制。顷之，厚熟继亡，上欲以吏事纾焘忧，起知

遂宁府。

七年,《长编》全书成,上之,诏藏秘阁。焘自谓此书宁失之繁,无失之略,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,卷第总目五卷。依熙宁修《三经》例,损益修换四千四百余事,上谓其书无愧司马迁。焘尝举汉石渠、白虎故事,请上称制临决,又请冠序,上许之,竟不克就。

又奏:“陛下即位二十余年,志在富强,而兵弱财匱,与‘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’异矣”一日,召对延和殿,讲臣方读《陆贽奏议》,焘因言:“贽虽相德宗,其实不遇。今遇陛下,可谓千载一时。”遂举贽所言切于今可举而行者数十事,劝上力行之。上有功业不足之叹,焘曰:“功业见乎变通,人事既修,天应乃至。”进敷文阁直学士,提举佑神观兼侍讲、同修国史。荐尤袤、刘清之十人为史官。

十年七月,久旱,进祖宗避殿减膳求言故事,上亟施行。丁丑雨。一日宣对,焘言:“外议陛下多服药,罕御殿,宫嫔无时进见,浮费颇多。”上曰:“卿可谓忠爱,顾朕老矣,安得此声。近惟葬李婕妤用三万缗,他无费也。”遂因转对,乞用祖宗故事召宰执赴经筵。

太史言十一月朔,日当食心八分。焘复条上食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,因奏之曰:“心,天王位,其分为宋。十一月于卦为复,方潜阳时,阴气乘之,故比他食为重,非小人害政,即敌人窥中国。”明日对延和殿,又及晋何曾讥武帝无经国远图。

十一年春,乞致仕,优诏不允。上数问其疾增损,给事中宇文价传上旨,焘曰:“臣子恋阙,非老病,忍乞骸骨。”因

叩价时事，勉以忠荃。又闻四川乞减酒课额，犹手扎赞庙堂行之。

病革，除敷文阁学士，致仕。命下，喜曰：“事了矣。”口占遗表云：“臣年七十，死不为夭，所恨报国缺然。愿陛下经远以艺祖为师，用人以昭陵为则。”辞气舒徐，乃卒，年七十。

上闻嗟悼，赠光禄大夫。他日谓宇文价曰：“朕尝许煮大书‘续资治通鉴长编’七字，且用神宗赐司马光故事，为序冠篇，不谓其止此。”

焘性刚大，特立独行。早著书，桧伞鹄路，桧死始闻于朝。暨在从列，每正色以订国论。张栻尝曰：“李仁甫如霜松雪柏。”无嗜好，无姬侍，不殖产。平生生死文字间，《长编》一书用力四十年，叶适以为《春秋》以后才有此书。

有《易学》五卷，《春秋学》十卷，《五经传授》、《尚书百篇图》、《大传杂说》、《七十二子名籍》各一卷，《文集》五十卷，《奏议》三十卷，《四朝史稿》五十卷，《通论》十卷，《南北攻守录》三十卷，《七十二候图》、《陶潜新传》并《诗谱》各三卷，《历代宰相年表》、《唐宰相谱》、《江左方镇年表》、《晋司马氏本支》、《齐梁本支》、《王谢世表》、《五代将帅年表》合为四十一卷。

谥文简，累赠太师、温国公。

袁 枢 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三八九

【说明】袁枢（1131—1205），字机仲，建宁府建安（今福建建瓯县）人，南宋著名史学家。自幼喜欢诵读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但苦其卷帙浩繁，“乃自出新意”，便把《资治通鉴》“区别门目，以类排纂。每事各详起迄，自为标题，每篇各编年月，自为首尾”，撰成我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——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。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四十二卷，上起“三家分晋”，下迄“周世宗征淮南”，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，将《通鉴》之文，总括为三百三十九篇，另附录六十九事，附在有关各篇之后，总计大小事件三百有余。纪事本末体，以事件为中心，将重要的史事分别列目，独立成篇，各篇又按年月顺序编写，这样就弥补了纪传、编年二体的不足。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编撰时注意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，有补治道，寓道于史，所以颇为孝宗所赏识，称此书“治道尽在是矣”。著名学者朱熹、杨万里、吕祖谦等也盛赞此书，如杨万里说：“有国者不可无此书。”还说：“学者不可以无此书。”后世学者对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亦颇有好评，章学诚称它“文省于纪传，事豁于编年，决断去取，体圆用神”。但这种

体裁孤立地记载某一史事，各题之间缺乏内在联系，只有与纪传、编体互为参酌，才能相得益彰。

袁枢，字机仲，建宁府建安人。年轻时奋力学习，曾经以《修身为弓赋》应试国子监，周必大、刘珙都认为他日后必成大器。应礼部试，考中词赋第一，调往温州为判官，兴化军教授。

乾道七年，任礼部试官，接受太学录的任命，轮对时上三疏，一论以开言路培养忠孝的风气，二论法规的恢复应当谋求万全，三论士大夫很多人虚幻荒唐，无休止地追逐名位利禄。张说从阁门知事以节钺签枢密院事。袁枢正与国学的同僚一起议论此事，孝宗虽然接纳了他们的议论但是脸上不高兴。袁枢退朝去拜谒宰相，把奏疏拿给他看，并且说：“公不耻与樊哙等人为伍吗？”虞允文非常地惭愧。袁枢就请补外官，出京师为严州教授。

袁枢平常喜欢诵读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但苦于此书浩繁博大，于是区别事件贯通首尾，撰成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这本书，奏于朝廷，孝宗读了这本书赞叹不已，把这本书赐给东宫以及分赐给长江的众帅，而且让他们熟读这本书，说：“治国之道都在这本书里。”

有一天，孝宗问袁枢现在任什么官，龚茂良以实际情况回答孝宗，孝宗说：“可以授与寺监主簿的官职。”于是以大宗正簿受召上殿对策，就因史书为题说：“臣私下听说陛下曾经阅读《通鉴》，并且屡次加有训戒之言辞，看到诸葛亮论述两汉兴衰的原因，有‘小人不能不黜去’的告诫，伟大啊帝

王的言论，作为法规留传万世。”于是依次陈述往事，从汉武帝而下到唐文宗偏听奸佞之言，导致天下祸乱。并且说：“本来就有奸诈虚伪的人而貌似真诚老实，谄媚奸邪的人而貌似忠诚鲠直，如果陛下每天和这样的人在帷幄中谋划国事，决定天下士人的去取，臣恐怕这一定会成为朝廷的忧患。”孝宗环视说：“朕不至于和这些人在帷幄中谋划国事。”袁枢感谢说：“陛下的话说到此，这是天下的福气啊。”

袁枢迁任太府丞。当时士大夫中很有些结党的人。袁枢上奏说：“人主有偏袒一伙人的心意，那么臣下就有勾结朋党的祸患。近年有人说陛下宠幸任用武士，有厌恶鄙薄儒生的意思，猜疑大臣，亲信左右，内庭做该朝廷做的事，近侍参与军国大计。现在陛下虽然统领权纲，专意视听，然而有人会堵塞陛下的聪明，暗中改变赏罚的对象。希望陛下能否只听于国人，毁誉不私取于左右近臣。”孝宗正一心一意要北伐，把这意向颁示给天下。袁枢上奏说：“古代的谋取他国的人，一定以弱示人，假如陛下立志报复金国，臣希望养威蓄锐，不要展示出真实情况。”又陈述用宰执、台谏的办法。

当时谏官想控制宗室应举锁试的名额，限制添差狱祠官的数额，减少臣僚举荐的人数，规定文武官员荫子为官的数额，严格特奏的等次，延长郊祀的年限，推迟科举的时间，袁枢说：“这都是近来追随狭窄的论调，人君只效法于天，这些都不能做。”于是上书直言劝孝宗推行广大之策以保存国体。

袁枢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分管修撰国史传。章惇家因为和袁枢是同乡，就婉转地请袁枢以文辞粉饰章惇传，袁枢说：“子厚做宰相，背负国家欺蒙人君。我做史官，书法不隐，宁

可辜负同乡人，也不能辜负天下后代的公正议论。”当时宰相赵雄总管撰史之事，见此景感叹地说：“无愧于古代的良史。”

袁枢代理工部郎官，接着改兼吏部郎官。两淮有旱灾，朝廷命袁枢视察真、扬、庐、和四郡。回来之后陈述两淮的形势，说：“两淮坚固长江就能守住，现在只知道防备长江，不懂得保卫淮河，在江南布置重兵，在淮上有放弃的空城，这样不能警戒发生不测事件。瓜洲新城，只是为了撤退有保证，金使路过此地指着议论，淮人听了以后感叹不已，谁为陛下设计的这个计策？”

袁枢任军器少监，升提举江东常平茶盐，又改为处州知州，前往朝廷奏事。袁枢出使两淮归来上朝对策时，曾说：“朋党相依附，大臣的权势就强大，言路被堵塞，人主的势力就孤弱。”当时宰相听了不高兴。至此又说：“威势权力在臣下手中，人主的势力就微弱，所以大臣驱逐台谏，从此蒙蔽人主的视听；威势权力在主上手中，人主的威力就强大，所以大臣勾结台谏，以此阻遏天下的公正议论。现在朋党的旧习还在，台谏官没有端正法度，言路前将长满丛生的灌木。”

除授吏部员外郎，改任大理寺少卿。通州平民高氏因产业的事下大理寺受审，殿中侍御史冷世光接收重金贿赂曲意庇护高氏，袁枢直言此事闻于朝廷，人们为他畏惧。孝宗发怒，立即罢免冷世光，以朝臣的身分弹劾御史，是从袁枢开始的。孝宗手诏令袁枢代理工部侍郎，还兼国子祭酒。因为议论大理寺的狱案请求任外官，有给予袁枢州郡官职的命令，不久贬两级官，前旨就搁置起来了。光宗接受帝位，按级恢复原官职，袁枢提举太平兴国宫，常德府知府。

宁宗即位，升为右文殿修撰、江陵府知府，江陵濒临长江，每年堤毁形成水灾，百姓无所依托。楚国故城楚观还保存着，以楚观为住室，把百姓搬到这里居住，以此防备意外的水患。植树几万株，用它做为挡水的屏障，百姓感激他。不久被台谏官弹劾罢官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从此三次任祠官，极力请求朝廷下诏令，自比于疏傅、陶潜。开禧元年，去世，终年七十五岁。

自此闲居十年，著《易传解义》及《辩异》、《童子问》等书藏在家中。

(曾贻芬译)

【原文】

袁枢字机仲，建之建安人。幼力学，尝以《修身为弓赋》试国子监，周必大、刘珙皆期以远器。试礼部，词赋第一人，调温州判官，教授兴化军。

乾道七年，为礼部试官，就除太学录，轮对三疏，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，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，三论士大夫多虚诞、饶荣利。张说自阁门以节钺签枢密，枢方与学省同僚共论之，上虽容纳而色不怡。枢退诣宰相，示以奏疏，且曰：“公不耻与侏等伍邪？”虞允文愧甚。枢即求外补，出为严州教授。

枢常喜诵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，苦其浩博，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，号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。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，奏于上，孝宗读而嘉叹，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，且令熟读，曰：“治道尽在是矣。”

他日，上问袁枢今何官，茂良以实对，上曰：“可与寺监簿。”于是以大宗正簿召登对，即因史书以言曰：“臣窃闻陛

下尝读《通鉴》，屡有训词，见诸葛亮论两汉所以兴衰，有‘小人不可不去’之戒，大哉王言，垂法万世。”遂历陈往事，自汉武而下至唐文宗偏听奸佞，致于祸乱。且曰：“固有诈伪而似诚实，俭佞而似忠鲠者，苟陛下日与图事于帷幄中，进退天下士，臣恐必为朝廷累。”上顾谓曰：“朕不至与此曹图事帷幄中。”枢谢曰：“陛下之言及此，天下之福也。”

迁太府丞。时士大夫颇有为党与者。枢奏曰：“人主有偏党之心，则臣下有朋党之患。比年或谓陛下宠任武士，有厌薄儒生之心，猜疑大臣，亲信左右，内庭行庙堂之事，近侍参军国之谋。今虽总权纲，专听览，而或壅蔽聪明，潜移威福。愿可否惟听于国人，毁誉不私于左右。”上方锐意北伐，示天下以所向。枢奏：“古之谋人国者，必示之以弱，苟陛下志复金仇，臣愿蓄威养锐，勿示其形。”复陈用宰执、台谏之术。

时议者欲制宗室应举锁试之额，限添差狱祠，减臣僚荐举，定文武任子，严特奏之等，展郊禋之岁，缓科举之期，枢谓：“此皆近来从窄之论，人君惟天是则，不可行也。”遂抗疏劝上推广大以存国体。

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分修国史传。章惇家以其同里，宛转请文饰其传，枢曰：“子厚为相，负国欺君。吾为史官，书法不隐，宁负乡人，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。”时相赵雄总史事，见之叹曰：“无愧古良史。”

权工部郎官，累迁兼吏部郎官。两淮旱，命廉视真、扬、庐、和四郡。归陈两淮形势，谓：“两淮坚固则长江可守，今徒知备江，不知保淮，置重兵于江南，委空城于淮上，非所

以戒不虞。瓜洲新城，专为退保，金使过而指议，淮人闻而叹嗟。谁为陛下建此策也？”

迁军器少监，除提举江东常平茶监，改知处州，赴阙奏事。枢之使淮入对也，尝言：“朋党相附则大臣之权重，言路壅塞则人主之势孤。”时宰不悦。至是又言：“威权在下则主势弱，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；威权在上则主势强，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。今朋党之旧尚在，台谏之官未正纪纲，言路将复荆榛矣。”

除吏部员外郎，迁大理少卿。通州民高氏以产业事下大理，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纳厚赂曲庇之，枢直其事以闻，人为危之。上怒，立罢世光，以朝臣劾御史，寔自枢始。手诏权工部侍郎，仍兼国子祭酒。因论大理狱案请外，有予郡之命，既而贬两秩，寢前旨。光宗受禅，叙复元官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、知常德府。

宁宗登位，擢右文殿修撰、知江陵府。江陵濒大江，岁坏为巨浸，民无所托。楚故城楚观在焉，为室庐，徙民居之，以备不虞。种木数万，以为捍蔽，民德之。寻为台臣劾罢，提举太平兴国宫。自是三奉祠，力上请制，比之疏傅、陶令。开禧元年，卒，年七十五。

自是闲居十载，作《易传解义》及《辨异》、《童子问》等书藏于家。

郑樵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四三六

【说明】郑樵（1103—1161），字渔仲，兴化军莆田（今福建莆田县）人，宋朝著名史学家。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夹漈山著书、讲学，著作多达五十余种，其中著名的当推《通志》。《通志》二百卷，包括本纪十八卷、世家三卷、列传一百零八卷、载记八卷、四夷传七卷、谱四卷、二十略五十二卷。所叙时间断限，各类稍有参差，本纪从三皇至隋，列传自周到隋，而二十略则由远古迄唐。《通志》的纪传部分，大抵是汇集前史，袭用旧文，稍加增删，新意不多，《二十略》是《通志》的精华，它们是氏族、六书、七音、天文、地理、都邑、礼、谥、器服、乐、职官、选举、刑法、食货、艺文、校讎、图谱、金石、灾祥和昆虫草木略。郑樵把历代典章制度、学术文化分门别类地加以记载，并逐一追溯其源流演变，有的还有不少新见解。都邑、氏族、六书、七音、校讎、金石、图谱、昆虫草木八略是郑樵开辟的新的专史领域，反映郑樵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面认识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敏锐看法。郑樵主张会通，他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，认为只有通史才能展现历史的延续性，才能避免“晋史党晋，而

不有魏”，“齐史党齐，而不有宋”的弊病。为贯彻会通的思想，郑樵修《通志》，不仅依靠古代文献典籍，而且重视亲身实践，注意吸收劳动者的经验，搜集金石、图谱等实际资料。这些主张和做法，对于今天研究历史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郑樵的《通志》还富有批判精神，他反对五行灾异说，称之为“妖学”，认为这是用来歪曲自然现象的；他反对史家随意褒贬，称之为“妄学”，认为这是专用以歪曲历史事实的。郑樵追求客观地反映史实，在以主观好恶歪曲历史之风盛行的时候，更显得可贵。

郑樵，字渔仲，兴化军莆田人。喜好著书立说，不作应试的文章，自以为他的才华不在刘向、扬雄之下。隐居夹漈山，谢绝人事往来。在夹漈山住了很长时间，就去游历名山大川，搜访奇闻古迹，遇到藏书家，一定留下来借读藏书，直到将所要读的书都读完才离去。赵鼎、张浚以下的人都器重他。开始研究经书要旨，后探讨礼乐、文字、天文、地理、虫鱼、草木、地方志诸种学问，都有论说，绍兴十九年将这些论说奏上朝廷，诏令藏于秘府。郑樵回归故里进一步锤炼他的学说，从师于他的人有二百多人。

因侍讲王纶、贺允中举荐，郑樵得以应召对策朝廷，就谈论自班固以来历代著史的过失。高宗说：“久闻爱卿大名，铺叙古代学问，自成一家，为什么相见的这样晚呢？”授郑樵右迪功郎、礼兵部架阁。因御史叶义问弹劾郑樵，郑樵改监潭州南狱庙，朝廷给他纸笔让他回家抄写他所著的《通志》。完成《通志》，入朝廷为枢密院编修官，不久兼摄检详诸房文

学。请求准他修撰金国正隆官制，与中国制度加以比较，因此请求进秘书省翻阅书籍。不久，又因谏官的议论此事中止了。金人进犯边境，郑樵说岁星分在宋境内，金太宗将自行死亡，后来果真如此。高宗临幸建康府，命令以《通志》进呈，正巧郑樵病逝，享年五十九岁，学者都称他夹漈先生。

郑樵喜欢作考证类例的学问，著成的书虽然多，但大抵内容广博而不得要领。郑樵平生甘于枯燥淡薄，乐于施舍，唯独热衷于做官，有见识的人因此轻视之。（曾贻芬 译）

【原文】

郑樵字渔仲，兴化军莆田人。好著书，不为文章，自负不下刘向、杨雄。居夹漈山，谢绝人事。久之，乃游名山大川，搜奇访古，遇藏书家，必借留读尽乃去。赵鼎、张浚而下皆器之。初为经旨，礼乐、文字、天文、地理、虫鱼、草木、方书之学，皆有论辨，绍兴十九年上之，诏藏秘府。樵归益厉所学，从者二百余人。

以侍讲王纶、贺允中荐，得召封，因言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。帝曰：“闻卿名久矣，敷陈古学，自成一家，何相见之晚耶？”授右迪功郎、礼兵部架阁。以御史叶义问劾之，改监潭州南狱庙，给札归抄所著《通志》。书成，入为枢密院编修官，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。请修金正隆官制，比附中国秩序，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。未几，又坐言者寝其事。金人之犯边也，樵言岁星分在宋，金主将自毙，后果然。高宗幸建康，命以《通志》进，会病卒，年五十九，学者称夹漈先生。

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，成书虽多，大抵博学而寡要。平生甘枯淡，乐施与，独切切于仕进，识者以是少之。

徐梦莘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四三八

【说明】徐梦莘（1126—1207），字商老，临江（今江西清江县）人。历任湘阴知县、宾州知州。“因伤时感事，忠愤所激”，专收徽宗、钦宗、高宗三朝与金朝关系的有关记载，编成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二百五十卷。此书编辑了上起徽宗政和七年七月宋与金海上通好之日，下迄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完颜亮侵淮败亡之时，前后三朝四十五年间宋金战和的史事。它取材十分广泛，主要有各家有关靖康事件的专录、政府公文和臣僚奏疏、有关重要人物的传记、行状、碑志等等，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除此之外，徐梦莘也注意引用专记辽、金情况的专书，如《辽亡录》、《金虏图经》等。总计引书一百三十八种，是一部丰富的史料汇编，提供了研究宋、辽、金之间各方面关系以及有关金人制度、风俗的资料，对研究宋、辽、金历史都具有重要价值。

徐梦莘，字商老，临江人。小时候就很聪慧，特别嗜好经史，下到野史小说，都过目成诵。绍兴二十四年举为进士。历官为南安军教授。后改任湘阴县知县。恰逢湖南帅检括土

田，命令增加耕田赋税，别的邑县对帅臣的命令很恭谨。只有徐梦莘说他的县没有新的耕田，租税无从出起。帅臣怨恨他对百姓循私，想从帐簿中搜寻到徐梦莘的过失，终究也没有得到，因此反倒器重他。

不久，主管广西转运司文件。当时朝廷议论改变二广的盐法，派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直在境内和东西漕臣集议此事。徐梦莘随从前往，说：“广西有山阻隔，只应继续沿用官般法，才不致伤害到百姓；广东诸郡靠江，或许可以容纳客贩，不宜仓猝地在二广一律施行。”他的议论和胡廷直的主张不合。胡廷直竟然顺从徐梦莘关于客贩的说法，以客贩为主要内容变法而得任转运使。徐梦莘既已担任宾州知州，还以先前的议论抵制新盐法，罢官而去。不到三年，二广的商贾破产，百姓苦于无盐，又按官般法施行。

徐梦莘安于加官进爵，每每想到自己出生在靖康之乱的时候，而四岁时江西阻难争乱，母亲用襁褓背着他逃走，才得以免祸。想深入了解靖康事件的始末，就网罗佚闻旧事，会萃异同，编成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二百五十卷，记载从政和七年海上之盟始，到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死止，上下四十五年，凡是敕、为制、诰、诏、国书、书疏、奏议、记序、碑志。都记载无遗漏。皇帝听说此书编成，称赞他，升任直秘阁。

徐梦莘平生著作颇丰，有《集补》，有《会录》，有《读书记志》，有《集医录》，有《集仙录》，这些书的书名前都冠有“儒荣”二字。徐梦莘好学博文，孜孜不倦，死而后已。开禧元年秋季八月，去世，享年八十二。徐梦莘的弟弟徐得之，侄子徐天麟。

徐得之，字思叔，淳熙十年举为进士。部使者以廉吏推荐他，以通直郎退休。徐得之安居贫贱乐守名分，不贪婪不急进取。著有《左氏国纪》、《史记年纪》，作有《具敝篋笔略》、《鼓吹词》、《郴江志》。

徐天麟，字仲祥，开禧元年中进士。调任抚州教授，历任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，临安府教授、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、主管礼兵部架阁、宗学谕、武学博士。轮他上殿面奏时政时，说人主应持以敬心。后奉祠仙都观，通判惠、潭二州，代理英德府，代发遣广西转运判官。他所到之处兴举学政，彰明教化，有惠民的政绩。

徐天麟著有《西汉会要》七十卷、《东汉会要》四十卷、《汉兵本末》一卷、《西汉地理疏》六卷、《山经》三十卷。谢任官职后，在萧滩上筑亭，画严子陵像而事奉他。

(曾贻芬 译)

【原文】

徐梦莘字商老，临江人。幼慧，耽嗜经史，下至稗官小说，寓目成诵。绍兴二十四年举进士。历官为南安军教授。改知湘阴县。会湖南帅括田，号增耕税，他邑奉令惟谨。梦莘独谓邑无新田，租税无从出。帅恚其私于民，欲从簿书间摭摭其过，终莫能得，由是反器重之。

寻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。时朝廷议易二广盐法，遣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直与东西漕臣集议于境。梦莘从行，谓：“广西阻山，止当仍官般法，则害不及民；广东诸郡并江，或可容客贩，未宜遽以二广概行。”议与廷直不合。廷直竟遂其说，以客贩变法得为转运使。梦莘既知宾州，犹以前议为梗法，罢

去。不三年，二广商贾毁业，民苦无盐，复从官般法矣。

梦莘恬于荣进，每念生于靖康之乱，四岁而江西阻讧，母襁负亡去，得免。思究见颠末，乃网罗旧闻，会粹同异，为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二百五十卷，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，讫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之毙，上下四十五年，凡曰敕、曰制、诰、诏、国书、书疏、奏议、记序、碑志，登载靡遗。帝闻而嘉之，擢直秘阁。

梦莘平生多所著，有《集补》，有《会录》，有《读书记志》，有《集医录》，有《集仙录》，皆以“儒荣”冠之。其嗜学博文，盖孜孜焉死而后已者。开禧元年秋八月，卒，年八十二。梦莘弟得之，从子天麟。

得之字思叔，淳熙十年举进士。部使者以廉吏荐，以通直郎致仕。安贫乐分，不贪不躁。著《左氏国纪》、《史记年纪》，作《具敝篋笔略》、《鼓吹词》、《郴江志》。

天麟字仲祥，开禧元年进士。调抚州教授，历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、临安府教授、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、主管礼兵部架阁、宗学谕、武学博士。轮对，言人主当持心以敬。奉祠仙都观，通判惠、潭二州，权英德府，权发遣广西转运判官。所至兴学明教，有惠政。

著《西汉会要》七十卷、《东汉会要》四十卷、《汉兵本末》一卷、《西汉地理疏》六卷、《山经》三十卷。既谢官，作亭萧滩之上，画严子陵像而事之。

李心传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四三八

【说明】李心传（1164—1234），字微之，井研（今四川井研县）人。参加乡试落第后，不再应试，一心著述，后经推荐为史馆校勘，后官至工部侍郎。李心传，一生史著颇多，保存至今者，尚有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二百卷、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四十卷、《旧闻证误》四卷、《道命录》十卷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记载高宗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间三十六年的史事，是继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而作。《要录》是编年体史书，以年、月、日为经，以事迹为纬，在同一时间内，诸事罗列并陈，一目了然。《要录》多用高宗朝的国史、日历，兼取私家著作，又加以认真考订，使此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取南渡以来事迹，分门编类记载南宋前期的典章制度，也兼涉部分北宋的典章制度，可与《要录》互为经纬，都是研究宋史的重要典籍。《旧闻证误》是将宋朝一代史事随得、随录、随考，辑录成卷的。此书内容广泛，考订精审。《道命录》是李心传用编年体体裁，记录程颐、朱熹等道学家的事迹始末，是研究宋代道学状况的宝贵资料。李心传多用编年体撰写当代史，涉及当代史的方方面

面，如在《要录》中有每年的各路、州、户口、人口数的记载，《杂记》记载乾道年间内外大军的总人数，并推算出养兵所需开支等等。其选择运用的史料，都经过缜密的考订，有相当的可靠性，表现出他严谨的治史态度。

李心传，字微之，宗正寺簿李舜臣的儿子。庆元元年参加乡试，落第以后，绝意不再应举，闭门著书。后来因为崔与之、许奕、魏了翁等共前后二十三人的荐举，由制置司催促派遣到朝廷。作史馆校勘，赐进士出身，专门修撰《中兴四朝帝纪》，才完成其中三纪，因有人议论停罢，加派为通判成都府。不久改任著作佐郎，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。朝廷下诏让他不要做参议官，允许征召官吏开设史局，继修《十三朝会要》。端平三月，编撰成书。朝廷召李心传前往朝廷，任工部侍郎，他说：

臣听说：“大战之后，一定有荒年。”大概战争杀戮太多，赋敛太重，使这些百姓的怨恨愤怒的气息，向上干犯阴阳的协和，以至于如此厉害。陛下所应当做的就是和各位大臣荡除乱政。与百姓重新开始，以此做为消除恶运、迎接吉祥的计谋。然而法制的弊端尚未重新改过，百姓劳苦而不给予赈济的恩德，既然不能改变那旧况，而且几乎有所加重。所以帝德还未达到能无过失的程度，朝纲或许苦于繁多紊乱，廉洁平实的官吏，但在现有官吏中罕见，而牟利无耻敢于作恶的人，倚仗敌人举兵由四方而起，以此寻求他的私欲得逞。如此情况而希望五福降临齐备，百谷因此成熟，这是缘木而求鱼。

臣考察导致大旱的根由，一是和余增加百姓怨恨，一是流离失所无归宿百姓怨恨，一是考查税赋不完全属实百姓怨恨，一是不因罪也籍没财物百姓怨恨。凡此四项都起于大战之后，而又没用力消灭这些弊端，所以愈积累愈严重了。成汤是圣明的君主，而在桑林祈神降福时，还以六件事自责。陛下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安定，但七年以来，祸福饥馑，史书不绝记载，那是为什么呢？早上颁布的法令晚上就改了，没有通常的规范，这样政事就不节制；行者自带行装居者送与财物，民力没有停歇的日子，这样就使百姓憎恶；陪都园囿庙祀，修建甚多，这样就会大兴土木；潜邸的女道士，声威气焰越来越猛烈，这样通过宫廷女宠干政请托的事就盛；贡献珍玩，很少听说推辞拒绝的，这样用财物贿赂的事就会流行；鲠直恳切的言论，多归于憎恶而丢弃，这样进谗言的人猖獗。这六件事中或许有一件，就足以导致旱灾。希望尽快颁降罪己的诏书，修饬这六件事，以此挽回天意。群臣当中有进献聚敛剽窃的议论以求晋升的人，一定予以从重贬黜，使他们不能从此向上诬毁圣德，则旱情虽严重，还可以止息。然而内部百姓怨恨，外部敌人逼迫，形势紧迫，什么灾难都能降临！陛下虽然拥有如云繁的谋臣，如雨众的猛将，也不知道什么是救世的良策。

皇帝听从他的意见。不久，又因议论而罢官，奉祠而居住在潮州。淳佑元年罢奉祠职，又给予他官职，又罢官。淳佑三年，退休。去世，享年七十八岁。

李心传有史家的才华，通晓史实典故，然而他作的《吴

猎》、《项安世传》，其中的褒贬有愧于史家秉笔直书的宗旨。大概他记事常常是看重川蜀，而轻视东南的士人。李心传所著成的书，有《高宗系年录》二百卷。《学易编》五卷、《诵诗训》五卷、《春秋考》十三卷、《礼辨》二十三卷、《读史考》十二卷、《旧闻证误》十五卷、《朝野杂记》四十卷、《道命录》五卷、《西陲泰定录》九十卷、《辨南迁录》一卷、诗文一百卷。

(曾贻芬 译)

【原文】

李心传字微之，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。庆元元年荐于乡，既下第，绝意不复应举，闭户著书。晚因崔与之、许奕、魏了翁等合前后二十三人之荐，自制置司敦遣至阙下。为史馆校勘，赐进士出身，专修《中兴四朝帝纪》。甫成其三，因言者罢，添差通判成都府。寻迁著作佐郎，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。诏无入议幕，许辟官置局，踵修《十三朝会要》。端平三年成书。召赴阙，为工部侍郎，言：

臣闻“大兵之后，必有凶年”。盖其杀戮之多，赋敛之重，使斯民怨怒之气，上干阴阳之和，至于此极也。陛下所宜与诸大臣扫除乱政，与民更始，以为消恶运、迎善祥之计。而法弊未尝更张，民劳不加振德，既无能改于其旧，而殆有甚焉。故帝德未至于罔愆，朝纲或苦于多紊，廉平之吏，所在鲜见，而贪利无耻，敢于为恶之人，挟敌兴兵，四面而起，以求逞其所欲。如此而望五福来备，百谷用成，是缘木而求鱼也。

臣考致旱之由：曰和籴增多而民怨，曰流散无所归而民怨，曰检税不尽实而民怨，曰籍贯不以罪而民怨。凡

此皆起于大兵之后，而势未有以消之，故愈积而愈极也。成汤圣主也，而桑林之祷，犹以六事自责。陛下愿治，七年于此，灾祥饥馑，史不绝书，其故何哉？朝令夕改，靡有常规，则政不节矣；行賚送，略无罢日，则使民疾矣；陪都园庙，工作甚殷，则土木营矣；潜邸女冠，声焰兹炽，则女谒盛矣；珍玩之献，罕闻却绝，则包苴行矣；鯁切之言，类多厌弃，则谗夫昌矣。此六事者一或有焉，犹足以致旱。愿亟降罪己之诏，修六事以回天心。群臣之中有献聚敛剽窃之论以求进者，必重黜之，俾不得以上诬圣德，则旱虽烈，犹可弭也。然民怨于内，敌逼于外，事穷势迫，何所不至！陛下虽谋臣如云，猛将如雨，亦不知所以为策矣。

帝从之。未几，复以言去，奉祠居潮州。淳祐元年罢祠，复予，又罢。三年，致仕。卒，年七十有八。

心传有史才，通故实，然其作《吴猎》《项安世传》褒贬有愧秉笔之旨。盖其志常重川蜀，而薄东南之士云。所著成书，有《高宗系年录》二百卷、《学易编》五卷、《诵诗训》五卷、《春秋考》十三卷、《礼辨》二十三卷、《读史考》十二卷、《旧闻证误》十五卷、《朝野杂记》四十卷、《道命录》五卷、《西陲泰定录》九十卷、《辨南迁录》一卷、诗文一百卷。

刘恕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四四四

【说明】刘恕（1032—1078），字道原，筠州（今江西高安县）人。司马光受诏修《资治通鉴》，请他加入史局，成为司马光修《资治通鉴》的主要助手之一，司马光对他颇为欣赏。在修《资治通鉴》过程中，刘恕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史，而且对五代史部分也有所涉及，只是未完成而死，余下的是范祖禹完成的。刘恕除参与《资治通鉴》的部分工作外，还撰有《通鉴外纪》，包括伏羲以来一卷、夏纪商纪共一卷、周纪八卷，还有目录五卷，仿《通鉴目录》体例，年经事纬，上列朔闰天象，下列外纪的卷数。它上溯远古，往往是传奇怪诞之说，加之刘恕以全为务，故遭人讥评。但是此书本是草稿长编，须待司马光笔削定稿。即便如此，仍可窥见杰出史家的严谨作风。

刘恕，字道原，筠州人。父亲刘涣字凝之，作颖上令，因刚直不能侍奉应合上司，弃官而去。家住庐山南面，当时五十岁。欧阳修和刘涣是同年的进士，认为他气节高尚，作《庐山高》诗予以赞美。刘涣在庐山居住三十余年，家居四周

萧条冷落，以稠粥为食，然而心意游离于尘垢之外，对尘世之事超然处之毫无动心之意，以高寿而逝。

刘恕小时候聪慧过人，看书过目即可成诵。八岁的时候，座上的客人中有人说孔子无兄弟，刘恕立即接言说：“以孔子哥哥的女儿做他的妻子。”满座都很惊异。十三岁那年，刘恕想参加皇帝在宫廷举行的诏试，从别人那里借来《汉书》、《唐书》，看了一个月就归还了。拜访丞相晏殊，以时事问晏殊，并且反复提出质问，晏殊不能答对。刘恕在钜鹿的时候，晏殊把他召到府中，以厚礼待他，让他讲述《春秋》，晏殊亲自率领官属前往听讲。未及二十岁，举为进士，当时朝廷有诏令，能讲解经书义理的人另外奏上名字，应诏的人才几十人，刘恕用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应对，先列二经的注疏，其次援引先儒对经理解的异同，最后以自己的看法下结论，一共二十问，都是这样应对，主考官对他的才能表示惊异，选他为第一名。其他的文章也列入高等，然而廷试没达到标准，再下参加国子试讲经，又举为第一，于是赐及第。调任钜鹿主簿、和川县令，揭露举发强悍隐恶的人或事，一时间号称能吏的人自以为不如刘恕。刘恕为人着重思想，急于许诺。郡守获罪被人揭发，手下官吏都因株连而入狱，只有刘恕抚恤郡守的妻子儿女，对待他们象自己的亲骨肉，还当面数落转运使引法苛刻使人入罪、大肆底毁他人。

刘恕特别热爱史学，从太史公所著《史记》，下至周显德末年的纪事，除纪传史书之外，直至私记杂说，无所不读，上下几千年间，大小事件，了如指掌。司马光编撰《资治通鉴》，英宗命令司马光自己挑选馆阁英才一起修撰此书。司马

光回答说：“馆阁中的文学之士确实多，至于专门精通史学，臣能够了解的人，只有刘恕。”马上召刘恕为史局僚属，遇到纷乱错综难以条理的史学，就把这些推给刘恕。刘恕对于魏、晋以后的史事，考证其错谬，最为精到详实。

王安石和刘恕有旧交情，想推荐他置三司条例。刘恕以不熟习钱财谷物为推辞的理由，而且借此机会说天子现在把国家大政交给王安石，应当恢弘张扬尧舜之道以此辅佐圣明君主，不该把牟利放在首位。又逐条陈述所变更的法令不附合众人的心意，劝使王安石恢复旧法，直到当面指责他的过失。王安石发怒，脸变得铁青，刘恕一点不屈服；有时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大声讲王安石的过失无所回避，于是刘恕和王安石断绝往来。正当王安石掌权，在其呼吸之间或成福或成祸，有高尚议论的人，开始不同意王安石然而最终还得依附他，当面称赞他而背后诋毁他，嘴上顺从而心里不以为然，都是如此。刘恕更加猛烈批评无所顾及，直接指责王安石所做之事，对得失没什么隐蔽。

司马光出京师知永兴军，刘恕也以亲老为由，请求监南康军酒，就近赡养老人，朝廷允许他在任上修书。司马光判西京御史台，刘恕请求拜诣司马光，在司马光那里居留了几个月才回来。在路上得了中风抽搐的病，右手右脚残废了，然而刻苦学习依然如故，稍觉病情好些，就修书，病得厉害才停止。官做到秘书丞，去世，时年四十七岁。

刘恕做学问，从历数、地里、官职、氏族到前朝的公府文书档案，全部加以精审的考证。搜求书籍不远数百里，亲自前往阅读并且抄写，几乎忘了睡觉吃饭。偕同司马光游万

安山，道旁有一块碑，读后得知是五代列将，人们所不知名的人，刘恕能说出此人行事的始末，回去查验旧史，确实不错。宋次道为亳州知州，家里有很多藏书，刘恕绕道来借阅。宋次道天天准备肴饌尽主人的礼节，刘恕说：“这不是我到这里来的目的，太耽误我的事了，请全部取消。”一个人关上门，昼夜不停地口念手抄，住了十日，读完宋次道的藏书而离去，由于这样苦读，眼睛上生了障膜。刘恕著《五代十国纪年》以此拟类《十六国春秋》，又采摭上古以来到周威烈王时的史事，而又是《史记》、《左氏传》所不记载的事，撰成《通鉴外纪》。

刘恕家素来贫穷，不能给亲人甘美的食物，也不从他人处妄取一毫。从洛阳回南方，正值冬天，没有御寒的衣物。司马光把衣袜和旧褥垫送给他，推辞不掉，勉强接受了离别而去，走到颍地，就将司马光的馈赠都包好奉还。刘恕尤其不信佛教的信条，认为一定没有这样的事，说：“人生就象住旅舍，一件东西不能少，离去时全部丢弃，那能给自己随身携带呢！”刘恕喜欢攻击他人的过失或短处，每每自责平生有二十失、十八蔽，写文章以警告自己，也终于未能改正。

刘恕死后七年，《通鉴》完成，追记刘恕的功劳，以他的儿子刘義仲为官，做郊社斋郎。第二个儿子仲和，才能异常出众，作的诗高洁深奥，刻意磨炼自己想自成一家，作文章仰慕石介，有豪侠之气，也早逝。

（曾贻芬 译）

【原文】

刘恕字道原，筠州人。父涣字凝之，为颖上令，以刚直

不能事上官，弃去。家于庐山之阳，时年五十。欧阳修与涣，同年进士也，高其节，作《庐山高》诗以美之。涣居庐山三十余年，环堵萧然，饘粥以为食，而游心尘垢之外，超然无戚戚意，以寿终。

恕少颖悟，书过目即成诵。八岁时，坐客有言孔子无兄弟者，恕应声曰：“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”一坐惊异。年十三欲应制科，从人假《汉》、《唐书》，阅月皆归之。谒丞相晏殊，问以事，反覆诘难，殊不能对。恕在钜鹿时，召至府，重礼之，使讲《春秋》，殊亲帅官属往听。未冠，举进士，时有诏，能讲经义者别奏名，应诏者才数十人，恕以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对，先列注疏，次引先儒异说，末乃断以己意，凡二十问，所对皆然，主司异之，擢为第一。他文亦入高等，而廷试不中格，更下国子试讲经，复第一，遂赐第。调钜鹿主簿、和川令，发强撙节，一时能吏自以为不及。恕为人重意义，急然诺。郡守得罪被劾，属吏皆连坐下狱，恕独恤其妻子，如己骨肉，又面数转运使深文峻诋。

笃好史学，自太史公所记，下至周显德末，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，无所不览，上下数千载间，钜微之事，如指诸掌。司马光编次《资治通鉴》，英宗命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。光对曰：“馆阁文学之士诚多，至于专精史学，臣得而知者，唯刘恕耳。”即召为局僚，遇史事纷错难治者，辄以诿恕。恕于魏、晋以后事，考证差缪，最为精详。

王安石与之有旧，欲引置三司条例。恕以不习金谷为辞，因言天子方属公大政，宜恢张尧、舜之道以佐明主，不应以利为先。又条陈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，劝使复旧，至面刺其

过。安石怒，变色如铁，恕不少屈；或稠人广坐，抗言其失无所避，遂与之绝。方安石用事，呼吸成祸福，高论之士，始异而终附之，面誉而背毁之，口顺而心非之者，皆是也。恕奋厉不顾，直指其事，得失无所隐。

光出知永兴军，恕亦以亲老，求监南康军酒以就养，许即官修书。光判西京御史台，恕请诣光，留数月而归。道得风挛疾，右手足废，然苦学如故，少间，辄修书，病亟乃止。官至秘书丞，卒，年四十七。

恕为学，自历数、地理、官职、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牒，皆取以审证，求书不远数百里，身就之读且抄，殆忘寝食。偕司马光游万安山，道旁有碑，读之，乃五代列将，人所不知名者，恕能言其行事始终，归验旧史，信然。宋次道知亳州，家多书，恕枉道借览。次道日具饌为主人礼，恕曰：“此非吾所为来也，殊废吾事。”悉去之。独闭阁，昼夜口诵手抄，留旬日，尽其书而去，目为之翳。著《五代十国纪年》以拟《十六国春秋》，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，《史记》、《左氏传》所不载者，为《通鉴外纪》。

家素贫，无以给旨甘，一毫不妄取于人。自洛南归，时方冬，无寒具。司马光遗以衣袜及故茵褥，辞不获，强受而别，行及颍，悉封还之。尤不信浮屠说，以为必无是事，曰：“人如居逆旅，一物不可乏，去则尽弃之矣，岂得赍以自随哉。”好攻人之恶，每自讼平生有二十失、十八蔽，作文以自警，亦终不能改也。

死后七年，《通鉴》成，追录其劳，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

郎。次子和仲，有超轶材，作诗清奥，刻厉欲自成家，为文慕石介，有侠气，亦早死。

欧阳玄传

——《元史》卷一八二

【说明】欧阳玄（1272—1357），字原功，浏阳（今湖南浏阳）人，著名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。他参加了宋、辽、金三史的修撰，以及《皇朝经世大典》的编写。宋、辽、金三史署名为脱脱撰，然而具体撰修三史的则是欧阳玄、张起岩、揭傒斯等人，这其中出力最多的又是欧阳玄。欧阳玄不仅发凡举例，而且笔削定稿，其中论、赞、表、奏多出欧阳玄之手。三史因记载对象不同，内容形式也有差异。《辽》、《金》二史除纪、传以外，还设表，如《世表》、《交聘表》、《属国表》等都很有特色，二史书后还附有《国语解》等。三史当中，后人一致认为《金史》较好。三史分别修撰，使辽、金二朝在中国历史上得到了应有的地位，保存了丰富的史料，对全面了解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中国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对外关系全貌提供了基础。

欧阳玄字原功，他的祖先居住在庐陵，与文忠公欧阳修出于同一宗。到他的曾祖父欧阳新时才迁居到浏阳，所以他是浏阳人。欧阳玄幼年聪慧，他的母亲李氏亲自教他《孝

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小学》各书。八岁能背诵，才开始跟随乡学先生张贯之学习，一天能记下几千字，就知道如何写文章。十岁时，有一道士凝视欧阳玄，告诉张贯之说：“这个孩子神气凝远，目光逼人，以后会以文章为天下之冠，有担负朝廷重任的才能。”说完就离开了，急忙追出与他讲话，已不知他的去向。朝廷派遣使者巡查各县，欧阳玄以学生身份拜见使者，使者命其作梅花诗，立刻作成十首，晚上回来时增加到上百首。看见的人对此都很惊讶。十四岁时，进一步跟随宋朝遗老学习作词章。下笔成章，每次参加乡学考试总是位于高等。成年后，闭门读书几年，人们见不到他的面，经史百家，没有不研究的，对伊、洛学派的本末，尤其淹博贯通。

延祐元年，仁宗下诏设科举取士，欧阳玄以《尚书》参加贡试。第二年，赐予他进士出身，授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之职。调任太平路芜湖县尹。县中多疑难官司，长期不能判决，欧阳玄考察了这些情况，都公正地进行了判决或平反。豪门大族不遵守法律，虐待他们的汉族奴隶，欧阳玄判决这些奴隶恢复自由。赋税征调及时，百姓乐意去做自己的工作，政教风化非常盛行，蝗虫唯独不入此县境界。改任武冈县尹。武冈县控制着溪洞，此处蛮獠杂居，对他们的抚育爱护稍有不协调，他们就拿起武器造反。欧阳玄到任一个月后，赤水、太清两洞聚集众人相互攻杀，官吏们互相对视，脸色大变，想不出解决的计谋。第二天，欧阳玄单人匹马带领两人直接到达獠人争斗的地方告谕他们。到达的时候死伤者充斥道路，战斗还没有停止。獠人熟知欧阳玄的名望，扔掉兵器，排着队拜倒在马前，说：“我们不是不惧怕法律，因为向县衙投诉某

事，县官判决不公正，反而用徭役横征暴敛搜刮我们，感情上无法忍受，就发愤去死。没想到麻烦我们的清廉长官亲自前来。”欧阳玄告诉他们此事的祸福，回去为他们审理官司，獠人于是安抚下来。

召欧阳玄作国子博士，升任国子监丞。致和元年，改任翰林待制，兼任国史院编修官。当时正值战乱，欧阳玄领印代理国史院事务，每天在内廷值班，参与决策机要事务，包括远近的调拨发运，掌管制诏，撰写文书。不久改年号为天历，祭天地祖宗，册封皇后、立太子、大赦等文书，都经他撰写。又列举当时政务几十件，密封起来直奏朝廷，大多数被推行。第二年，开始设置奎章阁学士院，又在院内设置艺文监隶属它，都选择清廉、有名望的官吏任职。文宗亲自任命欧阳玄为艺文少监，奉旨编撰《经世大典》，升任太监、检校书籍事。

元统元年，改任金太常礼仪院事，官拜翰林直学士，编修四朝实录。不久，兼任国子祭酒，被朝廷召入中都参议国事，升任侍讲学士，又兼国子祭酒。后至元五年，脚部患风痺，请求回到南方以便于治病、用药，顺帝不答应。授予翰林学士，没多久，恳求辞去官职，顺帝又不答应，免去他行朝贺的礼节。改年号至正，改革朝政，凡不利的事情都在朝廷集中商议，欧阳玄尽言没有隐讳。科目复设，阻挠者非常多。他仍然竭力争取。不久，回到南方，又被提拔为翰林学士，因病没有赴任。

顺帝下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召欧阳玄为总裁官，发凡举例，使撰述者有所依据；史官中有愤怒地表露才华、议论

不公正的人，欧阳玄不用口舌与他们争论，待他们交上稿件，用笔修改审定，都算作他们自己改正的。至于论、赞、表、奏，都由欧阳玄执笔。五年，顺帝因欧阳玄在几朝做官，并且有编修三史的功劳，命令丞相破格授予他爵位和俸禄，于是准备拜他为翰林学士承旨。等到奏请顺帝，顺帝再三称赞。不久，欧阳玄请求退休，顺帝又不同意。御史台上奏拜他为福建廉访使，走到浙西，病又发作。于是奏上退休的请求，作南山隐居，悠闲自得于山水之间，有在此了却余生的愿望。又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承旨，他多次坚决辞谢，不被批准。奉顺帝诏书制定国家法规，不久请求退休，陈述情况恳切，于是特别授予他以湖广行中书省右丞的职位退休，赐他白玉束带，给他俸赐养老。将要走时，顺帝又下诏不许他走，仍拜为以前的翰林学士承旨，进升为光禄大夫。

十四年，汝颖强盗兴起，蔓延南北，州县中几乎没有完整的城池。欧阳玄呈献招捕的措施千余字，确实可行，当时不能采用。十七年春，请求退休，由于中原道路阻塞，打算经四川回乡，顺帝又不答应。当时将要大赦天下，宣他到内府。欧阳玄长期卧病，不能行走，丞相传旨，准他乘轿子到延春阁下，实际是顺帝给臣子的特殊优待。这年十二月戊戌日（二十九日），去世于崇教里的寓内，时年八十五岁。中书通知顺帝，顺帝赏赐办理丧事的财物很丰厚，赠他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、大司徒、柱国的称号，追封他为楚国公，赠谥号为文。

欧阳玄生性仪度大方，内含弘大缜密，对待自己节俭不奢华，为政清廉公正，做官四十多年，在朝廷的时间，将近

四分之三。三次做成均，两次做祭酒，六次进入翰林，三次任承旨。编撰实录、《经世大典》、三史，都是大著作。多次做主考官，两次主持贡举和读卷官，凡宗庙朝廷重要文书册文，传达全国各地的制诏，大多出于欧阳玄之手。赏赐的金帛、丝绸、好酒，几乎每年都有。海内名山大川，寺院、道观，王公贵人墓道的碑铭，以得到欧阳玄的文辞为荣耀。支言片语，流传到民间，人们都知道它的珍贵。欧阳玄的文章和道德，以高超扬名于天下。在表率斯文，辅卫治国方面，都有功劳。欧阳玄没有儿子，以侄子达老为嗣，又先于欧阳玄去世。欧阳玄有《圭斋文集》若干卷流传于世。

(崔蓉 译)

【原文】

欧阳玄字原功，其先家庐陵，与文忠公修同所自出。至曾大父新，始迁居浏阳，故玄为浏阳人。幼岐嶷，母李氏，亲授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小学诸书，八岁能成诵，始从乡先生张贯之学，日记数千言，即知属文。十岁，有黄冠师注目视玄，谓贯之曰：“是儿神气凝远，目光射人，异日当以文章冠世，廊庙之器也。”言讫而去，亟追与语，已失所之。部使者行县，玄以诸生见，命赋梅花诗，立成十首，晚归，增至百首，见者骇异之。年十四，益从宋故老习为词章，下笔辄成章，每试庠序，辄占高等。弱冠，下帷数年，人莫见其面，经史百家，靡不研究，伊、洛诸儒源委，尤为淹贯。

延祐元年，诏设科取士，玄以《尚书》与贡。明年，赐进士出身，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。调太平路芜湖县尹。县多疑狱，久不决，玄察其情，皆为平翻。豪右不法，虐其驱奴，

玄断之从良。贡赋征发及时，民乐趋事，教化大行，飞蝗独不入境。改武冈县尹。县控制溪洞，蛮獠杂居，抚字稍乖，辄弄兵犯顺。玄至逾月，赤水、太清两洞聚众相攻杀，官曹相顾失色，计无从出。玄即日单骑从二人，径抵其地谕之。至则死伤满道，战斗未已。獠人熟玄名，弃兵仗，罗拜马首曰：“我曹非不畏法，缘诉某事于县，县官不为直，反以徭役横敛掊克之，情有弗堪，乃发愤就死耳。不意烦我清廉官自来。”玄喻以祸福，归为理其讼，獠人遂安。

召为国子博士，升国子监丞。致和元年，迁翰林待制，兼国史院编修官。时当兵兴，玄领印摄院事，日直内廷，参决机务，凡远近调发，制诏书檄。既而改元天历，郊庙、建后、立储、肆赦之文，皆经撰述。复条时政数十事，实封以闻，多推行之。明年，初置奎章阁学士院，又置艺文监隶焉，皆选清望官居之。文宗亲署玄为艺文少监，奉诏纂修《经世大典》，升太监、检校书籍事。

元统元年，改立太常礼仪院事，拜翰林直学士，编修四朝实录，俄兼国子祭酒，召赴中都议事，升侍讲学士，复兼国子祭酒。重纪至元五年，足患风痺，乞南归以便医药，帝不允。拜翰林学士，未几，恳辞去位，帝复不允，免其行朝贺礼。至正改元，更张朝政，事有不便者，集议廷中，玄极言无隐，科目之复，沮者尤众，玄尤力争之。未几南归，复起为翰林学士，以疾未行。

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召为总裁官，发凡举例，俾论撰者有所据依；史官中有悻悻露才、论议不公者，玄不以口舌争，俟其呈稿，援笔窜定之，统系自正。至于论、赞、表、奏，

皆玄属笔。五年，帝以玄历仕累朝，且有修三史功，谕旨丞相，超授爵秩，遂拟拜翰林学士承旨。及入奏，上称快者再三。已而乞致仕，帝复不允。御史台奏除福建廉访使，行次浙西，疾复作，乃上休致之请，作南山隐居，优游山水之间，有终焉之志。复拜翰林学士承旨，玄屡力辞，不获命。奉敕定国律，寻乞致仕，陈情恳切，乃特授湖广行中书省右丞致仕，赐白玉束带，给俸赐以终其身。将行，帝复降旨不允，仍前翰林学士承旨，进阶光禄大夫。

十四年，汝颖盗起，蔓延南北，州县几无完城。玄献招捕之策千余言，凿凿可行，当时不能用。十七年春，乞致仕，以中原道梗，欲由蜀还乡，帝复不允。时将大赦天下，宣赴内府。玄久病，不能步履，丞相传旨，肩輿至延春阁下，实异数也。是岁十二月戊戌，卒于崇教里之寓舍，年八十五。中书以闻，帝赐赙甚厚，赠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、大司徒、柱国，追封楚国公，谥曰文。

玄性度雍容，含弘缜密，处已俭约，为政廉平，因官四十余年，在朝之日，殆四之三。三任成均，而两为祭酒，六入翰林，而三拜承旨。修实录、《大典》、三史，皆大制作。屡主文衡，两知贡举及读卷官，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、播告万方制造，多出玄手。金缯上尊之赐，几无虚岁。海内名山大川，释、老之宫，王公贵人墓隧之碑，得玄文辞以为荣。片言只字，流传人间，咸知宝贵。文章道德，卓然名世。羽仪斯文，赞卫治具，与有功焉。玄无子，以从子达老后，卒，复先玄卒。有《圭斋文集》若干卷传于世。

宋濂传

——《明史》卷一二八

【说明】宋濂（1310—1381），字景濂，祖籍金华（今浙江金华），后迁至浦江（今浙江浦江）。洪武二年，朝廷下诏开史局，命宋濂、王祔为总裁官，以从大都缴获的元十三朝实录和《经世大典》为基础，修撰《元史》，仅用了六个多月的时间，就完成了一百五十九卷。因顺帝一朝无实录可依据，又派欧阳佑等人到北平等地，收集史料，以备续编。洪武三年二月，重开史局，七月份全书撰成。此书本纪四十七卷、志五十八卷、表八卷、列传九十七卷，合计二百一十卷。纪事上起元太祖铁木真称成吉思汗，下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，前后共一百六十余年。历代对《元史》贬多褒少，指责它详略不均，杂乱重复，无论赞，缺《艺文志》等等。出现这些情况，原因比较复杂，最根本的是可搜集的材料不足。元朝统治者一向对历史不重视，“不置日历，不置起居注”，而元修实录又多草率，《元史》以实录为主要依据，当然难免疏略。然而，《元史》也不是一无是处，如《选举》、《百官》、《食货》、《兵》、《刑法》等志本于《皇朝经世大典》，《天文》、《历》等志，则本于郭守敬的《授时历》，《地理志》本于《大

元一统志》，《河渠志》本于欧阳玄的《河防记》等等，这些志都受到普遍的重视。元朝实录有一些出于姚燧、欧阳玄、苏天爵等名臣之手。尽管《元史》有诸多缺点，但在元实录和《经世大典》、《大元一统志》等书都亡佚的情况下，它的史料价值就更值得珍贵。

宋濂，字景濂，他的先人是金华潜溪的人，到宋濂时就迁到浦江。宋濂年幼即异常聪敏、记忆力极强，在闻人梦吉处学习，精通《五经》，又前往吴莱处就学。这以后，宋濂又游学于柳贯、黄溍门下，柳、黄都对宋濂极为逊让，自称不如宋濂。元至治年间，因人推荐，授宋濂为翰林编修，宋濂以事奉老人为由辞谢不赴任，进龙门山著书立说。

过了十几年，明太祖夺取婺州，召见宋濂。这时婺州已改为宁越府，命令知府王显宗开办郡学，因而以宋濂和叶仪为《五经》师。第二年三月，因李善长的推荐，与刘基、章溢、叶琛一并征召到应天府，除授江南儒学提举，命令他授太子经，不久又改起居注。宋濂比刘基长一岁，都起于东南，而且都享有盛名。刘基雄壮豪迈有奇异的气质，而宋濂以儒者自居。刘基辅佐军中的谋划计议，宋濂也第一个以文学得到知遇，一直侍奉太祖左右，以备顾问。曾应召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宋濂进言说：“《春秋》乃是孔子褒贬善恶的书，假若能遵行《春秋》，那么赏罚适中，天下可以安定。”太祖亲临端门，宋濂讲解黄石公的《三略》。宋濂说：“《尚书》的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、《大禹谟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益稷谟》，完全具备帝王的大经大法，希望陛下留意讲明这《二典》、《三谟》。”

在这以后，议论赏赐，宋濂又说：“得到天下以人心为根本。人心不稳固，虽然充满金帛，将有何用处。”太祖对此都表示赞许。乙巳（元至正二十五年）三月，宋濂请求回乡省亲。太祖与太子一起慰劳赏赐宋濂。宋濂上笺谢恩赏，而且写信给太子，用孝友敬恭以及增进道德、修养学业勉励太子。太祖看了信大喜，召见太子，向他讲信中内容，赐笔纸褒奖回答，并且命太子写信给宋濂作答。不久宋濂遭父丧。丧服期满，召回朝廷。

洪武二年朝廷下诏修《元史》，命令宋濂担任总裁官。这年八月，《元史》撰成，除授宋濂为翰林院学士。洪武三年二月，儒士欧阳佑等人搜采故元朝元统以后事迹还朝，仍然命令宋濂等人续修《元史》，过了六个月《元史》再度撰成，朝廷赐宋濂等金帛。这个月，宋濂因朝见天子有失，降为编修。四年，调任国子司业，因考祭祀孔子礼而不按时奏报获罪，贬为安远县知县，不久召为礼部主事。第二年调任赞善大夫。这时，太祖注意文治，征辟各地儒士张唯等几十人，选择当中年轻而有卓异才华的人，皆提升为编修，让他们进宫中文华堂修习学业，命令宋濂做他们的老师。宋濂做太子师傅先后十几年，凡是一言一行，都用礼法婉言劝谕，使太子的言行合于礼法，至于有关政治教化以及前代兴亡的事，一定拱手说：“应当像这样，不应当像那样。”每当皇太子严肃面容欣然接受时，言必称师父云云。

太祖剖符分封功臣，召宋濂议论五等封爵。宋濂住在大本堂，议论到天亮，顺次根据汉代、唐代的旧例，衡量出适中的内容而奏明太祖。甘美的雨露多次降下，太祖问灾祥的

缘故。宋濂回答说：“天子受命不在天，而在于人，好的征兆不在祥，而在于仁。《春秋》记载异常现象而不记载祥兆，就是这缘故。”皇帝的侄子朱正文获罪，宋濂说：“朱文正固然应当受死，陛下实行亲其所当亲之义，把他安置在边远的地方就行了。”太祖夏至祭地时，感到心绪不宁，宋濂从容地说：“养心最好莫过于寡欲，真的能做到这一点，那么心境清新身体安泰。”太祖长时间地称赞此说。太祖曾以帝王之学，什么书最为重要的问题问宋濂。宋濂举出《大学衍义》。于是命令把《大学衍义》用大字写在殿的两边廊壁上。不久太祖亲临西廊，众大臣都在场，太祖指着《衍义》中司马迁论黄老事，命令宋濂讲解分析。宋濂讲解完毕，接着说：“汉武帝沉浸于方技的空虚悠远的学说中，改变文、景两帝的恭俭作风，民力已经衰敝，然后又以严刑督察百姓。人主真的用礼义修养内心，那么邪说就不能进入，用学校治理百姓，那么祸乱就不会兴起，刑罚不必被列于前。”太祖问三代朝代更替的时间以及版图的大小，宋濂全部陈述完毕后，又说：“三代仁义治天下，所以统治年代长久。”太祖又问：“三代之上，他们所读的书是什么？”宋濂回答说：“上古时典籍尚未完全确立，人们也不专门讲读。人君兼治理教化的责任，以身体力行统率众民，那么众民自然会被教化。”曾经奉制作咏鹰诗，命令七步就完成，诗中有“自古即戒沉迷田猎”的话。太祖高兴地说：“爱卿可称得上是善于上言啊。”宋濂的随事进献忠言，都是这种情况。

六年七月宋濂调任侍讲学士，知制诰，同修国史，还兼赞善大夫。朝廷命令宋濂与詹同、乐韶凤一起修日历，又与

吴伯宗等修宝训。九月定散官的官资品阶，授宋濂中顺大夫，想把政事委任给他。宋濂辞谢说：“臣没有其他的长处，能够待罪在陛下近旁就心满意足了。”太祖更加器重他。八年九月，跟从太子以及秦、晋、楚、靖江四王在中都讲武。太祖得到舆图《濠梁古迹》一卷，派人赐给太子，在书外题词，让宋濂询问访求，随所到之处而讲解之。太子把此书拿给宋濂看，于是清清楚楚地称引讲陈，随事进言，很有规范益处。

宋濂生情诚实恭谨，久在内庭为官，未曾揭发过别人的过失。他所住的房间，署名为“温树”。客人问宫中的事，就手指“温树”二字让他看。曾与客人饮酒，太祖秘密派人监视。第二天，太祖问宋濂昨天饮酒没饮酒，客人是谁，吃得什么东西。宋濂都如实回答。太祖笑着说：“诚实啊，卿不欺骗朕。”有时召宋濂问群臣的好坏，宋濂只称举那些好的，说：“善的是臣的朋友，臣了解他，那些不好的，臣不能了解他们。”主事茹太素上书几万言。太祖发怒，问朝廷大臣，有人指着茹太素的上书说：“这是不敬，这是诽谤不法。”太祖问宋濂，宋濂回答说：“茹太素尽忠于陛下啊。陛下刚刚广开言路，怎能过分给他加罪。”过后，太祖阅读茹太素的上书，有完全可以采纳的内容。把朝廷大臣都召集起来责问，因而呼唤宋濂的字说：“没有景濂，我会错怪上言的人。”于是太祖在朝廷称誉宋濂说：“朕听说最上者为圣，其次为贤，再其次为君子。宋景濂事奉朕十九年，不曾有一句话的伪诈，不曾指责过一个人的短处，始终如一，他不止是个君子，抑或可称之为贤啊。”每逢在内廷朝见，太祖必定设置座位命人上茶，每天早上必定令人准备早膳，太祖反复咨询，常常直到夜深才结束。

宋濂不能饮酒，太祖曾强迫他饮酒至三杯，就摇摇晃晃迈不成步了，太祖特别开心，亲自写《楚辞》一章，命令词臣赋《醉学士诗》。又曾把甘美的雨露调在汤里，亲手拿着给宋濂喝，说：“这汤能治好病，延长寿命，朕愿与你共饮此汤。”又诏令太子赐宋濂好马，又为此写《白马歌》一章，也命令侍臣和诗赋此。宋濂得到太祖这样的宠信。九年，宋濂进为学士承旨、知制诰，仍然兼任赞善大夫。第二年退休，太祖赐他《御制文集》和绮帛，问宋濂多大年纪，宋濂回答说：“六十有八。”太祖就说：“把这绮收藏三十二年，可以做百岁衣啊。”宋濂叩首拜谢。又过一年，宋濂来朝觐见。十三年，长孙宋慎因是胡惟庸的同伙而获罪，太祖想判宋濂死罪。皇后和太子极力营救，就令宋濂在茂州安置。

宋濂状貌丰伟，胡须很美，看东西近而明晰，在一粒黍上能写数字。从小到老，没有一天离开书卷，对于学问无所不通。作文章精深演绎，可与古代学者并驾齐驱。在朝廷，郊社宗庙山川百神的祭典，朝会宴享律历衣冠的制度，四裔贡赋赏劳的礼仪，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的文辞，都委托给宋濂，多次被推举为文臣之冠首。士大夫到宋濂府上乞求文章的人，前后继踵而至。外国进贡使节也知道宋濂的名气，多次询问宋先生的起居安好与否。高丽、安南、日本直至用双倍的价钱购买他的文集。各方的学者都称他为“太史公”，不加姓氏。虽然宋濂时至白头仍为侍从，他的功业爵位都不及刘基，然而这一代的礼乐的制作，由宋濂所裁定的居多。

那第二年，宋濂在夔州去世，终年七十二岁。知事叶以从把宋濂葬在莲花山之下。蜀献王仰慕宋濂之名，又把宋濂

的坟墓移到华阳城东。弘治九年，四川巡抚马俊上奏说：“宋濂是真正的儒者，辅佐国运，他的著述可为师表，在华美文辞方面颇有功效，辅导后进有显著的功绩。很久以前死在远方边戍，沉沦于地下，乞求给与怜悯录官。”将此奏议下到礼部讨论，恢复宋濂的官职，春秋两季在安葬他的地方祭祀他。正德年间，追谥号为“文宪”。

宋濂的第二个儿子宋璉最有名，字仲衍，善于作诗，尤其精通书法。洪武九年，因为宋濂的缘故，召为中书舍人。他哥哥的儿子宋慎也为仪礼序班。太祖多次考宋璉与宋慎，并且教诲告诫他们。太祖笑着对宋濂说：“爱卿为朕教育太子和诸王，朕也教育爱卿的子孙啊。”宋濂走路困难，太祖一定命令宋璉、宋慎搀扶宋濂。祖孙、父子，一起在内庭为官，大家都以此为荣。宋慎获罪，宋璉也被株连，都被处死，家属都流徙到茂州。建文帝即位，追念宋濂提倡尊崇旧学，召宋璉的儿子宋恽为翰林官。永乐九年，宋濂的孙子因是奸党郑公智的外亲获罪，朝廷下诏特别宽免他。（曾贻芬 译）

【原文】

宋濂，字景濂，其先金华之潜溪人，至濂乃迁浦江。幼英敏强记，就学于闻人梦吉，通《五经》，复往从吴莱学。已，游柳贯、黄潛之门，两人皆亟逊濂，自谓弗如。元至正中，荐授翰林编修，以亲老辞不行，入龙门山著书。

逾十余年，太祖取婺州，召见濂。时已改宁越府，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，因以濂及叶仪为《五经》师。明年三月，以李善长荐，与刘基、章溢、叶琛并征至应天，除江南儒学提举，命授太子经，寻改起居注。濂长基一岁，皆起东南，负

重名。基雄迈有奇气，而濂自命儒者。基佐军中谋议，濂亦首用文学受知，恒侍左右，备顾问。尝召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濂进曰：“《春秋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，苟能遵行，则赏罚适中，天下可定也。”太祖御端门，口释黄石公《三略》。濂曰：“《尚书》二《典》、三《谟》，帝王大经大法毕具，愿留意讲明之。”已，论赏赍，复曰：“得天下以人心为本。人心不固，虽金帛充牣，将焉用之。”太祖悉称善。乙巳三月，乞归省。太祖与太子并加劳赐。濂上笺谢，并奉书太子，勉以孝友敬恭、进德修业。太祖览书大悦，召太子，为语书意，赐札褒答，并令太子致书报焉。寻丁父忧。服除，召还。

洪武二年诏修元史，命充总裁官。是年八月史成，除翰林院学士。明年二月，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，仍命濂等续修，六越月再成，赐金帛。是月，以失朝参，降编修。四年迁国子司业，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，谪安远知县，旋召为礼部主事。明年迁赞善大夫。是时，帝留意文治，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，择其年少俊异者，皆擢编修，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，命濂为之师。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，凡一言动，皆以礼法讽劝，修归于道，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，必拱手曰：“当如是，不当如彼。”皇太子每敛容嘉纳，言必称师父云。

帝剖符封功臣，召濂议五等封爵。宿大本堂，讨论达旦，历据汉、唐故实，量其中而奏之。甘露屡降，帝问灾祥之故。对曰：“受命不于天，于其人，休符不于祥，于其仁。《春秋》书异不书祥，为是故也。”皇从子文正得罪，濂曰：“文正固当死，陛下体亲亲之谊，置诸远地则善矣。”车驾祀方丘，

患心不宁，濂从容言曰：“养心莫善于寡欲，审能行之，则心清而身泰矣。”帝称善者良久。尝问以帝王之学，何书为要。濂举《大学衍义》。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。顷之御西庑，诸大臣皆在，帝指《衍义》中司马迁论黄、老事，命濂讲析。讲毕，因曰：“汉武溺方技谬悠之学，改文、景恭俭之风，民力既敝，然后严刑督之。人主诚以礼义治心，则邪说不入，以学校治民，则祸乱不兴，刑罚非所先也。”问三代历数及封疆广狭，既备陈之，复曰：“三代治天下以仁义，故多历年所。”又问：“三代以上，所读何书？”对曰：“上古载籍未立，人不专讲诵。君人者兼治教之责，率以躬行，则众自化。”尝奉制咏鹰，令七举足即成，有“自古戒禽荒”之言。帝忻然曰：“卿可谓善陈矣。”濂之随事纳忠，皆此类也。

六年七月迁侍讲学士，知制诰，同修国史，兼赞善大夫。命与詹同、乐韶凤修日历，又与吴伯宗等修宝训。九月定散官资阶，给濂中顺大夫，欲任以政事。辞曰：“臣无他长，待罪禁近足矣。”帝益重之。八年九月，从太子及秦、晋、楚、靖江四王讲武中都。帝得舆图《濠梁古迹》一卷，遣使赐太子，题其外，令濂询访，随处言之。太子以示濂，因历历举陈，随事进说，甚有规益。

濂性诚谨，官内庭久，未尝讦人过。所居室，署曰“温树”。客问禁中语，即指示之。尝与客饮，帝密使人侦视。翼日，问濂昨饮酒否，坐客为谁，饌何物。濂具以实对。笑曰：“诚然，卿不朕欺。”间召问郡臣臧否，濂惟举其善者曰：“善者与臣友，臣知之；其不善者，不能知也。”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。帝怒，问廷臣。或指其书曰：“此不敬，此诽谤非法。”

问濂，对曰：“彼尽忠于陛下耳。陛下方开言路，恶可深罪。”既而帝览其书，有足采者。悉召廷臣诘责，因呼濂字曰：“微景濂几误罪言者。”于是帝廷誉之曰：“朕闻太上为圣，其次为贤，其次为君子。宋景濂事朕十九年，未尝有一言之伪，诮一人之短，始终无二，非止君子，抑可谓贤矣。”每燕见，必设坐命茶，每旦必令侍膳，往复咨询，常夜分乃罢。濂不能饮，帝尝强之至三觴，行不成步。帝大欢乐。御制《楚辞》一章，命词臣赋《醉学士诗》。又尝调甘露于汤，手酌以饮濂曰：“此能愈疾延年，愿与卿共之。”又诏太子赐濂良马，复为制《白马歌》一章，亦命侍臣和焉。其宠待如此。九年，进学士承旨、知制诰，兼赞善如故。其明年致仕，赐《御制文集》及绮帛，问濂年几何，曰：“六十有八。”帝乃曰：“藏此绮三十二年，作百岁衣可也。”濂顿首谢。又明年，来朝。十三年，长孙慎坐胡惟庸党，帝欲置濂死。皇后太子力救，乃安置茂州。

濂状貌丰伟，美须髯，视近而明，一黍上能作数字。自少至老，未尝一日去书卷，于学无所不通。为文醇深演迤，与古作者并。在朝，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，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，四裔贡赋赏劳之仪，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，咸以委濂，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。士大夫造门乞文者，后先相踵。外国贡使亦知其名，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。高丽、安南、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。四方学者悉称为“太史公”，不以姓氏。虽白首侍从，其勋业爵位不逮基，而一代礼乐制作，濂所裁定者居多。

其明年，卒于夔，年七十二。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。

蜀献王慕濂名，复移莒华阳城东。弘治九年，四川巡抚马俊奏：“濂真儒翊运，述作可师，黼黻多功，辅导著绩。久死远戍，幽壤沉沦，乞加恤录。”下礼部议，复其官，春秋祭葬所。正德中，追谥文宪。

仲子璲最知名，字仲珩，善诗，尤工书法。洪武九年，以濂故，召为中书舍人。其兄子慎亦为仪礼序班。帝数试璲与慎，并教诫之。笑语濂曰：“卿为朕教太子诸王，朕亦教卿子孙矣。”濂行步艰，帝必命璲、慎扶掖之。祖孙父子，共官内庭，众以为荣。慎坐罪，璲迹连坐，并死，家属悉徙茂州。建文帝即位，追念濂兴宗旧学，召璲子恽官翰林。永乐十年，濂孙坐奸党郑公智外亲，诏特宥之。

陈邦瞻传

——《明史》卷二四二

【说明】陈邦瞻（？—1623年），字德远，高安（今江西高安）人，明朝史学家。代表作有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和《元史纪事本末》。原先有山东临朐冯琦曾草创《宋史纪事本末》，未成而卒；另外，南京的侍御史沈越，用纪事本末体编录宋代史事，题名《事纪》。后来由冯琦的弟子刘曰梧、应天府丞徐申创议，请陈邦瞻对冯、沈这两部未完稿加以增订完成。此书约在万历二十二年撰成，共计二十八卷，一百零九目，纪事起于宋太祖代国，迄于文天祥、谢枋得之死。书中实际涉及宋、辽、金和元四朝史事，所以题为《宋史纪事本末》，估计是以宋为正统的思想在作怪。《宋史纪事本末》严格恪守袁枢的体例，分目纪事，条理清楚，比之庞杂的宋史，此点更为突出。前人说，“读《通鉴》者不可无袁枢之书，读《宋史》者亦不可无此一编”。崇祯年间，张溥将《宋史纪事本末》析为一百零九卷，每卷末附上自己的论断，即今流传的本子。《元史纪事本末》二十七篇，成于万历三十四年，其中《律令之定》一篇是臧懋循补撰的。此书与《宋史纪事本末》比较，体例不够严谨，内容也不太丰富，因为编者将宋亡以

前的元代史事归入宋编，明朝建立之后的事迹又被划入明史的范围，致使此书叙事过于简略，另外对史实的考证和处理不够精当。但是此书对于元代的历法、科举、学校制度以及漕运、河渠都有较详的记载，可供参考。《元史纪事本末》原为六卷二十七篇，黄克士重刻时并为四卷。张溥又将其分为二十七卷，并于卷后加了史论。

陈邦瞻，字德远，高安人。万历二十六年进士。授予南京大理寺评事。历任南京吏部郎中，离京任浙江参政。进而任福建按察使，改任右布政使。改补河南缺，分理彰德各府。开垦水田上千顷，建立濬阳书院，聚集众多学生讲习学问。士人百姓建祠祭祀他。改任左布政使。以右副都御史的这职巡抚广西。

上林土官黄德勋的弟弟黄德隆和儿子黄祚胤背叛黄德勋，投靠田州土酋岑懋仁。岑懋仁接受了他们，攻取上林，杀死黄德勋，夺走他的妻子、孩子和钱财。守臣询问情况，他们欺骗他说黄德勋是因病而死，并请求由祚胤继承他的位置。陈邦瞻向朝廷请求讨伐叛逆。适逢光宗继位，就提升他为兵部右侍郎，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，于是陈邦瞻率军征讨并擒获叛逆。海上盗贼林莘老号召聚集了上万人侵扰掠夺沿海地区，邦瞻扼制了这件事，使他们没有能够得逞。水边的少数民族在青州建造房屋，奸民与他们相互勾结，经常侵扰内地，邦瞻烧毁了他们盘踞的地方。陈邦瞻被召回朝廷授予工部右侍郎。还未上任就改在兵部，晋升为左侍郎。

天启二年五月，陈邦瞻上疏陈述四件事，疏中说：“客氏

已经被逐出皇宫，又被召回，是陛下的错误之举。辅臣不传达陛下的旨意，据理力争，贬斥进言的人，重犯拒绝规劝的过失，那又如何了解别人的意见呢？”疏送入朝廷，被谴责为忤违圣旨。不久，任户部、工部两部侍郎，专门管理军需。第二年在任上去世。熹宗下诏赠他尚书职。

邦瞻好学，作风气节敦厚。作官三十年，从未遭到官吏们的议论。

（曾贻芬 译）

【原文】

陈邦瞻，字德远，高安人。万历二十六年进士。授南京大理寺评事。历南京吏部郎中，出为浙江参政。进福建按察使，迁右布政使。改补河南，分理彰德诸府。开水田千顷，建濠阳书院，集诸生讲习。士民祠祀之。就改左布政使。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。

上林土官黄德勋弟德隆及子祚胤叛德勋，投田州土酋岑懋仁。懋仁纳之，袭破上林，杀德勋，掠妻子金帛。守臣问状，诡言德勋病亡，乞以祚胤继。邦瞻请讨于朝。会光宗嗣位，即擢邦瞻兵部右侍郎，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，遂移师讨擒之。海寇林莘老啸聚万余人侵掠海滨，邦瞻扼之，不得逞。澳夷筑室青州，奸民与通，时侵内地，邦瞻燔其巢。召拜工部右侍郎。未上，改兵部，进左。

天启二年五月疏陈四事，中言：“客氏既出复入，乃陛下过举。辅臣不封还内降，引义固争，致罪谪言者，再蹈拒谏之失，其何解于人言？”疏入，忤旨谪让。寻兼户、工二部侍郎，专理军需。明年卒官。诏赠尚书。

邦瞻好学，敦风节。服官三十年，吏议不及。

王世贞传

——《明史》卷二八七

【说明】王世贞（1526—1590），明代文学家、史学家。字元美，号凤州，弇州山人。太仓（今属江苏）人。嘉靖进士，官至南京刑部尚书。

王世贞与李攀龙同为明代“后七子”首领，主张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，强调诗的格调，倡导复古模拟。晚年文学思想有较大变化，觉察到复古的流弊。《艺苑卮言》是其早期论著。

其诗取材宏博，颇具匠心。词受传统束缚较大，题材狭窄。对戏曲也颇有研究。有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等书传世。

王世贞在史学方面有很大抱负，其著述有《弇山堂别集》一百卷，弟子裒集的《弇山史料》一百卷、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八卷。以及编辑的《明野史稿》一百卷、《皇明名臣琬琰录》等书。

王世贞，字元美，太仓（今属江苏）人，是右都御史王忬的儿子。生下来就有特殊的天赋，书一过目，终身不忘。十九岁时，考取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进士，授官刑部主事。王

世贞喜欢作诗写古文，在京都做官，加入王宗沐、李先芳、吴维岳等人的诗社，又和李攀龙、宗臣、梁有誉、徐中行、吴国伦等人相倡和，继承何景明、李梦阳的主张，名声越来越大。在官职上接连升为员外郎、郎中。

坏人闫某犯了法，藏在锦衣都督陆炳家里，王世贞搜查逮捕了他。陆炳通过严嵩请求释放闫某，世贞没有答应。杨继盛入狱受审，世贞经常送去汤药。继盛妻子为夫告状伸冤，世贞代为起草状子；继盛死后，又用棺装殓了他。严嵩对此咬牙切齿。吏部两次打算任命世贞作提学，都未被批准，而让他去作青州（今山东潍坊）兵备副使。世贞父亲在滦河出了事故，严嵩罗织罪名，判他死刑，关进狱中。世贞辞官奔赴京城，和弟弟世懋每天俯伏在严嵩府门前，哭着请求宽大处理。严嵩暗里坚持对王忬的原判，却表面上时时说些欺骗的话来宽慰他们。他们又每天穿囚服跪在路旁，挡住那些达官贵人的车子，磕着头乞求救他父亲。那些达官贵人害怕严嵩，不敢说话。王忬终于被斩首示众。兄弟号啕大哭，悲痛欲绝，护送父亲灵柩归家，守丧吃素三年，三年中不入内室就寝。守丧期满，仍不着官服，穿草鞋，戴葛巾，不赴宴会。

隆庆元年（1567）八月，世贞兄弟俩向皇上申诉父冤，说被严嵩所害。大学士徐阶处理此事，恢复了王忬的官位。世贞本不想再出山做官，正值皇上传下诏书，让臣下直言进谏，于是世贞上疏，陈述法祖宗、正殿名、广恩义、宽禁例、修典章，推德意、昭爵赏、练兵实八条建议，来响应皇上的诏告。不久，由言官推荐，吏部任命他作副使，去大名（今属河北）上任。接着升为浙江右参政，山西按察使。因母亲亡

故，回家守丧。守丧期满，调往湖广做官，接着改任广西右布政使，入京任太仆卿。

万历二年（1574）九月，以右副都御史的头衔安抚治理郧阳（今湖北郧县），几次向皇上分条陈述屯田、戍守、兵食等事宜，都是切实可行的重大建议。当时有一个坏和尚，冒充是乐平王的二儿子，带了高皇帝的遗像和世系家谱，行游天下。王世贞说：“受分封的宗室不能随便出城，而他却这样胡来，一定是假的。”把他抓来审讯，承认犯了欺骗之罪。

张居正主持国政，因为世贞是他同期进士，有意提拔他，世贞却对他不很亲近。世贞所管辖的荆州发生地震，引用《京房占》卜，说臣下势力太甚，地的四角就不得安宁，用来委婉地规劝居正。居正的内弟欺辱江陵县令，世贞向皇上告发，一点也不宽容。张居正忍不下去了，正好世贞升任南京大理卿，被给事中杨节所弹劾，就以皇上的旨意，把他罢了官。后起用为应天府尹，又被弹劾罢官。张居正死后，起用王世贞为南京刑部右侍郎，告病不去赴任。过了好久，与世贞交好的王锡爵主持国政，起用他为南京兵部右侍郎。在这之前，王世贞作过副都御史和大理寺卿、应天尹和侍郎，官品都是正三品。世贞计算全部任职时间，够规定可以封子。等提升为南京刑部尚书，御史黄仁荣说世贞早先被弹劾，罢官期间不应计算官龄，依据惯例，和世贞力争。世贞三次上疏后告病归家。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，寿终正寝。

王世贞开始时和李攀龙交互主持文坛，攀龙死后，独主文坛二十年。他文才最高，地位、威望最突出，誉满海内，气势逼人。一时间士大夫和隐士、词人、和尚、道士等，无不

奔走于世贞的门下，只要世贞一句褒奖的话，声价骤然提高了。他的理论主张是：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。大历（766—779）以后的作品不要去读。可是他的诗文，过分雕琢词藻。晚年，攻击他的人渐渐多起来，而王世贞诗文的风格也渐趋平淡。他病得很厉害时，刘凤前去看望，见他手里拿着《苏子瞻集》，讽咏玩味个不停呢。

世贞自号“凤洲”，又号“弇州山人”。那些跟他交往的人，大都在他集中可以见到，并且各自作为标目。集中说的前五子是李攀龙、徐中行、梁有誉、吴国伦、宗臣，后五子则是南昌的余曰德、蒲圻的魏裳、歙县汪道昆、铜梁张佳胤、新蔡张九一。广五子又是昆山俞允文、浚县卢柟、濮州李先芳、孝丰吴维岳、顺德欧大任。续五子则是曲阳王道行、东明石星、从化黎民表、南昌朱多炆、常熟赵用贤。末五子是京山李维桢、鄞县屠隆、南乐魏允中、兰溪胡应麟，赵用贤又在其中。他所肯定和否定的，颇有些以个人好恶来衡量高下的味道。

（邱文龙 译）

【原文】

王世贞，字元美，太仓人，右都御史忬子也。生有异禀，书过目，终身不忘。年十九，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，世贞好为诗古文，官京师，入王宗沐、李先芳、吴维岳等诗社，又与李攀龙、宗臣、梁有誉、徐中行、吴国伦辈相倡和，绍述何、李，名日益盛。屡迁员外郎、郎中。

奸人阎姓者犯法，匿锦衣都督陆炳家，世贞搜得之。炳介严嵩以请，不许。杨继盛下吏，时进汤药。其妻讼夫冤，为代草；既死，复棺殓之。嵩大恨。吏部两拟提学皆不用，用

为青州兵备副使。父忬以滦河失事，嵩构之，论死系狱。世贞解官奔赴，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，涕泣求贷。嵩阴持忬狱，而时为谩语以宽之。两人又日囚服跣道旁，遮诸贵人舆，搏颡乞救。诸贵人畏嵩不敢言，忬竟死西市。兄弟哀号欲绝，持丧归，蔬食三年，不入内寝。既除服，犹却冠带，苴履葛巾，不赴宴会。

隆庆元年八月，兄弟伏阙讼父冤，言为嵩所害。大学士徐阶左右之，复忬官。世贞意不欲出，会诏求直言，疏陈法祖宗、正殿名、广恩义、宽禁例、修典章、推德意、昭爵赏、练兵实八事，以应诏。无何，吏部用言官荐，令以副使涖大名。迁浙江右参政，山西按察使。母忧归，服除，补湖广，旋改广西右布政使，入为太仆卿。

万历二年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，数条奏屯田、戍守、兵食事宜，咸切大计。有奸僧伪称乐平王次子，奉高皇帝御容、金牒，行游天下。世贞曰：“宗藩不得出城，而诮张如此，必伪也。”捕讯之，服辜。

张居正枋国，以世贞同年生，有意引之，世贞不甚亲附。所部荆州地震，引《京房占》，谓臣道太盛，坤维不宁，用以讽居正。居正妇弟辱江陵令，世贞论奏不少贷。居正积不能堪，会迁南京大理卿，为给事中杨节所劾，即取旨罢之。后起应天府尹，复被劾罢。居正歿，起南京刑部右侍郎，辞疾不赴。久之，所善王锡爵秉政，起南京兵部右侍郎。先是，世贞为副都御史及大理卿、应天尹与侍郎，品皆正三。世贞通理前俸，得考满荫子。比擢南京刑部尚书，御史黄仁荣言世贞先被劾，不当计俸，据故事力争。世贞乃三疏移疾归。二

十一年卒于家。

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，攀龙歿，独操柄二十年。才最高，地望最显，声华意气笼盖海内。一时士大夫及山人、词客、衲子、羽流，莫不奔走门下。片言褒赏，声价骤起。其持论，文必西汉，词必盛唐，大历以后书勿读，而藻饰太甚，晚年，攻者渐起。世贞顾渐造平淡。病亟时，刘凤往视，见其手《苏子瞻集》，讽习不置也。

世贞自号凤洲，又号弇州山人。其所与游者，大抵见其集中，各为标目。曰前五子者，攀龙、中行、有誉、国伦、臣也。后五子则南昌余曰德、蒲圻魏裳、歙汪道昆、铜梁张佳胤、新蔡张九一也。广五子则昆山俞允文、濬卢柟、濮州李先芳、孝丰吴维岳、顺德欧大任也。续五子则阳曲王道行、东明石星、从化黎民表、南昌朱多炆、常熟赵用贤也。末五子则京山李维桢、鄞屠隆、南乐魏允中、兰溪胡应麟，而用贤复与焉。其所去取，颇以好恶为高下。

王祹传

——《明史》卷二八九

【说明】王祹（1322—1373），字子充，义乌（今属浙江）人，明代文学家、史学家、历算家。从小敏捷聪慧，年轻时便写得一手好文章。元代末年隐居青岩山，后为明太祖朱元璋征召为中书省掾史，与宋濂同为总裁官，以元十三朝实录和《经世大典》为基础，撰成《元史》。书成之后被擢升为翰林待制，并兼任国史院的编修官等职。

洪武五年（1372），云南尚为元朝统辖之地，明朝打算派使节赴云南谕降梁王归顺新朝天子朱元璋，王祹奉命前往。适逢元朝派遣大臣脱脱到云南征饷。闻知王祹来此劝降云南王，决意加害王祹，当脱脱威逼利诱欲使王祹屈服而遭到严辞驳斥之后，便将王祹杀害。

王祹能诗善文，著有《王忠文公集》、《大事记续编》、《卮辞》等著作。

在自然科学方面，王祹撰有《重修革象新书》二卷。这部书论述了天文学、光学和数学等方面的一些内容，其中包括宇宙理论、恒星观测、光的直线传播与成像原理、圆周率计算等。

王祹，字子充，义乌人。自幼聪明伶俐，成人后，体魄魁梧，身材伟岸。从师柳贯、黄潜，以擅长写文章而著名于世。王祹目睹当时元朝政府的破败情形，写下了七、八千字的文章上呈当朝宰相，虽经危素与张起岩共同举荐，没有任何结果。于是王祹隐居青岩山，潜心著书立说，其名声愈来愈大。

明太祖朱元璋攻克婺州之后，召见王祹，委任他为中书省掾史。征讨江西时，王祹撰颂文献呈朱元璋，明太祖高兴地说：“江南有两位大学者，你和宋濂。论学问之渊博，你不如宋濂；论才思之敏捷，宋濂却不如你。”朱元璋当时创建了礼贤馆，李文忠推荐王祹、许元和王天锡到馆中任职，获朱元璋批准。接着授于王祹以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之职，后升迁为侍礼郎，负责编撰帝王的言行录，同时还兼任南康府事务，施政仁慈，受赐金带以褒奖之。朱元璋将登基时，召回商议礼仪之事，因为一些事违背圣旨，而出任漳州府通判。

洪武元年八月王祹向明太祖上呈奏章说：“祈求上天保佑永世太平之根本，在于皇上心底忠厚、为政宽容，顺天道、合民心。施行暴政，采取严厉手段治国，虽可暂时获得平静，但不能保持常久。现在浙西一带既已平定，应当减少那里的课敛税收。”朱元璋赞许地采纳了王祹的意见，但没有完全接受他的主张。

洪武二年计划编修《元史》，任命王祹与宋濂为总负责人。王祹对于书写历史颇为擅长，他从浩繁的史料中，剔除支节，突显主干，胜任了修改定稿的主编之职。《元史》编成之后，他被提升为翰林待制，同时兼任制造及国史院编修官等职。王

祎还奉命预行教授大本堂，他的讲授不仅循循善诱，而且清楚通达。应召赴朝廷面见皇上，每次都受到皇上赐坐，王祎均能够与皇上从容不迫、轻松自在地交谈。不久，王祎奉命出使吐蕃，尚未抵达目的地，便被召还。

洪武五年正月，朝廷商议招降云南一事，任命王祎持谕降书前往云南征招。到达云南后，王祎向梁王递交谕降书，声称云南王应当从速将其所属版图归顺明朝，否则明朝的征讨大军不日将征伐云南。云南王不听王祎的降谕，并把他安顿在一家普通的住所。过了几天，王祎再次告诫云南王，说：“朝廷顾及到云南百万民众的性命，不忍使他们丧生于刀刃之下。如果你试图恃仗云南距中原路途遥远且地势险要，而违抗明朝的意旨，到时候明朝之威武大军开进昆明，你就后悔莫及了。”梁王闻听此言，被王祎的威吓所慑服，并随即请王祎移住高级的客店。此时，恰逢元朝派遣其大臣脱脱前来云南征饷，脱脱便以危言胁迫梁王，决意要谋害王祎。梁王迫不得已，带王祎去见脱脱，脱脱欲使王祎屈服，王祎正言叱责道：“上天已经决定结束你们元朝的命运，让我明朝取而代之，你们这些残火余烬，怎么敢与日月相争辉！况且你和我都是各自朝廷的使者，我岂能被你所屈服！”有人劝说脱脱道：“王公素负重名，你不可杀害他。”脱脱挥臂而说：“今天纵然是孔夫子在此，他也不得活命。”王祎转而对梁王说：“你要杀我，明朝的大军必然相继开到，你的大祸亦将接踵而至。”于是王祎就义，当时为十二月二十四日。梁王指派使者前往祭奠，并使之衣冠完整地入殓。建文年间，王祎之子王绅向朝廷申诉王祎的事绩，皇上下诏追赠王祎为翰林学士，并赐

封号“文节”。正统年间，改封“忠文”。成化年间，又传旨修建祠堂以祭祀王祹的英灵。（曲安京 译）

【原文】

王祹，字子充，义乌人。幼敏慧，及长，身長岳立，屹有伟度。师柳贯、黄潜，遂以文章名世。睹元政衰敝，为书七八千言上时宰。危素、张起岩并荐，不报。隐青岩山，著书，名日盛。

太祖取婺州，召见，用为中书省掾史。征江西，祹献颂。太祖喜曰：“江南有二儒，卿与宋濂耳。学问之博，卿不如濂；才思之雄，濂不如卿。”太祖创礼贤馆，李文忠荐祹及许元、王天锡，召置馆中。旋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。累迁侍礼郎，掌起居注。同知南康府事，多惠政，赐金带宠之。太祖将即位，召还，议礼。坐事忤旨，出为漳州府通判。

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：“祈天永命之要，在忠厚以存心，宽大以为政，法天道，顺人心。雷霆霜雪，可暂不可常。浙西既平，科敛当减。”太祖嘉纳之，然不能尽从也。

明年修《元史》，命祹与濂为总裁。祹史事擅长，裁烦剔秽，力任笔削。书成，擢翰林待制，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。奉诏预教大本堂，经明理达，善开导。召对殿廷，必赐坐，从容宴语。未久，奉使吐蕃，未至，召还。

五年正月议招谕云南，命祹赍诏往。至则谕梁王，亟宜奉版图归职方，不然天讨旦夕至。王不听，馆别室。他日，又谕曰：“朝廷以云南百万生灵，不欲歼於锋刃。若恃险远，抗明命，龙骧鸛舳，会战昆明，悔无及矣。”梁王骇服，即为改馆。会元遣脱脱征饷，胁王以危言，必欲杀祹。王不得已出

祎见之，脱脱欲屈祎，祎叱曰：“天既讫汝元命，我朝实代之。汝爝火余烬，敢与日月争明邪！且我与汝皆使也，岂为汝屈！”或劝脱脱曰：“王公素负重名，不可害。”脱脱攘臂曰：“今虽孔圣，义不得存。”祎顾王曰：“汝杀我，天兵继至，汝祸不旋踵矣。”遂遇害，时十二月二十四日也。梁王遣使致祭，具衣冠敛之。建文中，祎子绅讼祎事，诏赠翰林学士，谥文节。正统中，改谥忠文。成化中，命建祠祀之。

高士奇传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二七一

【说明】高士奇（1645—1704年），字澹人，浙江钱塘人。他长期在朝廷修书，讲过《春秋左传》，后依袁枢纪事本末体撰成《左传纪事本来》五十三卷。南宋章冲曾将编年体的《春秋左氏传》改编为纪事本末体的《春秋左氏传事类本末》。高士奇所撰《左传纪事本末》优于《春秋左氏传事类本末》，主要表现在文不仅限于《春秋左传》本身，他还参考了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以及两汉有关典籍，对原有内容加以补充考辨，使此书在内容上更为丰富、详实。此书以列国为中心，分为周、鲁、齐、晋、宋、卫、郑、楚、吴、秦、列国等十一目，在一国内又取大标目成篇，如周有“王朝交鲁”、“桓王伐郑”、“王臣之事”、“王室庶孽之祸”四事四篇，全书共列五十三件大事，每事一卷。在正文的每个专题中还穿插着一些内容，附列经史诸子中有关记载者，称为“补逸”；陈列异误，称之“考异”；须加辨证者，谓之“辨说”；点明要旨者，谓之“考证”；有所阐发者，谓之“发明”。在每卷之后，还以“臣士奇曰”的形式，附一篇史论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此书说：“士奇则大事必书，而略于其细，

部居州次，端绪可寻。与冲书相较，虽谓之后来居上可也。”

高士奇，字澹人，浙江钱塘人。所幼好学，善作文章。家贫，以监生资格到顺天府参加乡试，充任书写序班。擅长书法，因明珠推荐，进内廷供奉，授予詹事府录事。调任内阁中书，享受六品官俸禄，朝廷赐他在西安门内居住。康熙十七年，圣祖颁降敕命，因高士奇书写密谕以及纂辑讲章、诗文，供奉有一段时间了，特别赏赐表里十匹、银五百两。十九年，朝廷又告谕吏部优先顺其官序，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。不久补为侍读学士，担任日讲起居注官，调任右庶子。累官提升为詹事府少詹事。

二十六年，圣祖谒陵，于成龙在路上把明珠、余国柱的隐私都揭发出来。圣驾回到京城正值太皇太后驾崩，圣祖不入宫，以于成龙的上言问高士奇，也把情况都说了。圣祖说：“为什么没有人上奏弹劾？”高士奇回答说：“人谁不怕死。”圣祖说：“你们重于四大辅臣吗？想除去就除去，有什么可怕的？”不久，郭琇的上疏奏上，明珠、余国柱于是被罢相。二十七年，山东巡抚张汧因携带银两前往北京行贿的事情被揭发，捉拿法办，在供辞中涉及到高士奇。适逢奉圣谕告诫不要株连，于是将此事搁置不加审问。事情详见《徐乾学传》。高士奇因此上疏说：“臣等研究、编纂，只在值宿之处。宣谕奏对，都经过内廷使者。不是进讲，或许几个月也不能觐见圣上，从来不曾干涉政事。不只臣这样做，以前入宫当值的诸臣，如熊锡履、叶方霭、张玉书、孙在丰、王士禛、朱彝尊等，现今与我同事的诸臣，如陈廷敬、徐乾学、王鸿绪、张英、励

杜讷等，没有不这样做的。只是供奉圣上时间长了，嫌疑一天天增长。张汧无端地怀疑怨恨，含沙射影地进行污蔑，臣将难以自己表明心迹，幸亏依赖圣明在上，诬陷致罪难以得逞。但宫禁清静而幽深，到这里来的都是文采出众的人，怎么能继续玷污这些文学侍臣？臣伏请恩赐回归乡里。”圣祖下令解除高士奇的职任，仍然担任修书的事。二十八年，跟从圣祖巡察南方，到达杭州，圣祖临幸高士奇的别墅西溪山庄，亲笔题“竹窗”的榜额赐给高士奇。

不久，左都御史郭琇上奏弹劾，说：“皇上天未亮即起、很晚才进食，为政事焦虑操劳，励精图治，任用人，治理国事，未曾有丝毫借助于左右。却有原任少詹事高士奇、左都御史王鸿绪等人，他们表里为奸，结党营私。试略陈述他们的罪行。高士奇出身微贱，他开始徒步来到北京，寻觅教家馆的活计聊以为生。皇上因他对书法颇为擅长，不拘资格，提拔他补翰林，让他入南书房供奉，不过是让他考订文章，原来并没有给他参与政事的权利。而高士奇天天想着与人结交，谄媚依附大臣，兜揽政事自取权力，以此谋划分享利益。朝廷内外大小臣僚官吏，没有不知道高士奇的。高士奇的声望名气显赫，乃至于此。这是可以诛伐他的罪行之一。高士奇入内廷时间长党羽已经很多，于是自立门户，又勾结王鸿绪为他的死党，给事中何楷是他的结义兄弟，翰林陈元龙和他是叔侄关系，王鸿绪的哥哥王瑱龄和他是儿女姻亲，都被高士奇委以心腹，在外招揽权势。凡是总督、抚台、藩台、臬台、道台、府台、厅台、县令以及朝廷内的大小官员，都由王鸿绪、何楷等人为他们安排住宿，哄骗他们带来馈赠的财

物，多达成千上万。或者不属于他们一伙保护的，也有一般的规矩，称之为平安钱。高士奇等人的贪赃枉法，全无顾忌，这是他可诛伐的罪行之二。光棍俞子易，在北京横行无忌多年，事情败露逃跑。他在虎坊桥有瓦房六十多间，价值八千两，馈送给高士奇。此外高士奇在顺成门外斜街以及各处房产，是让心腹出面置买的，这里寄留着受贿银两达四十余万。高士奇又在原籍平湖县置田产一千顷，大兴土木，在杭州西溪又广置园囿宅第，凭他这个寻家馆谋生的穷书生，忽然间变成一个拥有数百万家私的富翁。试问钱是从那儿来的？无非是从各官吏那里取得的。官吏的钱又从何而来？不侵吞国家的钱，就是括民脂民膏。这高士奇等人是真正的亡国蠹虫民之盗贼，这是他可诛伐的罪行之三。皇上洞察了解高士奇的罪行，因为各馆编纂诸书尚未完竣，下令解除高士奇的官职只管修书，爱惜保全他的恩德太大了！但高士奇不想改过自新，仍然坚持作恶，毫不悔改。当圣驾到南方巡察，皇上告谕臣僚严禁馈送，否则以军法治罪。只有高士奇和王鸿绪实在不怕死，王鸿绪在淮、扬等处收罗各官吏馈送的钱一万两，暗中送给高士奇。淮、扬如此，其他地方也可想而知。这高士奇等人欺君不法，背公行私，这是他可诛伐的罪行之四。王鸿绪、陈元龙是殿试一等出身，俨然是文士中的杰出人物，竟然不顾公正的舆论，曲意依附大臣，无所不至。这些人苟且贪图富贵，伤名声毁教化，难道不玷污朝廷而羞辱当代文士吗？总之高士奇、王鸿绪、陈之龙、何楷、王项龄等人，有豺狼的本性，蛇蝎的心肠，鬼蜮的形骸。害怕权势的人已观望到情况但不敢说，趋向权势的人还拥戴他们而且不肯说。臣

假若不说，就有负圣上的恩遇。所以不回避嫌疑怨恨，请求立刻把贬斥赐给他们，依法公开处置，这将是天下最值得庆幸的事。”上疏进呈，高士奇等人均以年老而去职回到原籍。副都御史许三礼又上疏弹劾卸任的尚书徐乾学与高士奇是姻亲，他们招摇接受贿赂，相互为表里。吏部议论因所弹劾的内容没有根据，结果搁置一旁。

三十三年，高士奇被召到北京修书。高士奇到京以后，仍然当值南书房。三十六年，因要赡养母亲请求还乡，朝廷下诏允许他还乡，特别授予詹事府詹事。不久提升为礼部侍郎，因母亲年老未前往赴任。四十二年，圣祖南巡视察，高士奇在淮安迎接圣驾，扈驾到杭州。至圣祖回京，高士奇又随从到京师，多次入宫策对，赐予优厚。圣祖看着侍臣说：“朕开始读书，内监以《四子》本经教授，作应试之文；得到高士奇，开始懂得作学问的门径。起初见高士奇拿到古人诗文，一看就知道它的时代，心里感到奇怪，不久，朕也能这样做。高士奇没有战阵之功，而朕待他优厚，因他裨益我的学问，作用很大。”不久遣送高士奇回乡，这一年就在家去世。圣祖深深地怜惜他，命令加给他全部安葬费用，授他的儿子庶吉士高與为编修。不久赐谥号为文恪。

（曾贻芬 译）

【原文】

高士奇，字澹人，浙江钱塘人。幼好学能文。贫，以监生就顺天乡试，充书写序班。工书法，以明珠荐，入内廷供奉，授詹事府录事。迁内阁中书，食六品俸，赐居西安门内。康熙十七年，圣祖降敕，以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讲章、诗文，

供奉有年，特赐表里十匹、银五百。十九年，复谕吏部优叙，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。寻补侍读，充日讲起居注官，迁右庶子。累擢詹事府少詹事。

二十六年，上谒陵，于成龙在道尽发明珠、余国柱之私。驾旋，值太皇太后丧，不入宫，以成龙言问士奇，亦尽言之。上曰：“何无人劾奏？”士奇对曰：“人孰不畏死。”帝曰：“若辈重于四辅臣乎？欲去则去之矣，有何惧？”未几，郭诱疏上，明珠、国柱遂罢相。二十七年，山东巡抚张汧以賫银赴京行贿事发，逮治，狱辞涉士奇。会奉谕戒勿株连，于是置弗问。事详《徐乾学传》。士奇因疏言：“臣等编摩纂辑，惟在直庐。宣谕奏对，悉经中使。非进讲，或数月不覲天颜，从未干涉政事。不独臣为然，前入直诸臣，如熊锡履、叶方霭、张玉书、孙在丰、王士禎、朱彝尊等，近今同事诸臣，如陈廷敬、徐乾学、王鸿绪、张英、励杜讷等，莫不皆然。独是供奉日久，嫌疑日滋。张汧无端疑怨，含沙污蔑，臣将无以自明，幸赖圣明在上，诬拘难施。但禁廷清秘，来兹萋斐，岂容仍玷清班？伏乞赐归田里。”上命解任，仍领修书事。二十八年，从上南巡，至杭州，幸士奇西溪山庄，御书“竹窗”榜额赐之。

未几，左都御史郭琇劾奏曰：“皇上宵旰焦劳，励精图治，用人行政，未尝纤毫假手左右。乃有原任少詹事高士奇、左都御史王鸿绪等，表里为奸，植党营私，试略陈其罪。士奇出身微贱，其始徒步来京，觅馆为生。皇上因其字学颇工，不拘资格，擢补翰林。令入南书房供奉，不过使之考订文章，原未假之与闻政事。而士奇日思结纳，谄附大臣，揽事招权，以

图分肥。内外大小臣工，无不知有士奇者。声名赫奕，乃至如此。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。久之羽翼既多，遂自立门户，结王鸿绪为死党，给事中何楷为义兄弟，翰林陈元龙为叔侄，鸿绪兄项龄为子女姻亲，俱寄以心腹，在外招揽。凡督、抚、藩、臬、道、府、厅、县及在内大小卿员，皆鸿绪、楷等为之居停，哄骗馈至，成千累万。即不属党护者，亦有常例，名之曰‘平安钱’。是士奇等之奸贪坏法，全无顾忌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。光棍俞子易，在京肆横有年，事发潜遁。有虎坊桥瓦房六十余间，价值八千金，馈送士奇。此外顺成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，令心腹出名置买，寄顿贿银至四十余万。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，大兴土木，杭州西溪广置园宅。以觅馆糊口之穷儒，忽为数百万之富翁。试问金从何来？无非取给于各官。官从何来？非侵国帑，即剥民膏。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，其罪之可诛者三也。皇上洞悉其罪，因各馆编纂未竣，令解任修书，矜全之恩至矣！士奇不思改过自新，仍怙恶不悛。当圣驾南巡，上谕严戒馈送，以军法治罪。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，鸿绪在淮、扬等处，招揽各官馈送万金，潜遗士奇。淮、扬如此，他处可知。是士奇等欺君灭法，背公行私，其罪之可诛者四也。王鸿绪、陈元龙鼎甲出身，俨然士林翘楚；竟不顾清议，依媚大臣，无所不至。苟图富贵，伤败名教，岂不玷朝班而羞当世之士哉？总之，高士奇、王鸿绪、陈元龙、何楷、王项龄等，豺狼其性，蛇蝎其心，鬼蜮其形。畏势者既观望而不敢言，趋势者复拥戴而不肯言。臣若不言，有负圣恩。故不避嫌怨，请立赐罢斥，明正典刑，天下幸甚。”疏入，士奇等俱休致回籍。副都御史许

三礼复疏劾解任尚书徐乾学与士奇姻亲，招摇纳贿，相为表里。部议以所劾无据，得寝。

三十三年，召来京修书。士奇既至，仍直南书房。三十六年，以养母乞归，诏允之，特授詹事府詹事。寻擢礼部侍郎，以母老未赴。四十二年，上南巡，士奇迎驾淮安，扈跸至杭州。及回銮，复从至京师，屡入对，赐予优渥。上顾侍臣曰：“朕初读书，内监授以《四子》本经，作时文；得士奇，始知学问门径。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，一览即知其时代，心以为异，未几，朕亦能之。士奇无战阵功，而朕待之厚，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。”寻遣归，是年卒于家。上深惜之，命加给全葬，授其子庶吉士與为编修。寻谥文恪。

毕沅传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三三二

【说明】毕沅（1730—1797年），字纘衡，江南镇洋（今江苏太仓）人。他嗜好著述，而且爱才下士，这是他能吸收一批著名史家撰成《续资治通鉴》的主要原因。康熙年间，徐乾学会邀万斯同、闫若璩、胡渭等人，编成《资治通鉴后编》一百八十四卷，体例全仿《资治通鉴》，叙宋、元两代史事。大约在乾隆三十七年前后，毕沅开始组织人纂修《续资治通鉴》，以《资治通鉴后编》为基础，博采宋、辽、金、元四史以及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等一百多种典籍，重新修订，经过二十年的努力，四易其稿，到乾隆五十七年撰成。其书二百二十卷，上与《资治通鉴》相接，记事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，迄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，叙述了宋、辽、金、元四朝共四百余年的历史。综观全书，北宋部分编辑较精，而且辽、金大事也无一遗漏，纠正了以前详宋而忽略辽、金、元的弊病。《续资治通鉴》特别注意补充《资治通鉴后编》的缺略部分，引用史料时，一概采取原文收录的方式，但失于剪裁。另外，《续资治通鉴》也仿《资治通鉴》，在文中附有“考异”。此书编辑有法，材料丰富，近世

学者对此书多有较高评价，认为诸续《通鉴》书中，此书最佳。

毕沅，字纘衡，江南镇洋人。乾隆十八年中举人，授内阁中省官，担任军机处章京。二十五年中一等第一名进士，授予修撰。又调为庶子。三十一年授甘肃巩秦阶道官，随总督明山出关勘察屯田之事。调任安肃道。提升为陕西按察使。高宗东巡，毕沅到行在觐见高宗，备述甘肃干旱的情况。圣谕治理赈济之事，并且免去拖欠的租赋四百万。毕沅提升为布政使，多次保护巡抚。兵征金川，朝廷派遣毕沅督管军饷，军队军饷供应充足，授毕沅巡抚。黄河、洛水、渭水都涨水，朝邑被水淹，毕沅掌管赈济事，全活的百姓颇众。招募百姓开垦兴平、盩厔、扶风、武功的荒地，得到耕地八十余顷。疏浚泾阳龙洞渠，灌溉民田。对嘉峪关外的镇西、迪化来赴乡会试的士子，毕沅上奏请求给他们驿站马匹做交通工具。设置姬氏《五经》博士，奉祀文、武、成、康四王以及周公陵墓。修缮华狱庙以及汉、唐以来的著名古迹，收集碑碣并收藏在学宫。多次代理总督。四十一年，朝廷赐毕沅孔雀翎。四十四年，遭母丧，辞官服丧。四十五年，陕西巡抚空缺，朝廷告谕：“毕沅在西安时间长久，守制将近一年，命令他前往代理巡抚，这不是开在任守制的先例。”

四十六年，甘肃撒拉尔回人苏四十三叛乱，毕沅会合西安将军伍弥泰、提督马彪一起发兵讨伐苏四十三。叛乱事平定后论功劳，赐毕沅一品顶带。甘肃冒领赈济钱粮的事被揭发，御史钱沅弹劾毕沅向上循私，于是降为三品顶戴。四十

八年，又还原官品，不久实授巡抚。四十九年，甘肃盐茶厅回人田应五又叛乱，毕沅派兵分路搜剿。高宗命令大学士阿桂视察军队，毕沅管理军需和驿传，能按时供应，屡次得到上面的奖励。

毕沅先后镇抚陕西十年，曾上奏说：“使民富足的关键，最主要的是农田。关右大河，例如泾水、渭水、灞水、泾水、沔水、瀋水、潦水、潏水、黄河、洛水、漆水、沮水、汧水、汭水众河，源远流长。如果能就近疏导引流，筑堤堰开水渠，按时蓄洪，自然而然就没有水旱之害。自古以来云中、北地、五原、上郡等处施行畜牧，是天下的富饶之地，如果酌情筹集闲散款项，买牛羊驼马，用来给百姓试验放牧，等到繁殖出小牲畜，交还官府的款项，余下的就给此人做为资本。耕作和畜牧两者相兼顾，实在是边地获得无穷好处的良策。”此奏议未获准施行。

乾隆五十年，毕沅调任河南巡抚。上奏说：“黄河以北各府都忧患干旱，各府所属仓储，因蠲缓赋税赈恤灾民，所存粮粟不多，请留漕运粮粟二十万以备赈荒。”接着又请求延缓征收百姓所欠钱粮，并且审视赈济之事，高宗用情词恳挚的圣谕嘉奖毕沅。命令毕沅到胎簪山寻找淮河的真正源头，以御制《淮源记》赐给他。五十一年，赐毕沅黄马褂。授予湖广总督之职。伊阳盗贼秦国栋戕杀官吏，高宗责备毕沅捕治盗贼不力，命令他仍降回巡抚。五十三年，又授他为湖广总督。长江在荆州决口，拿出百万钱治理长江。毕沅上奏说：“长江自松滋以下至荆州万城堤，拐弯向东北流，向南直逼窖金，荆水至此无处宣洩。请准许在对岸筑杨林洲土坝、鸡嘴

石坝，迫使水流向南，冲刷的洲沙不至于壅塞河道。”又请求修襄阳老龙堤、常德石柜堤，潜江仙人堤，开凿四川、湖北大江险滩，以便利云南的铜运。

五十九年，陕西安康、四川大宁都兴起邪教，声称传于湖北，毕沅前往襄阳、鄖阳按察整治，被降为山东巡抚。高宗因明年将传位给皇太子，下令总督巡抚按察百姓所欠钱粮一并豁免，毕沅上奏山东蠲免累积欠租赋八百八十七万，常平社仓米谷五十万四千余石。六十年，毕沅仍授湖广总督。

湖南苗人石三保等叛乱，命令毕沅前往荆州、常德督管军饷，因运输军饷周密妥贴，被赐于孔雀翎。嘉庆元年，枝江百姓聂人杰等依仗邪教叛乱，攻破保康、来凤、竹山，围困襄阳，毕沅从辰州到枝江捕治叛乱者。当阳又被叛乱者攻陷，毕沅又移驻到荆州，仁宗命令解除毕沅的总督职务。不久收复当阳，擒获叛乱首领张正谟等人，朝廷又命令毕沅仍为总督，还授予二等轻车都尉可以父子相袭的官职。不久上奏叛乱头领石三保、吴半生、吴八月等都被抓获，只有石柳邓尚未捕获，请准许撤走各省兵马，留下二三万兵力分别驻守在苗疆的要隘处。仁宗告谕说：“撤兵是朕所希望的，但是平陇尚未收复，石柳邓还未抓到，怎么能这么快就议论此事？”不久抓获石柳邓。仁宗命令毕沅迅速赶往湖南镇抚。毕沅上疏说：“樊城是汉南的一个都会，请求准许建一座砖城，用做工付酬代替赈济。”二年，请求将提督府移到辰州，增设总兵驻扎在花园汛。不久上报朝廷疾病发作，手脚麻木不仁，朝廷赐予活络丸。不久去世，赠太子太保之官职。四年，追论毕沅在教匪初起时不明敌情贻误时机，滥用军需款项，夺去

父子相袭的官职，没收家产。

毕沅以文学起家，爱护人才，能谦恭地对待贤能之人，为官有很多善举，然而不擅长治理军队，又容易被部下所蒙蔽，于是功名不得善终。（曾贻芬译）

【原文】

毕沅，字纘衡，江南镇洋人。乾隆十八年举人，授内阁中书，充军机处章京。二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，授修撰。再迁庶子。三十一年，授甘肃巩秦阶道，从总督明山出关勘屯田。调安肃道。擢陕西按察使。上东巡，覲行在，备言甘肃旱。谕治赈，并免逋赋四百万。擢布政使，屡护巡抚。师征金川，遣沅督饷，军无匮，授巡抚。河、洛、渭并涨，朝邑被水。治赈，全活甚众。募民垦兴平、盩厔、扶风、武功荒地，得田八十余顷。浚泾阳龙洞渠，溉民田。嘉峪关外镇西、迪化士子赴乡会试者，奏请给驿马。置姬氏《五经》博士，奉祀文、武、成、康四王及周公陵墓。修华岳庙暨汉、唐以来名迹，收碑碣储学宫。屡署总督。四十一年，赐孔雀翎。四十四年，丁母忧，去官。四十五年，陕西巡抚缺员，谕：“沅在西安久，守制将一年，命往署理，非开在任守制例也。”

四十六年，甘肃撒拉尔回苏四十三为乱，沅会西安将军伍弥泰、提督马彪发兵讨之。事平论功，赐一品顶带。甘肃冒赈事发，御史钱沣劾沅瞻徇，降三品顶戴。四十八年，复还原品，寻实授巡抚。四十九年，甘肃盐茶厅回田五复乱，沅遣兵分道搜剿。上命大学士阿桂视师，沅治军需及驿传供亿，屡得旨奖励。

沅先后抚陕西十年，尝奏：“足民之要，农田为上。关右

大川，如泾、渭、灞、浚、沔、沔、河、洛、漆、沮、汧、汭诸水，流长源远。若能就近疏引，筑堰开渠，以时蓄泄，自无水旱之虞。古来云中、北地、五原、上郡诸处畜牧，为天下饶，若酌筹闲款，市牛羊驼马，为畀民试牧；俟有孳生，交还官项，余则畀其人以为资本。耕作与畜牧相兼，实为边土无穷之利。”议未行。

五十年，调河南巡抚。奏：“河北诸府患旱，各属仓储，蠲缓赈恤，所存无多，请留漕粮二十万备赈。”既又请缓征民欠钱粮，并展赈，上温谕嘉之。命诣胎簪山求淮水真源，御制《淮源记》以赐。五十一年，赐黄马褂。授湖广总督。伊阳盗秦国栋戕官，上责沅捕治未得，命仍回巡抚。五十三年，复授湖广总督。江决荆州，发帑百万治工。沅奏：“江自松滋下至荆州万城堤，折而东北流，南逼窑金，荆水至无所宣泄。请筑对岸杨林洲土坝、鸡嘴石坝，逼溜南趋，刷洲沙无致壅遏。”又请修襄阳老龙堤、常德石柜堤、潜江仙人堤，凿四川、湖北大江险滩，便云南铜运。

五十九年，陕西安康、四川大宁邪教并起，称传自湖北，沅赴襄阳、郧阳按治，降授山东巡抚。上以明年归政，令督抚察民欠钱粮豁免，奏蠲山东积逋四百八十七万、常平社仓米谷五十万四千余石。六十年，仍授湖广总督。

湖南苗石三保等为乱，命赴荆州、常德督饷，以运输周妥，赐孔雀翎。嘉庆元年，枝江民聂人杰等挟邪教为乱，破保康、来凤、竹山，围襄阳，沅自辰州至枝江捕治。当阳又陷，复移驻荆州，上命解沅总督。旋克当阳，获乱渠张正谟等，复命沅为总督如故，予二等轻军都尉世职。寻奏乱渠石

三保、吴半生、吴八月等皆就获，惟石柳邓未获；请撤各省兵，留二三万分驻苗疆要隘。上谕曰：“撤兵朕所愿，但平陇未克，石柳邓未获，岂能遽议及此？”寻获石柳邓。上命沅驰赴湖南镇抚。疏言：“樊城为汉南一都会，请建砖城，以工代赈。”二年，请以提督移辰州，增设总兵驻花园汛。寻报疾作，手足不仁，赐活络丸。旋卒，赠太子太保。四年，追论沅教匪初起失察贻误，滥用军需帑项，夺世职，籍其家。

沅以文学起，爱才下士，职事修举；然不长于治军，又易为属吏所蔽，功名遂不终。

王鸣盛传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一

【说明】王鸣盛（1722—1798年），字凤喈，嘉定（今江苏嘉定）人。他学识淹通，自己对此颇得意，曾说：“我于经有《尚书后案》，于史有《十七史商榷》，于子有《蛾术篇》，于集有诗文，以敌弇州四部，其庶几乎？”《十七史商榷》一百卷，是与《廿二史札记》、《二十史考异》鼎立为三的史学名著。此书所谓的《十七史》，包括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等十七部正史。书中虽然也论及《旧唐书》和《旧五代史》，但未列入数内。王鸣盛在自序谈及作书的目的：“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，或遇典制茫昧，事迹糅葛，地理职官，眼眯心瞿。试以予书为孤竹老马，置于其旁而参阅之，疏通而证明之，不觉如关开节解，筋转脉摇，殆或不无小助也。”王鸣盛详考史实，勘正本文错误，确实达到了撰述此书的目的，有益于后学，后人对此书评价甚高。对此书中的不少谬失，当时人就已察觉，并向他提出，遗憾的是，王鸣盛自视颇高，不肯正视，故仍保留至今。另外，

《蛾术篇》作为一部内容广泛的学术著作，也颇有影响。

王鸣盛，字凤喈，嘉定人。幼时随长洲沈德潜学习诗赋，后又从惠栋学习经书之义理，于是精通汉学。乾隆十九年，因考中一等进士而授翰林院编修，参加大考又因翰詹第一，而提升为侍读学士。担任福建乡试正考官，不久提升为内阁学士，兼礼部侍郎。因滥支驿站马匹而获罪，降为光禄寺卿。遭母丧，归乡服丧，于是就不再出来为官。

王鸣盛生性俭约朴素，没有声音女色玩赏物品的欢娱，安逸地坐在一间屋里，发出吁唔之声如同一介寒士。曾经说：“汉人讲经必定守家法，自从唐代贞观年间撰述诸经义疏而家法丧失，宋代元丰年间以新经学取士而汉学几乎绝迹，现在喜好古学的儒者都知道尊崇注疏，然而注疏中唯有《诗》、《三礼》及《公羊传》还是汉代人的家法，其他经书的注则出于魏、晋时人，还不深厚完备。”王鸣盛著《尚书后案》三十卷，专门阐述郑康成的学说，如果其中郑注有亡逸，就采用马融、王肃的注补上。《孔传》虽出于东晋，《孔传》的训诂还有传授，间或也一取《孔传》的训诂，又说东晋所献的《太誓》是伪书，而唐代人所指责的《太誓》不是伪书，所以在书中附今文《太誓》一篇，保存古代的功绩，自己说此书不逊于惠栋的《周易述》。又著《周礼军赋说》四卷，发挥弘扬郑玄的宗旨。又撰《十七史商榷》一百卷，在一史中的纪、志、表、传之间互相考核，因而发现它们的异同，又取野史丛说用此辨证它的谬误，对于地理、职官、典章、名物往往极为详尽。另外撰著《蛾术编》一百卷，此书列目为十篇：

《说录》、《说字》、《说地》、《说制》、《说人》、《说物》、《说集》、《说刻》、《说通》、《说系》，大概是模仿王应麟、顾炎武撰书之意，但援引内容尤其广博。王鸣盛的诗以才华辅托学问，以音韵表达情感。王鸣盛的古文尊用欧阳修、曾巩的作法，阐发许慎、郑玄的道理，还有《诗文集》四十卷。他于嘉庆二年去世，终年七十六岁。（何双生 译）

【原文】

王鸣盛，字凤喈，嘉定人，幼从长洲沈德潜受诗，后又从惠栋问经义，遂通汉学。乾隆十九年，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，大考翰詹第一，擢侍读学士。充福建乡试正考官，寻擢内阁学士，兼礼部侍郎。坐滥支驿马，左迁光禄寺卿。丁内艰，遂不复出。

鸣盛性俭素，无声色玩好之娱，晏坐一室，呶唔如寒士。尝言：“汉人说经必守家法，自唐贞观撰诸经义疏而家法亡，宋元丰以新经学取士而汉学殆绝，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，然注疏惟《诗》、《三礼》及《公羊传》犹是汉人家法，他经注则出魏、晋人，未为醇备。”著《尚书后案》三十卷，专述郑康成之学，若《郑注》亡逸，采马、王注补之。《孔传》虽出东晋，其训诂犹有传授，间一取焉。又谓东晋所献之《太誓》伪，而唐人所斥之《太誓》非伪，故附书今文《太誓》一篇，存古之功，自谓不减惠氏《周易述》也。又著《周礼军赋说》四卷，发明郑氏之旨。又《十七史商榷》一百卷，于一史中纪、志、表、传互相稽考，因而得其异同，又取稗史丛说以证其舛误，于舆地、职官、典章、名物每致详焉。别撰《蛾术编》一百卷，其为目十：《说录》、《说字》、《说地》、

《说制》、《说人》、《说物》、《说集》、《说刻》、《说通》、《说系》，盖仿王应麟、顾炎武之意，而援引尤博。诗以才辅学，以韵达情。古文用欧、曾之法，阐许、郑之义，有《诗文集》四十卷。嘉庆二年，卒，年七十六。

钱大昕传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一

【说明】钱大昕（1728—1804年），字晓征，嘉定（今江苏嘉定）人，清代著名的史学家、金石学家和音韵学家。他曾参加过《热河志》、《续通志》、《一统志》的编修，一生著述甚丰，属于史学范围的除《二十二史考异》外，还有《元史艺文志》、《诸史拾遗》、《通鉴注辨证》等等，而《潜研堂文集》和《十驾斋养新录》是由长年积累的读书笔记、序跋、书信、答问等文字集结成的两部综合性著作。最能体现钱大昕史学造诣的还是《二十二史考异》。此书一百卷，所考二十二史，是指二十四史中除《旧五代史》和《明史》以外的二十二种正史。钱大昕认为“二十二家之书，文字烦多，义例纠纷。輿地则今昔异名，侨置殊所；职官则沿革迭代，冗要逐时。欲其条理贯串，了如指掌，良非易事”。于是仿《通鉴考异》体例，编撰此书，考订二十二史的各个方面。考订文字也是此书的一大特色。钱大昕认为史文的训诂对正确理解文义和校勘讹误的重要，很重视训诂，并且也不忽略少数民族词汇等等。钱大昕认为“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：曰輿地，曰官制，曰氏族”。所以《二十二史考异》对《地理志》、《职

官志》都考订得比较精审，另外，对名物、典章也多有涉及。由于钱大昕学识渊博，能触类旁通，故在考证时，能以史证史，也能以经证史，以金石铭文等资料证史，以至于据音韵学训读史书文字，所以考订出二十二史的很多错误，有助于人们能在较可靠的史料基础上研究历史。另外，对于钱大昕的元史研究也不忽视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已取得的成就，更重要的是他开了研究元史之前河。

钱大昕，字晓征，嘉定人。乾隆十六年参加朝廷召试为举人，授予内阁中书官。十九年举进士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，在散馆学习期满授予编修。参加大考中二等第一名，升为右春坊右赞善。历任山东乡试、湖南乡试正考官，浙江乡试副考官。参加大考中一等第三名，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。三十二年，请求准假还乡。三十四年，补原来的官职。入宫当值上书房，调任詹事府少詹事，担任河南乡试正考官。不久为广东提督学政。四十年，遭父丧，丧服期满，又遭母丧，有病不再出来为官。嘉庆九年去世，终年七十七岁。

钱大昕少年聪慧，喜欢读书。当时元和惠栋、吴江沈彤以经术而闻名于世，钱大昕向他们求学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又求学唐代以前的子、史以及小学。钱大昕能将这些学问推而广之，错综条贯，发古人之所未发，有新的见解。担任中书时，和吴烺、褚寅亮一起学习梅氏算术。到他进入翰林院，礼部尚书何宗国一生研究天文，年事已高，听说钱大昕善于算术，就先往见他，说：“现在同馆诸公当中谈论算术的人很少了。”

钱大昕对于中、西两法，剖析得非常透彻，无所遗漏。用

中西法观察历史，自《太初历》、《三统历》、《四分历》，中经《大衍历》，下至《授时历》，对于历法中的朔望薄蚀，凌犯进退，都毫无遗漏地选择出来。汉代《三统术》是七十多家历法的始祖，其中错字深义，没有人能勘正解释。钱大昕推演《三统术》，根据《汉书·律历志》用以阐述刘歆的学说，裁定《律历志》的讹误，二千年来已绝迹的学问，明显得如启发蒙昧。钱大昕又说：“按古法岁阴和太岁不同，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所列摄提以下十二名，都说的是岁阴的所在。《史记》记太初元年年名为焉逢摄提格，这是岁阴，不是太岁。东汉以后不用岁阴纪年，而又不懂太岁超辰算法，就以太初元年为丁丑年，这样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记载都相反了。”又说：“《尚书纬》的四游升降学说，就是西法的日最高、最低的学说，宋代杨忠辅《位天术》用距差乘躔差，减去气汎积为定积，梅文鼎说郭守敬的加减岁余法就出自于此。但是《统天术》求汎积，一定先减气差十九日有余，与郭宗敬的说法又不同，对此梅文鼎无法解释。钱大昕推算它们相同，凡推算气朔，一定以甲子日为起算，现在《统天术》上元冬至乃是戊子日，不遇甲子，按《授时历》的推算法应当加上气应二十四日有余，就能从甲子日起算。现在减去气差，是以上元冬至后甲子日为起算。既然如此，应当减去气应三十五日有余，现在减去十九日有余的，是除去躔差之数不算。求天正经朔又减去闰差的，经朔应当从合朔起算。现在推得《统天术》上元冬至后第一个朔日是乙丑戌初二刻弱，所以一定要减闰差而后用朔实相除，所得结果就是《授时历》的朔应。”

钱大昕以辞章闻名于世，沈德潜编《吴中七子诗选》，钱大昕列居首位。以后就精心研究经史，对于经义中众说纷纭难以决断的内容，都能剖析阐述其源流，至于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天文算术、地理、氏族、金石以及古人的爵位乡里、事迹、年龄，钱大昕也了如指掌。还有古人的奸贤是非有疑问好像难以明白的，典章制度以前人们不能明断的，钱大昕都有明确的见解。只不喜欢道、释二氏之书，他曾说：“树立道德、树立功业，树立议论，这是我们儒家的不朽之处。先儒说释氏近于墨家，我以为释氏也最终与杨氏相同只为自己而已。他们抛弃父母而去学道，是看待自己重于父母。”

钱大昕在翰林院时，常参予修《音韵述微》、《续文献通考》、《续通志》、《一统志》、《天球图》诸书。他自己著述有《唐石经考异》一卷，《经典文字考异》一卷，《声类》四卷，《廿二史考异》一百卷，《唐书史臣表》一卷，《唐五代学士年表》二卷，《宋学士年表》一卷，《元史氏族表》三卷，《元史艺文志》四卷，《三史拾遗》五卷，《诸史拾遗》五卷，《通鉴注辨证》三卷，《四史朔闰考》四卷，《吴兴旧德录》四卷，《先德录》四卷，洪文惠、洪文敏、王伯厚、王弇州四家《年谱》各一卷，《疑年录》三卷，《潜研堂文集》五十卷，《诗集》二十卷，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二十五卷，《养新录》二十三卷，《恒言录》六卷，《竹汀日记钞》三卷。同族子弟钱塘、钱坫、能传播钱大昕的学问。（曾贻芬 译）

【原文】

钱大昕，字晓征，嘉定人。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，授内阁中书。十九年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大考

二等一名，擢右春坊右赞善。累充山东乡试，湖南乡试正考官，浙江乡试副考官。大考一等三名，擢翰林院侍讲学士。三十二年，乞假归。三十四年，补原官。入直上书房，迁詹事府少詹事，充河南乡试正考官。寻提督广东学政。四十年，丁父艰，服阙，又丁母艰，病不复出。嘉庆九年卒，年七十七。

大昕幼慧，善读书。时元和惠栋、吴江沈彤以经术称，其学求之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又求之唐以前子、史、小学。大昕推而广之，错综贯串，发古人所未发。任中书时，与吴烺、褚寅亮同习梅氏算术。及入翰林，礼部尚书何国宗世业天文，年已老，闻其善算，先往见之，曰：“今同馆诸公谈此道者鲜矣。”

大昕于中、西两法，剖析无遗。用以观史，自《太初》、《三统》、《四分》，中至《大衍》，下迄《授时》，朔望薄蚀，凌犯进退，抉摘无遗。汉《三统术》为七十余家之权舆，讹文奥义，无能正之者。大昕衍之，据班《志》以阐刘歆之说，裁《志》文之讹，二千年已绝之学，昭然若发蒙。大昕又谓：“古法岁阴与太岁不同，《淮南天文训》摄提以下十二名，皆谓岁阴所在。《史记》大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者，岁阴，非太岁也。东汉后不用岁阴纪年，又不知太岁超辰之法，乃以太初元年为丁丑岁，则与《史》、《汉》之文皆悖矣。”又谓：“《尚书纬》四游升降之说，即西法日躔最高、卑之说，宋杨忠辅《统天术》以距差乘躔差，减气汎积为定积，梅文鼎谓郭守敬加减岁余法出于此。但《统天》求汎积，必先减气差十九日有奇，与郭又异，文鼎不能言。大昕推之同，凡步气朔，必以甲子日起算，今《统天》上元冬至乃戊子日，不值甲子，依《授时》法当加气应二十四日有奇，乃得从甲子起。

今减去气差，是以上元冬至后甲子日起算也。既如此，当减气应三十五日有奇，今减十九日有奇者，去躔差之数不算也。求天正经朔又减闰差者，经朔当从合朔起算。今推得《统天》上元冬至后等一朔乃乙丑戊初二刻弱，故必减闰差而后以朔实除之，即《授时》之朔应也。”

大昕始以辞章名，沈德潜《吴中士子诗选》，大昕居一。既乃研精经、史，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，皆能剖析源流。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天算、地理、氏族、金石以及古人爵里、事实、年龄，了如指掌。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，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，皆有确见。惟不喜二氏书，尝曰：“立德立功立言，吾儒之不朽也。先儒言释氏近于墨，予以为释氏亦终于杨氏为己而已。彼弃父母而学道，是视己重于父母也。”

大昕在馆时，常与修《音韵述微》、《续文献通考》、《续通志》、《一统志》、《天球图》诸书。所著有《唐石经考异》一卷，《经典文字考异》一卷，《声类》四卷，《廿二史考异》一百卷，《唐书史臣表》一卷，《唐五代学士年表》二卷，《宋学士年表》一卷，《元史氏族表》三卷，《元史艺文志》四卷，《三史拾遗》五卷，《诸史拾遗》五卷，《通鉴注辨证》三卷，《四史朔闰考》四卷，《吴兴旧德录》四卷，《先德录》四卷，洪文惠、洪文敏、王伯厚、王弇州四家《年谱》各一卷，《疑年录》三卷，《潜研堂文集》五十卷，《诗集》二十卷，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》二十五卷，《养新录》二十三卷，《恒言录》六卷，《竹汀日记钞》三卷。族子塘、埏，能传其学。

阎若璩传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一

【说明】阎若璩（公元16636—1704年），字百诗，号潜兵，山西太原人，古代经营盐业，迁居江苏淮安。曾帮助徐乾学在洞庭山修纂《大清一统志》。他长于考据，对地理学方面造诣精深，所著《四书释地》。对人名、物类、训诂、典制等考证有据。著作有《古文尚书疏证》、《潜丘杞记》、《毛朱诗说》、《日知录补正》、《博渊掌录》等。

阎若璩字百诗，太原人。世代经营盐业，在淮安侨居。父亲阎修龄，因为有写诗的专长而自成一家。阎若璩年幼时多病，读书时默默牢记口不出声，十五岁时，因为是商籍的缘故补为山阳县县学的学生。他研究经籍和历史，通过深造自己有所心得。曾经集陶弘景、皇甫谧的话写在柱子上说：“一物不知，以为深耻；遭人而问，少有暇日。”他立下的志向就是这样。海内的名流经过淮安，必定去他的家里。二十岁时，读《古文尚书》到第二十五篇，就怀疑它是伪书。潜心研究三十多年，全部得出它的症结所在，写出《古文尚书疏证》八卷。引经据典，一一指出其中的矛盾所在，《古文尚书》的伪

处于是大白。所列举的一百二十八条，毛奇龄在《古文尚书冤词》一书中千方百计予以驳斥，最终也不能用强辞夺正理，这是由于有根据的论述先立于不败之地的缘故。

康熙元年，他到北京游历，不久便回到太原原籍，补廪生。康熙十八年，参加博学鸿儒科的考试，落第。昆山顾炎武拿自己所著的《日知录》向他征求意见，阎若璩就给他改定了几条，顾炎武便虚心地采纳了。编修汪琬著有《五服考异》，阎若璩指出了书中的错误，为尚书徐乾学所叹服。等到徐乾学奉敕命修纂《一统志》，在洞庭山开设了修纂局，阎若璩也参予了这件事情。阎若璩对地理方面尤其精密确实，对山川的形势，州郡的沿革，了如指掌，著有《四书释地》五卷，凡关于人名、物类、训诂、典制，每件事必定寻根究底，说法必定要求有所依据，广泛地引用材料作依据或例证，很多地方能够互相贯通。又根据《孟子》的七篇，参考《史记》等书，著有《孟子生卒年月考》一卷。又著有《潜丘札记》六卷、《毛朱诗说》一卷，亲手校订《困学纪闻》二十卷，依据浚仪的旧址而驳正笺说加以推广。此外还有《日知录补正》、《丧服异注》，宋朝刘攽、李焘、马端临、王应麟四家的遗闻逸事和《博湖掌录》等著作。

清世宗胤禛还是皇子时，就听说他的名声，把他请到府邸，索取阎若璩的著作阅读，每进献一篇看了以后必定加以称赞。病重时，他请求移住城外，用大床做成大轿，上面蒙了青纱帐，用二十人抬了它出城，安稳得如卧床一样。康熙四十三年，去世，享年六十九岁。清世宗派使者料理阎若璩的丧事，并亲自作诗四首，还写了文章祭他，其中有“读书

等身，一字无假，孔思周情，旨深言大”的话，别人都说只有阎若璩才能配得上这些话。（何双生 译）

【原文】

阎若璩，字百诗，太原人。世业监，侨寓淮安。父修龄，以诗名家。若璩幼多病，读书阅记不出声，年十五，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。研究经史，深造自行。尝集陶弘景、皇甫谧语题其柱云：“物不知，以为深耻；遭人而问，少有暇日。”其立志如此，海内名流过淮，必主其家。年二十，读《尚书》至古文二十五篇，即疑其伪。沉潜三十余年，乃尽得工春 结所在，作《古文尚书疏证》八卷。引经据古，一一陈其矛盾之故，古文之伪大明。所列一百二十八条，毛奇龄《尚书古文冤词》百计相轧，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，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。

康熙元年，游京师，旋改归太原故籍，补廪膳生。十八年，应博学鸿儒科试，报罢。昆山顾炎武以所撰《日知录》相质，即为改定数条，炎武虚心从之。编修汪琬著《五服考异》，若璩纠其谬，尚书徐乾学欢服。及乾学奉敕修《一统志》，开局洞庭山，若璩与其事。若璩于地理尤精番，山川形势，州郡沿革，了如指掌，撰《四书释地》五卷，及于人名物类训诂典制，事必求其根底，言必求其依据，旁参互证，多所贯通。又据《孟子》七篇，参以《史记》诸书，作《孟子生卒年月考》一卷。又著《潜丘札记》六卷，《毛朱诗说》一卷，手校《困学纪闻》二十卷，因浚仪之旧而校正笺说推广之。又有《日知录补正》，《丧服异注》，宋刘攽、李焘、马端临、王应麟四家逸事，《博湖掌录》诸书。

世宗在潜邸闻其名，延入邸中，素观所著书，每进一篇必称善。疾革，请移就城外，以大状为兴，上施青纱帐二十人舁之出，安稳如休簟。康熙四十三年，卒，年六十九。世宗遣使经纪其丧，亲制诗四章，复为文祭之。有云：“读书等身，一字无假，孔思周情，旨深言大。”金谓莫若璩不能当也。

顾炎武传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一

【说明】顾炎武（公元1613—1682年），初名绛，字宁人，自署蒋山佣，学者称亭林先生，江苏昆山人。少年时曾参加“复社”，进行反宦官权贵的斗争，以后又参加昆山、嘉定一带的人民抗清起义。明鲁王时官兵部职方郎中。明亡后坚决不仕，拒绝了清政府开博学鸿词科和明史馆时的征召。他还南北奔走，和下层社会联系，组织秘密团体，进行反清活动。晚年时定居陕西，著书立说。顾炎武学识渊博，对典制、郡邑掌故、天文、河漕、兵农、经史、音韵训诂都很有造诣。所著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经济史稿。他重视踏实治学，即所谓“博学于文”，又重视经世致用。晚年时治经侧重考据，开清代朴学风气之先。清代的考据家部分接受了他的“博学于文”、“行己有耻”的精神。其他著作有《日知录》、《肇域志》、《音学五书》、《亭要诗文集》等。

顾炎武字宁人，原名绛，昆山人，是明朝的生员。出生时眼珠有两个瞳孔，中间白而四周黑。读书时一目十行。他看到明朝变故很多，所以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。明朝在南京

亡国后，侍奉继母王氏躲避兵祸到了常熟。昆山县令杨永言组织了义军，顾炎武和归庄便投向杨永言。南明的鲁王授他为兵部司务，事情没有成功，幸而得以脱身，他的母亲便绝食而死，死前告诫顾炎武不要到异姓的清朝做事。南明的唐王朱聿键征召他为兵部职方郎，因为母亲的丧事没有赴任，便离家不再回去。顾炎武认为自己怀有为世所用的策略，不得一展自己的志愿，因此在所到的地方就稍稍地试一下。他在山东的长白山下开垦农田，在山西的雁门北面、五台的东面放牧，积累了千两白银。顾炎武走遍了边关要塞，四次到明孝陵拜谒，六次拜谒明思陵，才在陕西的华阴去住下来。他认为“陕西人仰慕经学，尊重不在朝做官的读书人，支持公正的评论，这一些都是别的地方所缺少的；而华阴控扼潼关和渭河的路口，虽然足不出户，也能见到天下的人，听到天下的事。一旦有警报，就能进山把守险要的地方，不过只有十里路那样的距离；如果有志于东南西北四方，那么一出潼关的关门，也有居高临下其势不可阻挡的便利”。因此在这里定居。

顾炎武生平精力过人，从少年到老年，没有一时一刻离开书本。他所到的地方，常常用二头骡二匹马装载了书籍，经过边境要塞和驻兵的堡垒，就叫来老兵向他们询问当地事情的曲折经过，凡是有跟平时听到的不符的地方，就取出随身带的书籍查对；如果是在平原旷野，就在马鞍上默读各种经书的注疏。他曾经和朋友在谈论学问时说：“一百多年来做学问的人，往往说心说性，而使人茫然得不出它的正确解释。命和仁，是孔夫子很少提到的；性和天道，是子贡所没有听到

的。性命的道理，在《易传》有所提到，而未曾屡屡告诉别人。他回答问学的士人，就说‘行己有耻’，做学问，就说‘好古敏求’。孔子告诉鲁哀公要取得聪明善良的成效，首先是博学。颜回几乎是圣人，还说‘博我以文’。从曾子以下，笃行诚实没有超过子夏的，谈到仁，就说‘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’。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，聚集起几十上百宾客学生，和他们说心说性，舍弃多学习而增长知识，却求得用一种道理贯穿於事物中的方法，把天下的困苦贫穷搁置一旁而不述及，却在讲什么危言微旨精粹纯一，这难道是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比孔子高明，而他们的学生都比子贡贤良吗？《孟子》这本书里，说到心和性时都是教诲不倦，乃至万章、公孙丑、陈代、陈臻、周霄、彭更等提出的问题，和孟子的回答，常常在于进退去留辞受取予之间。因此性、命、天这些道理，孔子很少谈到，而现在的君子却时常谈起。进退去留辞受取予的辨别，孔子、孟子常常谈到，而现在的君子却很少谈起。我认为圣人的主张怎么样？就是‘对礼乐制度的学识广博，凡自己认为可耻的事就不去做’这样的两句话。从自我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都是要学习的事。从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以至于进退去留辞受取予之间，都存在是否可耻的事。作为读书人而不首先说是否耻辱，就是没有根基的人；不是好古多闻，就是空洞的学问。没有根基的人去讲空洞的学问，我看他每天声称从事于圣人的言行，而离开圣人的言行更远了。”

顾炎武的学术，大抵主张抑制徒有浮华而注重实际。凡是国家的典章制度、郡邑掌故、天文仪象、河漕兵农之类，无

不深究事物的始末，考证得失，著有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一百二十卷，另外有《肇域志》一编，是在考证求索之余，将文字和地理图合在一起所写成的。他精通音韵学，著有《音论》三卷。谈古韵的，从明朝的陈第起，虽然从荒芜中开创了道路，但是还不够深邃严密。顾炎武便从经传中推索寻求，追溯事物的根本。在他的《诗本音》十卷一书中，主张陈第的诗没有协韵的说法，不和吴棫的本音说争论，他不采用吴棫的例子，但就《诗经》本书中的韵律相互考证，并用其它书做证明，说明古音原来就是这种读法，不是由于迁就而改变的，所以称为本音。又如《易音》三卷，就是根据《周易》以求古音，考证精确。又《唐韵正》二十卷、《古音表》二卷、《韵补正》一卷，都能上溯恢复夏、商、周三代以来的音韵，分门别类而知道它的演变。又著有《金石文字记》、《求古录》，和经书历史相互证明。而他的《日知录》三十卷，尤其是造诣精深的书，是积累了三十多年的心得所写成的。书中论及治理时能综合事物的名称和实际加以考核，对礼仪教化尤其小心谨慎。认为风俗衰败，廉耻的堤防就会崩溃，从没有礼仪这一点来权衡，常常要用古代的制度作为天下的楷模。顾炎武又因为杜预的《左传集解》中常常出现错处，便写成《杜解补正》三卷。顾炎武其它的著作有《二十一史年表》、《历代帝王宅京记》、《营平二州地名记》、《昌平山水记》、《山东考古录》、《京东考古录》、《譙觚》、《菰中随笔》、《亭林文集》、《亭林诗集》等，对学术和社会风气都很有补益。清初号称学有根底的，以顾炎武为最著名，学者们称他为亭林先生。

顾炎武又广交贤良豪杰年老的人，虚心和他们商讨问题，对自己不满足宽容。写了《广师篇》说：“通晓有关天道人事方面的学问，根底牢固而不可动摇的，我不如王寅旭；读书为自己，探索深奥的道理洞察细微，我不如杨雪臣；独一精通《三礼》，特出的讲授经书的教师，我不如张稷若，超脱于世事之外，自得造化的奥秘，我不如傅青主；坚持到老努力学习，没有教师而自己有所成就，我不如李中孚；备尝辛苦困厄，和人世间的潮流一起沉浮，我不如路安卿；知识丰富记忆力强，饱学而有才能，我不如吴志伊；文章写得出众，为人忠心厚道，我不如朱锡鬯；好学不倦，对朋友真诚，我不如王山史；精心于六书，信而好古，我不如张力臣。至于显达而在官位、可以称赞叙述的，也有不少，然而不是我一个平民百姓所能够议论的。”

康熙十七年，朝廷下诏顾炎武举博学鸿词，又修纂《明史》，大臣们争相举荐他，他誓死不从。康熙二十七年去世，享年七十岁。顾炎武没有儿子，吴江潘耒将他的遗书编列成序流行于世。宣统元年，顾炎武被送入文庙陪祀孔子。

（何双生 译）

【原文】

顾炎武，字宁人，原名绛，昆山入。明诸生。生而双瞳，中白边黑。读书目十行下。见明季多故，讲求经世之学。明南都亡，奉嗣母王氏避兵常熟。昆山令杨永言起义师。炎武及归庄从之。鲁王授为兵部司务，事不克，幸而得脱，母遂不食卒，诫炎武弗事二姓。唐王以兵部职方郎召，母丧未赴，遂去家水返。炎武自负用世之略，不得一遂，所至辄小试之。

垦田于山东长白山下，畜牧于山西雁门之北、五台之东，累致千金。篇历关塞，四谒孝陵，六谒思陵，始卜居陕之华阴。谓“秦人慕经学，重处士，持清讲，实他邦所少；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，虽足不出户，亦能见天下之人、闻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，入山守险，不过十里之遥；若有志四方，则一出关门，亦有建令之便。”乃定居焉。

生平精力绝人，自少一对老，无一刻离书。所至之地，以地一羸二马载书，过边塞亭障，呼老兵卒询曲折，有与平日所闻不合，即废书对勘；或平原大野，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。尝与友人论学云：“百余年来之为学者，往往言心言性，而茫然不得其解也。命与仁，夫子所罕言；性与天道，子贡所未得闻。性命之理，著之《易传》，未尝数以语人。其答问士，则曰“行己有耻”，其为学，则曰“好古敏求”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，先之以博学。颜子几于圣人，犹曰“博我以文”。自曾子而下，笃实无如子夏，言仁，则曰“博学而笃志、切问而近思”。今之君子则不然，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，与之言性；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，置四海之困穷不言，而讲危微精一；是必其道高于夫子，而其弟子之贤于子贡也。《孟子》一书，言心言性亦谆谆矣，乃至万章、公孙丑、陈代、陈臻、周霄、彭更之所问，与孟子之所答，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问。是故性也、命也、天也，夫子之所罕言，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。出处去就乱受取与之辨，孔子、孟子之所恆言，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。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？曰“博学于文，行己有耻”。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，皆学之事也。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，皆有耻之事

也。士而不先方耻，则为无本之人；非好古多闻，则为空虚之学。以无本之人，而讲空虚之学，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，而去之弥远也。”

炎武之学，大抵主于金华就实。凡国家典制、郡邑掌故、天文仪象、河漕兵晨之属，莫不穷原究委，考正得失，撰《天下郡国利病书百》二十卷；别有《肇域志》一编，则考索之余，合图经而成者。精韵学，撰《音论》三卷。言古韵暑，自明陈第，虽创关榛苏，犹未邃密。炎武乃推寻经传，探讨本原。又《诗本音》十卷，其书主陈第诗无协韵之说，不与吴棫本音争，亦不用棫之例，但即本经之韵互考，且证以他书，明古音原作是读，非由迁就，故曰本音。又《易音》三卷，即《周易》以求古音，考证精确。又《唐韵正》二十卷，《古音素》二卷，《韵补正》一卷，皆能追复三代以来之音，分部正帙而知其变。又撰《金石文字记》、《求古录》，与经史相证。而《日知录》三十卷，尤为精诣之书，阖积三址余年而后成。其论治综核名实，于礼教尤兢兢。谓风俗衰，廉耻这防溃，由无礼以权之，常欲以古制率天下。炎武又以杜预《左传集解》时有阙失，作《杜解补正》三卷。其他著作，有《二十一史年表》、《历代帝王宅京记》、《营平二州地名记》、《昌平山水记》、《山东考古录》、《京东考古录》、《读觚》、《菰中随笔》、《亭林文集》、《诗集》等书，并有补于学术世道。清初称学有根柢者，以炎武为最，学者称为亭林先生。

又广交贤豪长者，虚怀商榷，不自满假。作《广师篇》云：“学究天人，确乎不拔，吾不如王寅旭；读书为己，探赜洞微，吾不如杨雪臣；独精《三礼》，卓然经师，吾不如张稷若；萧

然物外，自得天机，吾不如传青主；坚苦力学，无师而成，吾不如李中孚；险阻备尝，与时屈伸，吾不如路安卿；博闻强记，群书之府，吾不如吴志伊；文章尔雅，宅心和厚，吾不如未锡鬯；好学不倦，笃于朋友，吾不如王山史；精心六书，信而好古，吾不如张力臣。至于达而在位，其可称述者，亦多有之，然非布衣之所得讲也。”

康熙十七年，诏举博学鸿儒科，又修《明史》，大臣争荐之，以死自誓。二十一年，卒，年七十。无子，吴江潘耒叙其遗书行世。宣统元年，从祀文庙。

汪中传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一

【说明】汪中（公元 1745—1794 年），字容甫，江苏江都人。少年孤贫，先受母教，曾帮助书商售书，因此遍读经史百家。工骈体文，有诗名，尤长于史学。他和王念孙等相过从，切磋问学，曾广泛考证先秦古籍和三代以前学校制度的兴废沿革。著作很多，有《尚书考异》、《春秋述义》、《墨子序》、《荀卿子通论》、《贾谊新书序》、《广陵通典》、《金陵地图考》等。

汪中字容甫，江都人。七岁时丧父，家中贫穷不能到外面去读书。母亲邹氏，亲自教他《四子书》。汪中年纪稍大以后，帮助书商在市场上售书，因此读遍了经、史、百家，一看就能读出来，成了有学问而能融会贯通的人。二十岁时，被补为生员。乾隆四十二年，汪中由于才识优秀被选拔贡于京师，成为贡生，提学使者谢墉，每当贡生参加考试时另外设置一榜，把汪中的名字写在其他贡生的前面，曾经说：“我先于汪容甫的，是官爵而已，如果说学问，我应当尊他为老师。”谢墉对汪中竟如此尊崇。汪中因为母亲年老最终没有参加贡

生的廷试。乾隆五十一年，侍郎朱珪主持江南的考试，对别人说：“我这次去江南主试，一定要把汪中选为第一名。”朱珪不知道汪中不参加考试。

汪中专意于经术之学，和高邮的王念孙、宝应的刘台拱是朋友，常常在一起讨论。他研究《尚书》，有《尚书考异》，研究《仪礼》，有《仪礼》校本、《大戴礼记》校本；研究《春秋》，有《春秋述义》；研究《小学》，有《尔雅》校本和《小学说文求端》。汪中曾经认为清朝研究古学的兴起，是从顾炎武开端的。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假托名义进行诬陷，到胡渭时才有所减少。中国和西方的天文历算，到梅文鼎时而精深。努力专攻古文经籍中文字的，是阎若璩。专门研究汉代《易经》的，是惠栋。凡此种种都是千年以来没有流传而中断的学术，到戴震出现后才集大成。汪中本来要写《六儒颂》，没有写成。

汪中又曾经广泛考证先秦古籍和夏、商、周以前学校制度的兴废沿革，从中使人了解古人怎样学习的情形。虞、夏时的制度为第一，《周礼》中的制度为第二，周衰以后的列国为第三。孔子之门为第四，孔子七十二弟子以后的学者为第五。又排列通论、释经、旧闻、典籍、数典、世官六个目录。在开头题写道：“看《周礼》中的太史云云，当时做一件事就有一本记载，以后就按照记载来做事，再往后就是事情已经废止而记载依然存在。到宋代的儒士以后，连记载带事都不存在了。”又说：“有官府的法典图籍文献，有学士大夫的法典图籍文献，元老旧臣的传闻。做一件事有一本记录，流传到后世，奉它为旧时的法律，这便是官府的法典图籍文献。先

王时的礼乐制度施政办事，遭到世代的衰败废弃而没有失去，是因为官吏能守护着文献，元老旧臣能叙述这些事情。好古的君子，怜悯它年月久远遭致消亡，而写在简册上，这就是学士大夫的法典图籍文献。”又说：“古代当学士的，是百官之长，是教导官吏们怎样做事，学士们诵读的只是诗书而已。其他的图籍文献，则都是由官府收藏而世代加以守护，民间是没有的。如果不是有关的官吏，其他官员也是没有士。所谓的士，也不是王侯公卿大夫的儿子，而是官职低微的士人，除此以外就是地方所办的乡学、官学而已。自从周朝所设大学辟雍的制度失传，太史的官职丧失了平日的操守，于是平民中出现了传授学业的老师，民间携带文具记录王事的士人多了起来。教学的官员，记录的职务，不在上面而在下面。到这种状况衰退以后，先秦时各个学派对各自的学说展开了争鸣，而先王的正道就荒废了。然而当诸侯失去了册籍，秦始皇焚书以后，官府所掌管的图籍文献，荡然无存，却还靠了文人、学者的相互传授，保存下来的有十分之一二，这是不幸中的大幸。”又说：“孔子所说的，文人、学者所能做到的，保留下来作为当时的正统思想。至于象刑赏和教化中的重大事情，由于圣人没有爵位，不再对自己的子弟进行教授。”又说：“古人的学校都在官府，人们世代担任这种官职，所以官吏世代都从事这种事业。官吏失去了他们的职守，所以专门的学问就废弃了。”他的书稿大体已经草拟好，但是最终也没有成书。后来就把自己考订的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典章礼制和文字训诂、名物象数，加上论述撰写的文章，编成《述学》的内篇和外篇，一共六卷。

他对经书的义理作出成绩的，比如象《释三九》、《妇人无主答问》、《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》、《居丧释服解义》。显扬儒家典籍的经和传以及古代儒者的著作，有《周官征文》、《左氏春秋释疑》、《荀卿子通论》、《贾谊新书序》。汪中其它的考证文章著作，也都有依据。

汪中又熟悉历史上的地理、名山大川和险要的地方，讲解绘图一目了然，著有《文陵通典》十卷、《秦蚕食六国表》、《金陵地图考》。汪中生平对诗文书札无所不精，所作的《广陵对》、《黄鹤楼铭》、《汉上琴台铭》，都受到当时人们的夸奖。他还著有《经义知新记》一卷、《大戴礼正误》一卷、《遗诗》一卷。他在乾隆五十九年去世，终年五十一岁。

汪中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，在母亲身旁服事勤劳，不辞繁重杂乱。在守丧期间，哀伤悲痛超过一般人，对于知己和过去的老友，凡是他们死后家境衰落困难的，对他们的问候超过生前。道光十一年，被表扬为孝子。（何双生 译）

【原文】

汪中，字容甫，江都人。生七岁而孤，家贫不能就外傅。母邹，授以《四子书》。稍长，助书贾鬻书于市，因遍读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守志成育，遂为通人。年二十补诸生。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，提学使堵谢墉，每试别置一，署名诸生前。尝曰：“余之容甫，爵也。若以学，当北面事之。”其敬中如此。以母老竟不朝考。五十一年，侍郎朱主江南试，谓人曰：“吾此行心得江中为选首。”不知其不与试也。

中颖意经术，与高邮王念孙、宝应刘台拱为友，共讨论之。其治《尚书》，有《尚书考异》。治《礼》，不《仪礼》校

本,《大戴礼记》校本。治《春秋》,有《春秋述义》。治《小学》,不《尔雅》校本,及《小学说文求端》。中尝谓国朝古学之兴,顾炎武开其端。《河》、《洛》矫诬,至胡渭而绌。中、西推步,至梅文鼎而精。力攻古文者,阎若璩也,专治汉《易》者,惠栋也。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学,及戴震出而集其大成。拟作六儒颂。未成。

又尝博考稽秦古籍三代以上学制度废兴,使知古人所以为学者。凡虞、夏第二,《周礼》之制第二,啁 衰列国第二,孔门第四,七十子后学者第五。列通论、释经、旧闻、典籍、数典、世官、目录凡六。而自题其端曰:“观《周》礼太史云云。当时行一中则有一书,其后执书以行事,又其后则事废而书存。至宋儒以后,则并其书之事而去之矣。”又曰:“有官诰之典型籍,有学士大夫之典型籍,故之传闻,行一事,有一书,传之后世,奉以为成宪。此官府之典型籍也。先王之礼乐政事,遭世之衰废而不秩,有司矜其文,故老能言其事,好古之君子,悯其浸久而遂亡也,而书之简异此学生士大夫之典型籍也。”又曰:“古有也。敬非其官,官亦夫有也。其所谓士者,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则一命之士,外此则乡学、小学而不在上而在下,及其衰也,诸子各学其学鸣,而先王之道荒矣。然当诸侯去籍秦政焚书,有司所掌,荡然无存,期望赖学士相传,存其一二,斯不幸澡之幸也。”又曰:“孔子所言,则学士所能为者,留为世教。若其政教之大者,圣人无位,有复以教子弟。”又曰:“古人学在官府,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。官既失守,故专门之学废。”其书藁划略具,亦未成,乃即其考三代典礼及文字训诂、名物象数,益以论撰之

文,《为述学》内、外篇,凡六卷。

其有功经义者,则有若《释三九》、《妇人无主答问》、《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》。《居丧释服义》。其表章经传及先儒者,则有若《周官征文》,《左氏春秋释疑》,《荀卿子通论》。《贾谊新书序》。其他考证之文,亦有依据。

中又熟于诸只地理,山川扼要,讲画了然,著有《广陵通典》十卷,《秦蚕食六国表》,《金陵是图考》。毛平于诗文书翰无所不工,所作《广陵对》、《黄锥楼铭》、《汉上琴台铭》,皆见称于时,他著有《经义积压新记》一卷。《大戴礼正误》一卷,《遗诗》一卷,五十几年,卒,年五十一。

中事母以孝闻,左右服,劳,有矢烦辱。居丧,哀戚地人,其于各友故旧,汉后衰浇,相存问过于从前,道光十一年,旌孝之。

王先谦传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二

【说明】王先谦（？—1917年），字益吾，长沙（今湖南长沙）人。他热忠于讲学、著述、刻书，对经、史、子、集都有研究，而且旁及外国史，并著有《日本源流考》、《外国通鉴》。最能反映王先谦史学成就的重要典籍则是《汉书补注》一百卷和《后汉书集解》一百二十卷。《汉书》已有颜师古注，而王先谦认为，“然未发明者固多，句读讹误，解释踳驳之处，亦迭见焉”，清代“海内耆古之士，承流向风，研究班义，考正注文，著述美富，旷隆往代，但散见诸书，学者罕能通习”，于是王先谦“究心班书，博求其义，荟最编摩”，终成《汉书补注》一书。此书是在颜师古注的基础上加注，除有词语注释、名物、典章的考证外，也有对文字的勘正，而且多是王先谦的注。《后汉书集解》，虽称集解，但主要是唐章怀太子注和清惠棟注，王先谦又采集今古诸说益之。这两部书，都因考证翔实，材料丰富为人称道，尤其是《汉书补注》。

王先谦，字益吾，长沙人。同治四年中进士，选为庶吉

士，授予编修官。光绪元年，参加大考中二等，提为中允，担任日讲起居注官。依次上疏讲言路防弊事，又请求筹划东三省的防务，并且弹劾云南巡抚徐之铭。六年，升为国子监祭酒。八年，遭父母之丧，服丧期满，仍任原官职。上疏请求令三海停工。出京城任江苏学政。十四年，因太监李莲英张扬，王先谦上疏请求给予惩戒。上疏大意说：“宦官的祸患自古以来就很明显，本朝法制森严，从来没有宦官擅揽大权危害朝政的事。皇太后垂帘听政，一向禀承前人谋略，毫不宽容，这是天下臣民所共同了解和共同看到的。只有总管太监李莲英，秉性邪恶，肆无忌惮。李莲英平日的污秽名声以及恶劣行迹，不敢形容于奏折之上。只考虑到太监等人供官禁驱使，能够每天亲近帝王左右，或因事奉命奔走稍有长处，偶然求得帝王的眷顾，估计也是属于情理之中的。为什么只该太监夸张他们所得到的恩遇，大肆张扬，以致太监篋小李的名字，震动朝廷内外，警骇众人的视听，这就是太监不安本分的明证。《易经》说‘走在霜上而知坚冰’，这是因为事物都有渐进的过程。皇太后、皇上对于造成安定政局保护国家的方法，无不勤奋地日夜寻求，遇事即防备四维。现在的小规模横行，已露出苗头。如果不严加惩办，就没有办法振兴法度整肃众人的情绪。”疏奏上，没有回音。

王先谦先后掌管云南、江西、浙江的乡试，对于搜罗人才，他不遗余力。已就任江苏，先奏明朝廷在江苏设书局，效仿阮元《皇清经解》的体例，刊刻《续经解》一千四百三十卷。南菁书院开创于黄体芳，王先谦为书院广筹经费，从各地选拔有才之士入院学习，而且亲自督教学生，劝导奖励他

们，从而造就的人材颇多。王先谦被飭令开缺本官职后回到家乡，先后执掌思贤讲舍，以及狱麓、城南两个书院。他继续培植人才，和以前没有差别。光绪三十三年，总督陈夔龙、巡抚岑春蓂上奏把王先谦所著的书进呈朝廷，朝廷赏王先谦内阁学士的官衔。宣统二年，长沙的饥民哄围巡抚官署，卫兵开枪打死数人，民情愈加激愤，匪徒乘此机会放火烧巡抚官署。省里的绅士打电报到北京，请求撤换巡抚，电报把王先谦的名字列在首位，然而王先谦并不知道。总督瑞澂上奏弹劾王先谦，吏部讨论降王先谦五级。同乡京官胡祖荫等人把冤抑呈递到都察院，也没有回音。辛亥革命以后，王先谦改名为遁，迁到乡间居住，过了六年去世。他的著作有《尚书孔传参正》三十六卷，《三家诗集义疏》二十八卷，《汉书补注》一百卷，《荀子集解》二十卷，《日本源流考》二十二卷，《外国通鉴》三十卷，《虚受堂文集》三十六卷等。

(曾貽芬 译)

【原文】

王先谦，字益吾，长沙人。同治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光绪元年，大考二等，擢中允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历上疏言言路防弊，请筹东三省防务，并劾云南巡抚徐之铭。六年，晋国子监祭酒。八年，丁忧归，服阙，仍故官。疏请三海停工。出为江苏学政。十四年，以太监李莲英招摇，疏请惩戒。略言：“宦寺之患，自古为昭，本朝法制森严，从无太监揽权害事。皇太后垂帘听政，一禀前谟，毫不宽假，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见者。乃有总管太监李莲英，秉性奸回，肆无忌惮。其平日秽声劣迹，不敢形诸奏牍。惟思太监等给使

宫禁，得以日近天颜；或因奔走微长，偶邀宸顾，度亦事理所有。何独该太监夸张恩遇，大肆招摇，致太监篋小李之名，倾动中外，惊骇物听，此即其不安本分之明证。《易》曰‘履霜坚冰’，渐也。皇太后，皇上于制治保邦之道，靡不勤求夙夜，遇事防维。今宵小横行，已有端兆。若不严加惩办，无以振纲纪而肃群情。”疏上不报。

先谦历典云南、江西、浙江乡试，搜罗人才，不遗余力。既莅江苏，先奏设书局，仿阮元《皇清经解》例，刊刻《续经解》一千四百三十卷。南菁书院创于黄体芳，先谦广筹经费，每邑拔取才士入院而督教之，诱掖奖劝，成就人材甚多。开缺还家，历主思贤讲舍、狱麓、城南两书院，其培植人才，与前无异。三十三年，总督陈夔龙、巡抚岑春煊奏以所著书进呈，赏内阁学士衔。宣统二年，长沙饥民哄围抚署，卫兵开枪击毙数人，民情愈愤，匪徒乘之放火烧署。省城绅士电请易巡抚，以先谦名首列，先谦不知也。总督瑞澂奏参，部议降五级。同乡京官胡祖荫等以冤抑呈递都察院，亦不报。国变后，改名遁，迁居乡间，越六年卒。著有《尚书孔传参正》三十六卷，《三家诗集义疏》二十八卷，《汉书补注》一百卷，《荀子集解》二十卷，《日本源流考》二十二卷，《外国通鉴》三十卷，《虚受堂诗文集》三十六卷等。

万斯同传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四八四

【说明】万斯同（1638—1702年），字季野，鄞县（今浙江鄞县）人。康熙十八年徐元文监修明史，延请万斯同，于是万斯同以布衣入史局，不署衔，不受俸，诸编修稿都送给他复审，《明史稿》五百卷都由万斯同手定，后经王鸿绪改动，撰成《明史稿》，最终成为《明史》的蓝本。万斯同很重视正史中的“表”，他认为史书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，表立而纪传之文可省，故表不可废，他以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都有“表”，而《后汉书》以下至《五代史》，仅《新唐书》有表，于是宗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例撰成《历代史表》五十三卷。此表依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例撰成《历代史表》五十三卷。此表依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列诸王世表、外戚侯表、将相大臣及九卿年表等，又依《新唐书》例，作方镇年表、诸镇年表，另外还自创宦者侯表和大事年表。此书除取材于正史的本纪、列传、志之外，还参考《唐六典》、《通典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通志》、《册府无龟》等书，以及各家杂史，加以汇集编次，“使列朝掌故，端绪厘然，于史学殊为有助”。当然此书也偶有脱略，“然核其大体，则精密者居多”，瑕不掩瑜，《历代史表》仍是

一部良史之作。万斯同还著有《昆仑河源考》、《历代宰辅汇考》、《明河渠考》等等。

万斯同，字季野，鄞县人。父亲万泰，生有八个儿子，万斯同是他的第八个儿子。哥哥万斯大，《儒林传》内有传。万斯同生来记忆力极强，八岁时，面对满坐宾客能背诵《扬子法言》。后来跟随黄宗羲游学，能够了解戴山刘氏的学说，以慎独为宗旨。用读书勉励名节，与志同道合的人相切磋学问，每月都有会讲。万斯同广通诸史，尤其精熟明代掌故。康熙十七年，因他学识渊博，推荐他为官，万斯同推辞而不赴任。

当初，顺治二年朝廷诏令修《明史》，不久停罢。康熙四年，又下诏修《明史》，也停止了。十八年，命令徐元文为监修，选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为翰林，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。万斯同曾怨恨唐代以来撰史设史局分别修撰造成的失误，因此说，专家撰史，虽然专家、个人才学不及众人，但所撰史书还不至于像官修史书那么杂乱，所以推辞不膺选。到三十二年，朝廷再次从家中将王鸿绪召出，命令他偕同陈廷敬、张玉书为总裁。陈廷敬负责本纪，张玉书负责志，而王鸿绪一人负责列传。就到家中延请万斯同，把撰史之事委托给他，而且由武进的钱名世帮助他。每当覆审一传，说某书某事应当参校，回首让小史取书带几卷来，没有一点差错的。士大夫到万斯同门上谘询，回答得明白透彻，声音洪亮。

曾写信给友人，自称：“年轻时在某处教馆，那家有各朝的实录，我默看暗读，不敢遗落一言一事。长大后游历四方，

就到世代士宦之家和有宿学的老人处访求遗书，考察询问过去的事。旁及郡志、县志、私家撰述，没有不搜寻研讨的，而主要的实录为指意归向。这是因为实录，直书其事件及议论，而不可加以增添和修饰。按其时代以考察其事，核查其言论而以公平之心去考察，则其人的本末就能得到十之八九了。然而言论的发出抑或有它的缘由，事情的发生抑或有它的起因，而它的流布抑或有所激发，则没有其他的书是不能完备的。凡是实录难以详尽的，我就以其他书补证。其他书记载不实而且杂滥的，我就以我所知道的实录裁定。虽然不敢完全称之可信，然而是非枉曲于人的大概就很少了。前人对于《宋史》，已经怨它繁芜，而我的记述将倍于《宋史》。不是不知道简赅的可贵，我恐怕以后的人一心求博而不知应有所裁剪，所以先为其极力穷尽，使后人了解我所取录的是有所舍弃的，而所不取录的，必然是其事实与言论不真实的而且不能增溢。”又认为司马迁、班固所撰史书都有表，而后汉、三国两史以下没有表。刘知几说得到史表不为有益，失掉史表也不为损失。他不了解史书有表，可以通达纪、传的终极。有的人已入纪、传而又列之于表，有的人没有入纪、传，而牵连于表中得以记载，史书立表之后纪传的一些记载即可省略，所以史表不能废弃。读史而不读表的人，不是深刻了解历史的人。”万斯同曾经作明代开国到唐、桂功臣将相年表，以备选择。这以后《明史》到乾隆初年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令刊定，就取王鸿绪的史稿以此为基础而有所增删。王鸿绪的明史稿，大半出于万斯同之手。

万斯同平生淡薄荣誉利禄，教书所得，就用以周济宗族

里人。朋友冯京第死于节义，他的儿子没入官府不能回家，万斯同募集钱财将冯子赎出。万斯同尤其喜欢勉励提携后进。从王公以至下士，没有不称他为万先生的。李光地评判人的流品等级，认为顾宁人、闫百诗和万季野，这几个人，真可以备石渠阁顾问的人选。而万斯同和人交往，他自题名则为“布衣万某”，不曾有其他的称谓。去世，终年六十岁。著述有《历代史表》，创作《宦者侯表》、《大事年表》两例，又著有《儒林宗派》。

钱名世，字亮工。康熙四十二年一等进士，授予编修。久负文坛荣誉，王士禛看到他的诗强烈地赞赏他。王鸿绪受聘修《明史》，万斯同担任考核，而交钱名世为文润色。为官至侍读学士，后因送诗向年羹尧谄媚而获罪，被夺官职。

(曾贻芬 译)

【原文】

万斯同，字季野，鄞县人。父泰，生八子，斯同其季也。兄斯大，《儒林》有传。性强记，八岁，客坐中能背诵《扬子法言》。后从黄宗羲游，得闻蕺山刘氏学说，以慎独为宗。以读书励名节与同志相磨切，月有会讲。博通诸史，尤熟明代掌故。康熙十七年，荐鸿博，辞不就。

初，顺治二年诏修《明史》，未几罢。康熙四年，又诏修之，亦止。十八年，命徐元文为监修，取彭孙遹等五十人官翰林，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同为纂修。斯同尝病唐以后史设局分修之失，以谓专家之书，才虽不逮，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，故辞不应选。至三十二年，再召王鸿绪于家，命偕陈廷敬、张玉书为总裁。陈任本纪，张任志，而鸿绪独任

列传。乃延斯同于家，委以史事，而武进钱名世佐之。每覆审一传，曰某书某事当参校，顾小史取其书第几卷至，无或爽者。士大夫到门谘询，了辨如响。

尝书抵友人，自言：“少馆某所，其家有列朝实录，吾默识暗诵，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。长游四方，辄就故家耆老求遗书，考问往事。旁及郡志，邑乘，私家撰述，靡不搜讨，而要以实录为指归。盖实录者，直载其事与言，而无可增饰者也。因其世以考其事，核其言而平心察之，则其人本末可八九得矣。然言之发或有所由，事之端或有所起，而其流或有所激，则非他书不能具也。凡实录之难详者，吾以他书证之。他书之诬且滥者，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。虽不敢具谓可信，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。昔人于《宋史》已病其繁芜，而吾所述将倍焉。非不知简之为贵也，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，故先为之极，使知吾所取者有所捐，而所不取，必非其事与言之真，而不可溢也。”又以：“马、班史皆有表，而后汉、三国以下无之。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，失之不为损。不知史之有表，所以通纪、传之穷者。有其人已入纪、传而表之者，有未入纪、传而牵连以表之者。表立而后纪、传之文可省，故表不可废。读史而不读表，非深于史者也。”尝作明开国讫唐、桂功臣将相年表，以备采择。其后明史至乾隆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刊定，即取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。鸿绪稿，大半出斯同手也。

平生淡于荣利，修脯所入，辄以赙宗党。故人冯京第死义，其子没入不得归，为醵钱赎之。尤喜奖掖后进。自王公以至下士，无不呼曰万先生。李光地品藻人伦，以谓顾宁人、

阎百诗及万季野，此数子者，真足备石渠顾问之选。而斯同与人往还，其自署则曰“布衣万某”，未尝有他称也。卒，年六十。著《历代史表》，创为《宦者侯表》、《大事年表》二例。又著《儒林宗派》。

名世，字亮工。康熙四十二年一甲进士，授编修。夙负文誉，王士禛见其诗激赏之。鸿绪聘修《明史》，斯同任考核，付名世属辞润色之。官至侍读，坐投诗谄年羹尧夺职。

赵翼传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五

【说明】赵翼（1725—1810年），字耘崧，阳湖（今江苏常州），是清代著名史学家。他平生史著颇丰，其中《廿二史札记》是其力作，在清代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此书三十六卷，五百四十四条，以笔记体裁撰成，所涉正史从《史记》到《明史》，共二十四种，其中又以宋以后诸史用功最勤。由于当时《旧唐书》和《旧五代史》作为正史尚未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，所以此书题为《廿二史札记》。此书对于二十四史的诸多情况都做了考订分析，如对各史参与编著的人员、时间，所采材料的来源、编著的情况、编写方法的优劣、史料的真伪和价值，以及一代的兴衰变革等等，都有系统深入的评论。赵翼能涉及如此广泛的内容，考辨分析较为精当，其主要原因在于他运用了札记这种灵活的治学方式。札记是与清初考据同时兴起的，很多学者采用这种形式取得成果，赵翼即是其中之一。还有，赵翼少有门户之见，故能兼采众家之长，融会贯通，而能发他人所未发。然而，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，赵翼论事也有所顾忌，如他赞成秦桧主和，斥责明末主张抗清志士误国等，遭后人讥讽。赵翼的史学活动除传

中记载外，还参与纂修《国朝宫史》、纂修《平定准噶尔略》、改纂《通鉴辑览》等。

赵翼，字耘松，阳湖人。出世三年就能认字，十二岁时，一天能写成七篇文章，人们为他的才华感到惊异。乾隆十九年，由举人考中明通榜，被内阁中书任用，入宫当值军机处，大学士傅恒尤其器重他。二十六年，又成为进士，殿试打算取赵翼为一等第一名，王杰第三名。高宗说陕西从国朝以来没有一个以一等第一名中选的人，于是把王杰提到第一名而将赵翼移到第三名，授予编修。

后来出京城为镇安府知府。粤地百姓往常社仓交谷，用竹筐，以秤砣代替斗赇示。主管部门因为要买马接济滇军，另外设大筐收谷，后来就不改了，百姓以此为苦。赵翼允许百姓沿用旧筐，自己过秤，把盈余的拿走，于是百姓感激赵翼，争着用肩舆抬着他经过他们的村落。以前镇安府百姓付奉到云南土富州做不法的事，捕获一百多人，付奉回首而逃逸，前任知府因为此事而罢官。后来付奉死，验证尸体确实是付奉。总督李侍尧怀疑赵翼为前任知府开脱，赵翼申辨，总督发怒，上奏弹劾赵翼。适逢朝廷要对缅甸用兵，命令赵翼前往军中帮助谋划，于是追回弹劾赵翼的上疏。傅恒已到达云南，筹划战事，议论以大规模军队渡戛鸠江，另外派遣偏师从普洱进军。赵翼说普洱距离戛鸠江有四千多里，不如由江东岸就近夺取猛密，按赵翼所提计策入告朝廷。这以后戛鸠江一带军队遭到瘴气的侵扰患病的人很多，而只有阿桂所统帅的江东岸一支军队保持完整，终于完成预定计划。不久，调赵翼守

广州，提升为贵西兵备道。因为广州评议罪责的旧案而降官级，于是请求辞官还乡，从此再没有出来为官。

乾隆五十二年，林爽文在台湾造反，李侍尧前往福建掌管军队，他邀请赵翼与他一同前往。当时总兵柴大纪已坚守城池半年之久，他把城内易子而食、折骨而炊的情况入告朝廷。高宗心意为此状所动，告谕柴大纪用军队保护着百姓渡海到大陆。李侍尧因此询问赵翼，赵翼说：“总兵想内渡到大陆很长时间了，只是惧怕国法所以不敢擅动。现在一旦弃城而去，那么鹿耳门就被贼占有，整个台湾就完了。到大路兵马到，也无路可进。应该封还这道圣旨。”李侍尧顿悟，采纳赵翼的意见。第二天立即追还前一道圣旨的告谕，李侍尧获特别奖赏；而大将军福康安率军继至，就能从鹿耳门进兵，打破贼众，这都是赵翼的计谋。

台湾的兵事平定，赵翼辞谢而归，以著述而自得其乐。赵翼尤其精邃史学，著有《廿二史札记》、《皇朝武功纪盛》、《陔余丛考》、《檐曝杂记》、《瓯北诗集》。嘉庆十五年，重新举行鹿鸣宴，赐赵翼三品官衔。去世时，终年八十六岁。同时代的袁枚、蒋士铨和赵翼齐名，而赵翼有治理世事的谋略，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。赵翼作诗没有一首不是在人意中而想写出来但别人却写不出来的，也是他的才华优异之体现。

赵翼同乡的学人在赵翼之后知名的，有洪亮吉、孙星衍、赵怀玉、黄景仁、杨伦、吕星垣、徐书受，号为“昆陵七子”。洪亮吉、孙星衍、赵怀玉各自有传。

（曾贻芬 译）

【原文】

赵翼，字耘松，阳湖人。生三岁能识字，年十二，为文一日成七篇，人奇其才。乾隆十九年，由举人中明通榜，用内阁中书，入直军机，大学士傅恒尤重之。二十六年，复成进士，殿试拟一甲第一，王杰第三。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，遂拔杰而移翼第三，授编修。

后出知镇安府。粤民输谷常社仓，用竹筐，以权代概。有司因购马济滇军，别置大筐敛谷，后遂不革，民苦之。翼听民用旧筐，自权，特羨去，民由是感激，每出行，争肩輿过其村。先是镇民付奉入云南土富州为奸，捕获百余人，付奉顾逸去，前守以是罢官。已而付奉死，验其尸良是。总督李侍尧疑其为前守道地，翼申辨，总督怒，劾之。适朝廷用兵缅甸，命翼赴军赞画，乃追劾疏还。傅恒既至滇，经略兵事，议以大兵渡戛鸠江，别遣偏师从普洱进。翼谓普洱距戛鸠江四千余里，不如由江东岸近地取猛密，如其策入告，其后戛鸠兵遭瘴多疾病，而阿桂所统江东岸一军独完，卒以蔑事。寻调守广州，擢贵西兵备道。以广州谳狱旧案降级，遂乞归，不复出。

五十二年，林爽文反台湾，侍尧赴闽治军，邀翼与俱。时总兵柴大纪城守半载，以易子析骸入告。帝意动，谕大纪以兵护民内渡。侍尧以询翼，翼曰：“总兵欲内渡久矣，憚国法故不敢。今一弃城，则鹿耳门为贼有，全台休矣！即大兵至，无路可入。宜封还此旨。”侍尧悟，从之，明日接追还前旨之谕，侍尧膺殊赏；而大将军福康安续至，遂得由鹿耳门进兵破贼，皆翼计也。

事平，辞归，以著述自娱。尤邃史学，著《廿二史札记》、《皇朝武功纪盛》、《陔余丛考》、《檐曝杂记》、《瓯北诗集》。嘉庆十五年，重宴鹿鸣，赐三品衔。卒，年八十六。同时袁枚、蒋士铨与翼齐名，而翼有经世之略，未尽其用。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为，亦其才优也。

其同里学人后于翼而知名者，有洪亮吉、孙星衍、赵怀玉、黄景仁、杨伦、吕星垣、徐书受，号为“昆陵七子”。亮吉、星衍、怀玉自有传。

章学诚传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五

【说明】章学诚（1738—1801年），字实斋，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人，是刘知几之后最著名的史学评论家。他的主要著述有《文史通义》、《校讎通义》、《史籍考》等，还主修了多种地方志。其中以《文史通义》最为著称，是章学诚文史理论的代表作。此书撰写大约始于1771年，直至临终前一年，此书经历三十年左右的长时间积累而成。该书没有一定体例，各篇之间也无一定联系，实际上是一部关于经史诗文诸学的论文总集。这里包括了章学诚有关史学的主要见解：第一，明确提出“六经皆史”。并指出，“盈天地之间，凡涉著作之林，皆是学”。“六经皆史”这一观点的提出，不仅提高了史学的地位，也扩大了历史研究和史料搜集的范围；第二，主张将史籍区分为著述和记注两类。著述是有观点、有材料、有分析的著作，记注则是资料的纂辑。章学诚提倡著述，反对历史研究停滞在史料搜集和考证上。第三，注意对史著的内容体例的探讨，他提倡通史，赞扬纪事本末体的出现，主张对纪传体史书加以改革。第四，倡导编写地方志，他认为方志应以记载历史文献为主，还主张方志立“志”、“掌故”、“文

征”三书，以及“附稗野说之流而作丛谈”。由于章学诚有长期的编纂方志的实践，提出这些主张对方志学的建立和发展，无疑是有贡献的。第五，提出史家不但要具备刘知几所说的才、学、识三才，还必须具备“史德”，特作《史德》篇。章学诚所提出的这些主张，在封建社会后期确实难能可贵，其中不少至今仍有借鉴作用。另外，章学诚对文献学也有贡献，这比较集中地反映在《校雠通义》中。

章学诚，字实斋，会稽人。乾隆四十三年，举进士，官至国子监典籍。自幼读书，就不甘心囿于章句注释之学，跟随山阴刘文蔚、章钰游学，学习了解戴山、南雷的学说主张。精熟明代朝政的始末源流，而且往往超出正史范围之外，秀水郑炳文称章学诚有良史才能。继而游于朱筠门下，朱筠的藏书非常丰富，因此能饱览群书，与学者名流相互讨论，学识更加宏富。著作《文史通义》、《校雠通义》，推演原《官礼》，从刘向、刘歆父子之传中有所收获。章学诚对于古今学术，都能条贯区别而得其要旨，所提出的论点多是前人所未发明的。曾与戴震、汪中一起为冯廷丞宁绍台道署的门客，冯廷丞特别敬重他，给予优厚的礼遇。

章学诚喜欢辩论，勇于自信。他著作《实斋文集》，对于唐宋文体，傲慢地不屑一顾。他所修撰的和州、亳州、永清县等志，都能概述大体，突出纲要，为世人所推崇。

章宗源，字逢之，乾隆五十一年，为大兴籍的举人，他的祖籍也是浙江。曾经辑录唐、宋已亡佚的古书，想修撰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，积十余年之功才完成。然而，书稿被仇

家所焚烧，只保存了史部的五卷。

一百多年以后，有一位姚振宗，字海槎，山阴人。著《汉书艺文志考证》、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，能订正章宗源的失误。又有《补后汉书艺文志》、《补三国志艺文志》两志。于目录学，可称之为卓然大家。议论的人说姚振宗足以继承章学诚、章宗源的学说。

而与章学诚同时有归安人吴兰庭，字胥石，乾隆三十九年举人。研习古事，博学多闻，颇多纂述。曾因宋代吴缜著有《五代史记纂误》，由此再取薛居正《旧五代史》与之参校，著成《纂误补》四卷。同乡丁杰精邃于经，吴兰庭熟习于史，一时有“丁经吴史”的说法。嘉庆元年，与千名老人饮宴。吴兰庭的著述还有《五代史考异》、《读通鉴笔记》、《南雷草堂集》。

(曾贻芬 译)

【原文】

章学诚，字实斋，会稽人。乾隆四十三年进士，官国子监典籍。自少读书，不甘为章句之学。从山阴刘文蔚、童钰游，习闻蕺山、南雷之说。熟于明季朝政始末，往往出于正史外，秀水郑炳文称其有良史才。继游朱筠门，筠藏书甚富，因得纵览群籍，与名流相讨论，学益宏富。著《文史通义》、《校雠通义》，推原《官礼》而有得于向、歆父子之传。其于古今学术，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，立论多前人所未发。尝与戴震、汪中同客冯廷丞宁绍台道署，廷丞甚敬礼之。

学诚好辩论，勇于自信。有《实斋文集》，视唐宋文体，夷然不屑。所修和州、亳州、永清县诸志，皆得体要，为世所推。

章宗源，字逢之。乾隆五十一年，大兴籍举人，其祖籍亦浙江也。尝辑录唐、宋以来亡佚古书，欲撰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，积十余年始成。稿为仇家所焚，仅存史部五卷。

后百有余年，有姚振宗，字海槎，山阴人。著《汉艺文志》、《隋经籍志考证》，能订宗源之失。又补《后汉》、《三国》两《艺文志》。目录之学，卓然大宗。论者谓足绍二章之传。

而学诚同时有归安吴兰庭，字胥石。乾隆三十九年举人。稽古博闻。多所纂述。尝以宋吴缜著有《五代史记纂误》，因更取恭居正《旧史》参校为《纂误补》四卷。同邑丁杰邃于经，兰庭熟于史，一时有“丁经吴史”之目。嘉庆元年，与千叟宴。他所著又有《五代史考异》、《读通鉴笔记》、《南雪草堂集》。

魏源传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四八六

【说明】魏源（1794—1857），字默深，湖南邵阳人。1844年中进士，以知州分发江苏，历任东台、兴化县知县、高邮州知州。太平军起义，因延误驿极被革职，后来恢复原官，不久病死杭州。他和龚自珍友善，同属今文经学派，主张经世致用，反对专作训诂考据，脱离政治、脱离实际的古文经学派。主要著作有《海国图志》、《古微党诗文集》、《元史新编》、《圣武记》等。1826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命编辑《皇朝经世文编》，所选都是在鸦片战争以前清代有关政治、社会和学术思想等方面的论述，以“经世致用”为目的，并筹议各省的漕粮、水利等问题。在《海国图志》中，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扩张殖民地、剥削殖民地人民的事实有所觉察。他代表开明的地主阶级利益，主张“师夷以制夷”，这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影响。

魏源，字默深，邵阳人。道光二年，参加顺天乡试考中举人。清宣宗看了他的试卷，挥笔加以褒奖赏赐，名声因此更大。魏源在参加举人会试中没有考中，主持考试的房考官

刘逢禄赋诗《两生行》对他表示惋惜。所说的“两生”，指的是魏源和龚巩祚。这两个人都由于怀有才学而沾沾自喜，名声也不相上下。魏源出钱捐班在两江总督幕府中任职，到道光二十四年考中进士，发往江苏担任知州，代理兴化县县令。道光二十八年，发生大水灾，督守黄河的河帅将要开启闸门泄洪，魏源据理力争没有结果，便亲自去总督衙门击登闻鼓上诉，总督陆建瀛急速前往勘察实情得以避免，当地的士民百姓因而感激魏源的恩德。补授高邮县令，因为犯迟误驿站邮件的传递的过失被罢官，副都御史袁甲三上奏恢复他的官职。咸丰六年，魏源去世。

魏源意气锋锐凌厉有雄才大略，熟悉朝廷的典章和传统的学术文化，谈论到古今的成功失败利弊病，学术的流派区别，反复论证头头是道，使四座的听者都为之折服。魏源曾经认为黄河应当改为恢复向北的旧河道，到了咸丰五年，铜瓦厢决口，黄河果然向北流入故道。他又写成《筹鹺篇》呈上总督陶澍，说：“自古以来有查缉盐场走私的法令，而没有查缉盐场邻近地区贩私盐的法令。邻近地区贩卖私盐只有降低官盐的售价予以抵制而已。不裁减费用怎能降低成本减少盐价？不改变法度怎能裁减费用？”只由于国家太平已久，阻挠魏源主张的人很多。等到汉口大火灾以后，陆建瀛才极力主张加以推行。

魏源因为清朝的版图广大，武功确实超越前代各朝，因此借阅了史馆中的官书，参考了士大夫的个人著作，将材料加以排比整理，写成《圣武记》计四十多万字。他晚年时遭遇到外国入侵的变故，认为筹办涉及外国的事务一定要了解

外国的情况，又根据史书的志传和林则徐所组织翻译的关于西方各国的《四州志》等，写成《海国图志》一百卷。其他的著作有《书古微》、《诗古微》、《元史新编》、《古微堂诗文集》。

（何双生 译）

【原文】

魏源，字默深，邵阳人。道光二年，举顺天乡试。宣宗阅其试卷，挥翰褒赏，名藉甚。会试落第，房考刘逢禄赋《两生行》惜之。两生者，谓源及龚巩祚。两人皆负才自喜，名亦相埒。源入赀为中书，至二十四年成进士。以知州废江苏，权兴化。二十八年，大水，河帅将启闸。源力争汉有得，则亲击鼓制府，总督陆建瀛驰勘得免，士民德之。补高邮，坐迟误驿褫免。副都御史袁甲三奏复其官。咸丰六年，卒。

源兀傲有大略，熟于朝章国故。论古今成败利病，学术流别，驰骋往复，四座皆屈。尝谓河宜改复北行故道，至咸丰五年，铜瓦厢决口，河果北流。又作《筹鹾篇》上总督陶澍，谓：“自古有缉场私之法，无缉邻私之法。邻私惟有减价敌之而已。非裁费曷以轻本减价？非变法曷以裁费？”顾承平久，挠之者众。迨汉口火灾后，陆建瀛始力主行之。

源以我朝幅员广，武功实迈前古，因借观史馆官书，参以士大夫私著，排比经纬，成《圣武记》四十余万言。晚曹夷变，谓筹夷事必知夷情，复据史志及林则徐所译西夷《四州志》等，成《海国图志》一百卷。他所著有《书古微》、《诗古微》、《元史新编》、《古微堂诗文集》。

顾祖禹传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五〇一

【说明】顾祖禹（公元1631—1692年），清初地理学家。字瑞五，号景范。明崇祯四年（公元1631年）生于江苏常熟，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（公元1692年）。他的家庭是一个地理学世家。高祖顾大栋撰有《九边图说》，曾祖顾文耀，父亲顾柔谦也都通晓舆地之学。在家庭影响下，顾祖禹毕生专攻史地，在沿革地理和军事地理方面的研究尤为精深。

从清顺治十六年（公元1659年）起，他参考二十一史、100多种地方志和其他大量文献，览城郭，按山川，稽道里，问关津，进行实地考察。历时三十余年，写成一百三十卷，三百八十万字的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。前一百二十三卷叙述历代州域形势，以明末清初的行政区划，分述各省、府、州、县的疆域沿革，山川形势，城市集镇，关塞险隘，津梁道路等。后六卷叙述山川异同，“昭九州之脉络”。末一卷叙述分野，阐明天文地理之间的关系。并附“輿图要览”四卷，绘有当时全国总地图，各省分图，边疆分图以及黄河、海运、漕运分图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是中国沿革地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，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。顾祖禹晚

年还曾参与编纂《大清一统志》。

顾祖禹，字复初。他的父亲顾柔谦精通史学，曾说：“《明一统志》对于战争中防守、攻取的要点，大都没有详记山川，条例又支离破碎，缺乏条理次序、因果和来龙去脉也不完备。”祖禹继承父志，撰述了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一百三十卷，凡是官方绘制的地图、各种书籍中承袭了谬误和以讹传讹的地方，他都进行了修订、校正。对山川地势的险要、平坦之处以及古今战役成功、失败的遗迹，都记载得十分详细，对景物名胜却记得十分简略。全书起稿的时候，他才二十九岁，到完成这部巨著时已五十岁了。宁都的魏禧见到这部书，赞叹地说：“这是数千百年来绝无仅有的书啊！”并把他的书和梅文鼎的《历算全书》、李清清的《南北史合钞》称作三大奇书。祖禹和魏禧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他们的友情坚如金石，魏禧死在他乡，祖禹主办了他的丧事。徐乾学奉皇帝之命编撰《明一统志》，他把祖禹招致自己门下，准备向上推荐，但被祖禹极力推辞了。后来祖禹死在家中。（于天池 李书 译）

【原文】

祖禹，字复初。柔谦精于史学，尝谓：“《明一统志》于战守攻取之要，类皆不详山川，条列又复割裂失伦，源流不备。”祖禹承其志，撰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一百三十卷，凡职方、广輿诸书承讹袭谬，皆为驳正。详于山川险易，及古今战守成败之迹，而景物名胜皆在所略。创稿时年二十九，及成书，年五十矣。宁都魏禧见之，叹曰：“此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！”以其书与梅文鼎《历算全书》、李清《南北史合钞》称作

三大奇书。祖禹与禧为金石交，禧客死，祖禹经纪其丧。徐乾学奉敕修《一统志》，延致祖禹，将荐起之，力辞罢。后终于家。